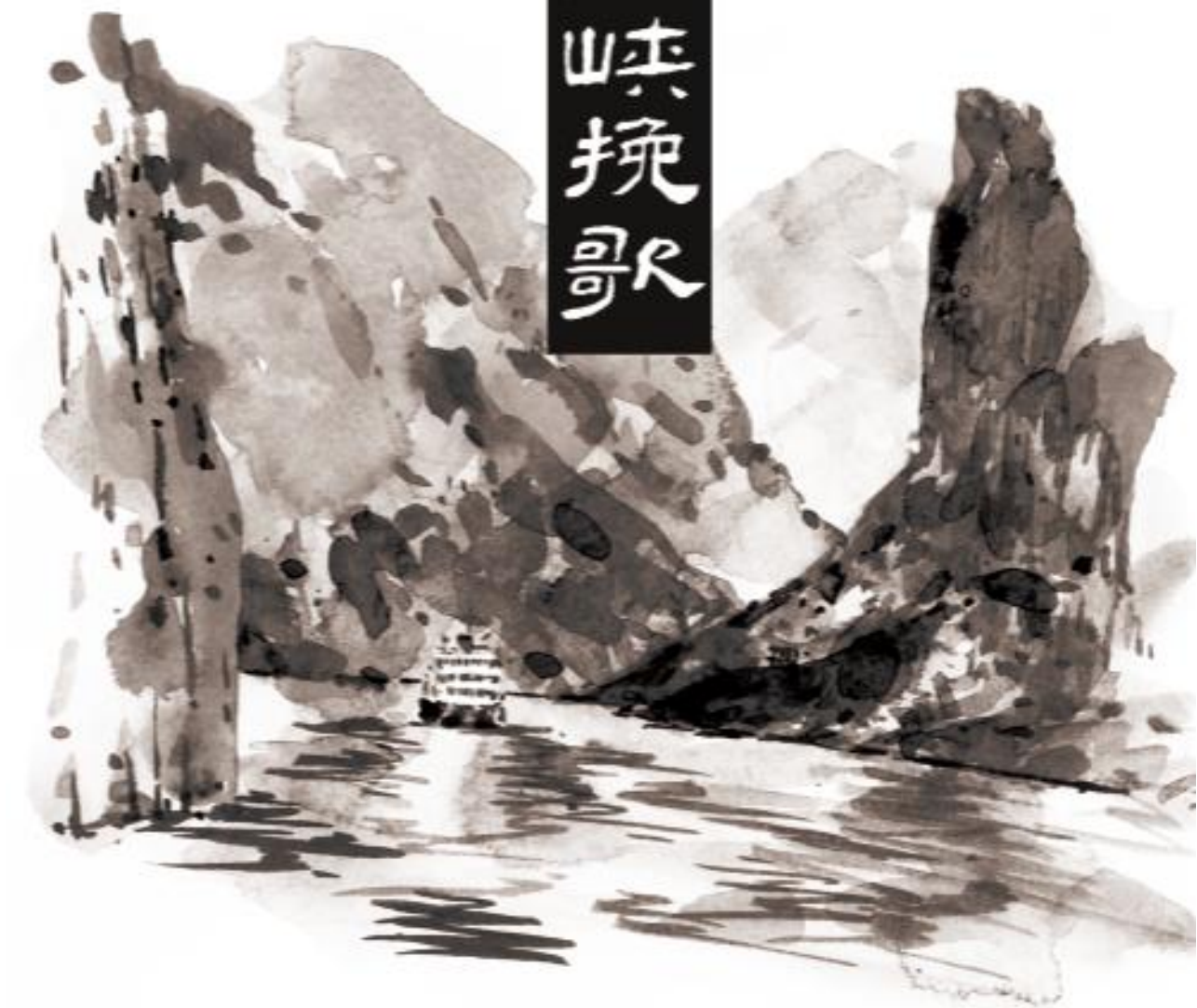
三峡挽歌



◎柳 白 / 著

走吧，到三峡去：

那里是我们先人用生命之血打造的家园。

走吧，到三峡去：那里的浪涛承载过千百万只我们先人驶向今天的航船。

走吧，到三峡去：那里的每一座青山都刻满了我们先人垦殖的足印。

走吧，到三峡去：看峡江上的悬棺，看藏在青山里的陶片；听峡风的倾诉，听远古传来的呼唤……

走吧，到三峡去：最后一次仰望白帝城上的烟树，亲近神女峰上的飘云，燃起屈原祠前参拜的香火，呼吸弥漫在青山翠谷的袅袅炊烟……

长长的三峡，将要收起它的曾感动了万千先人的涛声，与我们作别了。那一队队一船船扶老携幼的移民大军，把缠绕在峡江山水间的绵绵的乡情，一直带向最遥远的地方。

面对别离，我不能沉默。

我要用眼睛和纸笔尽力挽住流逝的时光……

于是，我上路了。

三峡挽歌

柳　白

（内部交流资料　非卖品）

序　言

三峡绝唱

李 锐

读罢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三峡挽歌》，令我感慨万端。

这部书是作者历时 4 年，爬山涉水“走”出来的力作。书中的人文史迹、历史传说、民风民俗，向我们展示了一副人文三峡的长卷。可惜这一切现在都随着三峡大坝蓄水，沉入了江底。诚如作者所言，三峡工程不仅毁掉了长江，也同时毁掉了弥足珍贵的人文三峡，这是十分令人扼腕叹息的。

50 多年前的三峡工程建与不建的论争，虽已成往事，但至今也没有将论争的全貌展示给大家。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旧事，在《三峡挽歌》这部书中做了披露：如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当年曾是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库上马的唯一专家。他认为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将会造成水库上游泥沙淤积，水害上移，后患无穷。后来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可惜他的意见非但无人听取，反遭一片斥责之声，并招致“右派”之劫。但黄万里赤子之心不改，在三峡工程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他再次挺身而出，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论证了三峡工程不能上马的理由。黄万里曾来过我家两次，说过这样的话：“钱正英过春节总来我家拜年（她的夫君是黄的亲戚），可就是不让我参加三峡论证。”

黄万里关于三峡的意见，我向上级反映过。三峡工程定案后，我也曾 4 次上书中央，建议从缓开工。朱镕基总理还就三峡工程问题与我通过一次电话。

现在三峡木已成舟。2002 年 5 月，陆佑楣邀请我去过三峡工地。在工地召开的座谈会上，我谈了两点意见。其中一点是，国家必须考虑到三峡建成后出

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泥沙淤积导致的碍航，以及两岸山体的稳定。我所以强调写这段话，因为听说《李鹏日记》有反映，说我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态度较前有了改变。

再回到《三峡挽歌》一书吧，此书所述的三峡千年往事，既是给当代人的，也可以说是写给后人的。因之，读罢此书，掩卷沉思，我从中品味到的是，这部《三峡挽歌》分明是一首饱含悲凉的三峡绝唱。

最后，以我数年前重踏三峡时所写的一首七绝诗权当做这篇序的结尾：

旧地重来廿二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忠与奸。

目 录

序　篇 / 1

第一部　夔峡雨 / 3

奉节守着三峡的大门——夔门。门里门外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故事：公孙述自称白帝，刘备托孤及其墓葬地之谜，杜甫、陆游留诗，宋濂客死，张献忠造反……这些匆匆人间过客，都是踏着夔门的浪花而来，又随着浪花而逝。峡口间曾经粉碎了几多浪迹天涯游子前程的滟澦堆，也已经消失在不尽的峡涛中。而深藏在夔门深处的长长古栈道以及巴人悬棺，仿佛又向你述说着另一段神秘的历史。

如今的奉节正处在举城大变动的骚动中，先人们筚路蓝缕创建的古城在爆破声中走向最后的毁灭。奉节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将如何面对未来？也许是眼下最难回答的困惑。

第一章　白帝说古 / 5
第二章　诗城之重 / 17
第三章　奉节民声 / 32
第四章　悬棺之谜 / 42
第五章　独走夔峡 / 50
第六章　奉节遗恨 / 59

第二部 巫山云 / 63

巫山名闻天下既在“巫”之玄秘，也在“巫山云雨”这段掌故：想当年，性解放之先驱巫山神女向楚王自荐枕席，两人云雨交欢之后，“云雨”即成为性

爱的代名词。神女，渐而渐之，又衍变成为美好追求的象征。而唐代诗人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诗句亦为巫山赢得名声。千百年来繁衍生息在峡江两岸的巫山人，用他们无畏的探求足迹，记录了巫山动人心魄的历史。

走进今日巫山深处，造访万年神女，随着巫峡渔船在峡江浪里穿行，听刚烈的峡江人讲述惊天血案，于怅惘之中去品味大昌人离乡的凄凉，你不能不会对峡江的文化历史更多一番感慨。

第七章　神女峰下 / 65
第八章　峡江打渔船 / 75
第九章　惊天血案 / 86
第十章　巫山医者 / 101
第十一章　大昌之恋 / 112
第十二章　巫盐沧桑 / 121

第三部　移民泪 / 135

故乡是扯不断的情，故乡是唱不完的歌，故乡是先人播撒的梦境，故乡是游子心中永远的家。今天，百万移民为了大坝永别故土，有谁知道他们远离乡土时内心的凄凉？有谁知道他们异地生存的艰难？报纸电视上的张张移民笑脸是作秀给你看的，不走进移民，你就永远看不到他们从心窝里涌出的泪水。

第十三章　“一发”移民 / 138
第十四章　5650 / 146
第十五章　移住当阳 / 170
第十六章　道心守望 / 188

第四部　巴东风 / 191

巴东，兴许以古代巴国之东得名。巴人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江边的巴东古城，不仅藏着远古巴人的行踪，也是一代名相寇准留痕之地。泛舟贯穿巴东，由湖北枝城泄入长江的清江河，登临秋风亭，能唤起你思古之幽情。叩访巴东官渡口 90 岁的纤夫谭邦武，你就会听到他讲给你峡江行船的百年风雨，唱那扯

动江云远去的峡江号子。

第十七章　临风怀寇公 / 194
第十八章　峡江纤夫曲 / 204
第十九章　巴人何处寻 / 226

第五部　西陵魂 / 237

西陵峡,险滩个连个。三峡中最有名的险滩多在西陵长峡:“青滩泄滩不是滩，崆舲才是鬼门关”。凶险莫测的西陵，是佳丽王昭君的故里，也是诗人屈原的家乡。而 1943 年发生在西陵峡东口的 “石牌保卫战”(被当时媒体称为“东方斯大林格勒大战”)，几乎已被今人遗忘。荒草断碑，悲风萧萧，就是当年为抵御日寇，十数万中华健儿血洒山河的地方。

第二十章　泛舟西陵峡 / 240
第二十一章　新滩之上 / 248
第二十二章　屈原故里行 / 258
第二十三章　石牌大血战 / 265

第六部　大坝梦 / 279

三峡筑坝，据说是几代人的梦想。为了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毫不足惜地淹掉了三峡，付出了巨大的文化和生态的代价。这其中，有科学的思考，有权力的运作，最终不是民主与科学，而是权力与专横获得了“胜利”。三峡之争，并没有随着大坝的兴建而结束,因为作为中国的良知和理性象征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还在，他们在大坝之前树起了中国脊梁。

第二十四章　悲情黄顺兴 / 283
第二十五章　大坝之争 / 288
第二十六章　万里黄河万里愁 / 295
第二十七章　问坝能有几多忧 / 309
第二十八章　98 洪水再回首 / 317
第二十九章　大坝啊大坝 / 323

第七部　峡江挽歌 / 329

大坝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三峡永远地消失了。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深掘与抢救三峡历史，俞伟超等一批文物工作者曾力所能及地做了最后的一搏。结果呢，俞伟超含恨而逝。

三峡工程的所谓“科学论证”，从没有论证过三峡文化和民俗的价值——文化三峡就是这样匆匆离我们而去。如果后人就此向我们发问，这难道是轻描淡写的一个“失误”了得？

第三十章　苍凉之叹 / 331
第三十一章　古峡悲离去 / 338

后　记 / 343

我为什么写三峡 / 345
致友人 / 352

序篇

2001 年 7 月 1 日，奉节。

前晚自重庆登上“长云号”客轮，经过两夜两天的航行，终于临近午夜时分，在奉节泊岸。

走出码头，裹着江风的热浪拂面而来。刚刚在船上听到见到的惊雷和闪电，神话一般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揹着旅包，手提帆布箱，我艰难地向高高石阶上的“依斗门”移动。

石阶上热闹非凡：上下船的旅人，手持竹扁担和麻绳子的脚夫，挑着竹编担子叫卖水果和冷饮的小贩，还有石阶两旁层层平台上的茶座……嘈杂的川音和不时传来的江船汽笛声，令你顿时不由得感到已经真正地走进了峡江的风情卷。

35 年前的“文革”初期（1966 年 10 月），我还是 20 岁的年轻学生的时候，曾乘坐“东方红 34 号” 轮来过这里。

也是临近午夜，舍船登岸。记得码头的石阶没有现在这样高——清冷的石阶两旁的斜坡上，几个摆着地摊的小姑娘，借着小小电石灯的光亮，一声接一声地叫卖着柑橘和竹筷。带着相当力度的秋风里，这柔弱的声音格外显得凄凉……

今是而昨非，昨是而今非。人世间，云翻雨覆，总是如此变化无常。我哪里料得到，数十年过去，这座有着厚厚文化沉积的

2300 年的古城，连同三峡两岸其它名城古镇一起，即将要随着“三峡大坝”的崛起而永久地沉入江底。120 万峡江人，随之将陆续离开他们世代生息繁衍的故土。

我再次来到峡江，带着一种朝圣般的感情。我不知道陆续告别家园的峡江人，背对那静默在江边的老屋，那缀满金黄脐橙的老树，那在晨光中升腾着雾气的老井，那一座座掩没在萋萋荒草中的祖坟，该是怎样悲壮地回首做最后一眼眺望。

我猜想，当载着移民，响着声声汽笛的每一艘客轮顺流远去的时候，整个峡江里便会一次又一次涌满了浸透泪水的乡愁——对于峡江的子孙来说，这是此生此世刻骨铭心的离别。

第一部 夔峡雨

清晨，江上蒸腾的云雾刚刚散去，抬眼就望见山如斧劈门似天然的夔门，和那江水滔滔呼啸而下的夔峡。

这里是三峡的起点，也是三峡历史的开篇。我奔它而来，是要亲自抚摸夔峡的雨丝，叩听百丈夔门历史的回声。

夔峡，亦称瞿塘峡、广溪峡。是整个三峡自西向东的第一峡。今立在白帝乡白帝村西北 120 米处的明代碑刻有曰："瞿塘关乃全蜀之咽喉"。可见夔门夔峡地势之重。

瞿塘得名由来，《夔州府志》云"瞿，大也；塘，水所聚也。又，秋冬水落为瞿，春夏涨水为塘"。

瞿塘峡西起白帝城东至白果背总长 8 公里，涨水时最宽江面可达 150 米；枯水时节，峡东口的南北黑石间宽度不足百米。奉节城如同守峡卫士，落在峡西口夔门外北岸的坡地上。

瞿塘峡之所以亦被唤做夔峡，先要明白"夔"字究为何意。《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夔"为兽的最早记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亦称夔龙。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椠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但其后"夔"为兽之说，又有了多种版本。至清代马啸所著《绎

史》卷五又说“黄帝战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历代所传夔龙也好、夔牛也罢……都传达了一个以其皮制鼓，声壮如雷的信息。而踞守在夔门入口处的滟滪堆，因江水与堆石撞击，恰似轰天雷鸣，故尔夔门之称言之不虚也。滟滪堆，亦称燕窝石，立在门前偏北处。堆石长约 30 米，宽约 20 米，高则达 40 米。千里奔泻直冲夔门而来的江水至此受阻，雪浪冲天，喷涌咆哮。江流因之极不规则地翻腾回转。随着不同季节滟滪石出水的大小，决定了人们对其戒备提防的程度。杜甫诗云：“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更有民谣唱道：“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象， 瞿塘不可上。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

关于“滟滪”得名的由来，古人李膺在《益州记》载“滟滪堆夏水涨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近，故曰‘滟滪’。又曰‘犹豫’言舟子取途不决水脉，故犹豫也。”

光绪年间的《奉节县志•山川篇》记述“滟滪堆，立在瞿塘峡口，中流之巨石也。左右漕口两道。每年自四月起至十月止，江水泛涨，水淹大石，喷漩汹涌，波浪曲折，船被水摧，往往触石而碎，其深无底，为大水极险之滩。”

南宋淳熙四年（公元 1177 年）任四川制置使的诗人范成大自成都奉调东返乘船途经夔门滟滪堆曾记下切身体验“摇橹者汗手死心，皆无人色……每一舟入峡数里，后舟方敢续发。水势怒急，恐猝相遇不可拆也。帅司遣卒执旗，次第立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则簸旗以招后船”。

滟滪是横在江中的魔鬼，但古人却对它表现了出奇的宽容。历朝历代描述它的诗文，浸透着的只是一种怀有敬畏之情的告诫。即使在火药已经问世的宋代，也没有人想到将其毁灭。它立在江中千万年，凝结了一部厚重的峡江史。

只可惜引来古今墨客诗情文思的滟滪堆，已经在 1958 年 11 月被 20 吨炸药夷平。当地人说，滟滪堆极其壮烈迸散的那一刻，巨大的浪涌翻上远在上游十里开外的奉节城。

今日乘船西来，从浪涛之上遥望，不见了滟滪堆的夔门，似乎缺少了生命与死神对决的味道。一切都显得过于平静。但你走到岸上去看，走到峡江人的心灵世界里去想，你仍然能感受到，千年万年，战争和天灾，“平静”从不属于这块土地。尤其是近几十年三峡工程的“上”、“下”之争，让峡江人身不由己地度过了年复一年的动荡的岁月。

第一章 白帝说古

1

话说夔峡之前，先要说说地扼夔门口外的奉节。此城公元前 1066 年，因巴人助周武王伐纣有功，曾为巴国封地，始为鱼邑。至东周文公十六年（公元前 611 年）更名鱼复。

鱼复作为地名，现今仍保存在奉节城东南，流入长江的梅溪河口，靠近江北岸八卦碛上面的一块缓坡地上。得名鱼复由来已久：一种说法是“言鱼至此回复洞庭”也。这块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却曾有过轰动中国考古界的发现：1999 年秋冬，此地地表以下缺乏文化遗物的 6 米深的土层下，找到了一处含有少量打制小石器的遗存。中含一片红烧土，旁边出土了一小块夹粗砂的红褐陶（长、宽、厚分别为 3.6 厘米、9.17 厘米、0.74 厘米），火候很低，捏制成形。虽然一块单片尚难确定此物是鬲是罐，但因为它是陶片，而且是我国已知陶器最原始的一种制作方式的产物，也是至今为止三峡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陶片，因之倍受考古界瞩目。据中科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鉴定，此陶片年龄当为 8000 年。以这块陶片为基点，我们就可以断定，三峡入口的夔门在 8000 年前已经有了原始人群的活动。并且其文明的程度与同时期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文明的基本同步。完全可以这样说，这一小块陶片，让我们找到了三峡文明发端的起点。

当代考古名家俞伟超先生曾评价说“奉节县鱼复浦遗址……找到了一片用手捏制的陶片，年代约为 8000 年前，是三峡地区首次找到的新石器时代之初的遗存，可能将要解开长江上游地区从旧石器过渡到新石器之谜。”他还说“这样的遗存，当然不可能仅此一地，一定还存于一片相当广阔的地段中”——可惜俞伟超设想的这“一片相当广阔的地段”的大部，因修三峡大坝终成为水下龙宫，永难再见天日。

至于奉节县的名字来历，有几种说法。一般认同的是大唐贞观二十三

（公元 649 年），为尊崇诸葛亮奉刘备“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之忠，遂更名奉节。奉节所以名闻天下，实则即源于此。

过往舟船出入夔门，人们都要抬头仰视夔门口北岸白帝城的那座孤峰独峙葱茏如盖的白帝城。望山顶上天云飘荡，看山腰和山尖上闪露出来的亭台楼阁。白帝城引人浪漫遐思，皆源于城上有一座演义三国故事的“托孤堂”。

其实，现今的白帝城与三国与刘备托孤毫无干系。白帝得名更早于刘备托孤 200 余年的东汉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当此时公孙述据西蜀为王，因见此地一口井中常有白气升腾，宛若白龙，以为祥瑞之兆，遂筑城自称白帝。《后汉书》载，公孙述，字子阳，本为陕西扶风茂陵人。出身官宦世家。少年即为清水等六县县令，且“政事修理，奸盗不发”。王莽天凤年间（公元 14 至 19 年），其又被派往四川导江等地出任太守，仍是“复有盛名”。稍后，王莽新朝搞得天下大乱，公孙述乘机荡尽川中诸雄，自立“蜀王”，建国号曰“成”。当其时，包括后来称帝的刘秀在内的中原各路豪杰，尚无人能与其争锋。其部将荆邯劝他，趁中原群雄混战，应尽快兵分两路：一路出汉中，定三辅，一路下长江，占吴、楚，天下可尽得囊中。公孙述本已心动。但其弟公孙光又从旁耳语，告之不可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一举，而失掉易守难攻的“天府之国”，公孙述终未成行。

公孙述称帝后，用了一帮贴身拍马的小人“唯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加之其“恣淫过度”，渐失民心。

待到刘秀平定中原，翻过手来将目标直指蜀中公孙述之时，公孙述已是无力回天，悔之晚矣。但他还是挣扎了一番：刺杀刘秀麾下的几员猛将；蒙骗百姓说米仓里凭空突然米谷如流，源源不断……最后刘秀大军兵临成都城下，拒不投降的公孙述念念有辞“废也，命也，岂有降天子哉！”，仍以天子自居。结局自然是其“被刺洞胸堕马”而呜呼哀哉。

爱弄小巧，鼠目寸光的可怜公孙述，最终只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然其死后，仍有不知好歹之人在白帝城为其建庙。宋人张珙还以隶书题“白帝庙”三字于庙门。直到明正德五年（1510 年），四川巡抚林俊以“正统”观念将公孙述定为“叛逆”，毁像改祭土神、江神及汉将马援，庙名亦更为“三功祠”。再过 22 年，明嘉靖十一年（1532 年），仍是以“正统 ”为标准，改“三功祠”为“义正祠”。始祭“蜀汉昭烈帝”及“蜀汉丞相诸葛亮”。再经 25 年，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正统”又好事的巡抚段锦又增设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祖孙三代泥像，并将“义正祠”更名“明良殿”。至

图 1.1 刘备当年托孤之地永安宫遗址

图 1.2 2001 年时的白帝城远景

此，“白帝庙长祀蜀汉人物”的格局，一直延续下来。再至清同治十年（1871年），奉节知县吕辉重修白帝庙，终形成现今规模的白帝城。“文革”后白帝庙，干脆将“明良殿”直呼“托孤堂”，并摆上一组带托孤情节的彩塑。将三国演义中的“白帝托孤”，移花接木，公然从奉节城永安宫搬进白帝庙。游客千里迢迢至此，既见“白帝庙”，又见“托孤堂”，自然以为来到刘备托孤的实处。“有关人士”乐得赚一笔大钱，谁也不愿将“托孤”真相点破。

7月，峡江多雨。从奉节往白帝城因无公共汽车可乘，只好在县政府门前租了一辆“面的”。不用讨价还价，包括跨过梅溪河的“过桥费”，总共30元。一路行来，还算平坦。但一过梅溪河，入了盘山道，滑坡与落石使得本就狭窄的路面变得泥泞起来。“面的”扭来扭去，像跳摇摆舞，总算开到了白帝城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自此可选择高低两个进口入白帝城。当地人说，要看白帝庙，拾级上山，走山上的门是条省力的捷径。如果走下面的入口，经观音洞上白帝庙，那可是峰回路转，要费老大气力——我选择了前者。

雨中，撑着小伞，登过数百石阶，高悬着“白帝城”三字横匾的一道方门赫然出现。欲进门，数十元的门票自不必说。要紧的是，进门走不了多远即到了白帝庙门前。因在影视中早已相识，此庙对我并不陌生。

雨天仍有旅游团队前来——他们是乘旅游船从江上来的。导游小姐手持扩音器引着队伍直奔庙中“托孤堂”。指着“托孤堂”里摆放的那组彩塑，煞有介事将“托孤”往事讲得惟妙惟肖。游者全神贯注听得有滋有味。蒙人的和被蒙的彼此都得到无限的满足。

抛开刘备真正托孤地在今奉节城里的永安宫不说，以真正史家眼光评判公孙述和刘备，他们实在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皆为平等意义上的争夺天下的政客。问题在于最早被祭祀的公孙述何以被逐出庙门，而被迟来200年的刘备占尽风水，独领风骚。说是根植于国人骨髓的“正统”观念，使我们从根本上扭曲了历史，似乎过于概括。如若将此等“正统”解剖为丝毫不知何为自尊的“奴性”，也许更准确：多少代“习惯”了被刘姓皇帝主宰生死，刘姓皇帝一旦倒台，当不成刘皇帝的奴才，心里反倒不习惯。若有姓孙姓曹的外姓人欲要争权取势夺得天下，理所当然被视为“逆贼造反”，举国共诛之。但翻阅三国演义，仔细揣摩书中的情节，即可发现，书中所写的结义于桃园的刘、关、张加上诸葛亮（也包括曹操和孙权），一样是杀人如麻的魔王。像关公欲杀人前，口言道：“吾杀汝，犹杀狗彘耳，空污刀斧！”；像张飞，听闻结义兄弟关云长被害“旦夕号泣，血湿衣襟”，整

日酩酊大醉，拿他人泄气而鞭死多人；像刘备，指使张飞之子张苞“将范疆、张达万剐凌迟”之后，仍然“怒气不息”；像诸葛亮，虽然有时杀人前，也滴下几滴鳄鱼的眼泪，但谁能说，他的“智慧”终极不是为了更多地杀人……刘关张及诸葛几位“大人物”眼中的所谓“义气”，除了他们自己的性命最值钱外，其他人的生命，简直不如一棵草。

三国逐鹿争夺天下的历史已过去快两千年，那个时代的人物皆已烟尘迸散。魏帝曹操不知归葬何处，独葬南京东郊梅花山的吴帝孙权之墓，也早早即被夷平灭迹。唯独刘备之“惠陵”，森森然立于成都郊外。岂止刘备，与刘备命运相关的诸葛亮、张飞、关云长，个个也都化为神仙，被世代颂扬。张飞有“桓侯庙”、 “张翼德庙”、还有立于长江南岸云阳县的“张飞庙”——张飞俨然成为“义”的楷模；关羽则在北方成为农家的“门神”，在生意场上成为“财神”，在浙江、福建沿海成为渔民出海的“保护神”。诸葛亮则化为民间聪慧的代名词。所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是矣。

我曾在福建东山岛的关帝庙，亲见台湾渔民叩拜关帝；我也曾在诸葛亮寂灭处五丈原的武侯祠，见两位大娘手里各摆放着两个画着人头像的鸡蛋，虔诚无比地向诸葛亮大人磕头求助……

三国演义本是历史的倒错。倒错至今，仍然倒错。因为我们“正统”文化里沉淀了太多的奴性和仇杀，已经很难寻到宽容和公正。而缺少宽容和公正，使我们的精神空间变得愈加龌龊和狭小。

白帝庙前有位中年妇女养着一匹白马，供游人照相留念，照一次两元，照多次少给几元也行。有几个日本人打着伞骑马照相，美滋滋。照完相翻译兼导游说，这几个东西是和中国友好的日本朋友，旅游局领导说不许收钱。中年妇女露出一副非常可怜的表情，却无可奈其何。

白帝城上我见到了人工嫁接后的历史，它像没有根基的天上的云，虚无又缥缈。

2

《三国演义》说刘备托孤病死在白帝城。其实，书中所指的白帝城乃在今奉节城内的永安宫。当年刘备大军在猇亭被东吴火烧连营 700 里，大败而逃。由赵云护送日夜兼程逃难至此。山高路险，正值暑天，又惊又吓的刘备病倒在此是顺理成章的事。

永安宫因地处永安镇得名。镇名一直延续至今。该镇当初应是没有几

户人家很清静的地方。所以从长江上，即可望见现今已完全隐没在奉节城杂乱的房舍间的宫墙。唐人杜甫诗“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及至宋代宋肇《重葺三峡草堂记》“荒烟野草，废宫旧戍，远树平芜，孤村别浦；牧童渔父，棹歌牛唱，深林巨谷，重崖复岭”都有对其景象凄凉的描述。

今日临江依山的奉节热闹非凡。下船走上约 200 个石阶，迎面即是明代成化十年（公元 1474 年）筑建的城池中最负盛名的“依斗门”（亦称大南门）。依斗门往东临江处另有一个“开济门”（亦称小南门）。此前，这两门上还曾分别刻有“纵目”和“观澜”四字。两座城门后来的命名皆出自老杜之诗。“依斗”撷采于“每依北斗望京华”句，“开济”则取自“两朝开济老臣心”。奉节城古有“全蜀东门”之誉，是出入川蜀的重要关口。明清两朝过往的商船，运送举子出川应试的客船常常泊满江面。川人曾流传“某某学问出不了夔门”，足见川人把走出夔门看得有多重。

从依斗门进奉节城，即可见人流滚滚。一道跨街的横幅即刻跃入眼帘“来到奉节城，万事能办成”。而 40 多年前的大跃进时期，相距不远的地方张挂的横幅写的是“下决心，立恒心，不达到先进不甘心”。

大跃进是个梦幻和灾难共生的时代，标语上的“决心”、“恒心”、“不甘心”之类的不负任何责任的“客里空”，你也就当个笑话听听罢了。但今天的“来到奉节城，万事能办成”仍然是句吹破牛皮的大空话。前后 40 余年，为官从政的领导假大空的恶习没见有太多的改变。

暂且回避“假大空”的讨论吧，还是把目光先对准行将消失的奉节城。

奉节不仅是个“诗城”，实在也是个盛满历史之谜的古城。明代以前堂堂奉节县署置于何处，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现有史、志竟毫无记载。还有奇妙的天坑及夔峡悬棺，亦无说处。唐代诗人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哀怨之情更包含了太多的生命消散之谜。

2002 年 4 月，我第三次往奉节采访，又见识了一件让人费解的黄桷树接连“杀人”的奇闻。

因三峡工程二期截流日期紧迫。奉节江边的一棵千年黄桷树需要“搬家”。此树高约 18 米，重达 40 吨。4 月 20 日，为古树“搬家”的工人才刚掘出树根，千枝万叶的大树即突然倾倒。两名掘树工人来不及闪躲被砸倒在树下，当场气绝身亡。

古树被掘出地面之后，锯下树冠和长长的根系，吊装上船，又连续砸

断两条大船的船舷。千辛万苦，将古树运抵新家璧山县正兴镇。该镇一位谭姓老板以7万元高价买下此树。并早早给它挖好了一个直径4米的大坑。4月25日下午3时许，一切准备就绪，开来两辆重型吊车，准备将古树吊埋。哪知两辆吊车合力刚将树干吊起，粗粗的钢缆就被挣断，垂落的树干狠狠把其中一位吊车司机砸烂。

千年黄桷连续“杀人”，当天被拉走扔到附近一砖厂的角落，无人再敢问津。

有人或许会说，黄桷“杀人”纯属没有逻辑关联的巧合。但我说，树迁之难尚且如此，况人乎？

3

奉节也许天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留下一个又一个历史谜面，让后人去找寻谜底。

奉节老城座落在江北迎江一面的山坡上。太阳悠悠将要坠入万山之前，站在江边看山，看水，很容易想体味到《三国演义》开篇词的意境：“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风平浪静之夜，临时雇上一条小机动船，荡向东边的瞿峡深处，听江水拍打船舷，看星汉灿烂于天河。运气好的时候，可以赶上明月从峡中桃子山后升起。置身若此，大有“智可谋人，不可谋天”之慨。

与奉节有过关连的人物可谓多矣。仅历代诗人就可以举出一大串：李白、杜甫、陈子昂、刘禹锡、苏东坡、黄庭坚……。奉节本土人士值得提及的名人只有一位：两袖清风的好官刘正品。此公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总办秋审案件。曾平反多起冤案。其中最著名的案件当属“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而死在奉节的名人，有案可稽的共有两位。刘备而外，另一位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师宋濂。他是因明初朱皇帝为宰杀开国功臣刻意制造的“胡惟庸案”，其长孙宋慎受到的牵连，转而株连宋濂。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全家被流放茂州。转年，宋濂于流放途中染疾病死在奉节，葬于莲花峰下。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宋濂遗骸又被迁往成都东郊（“文革”中又被扒坟扬尸）。

妇孺皆知，埋葬刘备的惠陵现在成都。但刘备死后果真葬在成都吗？

在奉节古城中，这是最富有吸引力的历史悬案。

我在奉节，没有官方接待——与往常的采访一样，从来是天马行空的独行侠。但采访刘备墓葬之谜，我必须向行家请教。

奉节是个小城。顶多转上个把小时就能把整个城区转遍。从我住的“诗城宾馆”——如果也可以叫做“宾馆”的话——走上十分钟，即到了考棚街。相传刘备托孤的“永安宫”，就在这条街上的今奉节师范学校里。进了校门，穿过一片开阔地，往前一直走 40 米，登上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个石阶，就是现今重建的形似汉阙的永安宫宫门。窃以为此宫可以径直而入，哪知一位老汉立在黑漆的大门中央，平伸双臂将手掌张开冲向来者——不用问，门票 10 元。与他讨价还价，彼坚持一块不能少。想讨张门票做纪念，老汉回答很干脆“没有！”

我从北京千里来此实在不易，甭说十块，就是二十块也得拿出来给他呀。进得门来，请老汉说说永安宫的来龙去脉，老汉答曰：“刘备就是死在这个宫里头，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其它再也无话。

真正永安宫，历经兵燹，原址早已无存。现在的永安宫本是清代奉节县文庙的大成殿。因在其侧出土了两块石碑：一块清碑上书“***故址……知夔州府事长白诚瑞并记”；另一块民国时期的碑刻上书“*安宫故址……**县县长杨乃斌重刊”，而被认定为永安宫旧址。

刘备托孤之事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 蜀志•先主传》“（章武）三年（公元 223 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至宋代陆游《入蜀记》载“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谓鱼腹永安宫也。宫今为州仓，而州治在宫西北，甘夫人墓西南”。陆游入蜀，为南宋干道六年（公元 1170 年）。初到夔州，陆游还不大可能深解刘备墓葬由来。但他记下甘夫人墓在宫址西南，却无意为刘备究竟墓葬何处埋下伏笔。历史上有关刘备墓葬地之争，起于陆游之后的宋人任渊。任渊考证成都惠陵乃“昭烈弓剑所藏之地”，而非刘备实葬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因三峡筑坝的风言渐起，峡中文物埋积将被淹没，刘备葬地再次引起专家学者关注。曾任奉节县文化局副局长的李君鉴女士，为此在四川、重庆、湖北搜集了 16 种版本的《刘氏族谱》，其中有 10 种族谱上皆有关于刘备葬地的记载。四川江津族谱道：“世祖公刘备字玄德，谥昭烈，称帝成都，遗址尚存。公终于白帝城，葬于夔府城内后花园内，生铁封其墓，有花亭为记”。奉节族谱载“太祖刘备字玄德，号汉昭烈

帝，终于夔州府白帝城。葬在夔城衙后花园内，是穴熔铁铸封其墓，为铁墓志”。

为探究此说虚实，1985 至 1986 年间，安徽省文物探测队，四川省地矿局地质工程队专业人员曾对甘夫人墓葬进行了超声物探，发现地下约 20 米深处有长 1 米余，宽 0.5 米，位置略倾的一个铁块，这正与多部《刘氏族谱》中的记述的“铁墓志”吻合。而且，在附近还探测到一个长 15 米，宽 4 米，高 5 米和一个长 18 米，宽 2 米，高 4 米的两个地下洞穴。此发现一时引起相当轰动。

说它轰动，因为对这个发现，有两种截然相悖之见：一说，据陈寿《三国志》和常璩《华阳国志》，刘备葬于成都言之凿凿，且二人成书年代距蜀汉不远，记述不会有误。另一说以为，刘备病死奉节为四月。五月，翻越千里蜀道将遗体运往成都。此时正当气候炎炎，加之交通极为不便，问题多多。刘备原配甘夫人即刘禅之母，早年病逝葬在南郡（今湖北荆州），刘备生前派人迁其遗骨，溯江而上，船抵奉节时，刘备已死，遂合葬于此。以此推论，奉节县政府所在地探测出的两个地下建筑结构，很可能即是刘备与甘夫人的合葬墓。

1998 年 5 月，学界人士齐聚奉节，就刘备墓葬真伪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争讨。双方各持一说，结局是不欢而散。

我到奉节，渴想实地看个究竟。去寻甘夫人墓，人家告诉我，甘夫人墓原在奉节县府第二招待所院内，解放后尚存。墓为条石围砌的圆锥形，上有八角亭盖，墓碑约高 1.5 米，宽 1 米，碑文上书“汉昭烈甘皇后之墓”，阴文大篆。惜于轰轰烈烈的 1958 年因土建，墓毁碑亡。现今的甘夫人墓上，已堂而皇之地立起了一座现代化的“皇恩楼宾馆”。据说，宾馆及宾馆周围前些年大兴土木过程中，曾多次挖出极似墓道的通道，并且条条通道均指向“刘备之墓”。

但在 1998 年 5 月那次关于刘备墓葬真伪的研讨会上，有人发言说某些人借此会“想利用修三峡之机，要求国家拨款对地下墓葬结构进行发掘”“炒作”“大造舆论”。

不大明白如此之见的先生究有何想。我倒是以为，过去的历史不能再现，留下的陈迹不能复生，即便“利用修三峡之机，要求国家拨款”搞清刘备墓葬的历史悬案，又有什么不好？

现在的永安宫是个 100 平米的小院。有重建的“托孤堂”，有一道由永安宫旧址出土的历代砖石碎瓦残片砌成的“寻古墙”，还有一个模拟传说而

造的“许由洞”。但这个“许由洞”，既不“聊斋”，又不文化，从头至尾让人只有一个字的感觉——俗。

关于许由的故事，也是奉节县名由来的另一个说法：话说刘备死后，与原配甘夫人合葬于府衙内后花园。诸葛亮妙运神机，算定 500 年后某月某日定要有人盗墓，故在墓内巧设机关。果不其然，500 年后这一天，来了一位叫许由的贪官。此人粗通经史，知道屡经战乱的永安宫的地下肯定埋藏着宝物。一日，他偶然发现县衙大堂座位下有一块石板别具异彩，便趁夜深人静之机，让妻子帮忙，揭开石板，见一深洞。他点着灯笼往下一照，还有一个石梯。顺梯直下洞底，许由大喜过望，竟然是蜀皇刘备与甘夫人合葬墓。他心想这可要发大财了。谁料突然刮起阴风，墓前的闪闪的长明灯里突然飞出一张纸条，不偏不倚悬在其面前，纸条上写着“许由许由，无冤无愁。私开吾墓，给我上油!”后面还有一行小字，大意是 500 年前的诸葛亮早料到 500 年后有人盗墓，故托造墓人代甘夫人藏条于此。

500 年前的诸葛亮料事如神，顿时把许由吓晕。等他读完纸条。长明灯渐渐转暗。哆哆嗦嗦的许由，连忙唤人添油。岂想小小灯窝犹如无底洞，一碗、一壶、八桶十桶倒下去仍不见满，长明灯总如将要熄灭状。许由又急又怕，惨惨阴风中，仿佛见到群群鬼怪向他扑来，吓得昏了过去。他的夫人为保全丈夫生命，不得不拿出家中所有应得与不义之财把全城的油买尽，一桶桶倒进灯窝。许由渐渐睁开眼睛，但见纸条还悬在面前，动也不动。许由夫人忽又想起家中还有梳头油可用，赶忙抱来，一滴不剩再添进灯窝，这招终于灵验了。长明灯由暗转明，纸条也飘进灯芯化做袅袅轻烟。昏厥的许由这才清醒过来。

经过这场惊吓，许由从此转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清官。到他卸任时，许由将这段经历原原本本告诉了接任的新县令，并亲笔题写了一块“奉公守节”的额匾相赠，这也就成为了“奉节”之名的一个由来。

今日之人造许由洞，只是黑洞洞阴森森吓唬小孩子的游戏，反正我钻进去又钻出来是又上一当的感觉。

4

2002 年 4 月，我再次抵临奉节，还没有听说深挖那两个据传可能是刘备的墓穴。除开上了水码头抬头可见的那个“来到奉节城 万事能办成”横幅标语原地未动，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城内人心惶惶，处在搬迁前的大震

荡之中。宾馆只可住不供水，街头到处是迎风飘摇的标语，到处是清仓大甩卖。什么“告别古城，老城千禧火锅特大优惠，推出自助火锅每位 18 元！”什么“老城拆迁，服装五折大甩卖”……奉节师范学校已搬迁，本来还算清静的永安宫前，那三棵四人方可合抱的古树周围，已成为临时集贸市场。中间那棵古树的石碑，被围困在几个出售廉价电器和鞋帽的塑料大棚中。永安宫大门仍然开着，但门票涨了价，还是那位看门的老者，张嘴两个字“20 元！”我不怪老者要钱的语气和姿态，他要钱的方式毕竟让你眼见心明，自有其道理。此回到奉节，最令人叹息的是，再没有听说有谁还在关注刘备丧葬之谜。这个谜必将沉入江底。

5

除了永安宫和白帝城，奉节的古迹还有许多。老城上面的奉节中学里还有一个卧龙岗。传说，诸葛亮当年来奉节探视重病中的刘备，即结营于此。后来至南宋王十朋，他是陆游往任奉节知夔州通判前 3 年（公元 1167 年）才离开此地。同在夔州任职，比起陆游，王十朋更为奉节百姓怀念。

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浙江乐清人。宋高宗时曾考取廷试第一。乾道元年（公元 1165 年）七月由饶州奉调夔州，至乾道三年（公元 1167 年）七月离开，整整三年期间，他为夔州百姓做了几桩深得民心的好事。有诗赞曰“省赋除马纲，捐缗利井堰”。宋代称大宗货运为“纲”（如《水浒》“智取生辰纲”）。“马纲”指战马经水运出川，夔州为集中地。但三峡滩多水险，常有马船倾覆江中。王十朋为此两次上书朝廷，请改水运为更安全的陆运，以减轻人民负担。任期内，他还捐奉带领百姓兴修水利；此外，为解决住在奉节城百姓饮水困难，他还在前面提到过的诸葛卧龙岗修建了颇具规模的引水工程，赢得举城民众欢呼。有其诗为证“接筒引水下山陬，端为夔民百姓忧。长使义泉名不断，莫教人费一钱求。”那个年代，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能为穷人鼓与呼的官人，虽说不多，总还是可以常见。

时光过去近 900 年，卧龙岗仍安卧在奉节中学校园最后面的高坡上。丝丝细雨中，穿过一道铁栅栏门，顺小路走上高坡，昔日取水的陶管还在，几块刻石孤零零立在无声的清风里。卧龙岗更高处被圈在学校院墙外，据说站在那里可以直接望到长江。惜无此福分，只得罢了。自卧龙岗下坡，则是整整一长廊碑刻：吟风弄月者有之，赞美园丁者有之，颂党颂国者有之——厚今薄古，卧龙岗几无旧时模样。

今日奉节城里，王十朋的名字已经少有人记起，但奉节人以王十朋号梅溪将流经白帝城下的西瀼水改名为梅溪河，则渗透着永恒的思情。

梅溪河出口与长江交汇处，岸上是前面提到的鱼复浦；江上就是有名的八卦碛，俗称水八卦或八阵图。当年“踏碛”之日，这里也是王十朋与奉节百姓同乐的地方。

“踏碛”由来：相传三国夷陵之战，东吴大将陆逊追击败逃的刘备至此，陷入诸葛亮事先布置于江中的八卦阵。多亏诸葛岳父黄承彦指点迷津，得以出阵退兵。杜甫曾有诗叹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此八卦碛，亦称“臭盐碛”，实则是与江北岸相接的 800 米宽 2500 百米长的一片乱石。枯水时节，乱石碛上，有盐泉涌出，人们纷纷在碛上取卤熬盐。届时此处炉火熊熊，青烟腾腾，蔚为壮观。

魏晋以来，奉节人为纪念诸葛亮逐渐形成了“踏碛”的民俗。每年“人日”，即正月初七这一天，奉节城官民步行 20 余里，争来八卦碛游乐，或野炊，或对歌，或放风筝于此。妇女们则在碛上捡拾小粒石子，回家后将石子凿穿做饰品，以图一年吉利。王十朋有诗描述此胜景“好遨蜀风俗，夔人贫亦遨。今日日为人，倾城出江皋。遨头老病守，呼宾酌春醪。归来及初鼓，繁灯照双毛。”

踏碛之风延续千年——大概因为奉节除了江边踏碛也实在无地可游可去——至“文革”而消亡。近几年稍有复苏。但三峡蓄水后，八卦碛将永久沉没。踏碛也就变成了回忆。

本以为八卦碛还在，还可以赶上来此踏一踏。但又宽又长的八卦碛只在江边冒出几块黑色礁石。梅溪河与长江交汇处现在是游览白帝城的游船临时停靠的码头：想见到的什么都不见了，最不想见到的将很快让你见到。

伴随着一个城镇的毁灭而消失的民俗后面，归根结底是浸透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的文化基因的流失。民俗是与地域密切相关的对于情感的艺术表达。而这种情感是漫长的历史积淀——其形成不易，毁灭却也过于彻底和轻率——其后果是什么，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

第二章 诗城之重

1

你可以不知道奉节，你绝对应该知道这样一首唱彻古今的短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安史之乱”中错投了唐永王李璘的李白，在被发配夜郎途中遇赦。归途中泊宿白帝城。清晨驾舟急流而下，望见白帝城上彩云飘飘，心潮激荡，写下了上面那首被称颂为天下第一快诗的《早发白帝城》。

其实，号称“天下第一快诗”的还有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另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两首“快诗”前一首是个人情感的释放，后者是叛军已平，报国有望的欢欣。虽同是“快诗”，李白比之杜甫总是差了一个精神档次。后人说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实为确评也。

座落在三峡入口处的奉节，像是向游子张开的温暖的怀抱，像是让经受风雨吹打的小船靠泊的港湾，给羁旅中的李白、杜甫还有后来的陆游等每一位亲近它的诗人，送上了这座小城馈赠的盈盈暖意和脉脉柔情。

细雨霏霏，无论走在奉节街中小巷被雨水打湿的青石板路上，还是漫步于大东门那段残存的古城墙边，总会油然从心中升起淡淡的诗情。陆游那首描述游子踏上归途时心境的七律，一次次涌上我的心头：“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可以想见当年远离家乡，“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的诗人，乡情是何等的绵长！

2

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之后的第七年，唐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此时距“安史之乱”平息也有三年——归心似箭，因路途艰辛，百病缠身，杜甫一家在夔州（今奉节）落脚。这一年，他 52 岁。

杜甫在夔州，自公元 766 年春末至 768 年初，共一年零九个月，写下了 437 首诗篇。其中多首诗作成为杜诗中的绝唱。奉节人自称“诗城”即源自于杜甫。

很小的时候读唐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读“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唐险过百牢关”，读“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读“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后，随着心境的不断变化，渐渐能体味出诗句中包容的悲情。

我不能准确地解答当年北归心切的杜甫，为什么会选择在奉节居住得那么长久。但他在此吟咏的诗篇，实在是记述了其忧国忧民的生命凄凉的尾声。

杜甫是我景仰的诗人。他在忠君和忧民这对不可解脱的矛盾中走过了痛苦的一生。来到奉节，我当然渴望能够追寻到诗人在此留下的遗踪。读宋代诗人陆游的《东屯高斋记》有这样一段文字“少陵先生晚游夔州，爱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斋’”。清夔州知府江权在《杜工部祠碑记》中载“工部入蜀所居，皆名草堂。惟夔之草堂有三：一曰瀼西，一曰瀼东，一曰东屯”。据现代人考证，所谓“瀼东”即白帝城，东屯即浣花溪。但若精准确定老杜故居所在，不是现在，早在宋代就已是谜案了。陆游出任夔州通判其间“吊先生（杜甫）之遗迹，则白帝已废为邱墟百有余年，自城郭府寺父老，无知其处者”。借来一本 1995 年版新《奉节县志》，翻过一看，简直就是一本解放后历任县领导人的“功劳簿”——虽然他们的“功劳”带给百姓的曾是诉不尽的贫穷。查找上面关于杜甫的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县志“大事记述”的年表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杜甫从云安移居夔州，寓居一年零九个月，着诗 437 首。其夔州之代表作多为千古名篇。秋，杜甫在瀼西台地上（今大菜园一带）经营果园 40 亩，种植柑、桔和枣树，次年在青苗坡，修渠引水灌田或饮用。”至于有关堪称杜甫遗踪的文字则是在县志“旅游”章节里的介绍：“杜甫西阁：原名观音洞，位于白帝山下。据碑文记载：明正德十四年（1519）祀观音神像于洞内，其侧有镇江阁，始建于元代。这里榕树群立，红墙绿瓦，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洞前纵观大江东去，俯瞰滟澦回澜，西看落日余晖，渔舟唱晚，情趣幽然，是夏日避暑胜地。1984 年，为了纪念诗圣杜甫，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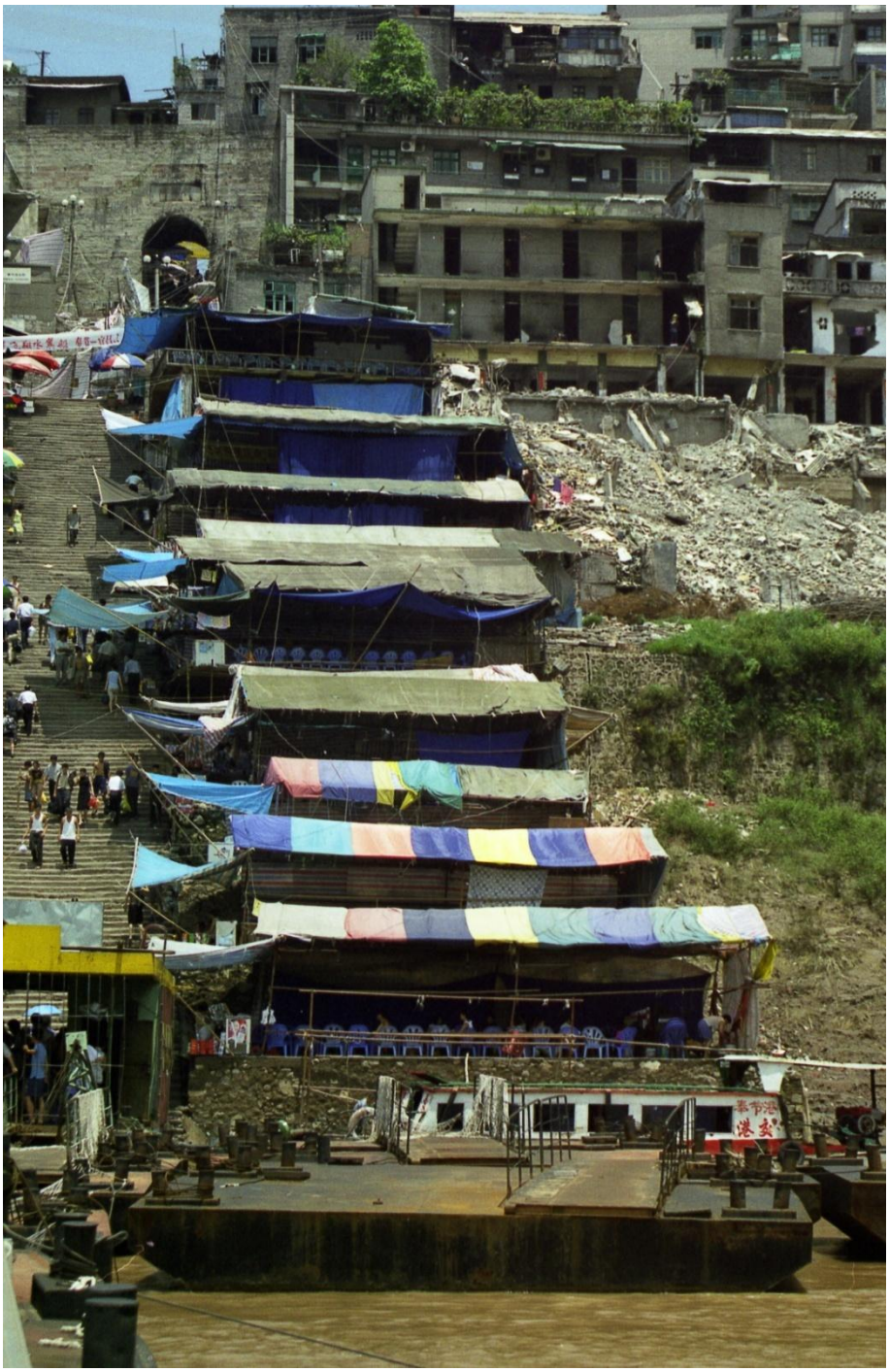


图 1.3 奉节依斗门码头

图 1.4 依斗门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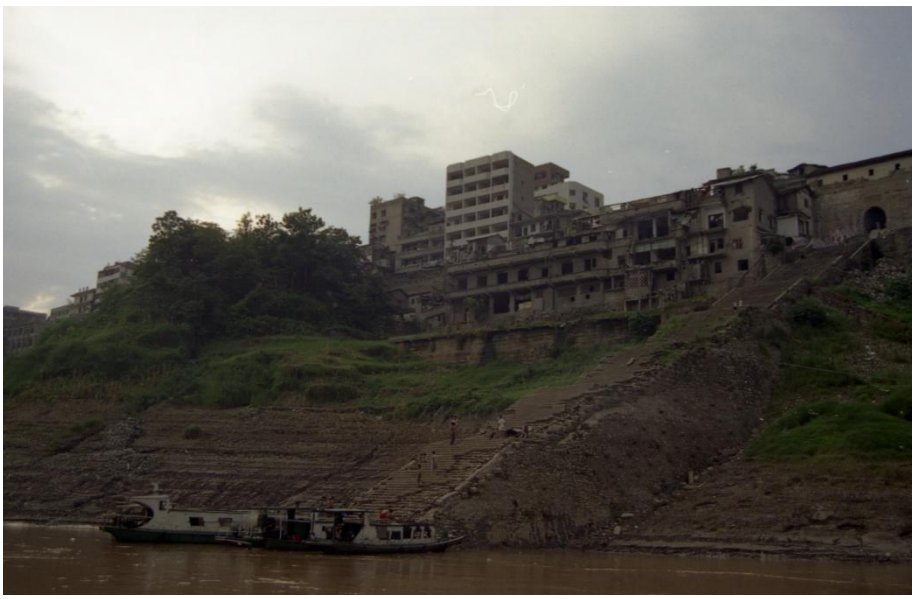


图 1.5 奉节开济门

修整，更名西阁。新修的西阁，游廊朱柱碧瓦，楼阁斗拱飞檐，阁楼上还嵌有‘杜甫吟啸图’大型瓷砖壁画。”；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如果不是有那几百首诗传世，杜甫可能早已是“烟消日出不见人”了。岂止杜甫，奉节留存的古迹比起其漫漫历史，夸张一点说，简直是荡然无存。请看随手开列的清单：莲峰书院遗址，今为奉节中学校舍；十贤堂遗址，今已废；纪念宋代文人周敦颐、王十朋及明代开国文臣宋濂而建的三贤祠亦已不存；杜甫“云暖麝香山”诗句中提到的香山寺，解放后殿宇改作民房或拆建；大江南岸乌云顶上的文峰塔，高九层，现已倒塌四层，亟待维修……用“文化”毁灭“文化”，历朝历代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如果这也算做一种“文化”的话。

我还是租了一辆“面的”，请司机带着我，沿着就我所知和司机所熟悉的路线力所能及地寻一寻与杜甫相关的遗踪。

那天一早起来，我带上相机、采访本走到街上，截住了一辆“面的”。开车的是位二十来岁小伙，姓王，自称是奉节城里人。

“知道杜甫吗？”我问。

“知道杜甫住过的草堂遗址吗？”见司机点头，我继续问。

“听说那里还有一块石碑，对吗？”

司机一直在点头，我当时即认定找对了人。讲好价钱，拉我去寻杜甫草堂遗迹，不计时间，随时可以停车，跑个来回 200 元。

夔峡峡口的白帝城是一座面临长江三面环水的小山包。它的西、东两侧则分别是梅溪河和草堂河两道溪流。出租车从县城东北出城，火样的骄阳下，沿着梅溪河跑了一会儿，过了一个桥一直再向北，带起一团又一团的尘烟，难行之路，颠簸着跑到了草堂河的西岸，大约个把小时过后，再沿西岸再向东而去。我问司机“草堂遗址还有多远？”“快到了，快到了，那里有块碑！”

“面的”从北往东折过不远处的浣花村村口戛然而止——“那块碑就是”——司机手指路北铁丝网后面的草丛和柚林里兀立的一块约两米高近一米宽的石碑对我说“是草堂遗址吗？”我怀疑。走到在路边阴凉处一堆搓麻人面前又问了一遍。那些人只顾打麻将，哪有心思管闲事。我只得钻过铁丝网，独自走到碑前大致看了看，碑文断断续续，描山叙景，讲得正是记叙杜甫在夔居住的文字。但字体已泐漫不清。能够看清的是碑文末尾的几行字：该碑立于光绪三十四年，立碑人分别是“安徽巡抚金坛冯煦谨撰　吏部主事永绥张称达敬书”。读不清碑文我有些抱憾，但还是举起相机，

将这块县志未存，且位在二期水淹线以下的石碑碑文拍下存照一帧。

到此时，我才恍然悟明白，杜甫当其时，住到离县城近二十里远的地方，靠地方官关照，拨给一块“官田”养家糊口，也证实了他处境的艰难。杜甫在奉节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内 3 次（一说 5 迁）搬迁，从生存角度讲，他应很少时间住在长江边。江边坡陡地贫，粮食很难收获。峡民亦应如是。

3

杜甫初到奉节之时，距他后来病逝湘江只有 4 年。像是老天有意安排，留给已是百病缠身的杜甫一段相对安定的时间，让其生命的华彩做出最后的释放，达到其诗歌创作的高峰。然而 ，这次饱含泪血和爱憎的释放，却几乎耗尽了诗人生命的全部。

一生中所有的情感都在这里凝聚，一生中所有的朋友都在这里怀念，一生中所有思考都在这里沉淀。

他写《八哀》，哀叹故友旧贤，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俶、李邕、苏源明、郑虔、张九龄“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箱箧。吾思哭孤冢，南纪阻归楫。扶颠永萧条，未济失利涉。疲苶竟何人，洒涕巴东峡。”

他写《秋兴八首》：“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他写《咏怀古迹五首》，实在是吟咏自己对人生的感叹：“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他写《古柏行》，喟叹生不逢时：“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唐大历二年（公元 767 年），杜甫在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刀飞剑闪，蔚为壮观。问其所师，答曰，公孙大娘弟子也。因之勾起诗人往事回忆“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贴，数尝于郾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抚今追昔，诗人在奉节以深深的念怀之情写下长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中最后几句道“五十年间似反掌，风烟颓洞昏王室。梨园子弟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五十年来家国，诉不尽的沧桑，由观剑勾起的美好回忆，转瞬即淹没在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悲剧里。但是困顿中的杜甫，忧国忧民之心依然在燃

烧。他既可以在《又呈吴郎》诗中，为一个孤苦的老妇代言求助“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为频仍战火中的国家和百姓的颠沛流离而焦虑。时任湖南道州刺史的诗人兼好友元结寄给杜甫的《春陵行》、《贼退示官吏》两首诗。诗中分别述写了道州惨状“州小经战乱，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家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走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在《贼退示官吏》一诗的序中，元结还写了这样的文字“癸卯岁，西原贼入道州，杀掠几尽而去。明年贼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与，盖蒙蔽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两诗读罢，杜甫大为感伤。被贪酷吏掠劫一空的道州，连贼兵都懒得光顾，可见百姓日子又当如何。他情不能禁，应和元结写下了《同元使君春陵行》“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春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常引经。道州忧黎元，词气浩纵横……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

奉节的杜甫，充分展示了其悲天悯人的情怀。

4

由杜甫的多舛命途，我们可以得知，做一个敢于为民请命的个性化的诗人，他的心中必是盛满了忧伤和苦痛：他无力挣脱，他也不想挣脱。

今朝今日，这种悲哀的诗人我还能不能在奉节城找到？

当我把在奉节县寻找奉节诗人的想法告诉我下榻的招待所的一位服务员的时候，没料到他竟然喜上眉梢，眼睛睁得大大地即刻回答我：“有，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就是诗人！他写过好多诗！”

晚饭过后，在那位服务员引领下，我如约来到依斗门附近的一条小街去与诗人会面。真是有些意外，诗人原来是位双腿不能行路的残疾人。他叫大罗，一脸文静的书生气。自幼因患小儿麻痹致残，读书到高中毕业就失学了。他并未就此消沉，而是以顽强的毅力遍览文史和法律学科。现在是奉节双扶公司（扶贫扶残）经理兼法人代表，带着 37 名残疾人自食其力。一进他家，看看四壁书架两万册藏书你就不由得会对面前的大罗肃然起敬。

但在与大罗会面后，我不仅想读他的诗，也对他以残疾之身义务为困难无助的百姓打抱不平产生了兴趣——与之会面之前他的同学向我介绍，

大罗曾为素不相识的一对夫妇打过 5 年的马拉松官司。

写诗与打官司，这两者间有什么关联呢？

——“还是从我自幼生长的环境说起吧。听父亲说，我家世代靠长江为生。祖父青年时代在长江上推划子。那时奉节没有码头。来来往往的无论客船还是货船到了奉节，都是把船泊在江心，然后由小划子（小船）在江岸与大船间送人或物。我的父母也是普通船工。父亲 18 岁入党，工作充满朝气。我懂事起，就知道他是奉节东风航运公司的‘内燃机专家’。父亲为人正直，一辈子无论生活和工作，都是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比如 1981 年夏天长江发大水——这是我记忆中最大的一次洪水——眼看洪水就要将我们家淹了。这么紧张的时候，我的父亲却跑到草鞋街帮助别的职工搬家去了——而且整个洪水期间就没回过家。那时我的祖父、母都老了，弟妹还小，眼瞅着洪水上涨干着急。幸亏同学知道我家困难，帮我们搬了家。父亲的正义感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加上我本人，也是在亲人、邻里和同学们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虽然我没享受过哪怕一天走路的快乐，但我从幼年起就生活得很快乐。读书时没有同学歧视我，每天同学们轮流背我上下学。下大雨也不间断。高中毕业时我的高考成绩已经超过大学录取分数线，因身体残疾大学没读成。但考上大学的同学经常来信，鼓励我做身残志不残的人。我那时的思想曾一度十分消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思考，我觉得就我身体状况，我搞文学创作比较合适。为扩大社会接触面，深入生活，学习法律为民请命也应当是搞文学的必由之路。我就是这样开始了自学文学课程和法律学。”

——“我这个人心很软，看到不平事，就愿意挺身而出，拔刀相助。1998 年，无偿帮助张洪文和文安林夫妇打那场官司就是凭着这样一口气。他们被欺侮，请不起律师，更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辩护。甚至连写篇字句通顺的法律文书都困难。我在与朋友聊天时听到这个情况，就毫不犹豫决定帮忙。当时也可以说我都忘记了自己是个残疾人。一旦介入才体验到，打官司要奉节–万县–武汉一趟趟多次往返。行动之难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大罗显然没有想到，准备与其谈诗读诗的我，竟然和他谈起“官司”。而我以为诗人的品行直接与诗作内涵相关。了解诗人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你就更容易读懂诗人的诗。我相信大罗能写出好诗。

大罗的家紧邻江边的依斗门。江上风和浪特有的气味一阵阵从窗外掠过我们谈话的桌面，溢满房间每一个角落——一段沾满长江气味的回忆就

是这样开始了。

5

惹发那场官司的事件发生在远离奉节的葛洲坝。时间是 1995 年 11 月 14 日。

此前奉节城里的张洪文（女）向其他几位朋友借款购置了一只机动货船，准备搞点儿运输生意赚钱。经过千辛万苦的筹划，终于在船上装上 270 吨煤炭，18 头菜牛以及 7000 多斤脐橙开航了。船是“夔州 8 号”。跟船的有船长郭名喜和该船经营人即张洪文。

11 月 14 日上午，张洪文踌躇满志地跟着满载的货船从奉节港出发。当晚 7 点抵达葛洲坝附近的黄柏河靠泊。之后，张洪文与船长郭名喜上岸去找当地熟人联系过葛洲坝事宜。因为他们知道让船顺顺当当通过葛洲坝的“规矩”——必须面对古小说中常听说的“剪径大盗”——留下“买路钱”。这一日，经过联系了解到，看闸的当班调度一个叫余文中、一个叫朱丙清。张洪文到值班室送“买路钱”的时候，只有余文中一人在场，朱丙清不在，张就拿出 100 元给了余一个人。并约好晚上 9 点过闸。

晚上 9 点，“夔州 8 号”按照事先约定开进 2 号闸门。进闸后发现闸内船只太多，便听从闸调人员安排，将船从船闸内退出，泊靠在 2 号闸的靠船墩，等候下次进闸。两小时过后，到了夜里 11 点，上水闸全部出闸完毕，下水船进闸的绿灯亮了。喇叭里同时传来余文中的下水船进闸的指令。张洪文的“夔州 8 号”随后进闸。正当此时，另一位叫朱丙清的闸调因没拿到张的 100 元“买路钱”开始向“夔州 8 号”发难。他以检查“三证”和过闸单为名，强行要“夔州 8 号”船退出 2 号闸。就这样，一个调度员要其进，另一个要其出，“夔州 8 号”前后 3 次在拥挤的船闸内进出，直到最后一次退船时，张洪文的货船被从 3 号闸调到 2 号闸的“奉节 18 号”货船猛烈撞击，造成“夔洲 8 号”船船舱进水。而此时朱丙清仍在广播里大喊大叫，让张洪文退船到“闸调”验单。心急如焚的张洪文慌忙跑上岸哀求朱丙清“我的船刚刚被撞了，要罚要处理等我们过闸后再说嘛！”

而等到张洪文匆匆从朱丙清那里返回来时，她眼瞧着“夔州 8 号”已经翻沉在 2 号船闸内。张哭喊着又奔向“闸调”去找朱丙清，朱此时已得知闸内翻船的消息，顿时也慌了神，当张喊着找他拼命时，他连鞋都没提好，就弃岗而逃。朱是当地人，路径熟悉，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闸内翻船，千古奇闻。把老本赔光的张洪文对着长江，对着葛洲坝悲哭到天明。

6

张洪文和他的丈夫文安林从此开始了诉讼生涯。但官司直打到 1999 年毫无进展。筋疲力尽加上一屁股外债，张洪文的精神已经难以再支撑下去了。1999 年初的一天，大罗出现在张与她的丈夫文安林的面前。同年 6 月 20 日，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罗与文安林冒着酷暑赶到武汉，下榻在最便宜的小旅馆，才等到盼望已久的湖北高法开庭通知。但出乎意料，刚刚开庭，审判长汪水松就毫不掩饰其倾向性，与葛洲坝船闸管理局一唱一和，硬说原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最终就以这个“理由”，结束了庭审。

大罗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那次庭审实际就是宣布了我们这场官司的败诉。我觉得天简直像塌了，真没想到世界上的事竟然是如此不公平！但我当时就没有认输，决心把这个官司继续打下去。以后，虽然起诉、撤诉、再起诉折腾了几个来回，仍无结果。但知法懂法的大罗认定，只要有一天碰上一个好官、清官，他能翻看《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52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给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机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就能够给张洪文和文安林一个说法。但可惜从案发到现在已经 8 年——和抗战时间一样长——官司竟然打“黄”了。

有理的官司打不赢，文安林与张洪文夫妇俩现在只有为还借债，天天从早忙到天黑。但张洪文不再开口说一句话，他们的见不到阳光的日子过得阴冷又黑暗。

大罗那天愤愤地对我说：“我现在对法律的理解，就是‘法律’在缺乏监督的执法者手里，已成为对百姓进行再伤害的工具。‘法律’在某些部门已经完全被金钱玷污了！”

7

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留给大罗的记忆化作了一首悲凉而凄婉的诗篇：

黄昏

黄昏我挽着夕阳
用竹笛梳理思绪
牵缕缕情思
追心中飘去的白云
森林都涨潮了
啸声中讲着黑色的故事
竹笛吹落满天星星
吹不回你眼角那颗清泪

自古至今，所有真正的诗人都是为追求理想的世界而活着。并且只要你是诗人，你就必当把痛苦揽入怀中。大罗亦如是，他在新奉节城诗城广场和我告别的时候，对我说，虽然残疾，从小仍对未来充满期待，但现在，他感觉，现今人与人之间太缺少同情和宽容，这是社会悲剧之源。

我理解，大罗内心其实很痛苦，因为他对此无能为力。

我们分手了，遥对长江的诗城广场上一片灿烂的阳光。摇着轮椅，大罗一一从广场上的杜甫、李白、刘禹锡、陆游四座雕像前经过。仰视这些前辈诗人，坐在轮椅上的大罗心潮澎湃，向着山下的大江即兴吟咏了一首《告别》:

与大江告别
把浩气留在心里
与大山告别
把刚强留在心里
让痛苦和悲愤
全部消融在宽容的世界
太阳滴下的眼泪
将落在明天——
开满鲜花的梦里

大罗流泪了。他生活中的故事让我明白：世上所有的诗人都要流泪，因为诗人泪水包容着的人类的良知。

8

把诗篇留给奉节的不仅仅是李白和杜甫。光唐代就还有杨炯《广溪峡》："广溪三峡首，旷望兼川路"；陈子昂《白帝城怀古》："日落沧江晚，停桡问土风。城临巴子国，台没汉王宫"；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迟疑"；孟郊《峡哀》："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石剑相劈斫，石波怒蛟虬"；刘禹锡的诗名气就更大了。他的 11 首《竹枝词》首首都精彩，特录如下：

其一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其二

山桃红花插满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其三

江上春水新雨情，瀼西春水縠纹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其四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其五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村中多伴女，永安宫外踏春来。

其六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

其七

城西门前滟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其八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其九

巫峡苍苍烟雨时，青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行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其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其十一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
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萝。

刘禹锡曾做过夔州刺史。他为人正直，性格刚毅。一生坎坷却从不屈服。他的诗尤为可贵处，在于叹声少，抗声多，为唐代诗人中仅见。诗城奉节因为有了刘禹锡的诗，才算有了诗歌的最强音！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地贫人穷的奉节城，命里是注定接纳不幸的诗人和诗人不幸的地方。一代代演义着人生悲剧的诗人用血泪而不是微笑，成全了今日奉节人引以自豪的诗城——这诗城份量可想而知！

但你若读过历朝历代的诗人们在奉节的诗作，再看今日荒凉的故地，

不由得心中会涌动一种文化和精神的沉重。奉节号称“诗城”，人们实际上津津乐道的却是“三国”，是刘备“白帝托孤”。而不是什么“杜甫”、“陆游”。打个比方说，“三国”是奉节漂亮的能赚钱的脸面，“杜甫”则好比是涂在脸蛋上的可有可无的胭脂，只在必要时可以用来装装门面而已。刘备一伙，把天下搅得乌七八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最后反落得流芳千古。那位只知忠君，不知忠国的满肚子阴谋诡计虚伪透顶的谋士诸葛亮，也变成历代“忠臣”楷模。那本充满阴谋、欺诈、谎言、仇杀的《三国演义》也成为了所谓“文学名著”。不管真假，在成都还给刘备专修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惠陵”。 中国“文化”，如果还堪称其为“文化”的话，由于越来越多的“政治文化”垃圾的堆积，越来越变得肮脏。

当那些导游带着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游客，登上白帝城的时候，很少有人去讲述杜甫流离在此，眼见家国破碎的悲叹“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疲病虎纵横。”；更不会去将心比心，体味杜甫“余生如过鸟，故里今空村”的几近绝望之情。导游知道游客最喜欢听的是“皇帝”的故事——无论“正史”还是戏说。

本质上讲，自秦汉以来，我们称颂的“文化”，一直以“皇权文化”为主流——历代文人大都在“皇权”巨大的阴影之下，完成其所谓的“创作”。如果你的创作走出皇权允许的“阴影”，杀身之祸就有可能降临到你的头上。因此，以服从皇权为前提的这些创作，既不敢恨也不敢爱，所表现的当然是一个扭曲甚至阴暗的心灵世界。像现在为回避当代真实的社会冲突和矛盾而“火”起来的影视古装戏，即是怯懦的中国人文精神的产物。而我们的民众，对于顺从“皇权文化”早已形成了惯性的思维。不管这个皇帝生前多么残暴，也不管他死后百年千年，只要是说皇帝的事，只要是皇帝允许说的事，连沉甸甸的悲剧都可以甚至面带微笑“戏说”——那才是最安全的文化！鲁迅先生早就评说过“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成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只有少数人有勇气冲决皇权的罗网，追求个性精神的自由获得了文学创作的成功。

什么时候，我们能发愿从罩在头顶上两千多年的“皇帝”的阴影中挣脱，我们的主流文化精神，才会放射出真善美的光辉。

9

唐大历五年（公元 770 年）冬日，杜甫别离三峡的第三年，寒风凄厉的衡州湘江边。

在完成绝笔诗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后，诗人在飘摇的小船上长辞人世。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杜甫这个以羸弱身躯扛起了忧民忧国重责的人民的诗人，在战伐流离中走过了动荡的一生。

杜甫是中国第一悲剧诗人，不知何故我总是将他与堂吉诃德联系在一起。他与他，都是在不断挫折的人生中，从不放弃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的渴望。不同的是堂吉诃德的人生是耐人寻味的“喜剧”中的悲剧，而杜甫则是明明白白的悲剧人物。他自知人微言轻，下情难以上达，但苦吟依然——“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自家无米下锅，也要先遥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直的中国文人抱负理想，似乎总是缺少点儿像堂吉诃德式的天真——如杜甫——因此他们活得倍加沉重。

10

今日热闹的奉节，真正并不稀罕留住杜甫的诗魂。所谓的诗城只剩下了一个空壳——人们都懒得愤怒——愤怒出诗人——也就懒得去费神写诗了。

如果要问这是为什么？我就想说一句话，那些有可能成为伟大诗人的人，活得远比自讨苦吃的杜甫老先生聪明得多了。

第三章 奉节民声

1

清早醒来，有人敲门。来者是奉节港航运输公司两位 职工郑明平和邓龙堂。他们告诉我凌晨两点，宿舍突然大火，火灾殃及 41 户。其中 27 户人家被火烧光。

真是意想不到的横祸，昨晚郑、邓二人刚将一份反映港运公司经理黄开树违法挪用移民巨款，职工生活无着，要求我以记者的名义去了解真情的材料交给我，今天就又发生了大火，对本来生活困顿的职工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我拿起相机，跟着郑、邓二人赶赴过火现场。

失火点在西门附近铁匠街南侧的居民密集区，简陋的迷魂阵般的街巷，歪歪扭扭的阴暗的住房，向我展示的是贫困。

火灾是从二楼起始，十几间住房烧得仅剩下空空框架。老式的峡江民居，大多是木屋，稍有不慎，失火是很容易的。但这里没有防火设施，从来没有。惊魂未定的灾民，有的在烧过废墟上，择捡可用的家什，有的坐在街上伤泣……。

从昨夜郑明平和邓龙堂交给我的“告全县人民书”上，我了解到，奉节港航运输公司已蜕变成为公司经理黄开树一家人经营的“黄氏公司”。黄家人在公司权钱在手，为非作歹已长达 5 年之久。屋漏偏遭连夜雨，我此时很为本来生活处于窘境的工人，再经火劫后的生计担忧。思来想去，决定以记者身份求见有关领导，听一听他们如何安排火灾后的灾民生活。

回到住处，我拨通了一个又一个“有关部门”电话。对方问清了我的身份后，却推三推四，统统将我拒绝。既然如此，我只有硬闯——直接去找主管奉节港航运输公司的上级单位奉节交通局。第二天下午 1 点，烈日当头，步行找到县城西北青石街南边的交通局大门。门口先我之前已聚集了百多个遭灾的职工和家属，他们都是要求局里解决眼下生计问题的，但

负责人一个都不出来与他们见面。可见“有关部门”还没到将心比心，急职工之所急的时候。

我走进交通局办公室，见到坐在办公室悠闲地品茶与他人闲聊的自称是办公室主任的人物，自报家门，说明来意。

“有记者证吗？”

我马上把证送到他眼前。

“有采访信吗？”主任拿腔拿调。

“记者证就是采访证明。”

“不行，我们这里规定必须要采访证明！”主任不依不饶。

“你看看记者证上的章程，记者证就是采访凭证。这是国家的规定，县里的规定总不能高过国家法规吧！”

“告诉你不行就是不行！”主任端起茶杯即要扬长而去。

讲实在话，此等主任的做派我见过多了，而且这几年越见越多，不单是贪官的队伍日渐壮大，还因为地位卑微的记者被“上控”得越来越紧，所谓媒体的“监督”力度随之也越来越小。尽管如此，我也不能退缩——这群人对下属职工蒙灾之后的冷漠让我气愤。

“你不能走，你必须转告局长，有北京来的记者要采访他！”我也毫不客气。

门里门外的受灾职工和家属也围过来，他们当然都站在我这边。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人群中突然一声大吼。定睛细看，一位块大体肥的壮汉向我冲过来。

“你是干什么的？”我反问。

“公安局派驻局里的！”他表露出十足的霸气——“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自有其道理。

“我们都是找领导谈问题的，这里和你没关系！请你不要对公民大吼大叫！”我与他双目对视。

“我们的田副局长来了，请你到他的办公室！”正当气氛紧张之际，那位办公室主任突现，语气也变得有点儿客气。

我心里清楚，他们明知道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真记者，而且自北京来，也怕事情越闹越僵，所以把局长“找”来了。

交通局似乎是个两层小楼。局办公室在一楼楼门入口处。田副局长的房间在楼门口的另一端。据以往经验，我提出请受灾职工代表参加会见，以防止记者走后“他们”不认账。“他们”经过“研究”同意了。

图 1.6 蓄水前的奉节滑坡

图 1.7 2001 年的奉节街道

田副局长叫田和新，本地人氏。他很清楚我的来意，连句寒暄话都没有，就开始了如下的谈话（文理不大通顺请原谅）。

——“昨日凌晨两点，港航运输公司职工宿舍火灾，交通局在两点十分左右接到报警。我、局办公室、局公安、企业股、运输安全部，局纪检室两点二十分到达现场。随后消防抵达。火情向分管县长陈斌及有关部门汇报（没有指明是谁，通过什么方式）。然后（依然没确指何许人）组织抢救火灾（抢救火灾文理不通），观察（还有心“观察”）和组织疏散。但火势控制不下来，水压不够。四点左右火势控制下来。县长、常务副县长成立火灾补救指挥部。县长陈 XX 任组长，副县长陈斌、李 XX 任副组长。指挥部下设治安保卫组、善后处理组等。火灾后，分管县长召集解决职工善后问题。交通局领导班子达成如下几条：第一，成立现场管护组。港航朱副经理为组长。抽调 7 名职工成立三个分队。再抽调收费所稽查队 8 人加上公安局派驻民警和交通局的 30 人协助维护现场；第二，港航孙副经理为组长，成立现场排危组负责继续查找火灾隐患。人员从港航管理部门抽调；第三，港航公司工会主席王培蓉，支部委员黄雄为正副组长抽调公司其他人，做职工善后工作，稳定情绪，防止派生其它问题，雪上加霜；第四，经理助理黄开明为组长，安排中层干部继续抓港航的生产经营；第五，经理黄开树为组长，侧重抓好 27 个过火灾户及 14 户受灾户的生活安排。具体安置办法依据县建委质量监督站意见。具体安排如下：利用港航公司下属单位“交通建筑公司”腾出 4 间房临时安排 14 个灾户。其它再将港航客运站大厅改造隔离安置 10～20 户。昨天晚上，我们就恢复了给宿舍供电。今天又发生一起火警，是租房户用电不慎造成的。所以我们还要对租房户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把受灾户安置进去。昨天当天，我上午 6 点半离开现场回到交通局就开了会。会后，交通局捐赠了 5000 元，东风航运公司捐了 5000 元，港检所捐了 1000 元，航务所捐了 1500 元，路政中队捐了 1000 元稽征所 2000 元，捐钱的还有养路一段，养路二段，桥管所……物资供销公司捐了 50 元，大修厂副厂长拿 50 元，机关局长拿 200 元，我拿了 100 元……其它单位还在捐助中。捐资总共估计可达 30000 元。这些钱由民政掌握给予困难户救济……”

田局长讲得头头是道，语气又谦和，让我听得入迷。局长就是局长，了解情况比我多，又是他出面具体领导指挥，41 个受灾户都有了安排，我怎能不相信？但我仍心存狐疑：既然是这么为职工着想的领导，为什么港航运输公司职工在火灾发生前，还以街头静坐的激烈方式反对他们？我转

移了话题，想探个究竟——于是，我与田副局长又有了下面的对话。

“听工人反映说，港航运输公司的退休工人从去年（2000 年）8 月至今，没有生活费。”

“那不是事实！现在港航全靠自己养活自己。比如，每年春节，募捐一点钱看看老人。我们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但我们无能为力。”田副局长王顾左右而言他。

“记者同志，我说两句好不好？”一直坐在一旁没说话的工人代表不再沉默，“田局长说的是瞎话！现在不光退休工人拿不到生活费，待岗职工也拿不到一分钱。我们（港航运输公司）大修厂的一线工人每月辛辛苦苦才拿到 40 元，一线工人最多只拿到每月 180 元。而他们公司管理人员月工资高达 1200 元！多次反映，公司就是不闻不问。还有他刚才提到的港航客运站大厅安排 20 个受灾户，根本不可能。那个大厅，年年长江涨水时年年淹，而且八十年代时就已经是危房，让人怎么住？”

“现在的企业状况很难，这么安排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尴尬的田局长装出一脸无奈。

听了工人代表的话，我有些气愤，怎么能如此漠视职工的生死呢！

2

我到奉节采访的前一个多月，奉节港航运输公司的职工曾在全县范围内发表的一封“告全县人民书”。 全文如下：

奉节县港航运输公司黄开树，于 96 年 9 月由当时奉节县交通局任命为港航运输公司经理，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规定，严重剥夺了港航运输公司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致使港航运输公司经营管理混乱，弄虚作假，欺上压下，时间长达 5 年之久。将一个监督机制健全的集体企业变为其家庭式的“黄氏公司”。

一、黄开树经营能力不强，其所经营的港航运输公司煤经部，于 94 年交手时，已造成煤经部严重亏损，所经营的苏奉物资联营公司在 97 年倒闭时，已亏损百万余元。黄任港航公司经理几年来，经营每况愈下，年年亏损，公司靠九江沉船补偿 200 多万元和银行贷款维持运

转。通过做假账，反而变成了盈利。仅以 2000 年为例，公司全年总收入 2249833.33 元，支出约 2691990.69 元，很明显，亏损约 442157.36 元，但账面上反而盈利 69753.84 元。请问，利润从何而来？由此可见其经营能力低下，并无业绩可言！

二、公司各要害位置全部由其亲属掌管，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氏公司。

三、为了其小集团的利益而不顾职工死活。港航运输公司生产一线职工每月工资到头，仅得 180 元工资，而公司管理人员工资，可高达 1200 元，还不包括电话费等。公司待岗职工甚多，并且没有一分钱生活费，公司不闻不问。

四、港航运输公司职工的移民建房，工程总造价 1200 多万元。自工程立项、招投标（实际是定向协议），订立所谓“开口合同”（开口合同即是没将发包价格讲定，工程完工后再算）。直到现在，职工都被蒙在鼓里，就连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副经理等都不知道内幕，这难道不是搞“暗箱操作”吗？整个议标内幕，只有黄开树和该工程经办人知道，简直胆大包天！竟敢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造成职工迁建房价格每平方米高出三马山地区同等条件房屋价格一百几十元（例如三峡航运公司移民迁建房）。同志们，这是职工的血汗钱哪！

……

可怜的港航运输公司广大职工，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有理无处说，难道在中华大地上，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广大港航职工绝不相信！特呼吁请求各级领导、各阶层人士及广大民众给予声援！给予关注！

奉节县港航运输公司广大职工

二 00 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封“告全县人民书”，其实并没有写清港航运输公司职工最值得上“告”的问题——恰恰是这些问题引起了我对港航职工命运的关注。职工代表郑龙堂和李华明拿出证据告诉我，据 1992 年长江规划委员会的测算，港航公司生产、生活静态移民资金总额应为 558 万。到目前为止加上物价上涨指数诸多因素，移民资金总额已提高到 780 万左右。而奉节县移民局廖副局长现已用掉移民资金 650 万元。其中建砖厂用了 380 万元，建移民房 2.1 万平方米（移民建房总数的五分之三），用了 140 万，余下的 130 万元资金

不知去向。副县长陈斌说“移民款要专款专用”。仅生活移民资金（住房补贴）算下来平均每人 6000 元，总数应在 360 万～380 万元之间，但公司一分钱都没给。

工人们还开出一份“黄氏家族公司”的家族名单：

奉节港航运输公司总经理黄开树；总经理助理其弟黄开明；公司财物科长其姨妹张世彬；公司督察科长其姨妹夫；其姨姐公司移民资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公司材料供应科科长其大哥黄厚诚；公司出纳其妻汪小燕；港航运输公司煤炭经营部经理其亲家李品贵。

可见，黄开树，这么一个小小的经理翻云覆雨，借“企业改制”之名，巧取豪夺，何等无法无天！工人拿着黄纵容亲属做假账，大量鲸吞移民款项的证据，向县长要求罢免黄的职务时，奉节县长陈孝来把投诉材料往桌子上一摔吼道：“你们的投诉材料，我看都不看，材料上按手指印，我见得多了，一个人就可以按几十个！”职工代表再给重庆市（奉节和巫山属重庆市管辖）市长打电话，也无下文。生活无着的工人好不心焦！

现今中国的官场，如果你没有什么背景的话，立足是相当艰难的。立足之法最简便的，除了“拍马屁”，就当属“用”钱了。有了钱，你可以买官鬻爵，大到省厅“领导”小到村社“干部”，在不少地区都是明码标价。而那些已经就位的“领导”，只要你给他送钱“到位”，只要情况许可，无论你干了什么坏事，他都敢为你撑腰打气，甚至亲自出马。可以如此断言，凡那些着迷官场之人，十有八九为心术不正的坏家伙。像奉节县某些置工人死活于不顾的领导，却对黄开树家族犯罪置若罔闻，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其它某种奥妙吗？

碰上如此为人民服务的“父母官”，《告全县人民书》发到县里，当然连个响声都没有。6 月 8 日起，忍无可忍的公司职工 100 多人，在县城钟表社附近的街口静坐三天。这下事情闹大了——可能是奉节城“文革”之后最出彩的事件了。三天里县里人纷纷前来观光——使本来街道就狭窄的闹市，人如潮涌，交通阻塞。

县领导和交通局终于答应与职工面对面。地点在永安镇政府 5 楼会议室。时间是 6 月 8 日。好不容易争得的机会，港航职工几百人闻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把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

副县长陈斌、县移民局廖副局长、奉节港航运输公司经理黄开树之外，黄开树的老婆和黄的姨妹也来了。

双方见面后的话题是从生活移民资金开始的。

“生活移民资金为什么不发给我们？”职工代表邓龙堂首先发问。

“生活移民资金能不能发到人头上？”黄开树不直接回答而是问坐在他旁边的廖副局长。

“可以量化到人头上，也可以打到建房款，降低建房成本。”廖与黄一唱一和。

“移民资金专款专用。打酱油的钱不能去打醋。”副县长假装一本正经。

“780 万移民资金，现在不明不白还剩下 100 多万，你拿什么量化到人头上？”邓龙堂紧追不舍。

“邓龙堂，你代表谁质问领导？你不能代表工人！”黄开树的姨妹突然从邓的手中抢过话筒杀出来。

“生活移民资金是你管的事吗，你们不要故意刁难！”半路再杀出黄开树的老婆。

正戏还未开场，会场就被搅乱了，情绪激愤的职工上前与两位横眉立目的女人论理。工人上当了，这看似突发的“围魏救赵”的一幕，事先早已有安排。否则前台就座的领导，不会趁机迅速溜掉。

外面正下着急雨，他们钻进了各自的小汽车，汽车屁股冒着白烟，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工人再听不到有关领导的消息。如果也算是消息的话，就是领导“跟你们谈过了，你们胡搅蛮缠！”，“开会，没时间！”。

工人们仍然抱着希望，仍然想让县里或交通局的领导帮忙查处 130 多万移民款的下落，或是答应工人以合法程序选举自己信任的港航运输公司经理。

又是半个多月过去，几十名工人终于在县第二招待所的会议室里“堵”住了此刻正在与我会面的交通局田副局长。从上午到傍晚，但此局长除了说“你们限制我人身自由”这一句话，其它事情概不表态。到了晚上 7 点多，县工会来了一位张科长，县经委来了个姓朱的女同志，来了个交通局办公室姓龚的主任。三个人单独与工人代表经过协商，县工会的张科长痛快地答应了工人要求：选举经理问题马上落实，从下星期一开始进行，县里并派观察员到选举现场。

结果又如何？苦等到“下星期一”，终不见伊人倩影。工人又被骗了一次。

我问田副局长“航运公司经理黄开树的任命合法吗？”

“我们已决定进行一次完全民主选举。”

“生活移民资金 130 万不知下落是怎么回事？”

“黄开树的经济问题我们正在审计，如果有问题，统统依照刑法处理！”

“黄开树的弟弟黄开明当了经理助理，是交通局任命的吗？”

“黄开树要求过几次，但交通局没有同意！黄开树当时就提出辞职，领导做了工作。”

“黄开树辞职像是在演戏，他实际上要把港航运输公司改变成为由他自家人掌管党政财权的私家公司，县里局里难道一点儿都不知道？一点儿责任都没有？”

“我们正在处理的不就是这件事吗？”副局长总有话说。

“你们领导对怎样评价黄开树的工作呢？”

“黄开树民主作风差，对家人管束不严，本人政策水平有待加强。”田副局长说得不疼不痒。

“私自拉来自己弟弟当经理助理，老婆当公司会计 ，130 多万巨款下落不明，这能用民主作风差，对家人管束不严，政策水平有待加强几句话就说得通吗？”

“我们局里没有偏袒黄开树的意思，96 年港航运输公司前任法人代表左洪银运作困难的情况下，内部矛盾也很多，当时交通局为了暂缓矛盾，就任命了黄开树。黄现在到底有什么经济问题，一切要等到司法部门的调查有了结果再说！”

与田副局长告辞时，我对他说职代会选举新的企业领导一事不要再拖，受灾户的困难应当尽快解决，黄开树的经济问题审查有了结果请尽快告知。田副局长露出灿烂的微笑，频频点头。虽然我知道“微笑”不等于“结果”，但我想作为记者，我对他及他的领导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疑惑，总不会不见“效益”吧！

从交通局出来不远处，就是奉节县城妇孺皆知的“人民广场”。虽然夏日的阳光如同流火，但人民的广场仍然到处可见歇息或过路的“人民”。聊天的，喝茶的，摆摊的全躲在广场北面的树荫下。一位瞎了双眼残了左臂的艺人正在一个角落打锣敲鼓卖唱。残疾人前铺着的一张红纸上，写着他残疾的经历：他叫廖福清，乃云阳县红狮镇白阳村 10 组农民。他的眼睛和左臂是“文革”中“农业学大寨”时，为造梯田开山放炮致残的。我走近他，他正在唱自己“学大寨”的经历：“干部派我搞基建，我开山放炮冲在前。炸瞎我双眼失了明，炸断左臂剩一根。我带着幺女出了门，请同情我这不幸人……”。之后，廖福清又唱了一段《苦媳妇》“花开叶儿乌，听唱

苦媳妇。恶公婆来恶幺姑……”他的调子似还动听，音色也不错——要不就没有那么多老人小孩围着他了。我注意到有个小女孩坐在廖福清身旁，一脸忧郁的模样，那是廖的女儿。她对我说，一年四季她们父女就是靠卖唱在峡江两岸流浪，她其实很想很想去读书……我在女孩儿面前的红塑料桶里放了 5 元钱。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在用眼睛盯着我——5 元钱在这贫穷的小山城人的眼睛里就算是“大”钱了。

我没有继续听他们父女二人将故事讲完的心情——50 年来，每一次轰轰烈烈的“运动”和“革命”的后面，给予百姓的都是无穷尽的灾难——在三峡采访，走进峡民的生活，我的心情常常很沉重。

第四章 悬棺之谜

1

峡江的水并不是日日浑浊。春天雨少，且不猛烈，沿江不会有太多的水土流失，江水在不知觉中转为暗绿色。此时沿着夔峡北岸的古栈道东行，路上金黄的小花一片接一片，盛开在丛密的或枯黄或葱绿的蒿草和芦苇中间，看上去，煞是美丽。

从夔峡口的老观庙信号台往前路径相对平坦。过了这一段，多年失修的栈道突然变窄，高高的蒿草中摸索着往前走约一千米就到了有名的风箱峡。风箱峡是二十里夔峡中唯一有一块宽敞的平坝的地方。传说明末农民造反的头目张献忠率兵败退进川，曾在此处宿营。300 多年风逝而过，独坐在今日风箱峡，仰望吊在铁锈色山体的缝隙中的状似风箱的悬棺，多想问天，问江，问山——那些高悬在山崖上远逝的灵魂，曾如何走过了惊心动魄的一生。

悬棺葬准确地说应称崖葬，在三峡应当很多。像巫峡中的铁棺峡，西陵峡中的兵书宝剑峡都是因悬棺得名。较有代表性的三峡悬棺有如下几处：

小三峡上游巫溪段。该段庙峡和荆竹峡的峭壁上计有或大或小的悬棺穴 274 个，保存至今的悬棺还有 43 具。

巫峡东口湖北巴东县江北岸汇入长江的神农溪两侧绝壁上，有悬棺约 10 具。

西陵峡西段江南岸九畹溪一个叫棺木岩的地方，一块呈铁锈色的崖壁上有一道距地面高约 50 米的横切裂隙，其中置放了悬棺 7 具。

还是西陵峡南岸，近年来在湖北秭归西南磨坪乡杨林桥村，青干河支流一处长约 120 米、高约 100 米的峭壁上，发现悬棺百余具。这是三峡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悬棺葬群。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小峰悬棺群。此地为西陵峡江北岸长江支流黄柏河

岸边。一处高约 100 米的山壁上，有个天然石洞，洞中原有悬棺多具。因近几十年屡遭人为破坏——如 1958 年以来，曾有农民取棺内人骨做肥料，并将棺木从洞中掀到山下，前后共毁掉棺木 20 多具——棺木群中最大的一具“套棺”即在其中。小峰地区现存悬棺共 19 具。

而夔峡中除了北岸的风箱峡，南岸的盔甲洞、狮子洞等亦都有悬棺。

有物可考的崖葬最早始现于 3000—4000 年前的商周时期——如今日尚存的福建武夷山悬棺。再往后即为距今 2700 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如江西贵溪龙虎山悬棺。而包括风箱峡悬棺在内的三峡悬棺始于何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史籍上不见有关崖葬的准确记载。仅在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及清人王世正《陇蜀余闻》等书中有过只言片语的记述。今人关于崖葬年代的判断，来自考古的实地发掘。老辈子人讲，百十年前，乘船可见的三峡里的悬棺尚有十几处。但很少有人去理会悬棺的来龙去脉。绝大多数悬棺也就在这无人理睬的时光里，腐烂，坠落，消失。

1995 年版《奉节县志 •卷三十二》有关瞿塘峡悬棺记载如下“该棺位于瞿塘峡北岸风箱峡陡峭的山崖和南岸岩壁上，今草堂区白帝乡瞿塘村南 2000 米处。悬棺现存 7 具，在江北岸风箱峡，海拔 120 米处有 5 具，均用铁柱将悬棺架在岩隙上。江南岸海拔 140 米处岩洞里有两具。因岩壁陡峭，距地面又高，无法测量，故崖上悬棺具体形状不详。1958 年和 1971 年曾有当地采药人取下过几具悬棺，里面有柳叶剑、陶纺轮、四铢半两铜钱、巴人下颚骨等文物。据考证，瞿塘悬棺群大约是战国时期所置。白帝城博物馆悬棺陈列室内陈列的一具悬棺，为巨大整段楠木，从中剖开分上下两块，再将里面凿空而成。上部呈拱形，下呈方形，两头均制成对称的‘凸’形。”

迄今所能查找到的较为完整的三峡悬棺的资料，就是收录于《三峡考古之发现》（上册）中的 1971 冬季奉节文化馆对风箱峡仅存的两具悬棺的考证记录了。

1971 年正值毁灭文化的“文革”中期，奉节文化馆人士仍有如此文化眼光问津风箱峡悬棺，也着实令人钦佩。

风箱峡的悬棺架在峡江北岸约百米高的悬崖缝隙间。至今站在风箱峡的平坝上抬头仰望，悬棺仍然可辨。但坐船过峡，枯朽的棺木几乎与铁锈色的山崖溶为一体，你就很难看得清晰了。

当时从一大一小的两具悬棺中收集到的主要文物，计有铜剑两件；铜

斧一件；铜带钩两件；木制剑鞘一件；西汉文帝四铢半两钱一枚以及草鞋残片……

从以上这些器物，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其一，棺中一把长 39 厘米铜剑，剑身铸有图案纹饰，柄上有一穿孔；另一把长 33 厘米的铜剑，近柄处两面均有相同的长喙四尾羽的鸟纹，此为战国时期流行的“巴式”剑。加之巴人有兵器殉葬的习俗，死者应属巴人。

其二：以棺中所见汉文帝四铢半两钱推断，死者必是与西汉文帝刘恒同朝或其后人氏。其死亡年代可定在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前元元年之后，距今不足 2200 年。

巴人向以强悍劲勇着称。但因其为部落式的群体，没有相对完善的国家机构，终于公元前 316 年被秦所灭。秦灭巴后对其采取了怀柔政策——依其部落旧制——其生产和生活习俗得以一直延续，直至汉代之后。因此，在三峡中多见的汉代巴人悬棺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人望悬棺，困惑有三：一是崖葬在古代巴人聚居地并不多见。考古发掘证明巴人以土葬为主，那么何等身份的巴人才取用崖葬这一特殊葬式呢？二是山势绝险，生产方式并不先进的巴人以何种手段，将沉重棺木和尸体运送到峭崖之上？三是，巴人在三峡中生活了 4000 年以上，今人所见最早的悬棺葬为什么才有 2000 多年？所谓悬棺葬是否仅为巴人习俗？

风箱峡的悬棺大小不等，据传多时共有 9 具。很有可能属同一家族——如果彼时 DNA 技术问世，结论不言自明。姑且抛开此说不谈，探究少数巴人施以崖葬之缘由，一个便捷的方法就是从现存的依旧保持着崖葬的少数民族中寻根溯源。为此，我专门往云南昆明向古民俗专家汪宁生教授求教。

2

未见汪先生前，我确实心怀忐忑，多人告诉我，先生性格孤傲不群，不相识的人与其难以沟通。但出乎意料，当我敲开住在西南民族学院教师楼的汪先生的宅门说明来意，先生的坦诚让我感动万分。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学人，谦虚总是本色，他们傲对的仅仅是肮脏的官场或是不学无术。汪先生毫无保留托出自己关于古代崖葬的研究成果，并向我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先生主要解答了崖葬的实施方法。他首先展示了一篇载于 1972《美国地理杂志》上的一篇记述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的托拉加人崖葬的报道。译

文如下："邀请我们来到塔拉（Tala）托拉加人地区作客的商人，在一个下午告诉我们一次盛大的葬礼即将举行……死者 Sa'pang 是最高等级……我们进入一个崖洞，看到其它棺材被塞在石灰岩壁的裂缝中。许多棺材上堆着死者个人的衣服……地面散布着来自已坏棺材中的骨骸和四个头骨……外面我们再一次爬到平台就近观察人像……他们称为 tan-tan，为了纪念死者而制。每一 tan-tan 都是和死者遗体最后进入墓洞的。……人像大小约为生人的三分之一。……把棺材运上崖壁放入天然崖洞，是较早葬俗的遗留。……在葬礼结束时，一个抬棺人把死者尸体包起来放在肩头，借助于刻出足窝的竹竿爬上悬崖。同时有助手站在适当位置使稳。这样，把死者放入事先以同样方法运上去的棺木之中。另外的助手关上入口的木门。最后把人像……放在入口处。"

汪宁生教授并出示了其收集到的国内另位学者罗康隆先生发表的贵州麻山崖葬的实录。麻山属苗族聚居地。该地区苗族自 1949 年之后已实行平地土葬，但对凶死者仍保持崖葬旧俗。1985 年 5 月罗康隆先生目睹了一位口鼻出血被认为凶死的 44 岁的苗族妇女进行崖葬的过程。但此地的崖葬，不过是将一具尸棺用直径约 8 厘米的绳索，拽上一座并不十分陡峭的大山高处的洞穴中。与广西部分地区曾流行的"用绳拽棺而上"的崖葬方式相同。

上述两段关于崖葬的记述，至少能回答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崖葬不应是普及的葬俗。其或者如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托拉加人，只实施于身份高贵的死者；或者如贵州麻山的苗族，专对凶死者而用。那么风箱峡悬棺中的人物，该当如何呢？

排开可能曾被掠盗和风化失落的文物不算，从死者现存的殉葬品来看，死者不会是匆匆而是从容而葬。又据此处曾有大小不等悬棺多具，因此有可能是个家族墓群。又据此处悬棺棺木历经 2000 余年威猛的峡风峡雨的吹打以及如火烈日的暴晒，至今仍存留两具牢实地摆在山崖缝隙的高处，足见棺质之优。笔者推测，此地葬者或男或女应是有一定身份之人。

回过头来再看悬棺中的那两把"巴式剑"，其文饰各不相同，一简一繁，一长一短，不似战场上通用的兵器（通用兵器实用为主，除非特制，不会打造得如此精美）极可能是身份的象征或用于其它（如巴舞道具）。

夔峡口南岸白盐山临江的峭壁上，有一列排成"之"字状的方形石孔。方孔共 65 个，孔距约 2 米，深 32 厘米，28 厘米见方。这就是有名的"孟良梯"。"之"状石孔凿于何年，未见史籍记载。有人牵强附会说"孟良梯"

实为古栈道遗迹。此说很值得商榷。如果是开凿栈道，只精凿此数十孔并无意义。况且将“栈道”修成“之”形，而不是横向延伸，明显有另一种向上的功用。登梯至崖顶，缘崖口过狮子岩即是盔甲洞上打有牛鼻孔的地方，是否可以判定此梯与悬棺葬俗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盔甲洞”的命名和“孟良梯”一样均起始于宋代。称其是宋代巾帼英雄穆桂英秘藏盔甲的地方。1958 年，曾有航道老工人周发富等二人，腰系绳索自上而下，攀援绝壁进入洞中，发现里面数具悬棺内有人的颚骨、木梳、铜鞋及巴人柳叶剑。特别是那把高背木梳，梳背黑漆为底，上有彩色图案；弧形背中央有一圆形未穿透小孔；梳正面为酱红色漆底，用红色绘有两个发髻高耸似轻歌曼舞的仕女，其头上方还飘着浮云。还是盔甲洞，1978 年，从其中一具棺木中收集到粘附于尸骨上的棉絮以及单、夹、棉三种服饰残片，且针脚细密，反映出当时已具有较高的织染和缝纫水平。

峡江两岸同一葬俗，同以当时人的能力极至——现代人亦叹为观止的手段——将沉重的悬棺送上绝险山崖，的的确确令我们浮想联翩。人们在思索，古代巴人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得以完成如此壮举。

笔者以为，以当时社会生产能力和人类智慧所达到的水平而言，将沉重的悬棺搬上高崖，方法应当不拘一格。前面谈到的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托拉加人，以粗大的茅竹节与节之间刻出方形足窝为梯支撑至山崖高处，然后棺木尸体分头运到预定地点，不失为一种办法。其它如“筑土为台运棺其中，事后台卸土撤而棺乃独立岩隙”……。但就三峡的地质特点，“自山上悬索下柩”的方法可能最流行：三峡地区崖顶常可见“牛鼻孔”可能即为系棺之用。有人考证，有悬棺葬的山壁，看似巍峨摩天，其崖顶及背后或两旁的地势却是平缓开阔，附近并有人居住。古人将几百公斤重的棺木沿崖顶用绳索吊至山壁石洞，并不难。再有，古三峡诚如郦道元《水经注•江水篇》所言“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又初唐陈子昂诗“崖悬青壁断，地险碧流通。古木生云际，归帆出雾中”；又中唐孟郊诗“三峡一线天，三峡万绳泉。上仄碎日月，下掣狂漪涟。破魂一两点，凝幽数百年。峡晖不停午，峡险多饥涎。数根锁枯棺，孤骨袅袅悬”；又中晚唐杜甫诗云“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等诗文看，三峡两岸山崖曾多生古木怪柏，皆可借助“悬索下柩”之用。近年在秭归西南的磨坪乡发现的悬棺群葬中，考古工作者于最高处的洞穴内找到一捆绳索，如果研究能证明，此绳索与悬棺葬属同一时代，那么，则可有助于揭开悬棺置放之谜。

至于说巴人在三峡生活了至少 4000 年以上，为什么峡中悬棺才仅有2000多年。根据现有的文物遗存如云阳李家坝和涪陵小田溪的巴人墓葬群，我个人以为，巴人以土葬为主，悬棺葬只是巴人葬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三峡悬棺葬的出现时期大约在战国以后，而且仅限于少数几个巴人部落。汉以后这些部落逐渐消亡，悬棺葬也就随之消失了。

至于悬棺属性，原宜昌市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高应勤先生则认为，巴人起源于重庆至湖北清江流域广阔地带，这是当今学术定论。但也不能就此断言，悬棺葬只属巴人。如福建武夷山和江西龙虎山也有不少悬棺，你就不能说那些是巴人悬棺。一般地说悬棺是一种容易被多民族或多部落接受的葬俗，即使三峡悬棺也不能武断称之皆属巴人。因为三峡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居住过濮、僰、蜒、夷、巴等多种族属。只是三峡悬棺通过考证多属巴人或与巴人有相当关联的族属而已。

3

悬棺葬的研究，多少年来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话题，但由于相关的文字记载太少，关于悬棺葬的研究只是来源于对考古物证的推测。一般说来，悬棺葬为巴人葬俗得到公认。但还另有说法称，近年在四川宜宾地区珙县发现的明代悬棺葬主的祖先为契丹。笔者以为此说难以成立 ，因为以游牧为生的部落，流落三峡只能是自寻死地。按常理，即使战败逃跑也要一如匈奴，逃向北方他们熟悉的辽阔草原逐水而生；还有说法称，珙县的悬棺葬中的僰人为巴人某一支的后裔。而僰人先祖为巴人。巴人的先祖是百越人。百越人本来居住在长江下游福建武夷和江西龙虎山一带，后来溯流而上到了三峡及重庆，于是将悬棺葬的习俗延续到这里。此说也很值得商榷，首先是百越人凭什么理由，要万里迢迢跑到先前一无所知的生存条件恶劣的天险三峡来？如果是因为战争，他们在恐怕到不了三峡迁徙中途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是瘟疫，他们在长江中游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安居之所……中国历史的特异性还在于文化和政治中心整体上说是由西向东的转移，如百越人那般大规模的由东而西万里逆向转移恐怕还没有发生过。再有，如果百越——巴人——僰人为血亲关联，难能透出“百越民俗信息”的三峡的巴人史又将从何谈起？

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可以大胆推测和想象，但在求证过程中一定不要草率而要严谨。草率易使研究结论肤浅和过于功利化，

只能引起研究的混乱。笔者以外行的眼光推测，珙县明代僰人悬棺应与三峡巴人悬棺有所联系，难与百越和契丹有什么瓜葛——当然最后结论还要由专家据史确认。

4

趁三峡涨水之前，悬棺还可以看见——在瞿塘峡、巫峡、西陵峡都保有他们最后的踪影。群峰陡起，顺水飞舟，仰视三峡崖顶悬棺，不管其有多高，无一例外在山下，在江上都可以望见。这或许是悬棺葬俗中的又一特性。静眠在悬棺里的巴人，枕着涛声，在三峡的风中，雨中，雾中，雪中长眠了两千余年。流淌的时光使他们变成了干枯的骨架，变成了历史。从前，他们睡去的时候，想到过吗，他们生息的土地，会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灩澦回澜消失了，江涛不再响如轰雷——大船，更大的船接踵而来。远古的苍凉，山坳里曾燃烧数千年的红亮的篝火，幻化成如今洒满山岗的热闹的灯光。

5

自汉以来，夔门口上就有铁索横江。《读史方舆纪要》云“夏人守瞿塘，以铁索断关口。北倚羊角口，南倚南城寨，凿两岸壁，以绳为飞桥”。如唐代天佑元年（公元 904 年）此地即有守将张武镇守于此“作铁链，绝江中流。立栅于两端，谓之锁峡”。

眼下老观庙信号台前立着的两根锁江铁柱，是为免得将来峡江涨水被淹，从夔门口与草堂河交汇处的一块青白色巨礁上迁移而来。该柱以生铁铸造高 2.3 米，直径 0.4 米，基座高 0.27 米，柱身有五节宝顶，上部有文饰，其中一根铁柱下部残存“大将军徐”字样。据考，锁江铁柱为南宋景定五年（公元 1264 年），由守关大将军徐宗武所铸，是南宋抗元战争遗迹。史载，当时的瞿塘峡口共设置铁链 7 条，总长 277 丈，5010 股。铁柱原址附近的山壁上，还有一块当朝丞相贾似道碑。碑文不外乎“铸铁柱，造铁缆，锁瞿塘关，永为万万年古迹”之类的无关痛痒的俗语。国史上，像贾似道这样的“蟋蟀宰相”总是似曾相识，平时不管与其相关不相关，臭字题得漫天飞，一旦与百姓冲突面对面——哪怕他自诩是“人民的儿子”——杀起人民来手起刀落毫不留情。

图 1.8 抗击蒙古时的锁江铁链，后来被挪上岸来

但自元之后，夔门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转化为商贾往来交纳税银的关卡。

夔门在历史演进之中，似在不知觉中划出了一条战争与和平的分界。历来战争总都是阶段性地集中在几个重复的“点”上。民族或文化的嬗变也便会围绕着这样的“点”而交合融汇，这也算是战争的功能吧！在讨伐纣王的征战中出尽风头的巴人，曾经就聚散在这条分界的两侧。那些高悬在冷寂山崖上的悬棺，像是一只只神秘的眼睛，注视着那些隐在深深的山谷和清冽的溪流畔不再喧嚣的巴人后裔：当初的威武之师，一代复一代衍变成弓腰劳作的山民，顺从又贫穷；灩澦迸散，峡江似练，再难见夔门的惊天怒吼……山，水在少有宽容的文化里归于毁灭后的平静，一种更可宝贵的东西也随之失去——那就是能够激发心灵底处的与天地抗争的精神。

第五章 独走夔峡

1

数百里三峡两侧的山壁至今保有百多里断断续续的栈道（或称纤道）。但只在夔峡保存了一条贯穿整个峡谷的被唤做“夔大道”的相对完整的古栈道。此栈道全长约 8 公里，据史载其始建于清道光三年（公元 1824 年），先凿成夔峡东段。至光绪十五年（公元 1889 年）时任夔州知府的汪鉴筹款再建成了西段，才使夔大道东西相连。说是大道，实为紧贴江北崖壁硬凿出来的几种不同类型道路的组合：石壁上劈下部分而成的碥道，将崖壁凿空而成的石槽道，用石块垒砌的垒石道，连接山与山之间空间的石桥。其中最为绝险的开凿当是硬将绝壁掏空的石槽道。故尔在道中风箱峡的石壁上特别刻上“天梯津立隶”和“开辟奇功”八个大字。

多少次乘船过三峡，经常远见有人背着行囊时隐时现于临江绝壁的夔大道上，让我钦羡至极。这次有了机缘，我决定以徒步的方式，从头至尾走一遭。

2

2001 年 7 月 5 日天刚亮，约了向导老李从白帝城半山腰起步。经城下的西阁、观音洞，再过白帝城与赤甲山之间草堂河上的斜拉桥，即古象陈列馆——那里陈列着一头在附近山里发掘出来的 200 万年前的夔门古象化石。从陈列馆右侧山路往前走不远，就到了我们此行的起点——老关庙信号台。全长 8 公里的夔峡共有指引航船的信号台两座——待我们见到另一座白果背信号台时，即算走到夔峡东端出口了。

已是连续两天的急雨过后，清凉的峡风把峡门口吹得满目清新。站在老关庙信号台下，还没有开步走，隔江一眼就先望到了南岸白盐山（也称

粉壁墙）石壁上的石刻："夔门天下雄 舰机轻轻过"、"瞿唐"、"夔门"，而抗战将令冯玉祥 1940 年的题字"踏出夔巫 打走倭寇"，和将军 6 年后的再题诗"打出夔门去，驱逐小倭寇。我曾题此语，刻在崖上头。胜利还都日，此愿国已酬。仍须共争取，和平与自由"，让我的思绪顿时飞向长城和黄河——用生命捍卫祖国山河是中华子孙永远的使命。

所有崖壁上的石刻——你莫要大惊小怪——被定为书法"珍品"的不是那块包容着强烈民族精神的冯将军的题刻，而是充斥着一堆极尽阿谀奉承的文字的南宋《中兴圣德颂》。此颂共 980 字，题壁高 4 米，宽 6.78 米。说的是南宋高宗赵构禅位于孝宗的"圣德"。宋高宗何许人？就是纵使秦桧杀了岳飞而与辽金"议和"的皇帝。宋孝宗赵昚何许人？27 年执政，终难逃"禅位"的高宗的掌心，当了 25 年继续与辽金或是"投降"或是"议和"的儿皇帝！就是这么一块题刻到如今已被捧上天。什么"书法价值"，什么"实物史料"，什么"石刻技艺精湛"……吹得无边无沿儿。

此碑文作者"著名"的赵不忧，书者亦"著名"——这个已经被当代俗人用烂了的词——南宋书法家赵公硕——都是沾了与皇帝同姓氏的光得以扬名天下者。

刻字于石体或山壁——原始崖画除外（那是画不是刻）——据传始于秦汉，之后渐成风气。以至成为权者记录"功德"，民间记录事件，文人抒发情怀的重要方式。像《中兴圣德颂》这类的题刻则是历代皇帝最高兴别人去做，他们最得意看到的。但纵观历史，凡事关皇帝的题刻，也就是皇帝最喜欢看到的石刻，十有七、八，"实"不可据，"虚"不可考。你想想，包括高宗在内的徽宗和钦宗把黄河以北的大半国土已经丢得一干二净，非但不受惩治，高宗还恬不知耻地"禅位"与孝宗，竟然还算"圣德"，竟然还有人吹捧，可见无耻文人记录的中国的历史可信者几何？

粉壁墙上共有宋代至民国大、小石刻十余块。《中兴圣德颂》是较早的题刻之一。后来听说，三峡蓄水，题刻中的 13 块要"保护搬迁"。具体是，有 4 块石刻将被切割保存；9 块用拓片和翻模等手段"克隆"，再装点于下游 500 米临江崖壁高处。《中兴圣德颂》则被加以特别保护——切割后被送到兴建中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我后来也曾问过白帝城文馆所一位副所长，为什么不将冯玉祥将军题刻切割收藏？副所长答曰"冯玉祥将军题刻风化严重，不宜切割。而且，不切割也是保护。我们将在这块题刻上面装上一层护网，减缓蓄水后江流对其的冲击，同样达到保护目的。"

我之所以看重冯将军题刻，因为它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民族精神。

就此意义而言，这才是白盐山所有石刻中的珍品：八年抗战——千万家庭的毁灭，3500 万同胞的命的牺牲——成为中华民族最沉重的记忆。让每一个过往三峡的中国人牢记这个“沉重”，为了不再重蹈覆辙。

但，我们的历史还是再现了忘却的一幕——2003 年 6 月，冯将军“沉重”的题刻，“理由”非常充足地沉入了冰冷的峡江。

哀其不幸，恨其不争，怒其不自尊自省——此刻，我只能说出这样的感受。前些年走在重庆街头，看到闹市中心矗立的解放碑，这感受就曾有过。这座为悼念 1939 年日本对重庆大轰炸的死难者而修的“抗战堡垒”，上面曾刻有如下警句：“炸！炸不掉我们钢铁一般的意志；烧！烧不毁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但在 1949 年解放后却被拿来改成解放碑。我真想问问当初这个动议的首创者，“解放”——国共两党之争，比起日本对中国人的伤害，孰轻孰重？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历史，就是这样在党争之中被忘却被删改——如同那个花花公子张学良被装扮成了民族英雄一样，让冯将军像火样燃烧的石刻默默沉江，宣示着一种精神的堕落，一个民族尊严的缺失！

早就该这样说了，我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日本忘记历史？其实，我们对历史比日本人忘得还快！

3

夔大道前行不远，路途渐渐变窄。走过崖顶摆着神秘悬棺的风箱峡，前行千米就是夔峡又一景——七道门。向导老刘说，抗战时期，此“门”摆过大炮，以备日寇进犯三峡之需。所谓“七道门”，实为一个崖洞层层套了七个大洞小洞。我进去四个洞，就再难前进了——阴风扑面，深不可测，只得返回洞门口歇息。

已经快近正午，太阳高升在天。从七道门前行不久，转向另一面山坡，再也躲不开当头的烈日。此时，前几日因阴雨变得湿滑的道路愈发难行。荒废多年的古道，变成了只有一两尺宽的羊肠小径。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往前走，生怕滑倒滚进脚下的峡江。又走了个把小时，汗水已经把全身湿透了。找到一堆背阴的石头，向导老李劝我歇下来。他说，现在正经八百走这条古道的人，只有住在大山后面的山民。

别看老李已经年过六旬，却是身轻如燕。走起山路矫捷得像只猴子。他在奉节航道处退休。退休前，负责安装和维修峡江奉节段沿江信号台的

通讯设备。现在信号台上使用的高频电话都是老李亲手安装的。当年他曾无数次往来于我们脚下的这条古道——他熟悉此道上的一草一木。

行在绵绵古夔道上,老李指给我看山壁上一个又一个“牛鼻孔”——更明白一些说，这是人工依山壁打凿的横向相临相通的两个巴掌大的洞穴，两洞之间的隔梁做泊船系缆之用——简单又牢靠。“牛鼻孔”外，夔道外侧还有前人遗留的刻满纤痕的纤夫石——夔峡古道原来也是纤道。

对坐在歇脚的山石上，我问老李“峡里的这条古道是什么时候荒废的？”“要说真正荒掉，是从‘文革’以后。”他解释说“作为纤道，解放后没几年，因为纤夫中不少人都转了行，渐渐失去功能。像我父亲就由纤夫改行，先当了航标员后当了信号工。他几十年上班回家往返常走这条路。直到‘文革’开始前，古道还有养路工定期保养维修。一闹‘文革’，路就没人管了。没人管，路面就保不住。前面快到东峡口有一段路，一碰到雨天准塌。我的父亲主动担负起这段路的保养任务。直到他 1978 年退休。再以后，改革开放，经济好转江上的船多了，往巫山的公路也修得宽了，岌岌可危的夔峡古道就渐渐荒掉了。”

感觉得到，老李关于古道的回忆中，时时闪动着父亲的身影。

4

老李的父亲名李德元，是一位地道“老三峡”。关于他，还得从 1954 年长江航道局奉节航道段成立说起。

此前，川江的导航标志就是“水中几根破竹竿，岩上几个白圈圈”。如果船过三峡，则全凭领航员根据沿江的礁石、树木、房屋当做导航的标志。

奉节航道段成立了。上起巴阳溪，下至夔峡出口外的黑石滩共 43 公里的航道有了正式的管理部门。那一年，整个峡江设置了航标灯，破天荒开始有了夜航。在峡江上拉过纤，绞过滩，干过苦力的李德元当上了第一代航标员。

他的航标员生涯是在前面峡出口外的横石溪信号台。那时起航标就分为岸标和浮标两大类。江左即北岸标为白色三角灯标，江右即南岸标为红色三角灯标。而浮标灯则全是设在江上，靠北岸绿灯，靠南岸红灯。所有标灯用的是煤油——不似现在自动电控——天天要靠航标员每天傍晚一一点亮。岸标好说，水中的浮标灯就难办多了。浮标灯都架在小船上，小船则是系上粗绳，然后用粗绳另一端绑上巨石沉入江底固定在江中某一点。

图 1.9 作者在夔峡栈道

图 1.10 夔门古炮台

图 1.11 夔门及桃子山，入此为三峡

图 1.12 夔峡东出口

风雨无阻，李德元每天要负责点亮10公里左右江段上的40多盏标灯。穿上救生衣，划着小筏子，暮色将临时分出没在风波浪涛之中，危险可想而知。有那么一个阴云天，是个周末，他——就是今天的老李——到横石溪信号台看父亲。刚巧父亲李德元提早划着小筏子去点标灯了。老李站在信号台的窗前，只见岸边和江面上的标灯一盏接一盏的亮了，却看不清父亲的影子。再过一会儿，忽然下起了大雨，天色很快全黑了。父亲没能按往常的时间回来。老李焦急万分，这种天气他最怕父亲遭到不测。一个人跑到江边，对着大江千呼万唤，没有回音。他急了，沿着江边的小路不停地顺流往下跑，一气跑了好几里。天太黑了，江上万物不见，只剩下耳边的风声和雨声。老李又返回横石溪。父亲还没有回来，他很明白，父亲肯定出事了。独自立在窗前，老李眼巴巴对着大江望了一夜。天亮了，不甘心的他又沿着江岸继续去找。岸边、江上，他不停地用眼睛搜索。一气走了二、三十里，仍是不见父亲的影子。他越来越绝望，一屁股坐到岸边的一块石头上。当他无意中把目光转向江南岸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高高的个子，手中拎着救生衣向他这边张望。是父亲，肯定是他的父亲。父亲肯定也看见了老李身穿的海军衫——那是做梦想当海军的老李死磨硬缠央求父亲向朋友要来的。李德元先向儿子这边喊起来，老李紧接着回应。父子同在大江的两岸挥手——峡江人的生离死别永远离不开山水、风浪和那条悠悠的小船。

老李回忆说，那天风大雨猛，父亲划的小筏子翻到江里。幸亏救生衣和他的好水性，顺江漂了20里他爬上了岸。

5

时间已过正午，喷火的太阳就挂在脑袋顶上。古栈道一片热光灿烂。走过大半行程，路愈发狭窄，目光越过只一层荒草的山坡，立在峡口的白果背信号台已经历历可见。然转过这道山的弧线，信号台又被挡在了山后。就在此时，最担心发生的事摆在了面前——路断了，断了足有50米。只见路的痕迹已经与山的坡面相齐，再往坡下看，高深莫测的浑浊的峡江水不停地撞击着山壁咆哮翻腾。

退不得也进不得，正是考验胆量的时候，老李方显峡江人英雄本色。他先接过我的相机和背包，从容将这些东西送到断头路的另一端，然后再攀过来接我。他走在前面，叮嘱我“哪里也不要看！”——让我踩着他脚踩

过和手抓过的地方一步一步小心向前挪——一点儿不能疏忽，稍有失误，就要坠入脚下的滚滚峡江。我几乎是整个身体贴在山体上，通体汗透地走过了这惊心动魄的 50 米！

这 50 米过后，对我来说，夔峡栈道再无畏途——犹如人生，“沧桑历尽万事轻”。像是才眨眼工夫我们很快就走到了夔峡东端白果背信号台。再看表，已经快两点钟了。该座信号台即老李父亲退休前工作的地方，只是现在已经从平房改建为两层小楼了。两个值班的年轻人小刘和小江正端坐在二楼的岗位上。

现今的信号工安全多了，夜间的岸标和航标灯自动控制不用管。白天就坐在屋子里，操纵一下挂在外面的航向标——箭头朝上上行船通过，箭头朝下下行船通过。过大船的时候用对讲机相互联络，信号台之间则用高频电话沟通。一天下来上下水各走大船百余条，不费吹灰之力。生活设施也比以前方便得多。卧室、厨房、电灯、卫生间，简直赛过小神仙。唯一比以前不便之处是，以前喝水直接到江里去挑，现在要从外面送水喝。长江水这些年污染得已经不堪入嘴了。

老李带我进了信号台。他对这里的环境十分熟悉：往江中挑水的小路，信号台后面几块古怪的山石，都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李德元在的时候，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信号台上江风大得出奇，峡风穿户而过，清凉清凉，比天然空调还舒坦。听说三伏天，夜里也要盖棉被睡觉。白果背也有叫白鸽背，名字由来不见县志记载。但无论名取哪一个，都美都动听。从信号台上可以东望日出，西望落日，充满了诗情。

此地没有班船停靠，借着信号台的电话和对讲机，信号工小刘为我们喊来一条小机动船，载我们返回奉节城。走出信号台，但见古道出了夔峡仍在向前延伸，通向山深不知处。峡江的天气变得也很快，刚才还烈日如火，转瞬就满天阴云了。老李见我担心下雨，笑着告诉我“奉节这一带有句民谚‘云跑东，雨不凶；云跑南，打翻船；云跑西，披蓑衣；云跑北，雨没得’。你看上面的云都是向北飘，放心，准下不了雨！”

真正是方便，我们刚到江边，就见一只小船开来。是只长七、八米的机动船。说好 100 块钱，船老大逆水行舟把我们直接送回奉节。这条七、八米的机动船，若在北京的北海或颐和园的湖面上，简直是个庞然大物，开到长江，小的就像一片飘叶。

小船嘟嘟嘟离开江岸逆水向峡的深处开去。峡的南岸是一溜风景：“犀牛望月”、“凤凰饮泉”、“倒吊和尚”、“孟良梯”……我只盯住峡北岸我们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刚刚走过的夔峡古栈道。那条道，到了峡江上再看，柔和得却像一条飘舞的绿腰带。还可以看见有人走，人小的只有巴掌大。

渐至夔门，你抬头仰望上空，仍依稀可辨空中一道钢丝横悬夔门两岸。那是 1995 年 10 月，51 岁的加拿大人科克伦由南向北徒步跨越夔门时留下的遗存。钢丝长度 728 米，与江面垂直高度 328 米。峡风强劲，高峡之上尤甚。然而无所畏惧的科克伦从容完成了跨越。这跨越，曾完成了一次向拥有智慧而匮乏勇气和勇敢的中国精神的冲击。

有道是“古道西风瘦马”，有道是“断肠人在天涯”——而今呢，满天阴云下的瞿塘峡，雪浪无声，舟影寥寥，已是一首被冷落的凄凉的诗篇。

第六章 奉节遗恨

1

我在结束 2002 年 4 月奉节的第二次采访之前，专门空出时间，去了解上一次来奉节时，奉节航运公司职工代表郑明平、邓龙堂所反映的总经理鲸吞职工移民款的问题的处理情况。此前，我在北京曾打电话给郑、邓二人，请他俩将一些关于郑龙堂的补充材料寄给我，但没有得到回音。

在奉节，我与郑、邓联系，电话接不通；我去找李茂兴，他的家已是人走楼空。幸好在去年失火的奉节航运公司职工宿舍的那片烂房里，有几个职工还认识我。他们讲，去年我走后，郑明平和邓龙堂等人便被抓进公安局实行拘留。理由是违法聚众闹事，对抗政府。

我知道，这显然是指去年 6 月 8 日到 6 月 10 日，郑、邓二人与奉节航运公司忍无可忍的职工一起，在奉节城钟表社附近街口抗议政府对职工应得的“移民款”层层盘剥，而进行的静坐示威。

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赃官拿工人的生命钱中饱私囊，不闻不问。要求处置赃官，却被定罪为“聚众闹事”成为罪人——呜呼，天底下穷人简直连一块哭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既然找不到告状的地方，工人也只好忍气吞声。这回没有航运公司的职工再来找我了。与上次来奉节比较，我下榻的招待所冷冷清清。唯一到招待所找过我的是位无依无靠的老婆婆。她哭诉，去年失火后，一直躲在亲戚家栖居。快一年了，将来如何还没有着落。我安慰她，并给她些许经济上的帮助——我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我还问老婆婆，航运公司的赃官黄开树和他的家族现在怎样“黄家啷个惹得到？人不要脸，百事可为！”

我自幼就没有贪恋过权力，但在奉节却突然有过当个官的闪念：都怪我手中无权，只能看着百姓任人宰割，而无力相助。而同时，心底下也升起一股莫名的惆怅：被这伙结党营私的坏家伙敲吸骨髓，在做出一点反抗

被镇压后，峡江人竟然如此容易地归于“平静”。

中国百姓，你怎么就不会愤怒？

不止在奉节、包括巫山、秭归、巴东等整个峡江两岸的城镇，都流行着一种被叫做“麻木”的交通工具。所谓“麻木”其实就是可以载客的三轮摩托。“麻木”屁股冒着青烟，盘旋着跑在峡江岸边城镇街道上，嘣嘣嘣的噪声大得出奇，动力却很小——连个稍稍陡一些的坡坎都爬不上去。“麻木”是峡江人自己起的名，这其中是不是也暗含了峡江人对自己命运的自嘲——索性就“麻木”着任它去吧！

受压迫者“麻木”，压迫者焉能不愈加猖獗？

“麻木”——是对罪恶的纵容。

2

傍晚，阴云团团缠绕在奉节城的上空。坐在热闹的依斗门门洞里的石阶上，等候奉节开往巫山县的客轮。直对长江的依斗门里为坡形的石阶，极强的江风贯门而过，是夏季纳凉的好地方。我的旁边坐的是一个叫滕明德的流浪汉。自称四川武胜万山区三村八队人氏，55 年生人，今年 46 岁。他告诉我，流浪至此，是因为老婆丢了来找老婆。他曾到过湖北襄樊，在那里被收容后遣送到奉节，就没人管了。因无回家路费，就住在依斗门里靠乞讨过活。滕明德的话还没说完，坐在他后面的另一个人又搭腔对我说，他今天还没讨到饭吃，帮他个忙吧。我转过头去，门洞里没有灯，看不清此人的脸。问他尊姓大名，答曰“逢人只说三句话，穷人富人不一心”。说罢起身拂袖而去——他竟然把我当成无情无义的富人了。滕明德说，“此人也是常在依斗门闲坐，原是个大学毕业生，涪陵来的，人都叫他‘流浪老知青’”——但这个“老知青”却让我在短短接触中，感觉到一种超然物外的玄秘。

往巫山的客轮正点泊岸。很快就驶离了码头。我的手机突然响起——县交通局田副局长打来电话，约我晚间吃饭。吃饭，我当然不会去，但我至今后悔两件事，一是应当多留一天主动再去见见田局长，调查他们对黄开树的处理情况；二是多余告诉他我已经搭船离开奉节——否则他至少心里还要打几天鼓——不能让这些把百姓视为仇敌的人过得踏实。

天色渐晚，远山隐隐，近山朦胧——“山城向晚云阴结，几处炊烟隐暮笳”。船入夔门，雾气愈重。仿佛将这里所有过的历史全部淹没在浓浓的

云雾中。史载：奉节乃故鱼国也。后为巴国领地更名鱼邑。楚成王三十八年（公元前 634 年），夔子国因不祀楚神祝融、鬻熊，为楚所灭，将夔并为庸国之鱼邑。楚庄王三年（公元前 611 年）楚联巴秦共灭庸。三分其地，鱼邑重归于巴。再至秦惠王后元九年（公元前 316 年）势力渐强的秦国，完成了对巴国的最终的毁灭……

不知巴人在走向毁灭时是否做了最后的反抗，但以巴人骁勇善战的性格，几乎可以肯定，巴人面对强秦上演过极其悲壮的一搏！而秦国灭巴，仍对巴人保存了几分仰敬和畏惧：留下巴人原来的首领，不改其旧俗。

客轮悠悠，不知觉中驶出了短短的夔峡，进入大宁河宽谷。山、树、云皆都隐入茫茫的夜色里。只听见江水拍击船舷的啪啪之声，只看见两岸萤光似的点点闪烁的灯火。峡风猛烈，迎面扑来呼吸都困难。下雨了，回到船舱里，隔着小窗再往外面看，万物皆不见。只能闭目回想奉节城：忽地想起在八卦村的旱八卦阵遗迹附近找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之墓的情景。东南西北找了一大圈，什么都没有。在八卦村里歇息，一位农民拿出一个造型像只老虎似的铜带钩，问我这东西值多少钱。我不是考古工作者，当然不知此物何价。后来向专家请教，我知道了这种虎形铜带钩是典型的巴人遗物。相传巴人崇拜虎神，并可能以白虎为图腾，所以至今包括奉节在内的峡江一带，还多少保存着关于虎的习俗：如孩子带虎头帽，穿虎头鞋，结婚时铺虎毯，跳丧时唱“三唱白虎当堂坐，当堂坐的是家神”……可惜那只威风八面的图腾虎，只作为文化信息存留在土生土长的奉节人的习俗里。

我幻想回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年月，我幻想白虎被峡江巴人奉为图腾的时代——让生命饱含激情，即使活上一天，也比只为健身苟活一万年更令人向往。

第二部 巫山云

出夔峡，峡江水突然变宽变缓，两岸的群峰也都化成矮矮的缓坡。江水在这悠悠的 27 公里的大宁河宽谷，仿佛舒展着腰身，时刻准备冲向气象万千的巫峡。

别小看了这段貌似平庸的宽谷：中国最早的人类——据说已有 200 万年历史的巫山人就发祥于这宽谷西端、夔峡出口的大溪镇。而宽谷东端——巫峡峡口的巫山县，更是溢满神奇的传说。

巫山县战国时期为楚国西陲门户，县境属巫郡。后为秦国领地，更名巫县。至隋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改为巫山县至今。

在中国的版图上，公然以“巫”为名的地方，除了山西夏县巫咸山和湖南西南的巫水江及辽宁某地，以及昆明巫家坝外，主要集中在巫山四围。像“巫溪”、“巫峡”、“巫峡镇”、“巫山十二峰”。这个地区，面积不大，位于中国腹地，却与中原文明相分隔，曾经构成了自成一统的“巫文化”。

“巫”与“巫山”作何解，《说文• 巫条》解释“巫，祝也，能齐肃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历代学者在考证巫山之“巫”时，则更是众说纷纭。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其著述《艺林伐山•卷四》中援引晋人郭璞《巫咸山赋》文说“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师，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封于是山，因以为名”；《山海经

• 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在此升降，百药爰在”，有人考证说，此灵山即巫山是也。而灵山则是确指今巫溪宝源山。因该山上百药满坡，山下一股天然盐泉，故为“灵”，为“宝源”也。《山海经 •大荒南经》还说“有𢦏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𢦏处，是为巫𢦏民”，古史学家认为虞舜时代的此“𢦏民之国”即涵盖了现在的巫溪和巫山。汉语中充满玄机之“巫”字，出处即在于此。

莫以为晋人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是最早的“大同国”，《山海经》里描绘的巫𢦏国才是第一个“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天人合一的美好天堂！

且不管巫山之“巫”到底何云，且不管杜甫“巫山巫峡气萧森”的诗句把巫山吟咏得如何莫测，那个长近百里的巫峡，那青翠秀美的小三峡，那楚阳台，那高唐观，奇秀的巫山十二峰，那神秘的巫山云雨，都吸引你必须是要到那里去——看飘云和迷雾遮掩下的巫山，看神女峰下摇荡的行船——自上古唐尧时代起，近万年的巫山巫峡史，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廊，记录了所有失去或将要失去的岁月的轨迹。

第七章 神女峰下

1

飘云，飘云，蒸腾的雾气里，飘云缠绕着飘云。

山穷水复，峰回路转，全长 45 公里的巫峡，清晨总是让飘渺的云雾罩在峡口，展示出其萧森玄妙之气。然而古往今来，迁客骚人，就是在这神秘的穿越中领略了巫峡诱人的风采。

从巫峡西口顺流而下三十里即是峡中最美的风景十二峰。江北岸依次为登龙、圣泉、朝云、神女、松峦、集仙六峰，江南岸六峰为净坛、起云、上升和飞凤、翠屏、聚鹤。神女峰则是美中之冠。你看她亭亭玉立的身影立在缥缈的云端，忽隐忽现，激起古往今来的诗人无限的惆怅与向往。颂唱神女的《巫山高》曲牌，由短及长，一变再变，填尽了神女峰下迁客骚人的哀怨。

“巫山高不穷，迴出荆门中。滩下石声溅，猿鸣上逐风。树杂山如画，林暗涧疑空。无因谢神女，一为出房栊。”（梁•元帝《巫山高》）

“巫山与天近，烟景常清荧。此中楚王梦，梦得神女灵。神女去已久，白云空冥冥。惟有巴猿啸，哀音不可听。”（唐•张九龄《巫山高》）

“奇峰高十二，一叶下巴东。冷碧出云上，空青落镜中。江声疏密雨，树色往来风。峡路苍茫里，寒猿听不穷。”（清•傅作楫《巫山高》）

“巫山高，高入云，云中十二峰，五色何氤氲。琪花玉树纷难详，遥见碧城开天阊。黄金为门白玉墙，中有云鬟日月珰。含情弄态如相望，亦如藐姑射山旁。飘飘似仙云中翔，阳台何山无斜阳。为云为雨

图 2.1 神女峰背影

图 2.2 集仙峰下的孔明碑

山之常，底事巫山诬襄王。”（清•李调元《巫山高》）

有关巫山神女的传说之源，颇多歧义。一说，神女是西王母的第 23 个女儿，因协助大禹治水而被人们称颂与怀念。但认为其本出自楚辞人宋玉《高唐赋•序》的另一说，应和者甚众：

>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为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当初楚怀王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自荐枕席与之云雨交欢的高唐观遗迹，今日依然矗立在巫山老县城西北高丘山半腰台地上。高唐观亦称“楚王宫”或“细腰宫”。不过历经两千多年风云沧桑，此观已是面目全非。明代时还尚有规模的建筑群落，禁不住兵匪一毁再毁。现已变成巫山县委党校内的几间清冷的荒舍。据传 1958 年“大跃进时期”，这里曾一度是公共食堂。

早晨灿烂的阳光从一夜秋雨的天空上倾泻而下的时候，我终于在巫山党校的院子里找到高唐观旧址：仅剩下一座破烂的瓦顶像是民居的“玉皇殿”。白色粉墙，两扇小窗，锈色对开的小木门锁住了墙里的一切。正门两侧的墙壁上残留着一幅石刻楹联：“金阙响南陵九天阊阖开宫殿，琼楼依北斗万国衣冠拜冕旒”。而那幅名闻古今的高唐观石门联，则已被卸下分别横躺在楹联的脚下：“仙鬟枕峡水三千休谈宋赋，古刹迎巫峰十二可访唐碑”。碑上紧压着钢筋和沙石，看上去一副惨状。倒是贴在观墙上的“全面提高领导干部队伍政治素质”、“认真学习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的两条墨迹犹新的标语，更显得得意洋洋。有人牵着毛驴从殿前走过，看都不屑看一眼这座曾引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韦庄、苏轼、苏辙、黄庭坚诸多文豪造访的名观。

高唐观遗址现存碑碣二通，弃置于一杂屋角落。二碑均为清碑。其一立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由巫山六品职员韩钫撰文。其二立于道光

二十二年（1842 年）。无缘近睹，不知所云。另有朝云暮雨石一块，立在大殿门口。该石朝时泛起腾腾云雾，暮间结有晶莹露珠，为高唐一大奇观。但此石我并未见踪影。

倘佯在高唐故址，唐人韦庄留下的诗句萦绕耳畔“乱云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朝朝暮暮阳台下，为云为雨楚国亡。惆怅庙前无限柳，春来空斗画眉长”。

而一身傲骨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笔下的神女则另有弦外之音“巫山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晓雾乍开疑卷幔，山花欲谢似残妆。星河好夜闻清佩，云雨归时带异乡。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天上神女，你好没出息，来找楚襄王这样的俗人做甚？

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
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
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
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

——《宿巫山下》· 李白

走下高唐观，远眺巫峡口，决心摇舟下巫峡，走到神女峰下，看看曾在高唐观中飘来飘去的神女，而今安在哉？

2

在巫山码头雇到一只用钢板打制的机动船。讲好开船到神女峰下，一天来回 100 元。船主叫蔡天，是个三十岁热情的青年人。

秋阳高照的好天气，我登上蔡天的机动船顺流而下，很快就进入巫峡。事前约定，小船先在入峡约两华里处北岸停靠，为的是弃船上岸参观将来涨水要被淹没的“陆游洞”。

“陆游洞”原名“清水洞”，因陆游曾在此泊宿而更名。宋乾道六年（公元 1170 年）诗人陆游往任夔州通判旅次，曾泊船于此洞前，歇息洞中。他并在其《入蜀记》中写道“二十三日……泊清水洞。洞极深，后门自山后出，但黯暗。水流其中，鲜能入者。岁旱祈雨颇应。”

“陆游洞”今已被修饰得古色古香。入口处前一直径约半米的圆孔源源不断将洞内之水喷泻入江。喷泉上筑一平台，自平台北侧再上二十余石

阶，是一尊陆游整身雕像。雕像后面即是陆游洞了。洞前山壁上嵌一方石，上书："天下一绝"四个大字。蔡天告我，以前陆游洞曾经对外开放，1999年9月28日，洞前发生了游船停靠岸边翻沉事故，开放中止。但此洞一直有人看守，以待像我们这样的零星散客。我们进洞时，并无人理会。到走进深处才发现里面黑魆魆伸手不见五指，只得退出。此时见一人立在洞前塑像前，前去打问，乃收门票钱者也。他料定眼前这一常见常现的场景，早已恭候于此。所谓门票，就是每人向他交出20元人民币，换得其将洞内灯光开启，并向每人提供照明灯一盏。一番讨价还价，收钱者将门票死定在20元不松口，我们只得依他——想想今生今世跨进此洞仅这一回呀！

走进洞中。初始以为不过是个一般般的石灰岩溶洞。深入之后才发现此洞了得！但闻洞内水声或潺潺不息，或迸溅轰鸣。幽深的通道两侧或宽如厅或窄如廊，造型各异的钟乳石，似人、似兽、似物，千姿百态；清溪、小桥、静潭、瀑布，时隐时现。还有一种通体黑色类似蝙蝠的小鸟，在洞里飞来飞去。走完窄窄的人工水泥道，以为通路已尽，未想忽地又冒出阶梯，引我们更上层楼。原来陆游洞由上下两洞构成，方才走过的下洞为"清水洞"，沿阶梯再向上盘约百米，另有一洞霍然而现。此为上洞，亦称"人和寨"。该洞左壁下端有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碑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人和保全地利"可知此洞得名应在清代。

从"人和寨"再沿盘210阶梯而上，即出古洞上顶直达山腰小亭。刚刚离开幽暗的洞穴，明亮的阳光刺得你睁不开眼睛。当你适应这光明的时候，最先跳入眼帘的就是滚滚西来的江水。带着暗红酸性土壤色彩的浊流上，飘过一艘又一艘游轮。没有哪怕一艘游轮再敢来翻过船的清水洞前停泊，前船之覆，后船不愿重演——小小陆游洞的历史因之寂寞地留在洞间的石刻上，无奈地等待2003年夏天就要将其彻底吞没的涨水。

不仅"天下一绝"的陆游洞，盛满历史的整个三峡都在等待——一段历史的开篇必将是另一段历史的结束。人类的文明无疑是由人类来创造；同样，这文明也可以由人类毁灭。谁能说得清，文明的终点是什么？

3

我们的小船，沿着峡江南侧驶入巫峡深处。正午的阳光下，峡中弥漫着一派蒸气似的迷蒙。有诗曰"放舟下巫峡，心在十二峰"。其实，在巫峡里只可见九峰。另有上升峰、起云峰、凈坛峰隐在南岸群山深处。

峡江上行船很有规矩：一般是两船迎面驶来，大船鸣笛示意，小船开到岸边回避，免得巨大的浪涌把船掀翻。峡中上午过往船只多，我们的小船在群峰耸翠间一避再避，驶行的很慢。渐近横石溪，号称巫山十二峰中第一峰的“登龙峰”愈发清晰地现在眼前。但此峰山脊过宽，并无多少引人之处，徒具虚名而已。再往前行不远，又一高峰耸峙江北，名曰：圣泉。侧看该峰如雄狮傲立苍空之上。狮颈处，一块光洁白色方石浑然天成，故此峰又名“狮子挂银牌”。再过朝云峰，就是此行特来朝拜的神女峰了。

1966 年秋天，借“文革”串联之便，我曾自武汉逆江而上，与神女有过一面之缘。时值午后，客轮缓缓驶近神女峰下。阳光正在西面群峰背后灿烂，勾勒出峰顶上神女纤细的剪影。满船人站在甲板上抬头仰望，个个仿佛都忘记了身处“文革”风浪中的险恶，发出一片惊叹。那个魅力无穷的俏丽神女，就是这样和“文革”的岁月一起，印在了我年轻的记忆里。

今日重临神女峰远望，神女缥缈的仙姿如故。虽然已经有人不畏风险攀到了她的近前：“见神女石……经过长年的严重风化、雨蚀，身上的部分碎石已滚落长江之中，另一部堆积在她脚下。‘她’的腹部已裂穿一孔，可以透视过去。‘她’遍体鳞伤，实际已是苍然老妇，病情沉重，亟待专家前去会诊抢救”（《汉江早报》1987 年 10 月 14 日）。而我呢——历经几度劫难——不仅外表，连内心世界也变得迷茫。再一次仰望她妩媚的身影，已经没有了初见时如潮的心浪。我只是想，她的身前身后飘过的千年万年的烟云雾雨；只是想，她不过是吸引了人世间无数匆匆过客的一块别致的山石：在人性被强行压制的年代，它是自由的化身；在动乱频仍之时，它是企盼安宁的偶像；在平静的岁月里，它又成为美的追求。人世间的永无止歇的动荡，搅得一块山石也要晃来晃去。唐代诗人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其四》）的名句让我感慨万千！

当年陆游进川经此写下这样的文字“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见。所见八、九峰者，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宜为仙真所托。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时，有丝竹之音往来峰顶。山猿皆鸣，达旦方渐止。庙（凝真观 笔者注）后山半，有石坛平旷。传云夏禹见神女，授符书于此……是日，天宇晴霁，四顾无纤翳。惟神女峰上有白云数片，如鸾鹤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异也”（《入蜀记》）。

陆游所记述的神女之事，年代虽早，却是晚于楚宋玉《高唐赋》千年的后来人的新撰。那座唐以后所建供奉神女的庙宇，即立在神女峰斜对岸西侧飞凤峰向峡江延伸的缓坡上。陆游至此，一定有过长久凝视神女峰的

那一刻。他被实实在在地感动过，他不会认为引起他感动的神女是虚幻——当一个真诚善良的人走过沧桑，心灵里储存最多的也许就是多情之泪。

一朝一代，神女庙的香火虽是逐年黯淡，总也没有熄灭。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总有女人携香烛和亲手缝制的小布鞋前来祭祀。直至“文革”破“四旧”，此庙被彻底摧毁——庙里的神女像也被扔到江中。但那个“神女”在原地飘来飘去，既不下沉也不流走。百姓啧啧称奇，又把“神女”捞上岸，放到比原神女庙位置更高的王爷庙里。至于王爷庙躲过“文革”一劫，大概是因以前发生过的这样一段故事：抗战时期，王爷庙曾是国民党军火库。驻扎在此的国民党棒棒兵（当地人语），闲来无事多次敲打王爷塑像的脑袋。一次他们的运兵船经过山下神女溪，突然船头船尾出现两个人。前面的英俊小伙即是王爷庙里的王爷，后面的白胡子老头是王爷庙里另一尊塑像土地菩萨。两人三下五除二将运兵船搞翻了。船上的棒棒兵纷纷落水。淹死的不用说，活着的跑回庙里磕头连连。之后，包括“文革”再无人敢在王爷头上大不敬了。

无人搅扰的王爷庙再供上“神女”，似乎有点儿不伦不类。但其背后都隐藏着两个字——畏惧。神女峰对岸青石村的老社长（即村长）宋公麟讲起这段往事时，仍怀着敬畏之情。但在青石村青年人的眼中，神女之美不再只是缥缈的虚幻。他们依仗神女诱人的身姿，搞旅游，开家庭饭店，为现实的生活而忙碌。就像女诗人舒婷的诗句所言“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4

到与神女峰隔江相望的青石滩走一走——那个在神女眺望的目光下存在了不知多久的小山村，就要不情愿地沉睡于江底。到那时候，小村的顶上将是一片碧波荡漾，充满诗情画意。但现在，大半屋舍已经荒废的青石滩，还有留守的十几户人家。

青石滩，又名青石洞、青石村，是一个散落在十二峰之一翠屏峰下的秀美之地。村上有坡地 74 亩，种植杂粮和柑桔。因依傍峡江，外出的人大都靠打渔、运输谋生。该村原有王、周、张、宋、任、朱、廖、侯、孙、向、陈 11 姓，40 余户共 210 多人。大都是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时，从湖北麻城迁来。其中陈姓一支因有些财产，解放初闹土改那阵举家逃离避祸，不知何往。

人世间，有人烟的地方，都有路。如果没有路，也要千方百计修出一条路来。王屋山的愚公就是因修路而百世流芳。青石滩也不例外，有了村前的水路，他们还需要一条山路。村东有一块立在田边的石碑。碑上文字部分已漫漶不清。大致意思是“青石之上有大路焉，路途艰险。李姓修路，望予过往行人资助……”碑文后尾写明立碑年份：乾隆二十一年仲冬月下河码头碑计。读罢此碑可知，青石滩早有人迹。乾隆间集资扩路，是与外界交往的迫切需要。这也反证了，本来人口寥寥的青石滩的确是在前清大移民的背景下，有过又一次突然的繁荣。

老村长宋公驎说，青石滩往上约 5 里曾有一个热闹的小镇川心店。镇上曾有巫盐（铺）24 家。可惜小镇今已不存，残壁断墙前后，缕缕荒草在秋风夕阳下摇来摆去，像在述说人去山空的凄凉。宋公驎所说的盐铺，实在是峡江另一段沧桑。

盐是生命之必须，由盐而发的战争，无论中外，皆可写出一部厚厚的史书。就三峡而言，通向大江南岸湘黔的盐道就有好几条，每一条都奇险和漫长。那条从西陵峡三斗坪至湖南津市的盐道就足有 500 里。而青石滩之南蜿蜒于千山万壑中的盐道同样绵长。盐道险峻，因为它的终点是聚居于深山的少数民族地区。那里食盐极度匮乏，食盐的价格比黄金贵重。没有盐，他们不得不出山到汉族区抢掠。为安抚这一方深山百姓，巫盐的规模运输也就开始了。这是宋真宗咸平年间的事（公元 998–1003 年）。

巫盐，顾名思义应产在巫山。但若准确地说，巫盐真正产地是大宁上游的巫溪。青石滩上面的川心店不过是个巫盐集散地而已。但青石滩的百姓死也记得川心店的24家巫盐铺，这一些盐铺连通着青石滩人世代的血脉。

是日夜，宿在青石滩上仅存的一个家庭旅店。五、六个床位只住了我一人。来送我的小船回巫山城了，他第二天中午再来接我。难以想见的是，青石滩一直在没有灯光的暗夜里生活了千百年。老村长宋公驎说，为了引来灯火，他跑了多少年！直到 1999 年，借着要看澳门回归盛典的电视实况，电线杆才立起来，灯光才第一次闪亮在青石滩。想亲身体验没有灯光的滋味，独处小旅店，我没有开灯。点上一支光烛，写字读书，直到夜已深沉仍无倦意。推开临江的另一道小门，听风，听涛，还有与风声涛声一起奏响的石榴树下秋虫的低鸣。夜露起了，衣裳不一会儿就沾满了湿气。峡中少有蚊虫，如果你抵得住秋夜的寒凉，尽可以去畅享峡江的每一丝风，每一个浪，它们都时时带走一段历史离我们远去，而远去的历史永远不再回来！

5

青石滩曾有过一场大火。大火把青石滩烧个精光。滩上的住户如鸟兽散——逃到下面的石碑、河梁、碚石等地。那场火有多大？大得烧红了通到江心那块巨礁。巨礁的名字很美，叫“凤凰嘴”。大火烧在哪一年？已经没人说得清。上了年纪的人能说得出来的是，那把火是在枯水季节有钱的富人放的，专为烧掉“凤凰嘴”。因为它横在江上，经常把船搞翻，把“嘴”烧掉，江面就可以变宽。但大火烧起来，难以控制，结果殃及全滩。可你认真琢磨此说，立刻就不明白了——用炸药炸掉“凤凰嘴”岂不简便得多？

过去常年在峡江上谋生的人，没人不在青石滩上落脚。青石滩被峡江人习惯称为下河码头。码头所在的“凤凰嘴”实际是飞凤峰的延续——有了“凤凰嘴”才能显得大“嘴”后面大山的飞腾之状——才有了飞凤峰美名。但延伸至江心的“凤凰嘴”，成为了峡江上有名的险滩。先前往来船只过此，都要先将货卸下。待空船绕过险滩之后，再装货继续前行。即使如此，此处仍是翻船事故频发。一些痞棍乘机打劫，大发横财。清末的李章弼、李洪应、李洪义的三个小船痞棍，曾把青石滩搅得昏天黑地。现今坡岸上“神女溪旅游公司招待所”门前一块立于光绪十九年（1893 年）五月的古碑，就记录着打击当地痞棍，整治码头秩序的一段往事。碑文云“巫山县水程一百七八十里，仅水甲一人长住大溪，未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今口原设水甲外，添设三名均由县招募……”

碑文最重要的部分是“计开新立章程十六条”——规范了捞救翻船物资所得报酬细则。如“救起油每篓给辛资钱四佰文”，“救起白蜡每支给辛资钱两千文”，“救起衣箱每口给辛资钱六佰文（不准开锁损坏）”，“救起干花壹包给辛资六佰文。如包皮扯烂痕迹新者不给钱”，“救起银每篓给辛资四千文”，“失事之船，如本船力能捞救，应听其自行料理，按章给钱论处。水甲不得阻拦争捞。仍每大船给水甲钱一千文，小船给钱五佰文”……

此碑高约一米六，宽约八十厘米，无碑额，上边缘有凿痕，基本保存完好。它不再具有当年的告示功能。有无聊者不知何意，用黑墨在碑上涂了一个“风”字。碑身面对神女峰，面对峡江，它已是个被丢弃的再也长不大的孤儿，既得不到亲人关照，又不能自我保护。任风吹，任雨淋，任日晒，任雾浸。

请莫轻看了这个孤儿，伸出手来救救它吧，它的肩头扛着青石滩百年

风云。

图 2.3 神女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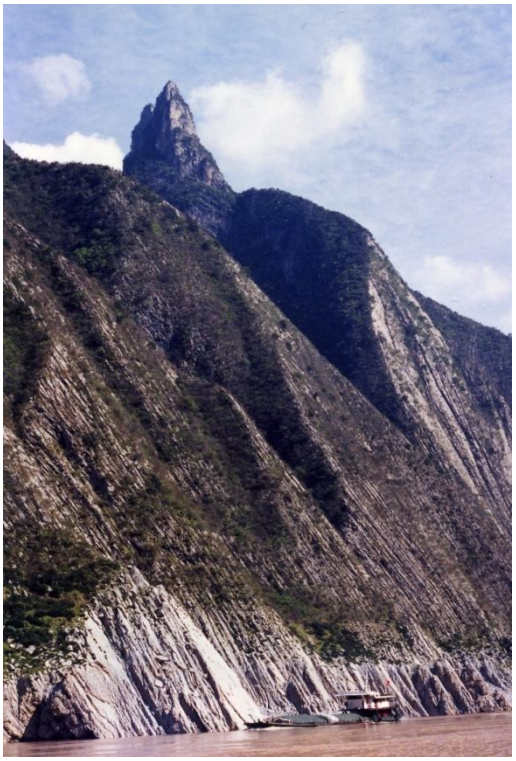


图 2.4 剪刀峰

第八章 峡江打渔船

1

船行在日夜奔流的峡江上，吸引你目光的除开两岸风光和江中波浪，就是天上无穷变幻的白云了。书本上描述的“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场景，早就被峡风吹得不知去向。如果此时，让你张开想象的翅膀飞翔——立在船头——几乎不会有人能想到在这浑浊奔腾的峡江中同是为觅食而往来奔波的游鱼，想到它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它们在江海里成群结队地畅游之时，我们人类尚未问世。而人类出现，为维系自身生存，最早选择的主要食物来源就包括有鱼。2000 年 9 月，武汉大学余西云副教授与湖北省文物局王凤竹研究员带领 10 多名考古人员在巫峡东段北岸楠木园进行考古发掘，在一片约 7000 年的古人类遗址上发掘出大量鱼的鳃盖，从而证明鱼是三峡中的早期人类重要食物。

说到峡江的鱼类，真是丰盛无比。早在唐代便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的记载。“白苹花花卖鲟鱼”“家家解食生鱼子”连烹食现已为珍惜物种的中华鲟都是习以为常。你再听听峡江人给峡江鱼起的名字，哪一个不独具特色。那个因葛州坝截流，阻断了其洄游通道，已经在峡中消失的中华鲟俗名叫“霸王鞭”，其它鱼还有“鲟鲶子”、“火烧扇”、“母猪壳”、“鲶巴郎”、“麦杆刁”、“鸭翅子”、“耸肩膀”、“黄姑头儿”、“石燕子”、“麻花鱼”、“马杆子”、“麻条子”、“烧火佬”、“青龙棒”、“赵格棒”、“船钉子”、“翘嘴白”、“石板头”、“红稍”、“青足”、“杉木塞子”……等共百余种。

峡江鱼多，打渔必然是峡江人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但比较具规模的捕鱼活动，初见于清代同治年间的史籍记载：“近江者半为渔”。《续修东湖县志•疆域志下》还有这样的记述“渔人捕鱼，网罟大小不一，在岸在船不一异他处。所不同，一名赶讪，二曰叉系。赶讪必于每年春三月初八、

十八、二十八三日，相率连综相舷，令声震水面，连歌彻夜，必悲怆慷慨，多获多鱼。此三日之期，年年不易，惟三游洞以下、十二碚以上为之。叉系则于每年八、九月间捕取鲟鳇二鱼，其取鱼之地有十余处，多于黄牛峡一带水流急处。先藏系于水底，鱼大，其彀久而后疲，始用叉，而人跨于鱼背，纳巨绳于鳃，以起此鱼。名起鱼之器曰金叉系，得鱼大者千余斤，小者二三百斤。”

想当年，千斤、百斤大鱼垂手可得，峡江的水中世界该是何等热闹非凡。

2

今之峡江，捕鱼者若何？

一位上了年纪的打渔人谈起峡江鱼的时候，像是在我眼前推开了又一扇峡江之门——我一定要走进去看一看。

这位打渔人叫袁大荣，住在老巫山县城起云街 94 号。老巫山县城所在地其实是巫峡镇。该镇自抗战胜利以后重建。抗战期间被日寇飞机炸毁的街道，经过重新统一规划，遂以巫峡 12 峰将街道命名：上升、起云、净坛、飞凤、聚鹤、神女、圣泉、集仙、松峦、登龙、翠屏、朝云 12 条主街纵横交错，容貌曾焕然一新。起云街在老镇靠长江不远，是一条道路宽不足两米曲曲折折专卖杂货的古巷。老袁的家刚好在街的拐角处。天气很热，开着电扇的屋里也不如阳光照不到的街上清爽。我与他干脆摆上小竹凳，坐在家门口就聊起来。

——“我家本是上边云阳县人。爷爷叫袁寨江。爸爸叫袁久千。爷爷弟兄俩个，以前都在云阳种田和开作坊。那是清朝的事了，我家开了四大作坊：烧酒、轧面、粉丝、榨油。生活过的满不错。可闹不清怎么回事，宣统年间，我家有一年着了四次火，一下子把家底儿烧光了。爷爷带着我们这一家，跑到奉节找出路。人生地不熟，又到了巫山，还没活干。有朋友就劝爷爷到江上打渔谋生。打渔用不着求人。爷爷买了一条小棚船，开始下到江上学着打渔养家。说他‘学’打渔，一点儿不假，因为没人教嘛！小棚船长十三、四米，宽顶多一米。在那么大的江上飘来飘去风险本来就很大，更何况一个没驾过船摸过鱼网的新手。爷爷是个聪明人，连看带问，掌船的技术学得很快。没多久就可以驾船自如了。生活劳累，爷爷很早就去世了。长年跟爷爷在船上帮忙的爸爸接过船继续跑在江上捕鱼。渔船虽

说不大，但出去一趟，风里浪里，上至万县，下至宜昌，经常要跑 300 多公里的水路。我 13 岁那年，跟爸爸上船。临出家门，妈妈搂着我哭了好久。老百姓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说江上行船等于‘血盆里抓饭吃’。峡里到处是险滩急流，船毁人亡是家常便饭。到后来，妈妈也上了船，天天守着我们，她心里踏实多了。我们一家人在峡江里过了多少年，遭人欺遭人骗的事遇到多了，我不愿意再说起。从来没说过，对儿子也不说。说了伤心，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

袁大荣已经快 70 岁了。个子不高，胖胖的身材，肌肉很结实。见惯大风大浪的人，即使惊天动地的大事，让他谈起来，也是不过平淡如水。譬如滟滪堆，在他看来船行到此，“只要对着堆口一冲即过，也算不了什么”；譬如他说，“没修葛洲坝前，下边青滩（在西陵峡）的浪要是打起来有快两丈高，有时为了赶天气平平常常也就过去了”；譬如问他行船遇到过什么危险，他就说“没听说翻过渔船，河底都摸清了，一代传一代不会有危险”……老袁不认为他有多少出生入死的经历，不管什么事——除非你紧追不舍——从他嘴里讲出来，都是三言两语。采访两天，他还是捕鱼的经历谈得最多。虽然这与我想要知道的，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老袁说，要不是感觉我这人还实在，要不是听说我想写书，他连这些也不谈。

——“我和爸爸一起捕鱼的时候，江上的鱼多得很。主要的鱼种有鲢条、灰托鱼、麻花鱼等十几种。江鱼除了有水上和水下区分外，还有很强的季节性。如七上八下，就是说，阴历七月主要捕活动在江上层的鱼，八月上面的鱼少了，就要捕深水鱼为主。阴历开春到六月间，到峡江和溪河里捕灰托鱼和鲢鱼。春天也是捕捞鳊鱼、草鱼和鲤鱼的旺季。那时捕到七、八十斤重的大鱼是经常的事。还有夏天洪水来了也不撒网，因为水太急。如果下网也不在峡里，选择巫山至奉节，秭归至巴东之间的宽谷地带的水缓和水浅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峡江水少，河变窄了，我们就到下面香溪口（西陵峡西端）和牛肝马肺峡专捕黄姑头儿和鲶鱼。冬天鱼都躲到深水里，一般不下网。因为把网撒到深水底下礁石太烂，鱼网要被刮破。这时捕鱼都用钓钩。钓钩在牛肝马肺峡可下到五十丈深。紧靠崖壁把钩子放下去，能捕到白鳝。此外还用滚钩。滚钩是横下到江里的。长有一丈远，上面布有用 14 和 12 号钢丝做的三至四百个钩，大鱼只要一碰上一般跑不脱。1948 年正月，我在巫山对岸南碛坝用滚钩钩住了一条 200 多斤的‘腊子’，也叫“霸王鞭”，就是现在人常说的中华鲟。那天早上下了钩，我就一直守着。没有多久就钩住了一个大家伙。肯定是条大鱼。我拼命拉住钩的一端

往岸上拽，生怕它逃脱。以前捉住的大鱼，十有八、九都挂不到，钩子也让它们背跑了。这次发现及时，大家伙没跑脱。拉到岸边一看，是条很少见到的中华鲟，可把我乐坏了。这个家伙脊背硬得很，蛮劲很大，有两米多长。在岸上滚了半天才死掉。捕一条大鱼算不得什么，但捕到中华鲟在巫山这个小地方也是个新闻了。很多人来看来问。我把这个家伙切成块块，很快就卖掉了。我们打渔人生活很难。整年整月风里来雨里去，鱼却卖不出好价钱。渔船上有个活水舱，打到百多斤鱼时，拿到市场去卖。满心指望换点现钱回来，但鱼再新鲜也常常卖不脱。特别热天，鱼卖不脱要臭。把鱼价甚至降到一、二分钱一斤。就是这个价钱，鱼也经常没人要，真是好伤心。爸爸不忍心把卖不掉的鱼扔到江里，这个差使常由我来做。”

老袁和我坐在起云街94号他家门口，整整大半天。我们谈得还算投机，但街上过往的熟人太多，谈话总要被打断。我与老袁相约，第二天一早坐到江边去继续谈。转天清晨，在江边约定的地点，我们几乎同时到达。老袁穿着短裤背心，手持芭蕉扇，潇洒地从对面向我这边走过来时，他的背后就是云雾缠绕的巫峡西口。等腰三角形状的文峰山高耸在峡口北岸。尖尖的山顶直插云霄。巫山，还是那片山；巫峡，还是那个峡；但峡江变了，变得早已不是从前那条江。老袁今天要告诉我的就是这近五十年峡江之变。

——“我们的捕鱼生活到了 1954 年发生了改变。那年成立了互助组。将 9 条船‘互助’在一起。成立互助组有好处。譬如上大滩时互相帮助拉，比单干时强多了。那时一条船每月最多能打到 500 斤鱼。最少也能捞它 300 斤。每月拿多少钱，由大家评议。绝对没有私下交易。总的原则多劳多得。到了 1958 年，搞大跃进到处成立‘人民公社’。 我们互助组因为船少，就改名为巫山县城关镇巫山渔业社。船归公，但没有易主。驾自家船性能熟悉安全些。不过这时我驾的船比爷爷那辈人大些了，船身有一米五宽。1961 年 6 月，我一个人在奉节捕鱼，赶上涨水船险些翻掉。到 8 月水小才回来。要说长江上捕鱼的问题，我记得是从 1958 年开始的。从那年起，各色人都上江捕鱼了。过江船也突然增加了许多。过江船多，鱼不易产籽。59、60、61 年，这三年长江的鱼类受的损失很大。长航局航道站的人用柴油发电机在峡江沿岸放电烧鱼。一天能烧死几千斤。连平时很少捕到的中华鲟也烧得到处可见。被烧破了鱼膘沉到江底的鱼不知还有多少。我们联名向国家水产部反映这件事没有下文。到了‘文革’以后，在江上（电）烧、炸、捞的人就更多了。江水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江里的鱼明显地少多了。鱼少了鱼价涨得也多了。像鲤鱼、草鱼，‘文革’中还卖三毛多一斤，83 年后每

斤就卖七毛多了。现在的情况更糟糕。有的私人就用 5 马力的那种小型发电机在江上烧鱼。非法捕鱼的屡禁不绝。沿江每个县都有渔政管理所，说是负责监督处置无法无天烧、炸、捞鱼的那些人，他们实际起不了什么作用。前几天有两个娃娃在大宁河炸鱼，一个把肠子炸出来，一个把手炸掉。鱼不好捕了，那些人又想出新办法毒鱼。用 ‘鱼毒精’ 或巴豆制成的毒药放到江里。上游撒，到下游捡。江里毒不到，就到溪河毒。加上现在厂矿污染水，如磷肥厂、氮肥厂的污染水都进了长江，鱼哪还有活路？我们这些祖祖辈辈打渔为生的人，已经不能靠打渔生活。巫山城真正靠捕鱼谋生的现在还剩下两户。”

我们俩坐在江边围堤上交谈那天，刚巧天阴没出太阳。江风拂面，十分清爽。袁大荣谈话的兴致也比昨天高得多。他的方言很重，有些话你要反复去问，才搞得明白含义。他把晚上说成“晚歇”，把雨停了说成“没下哒”，把大雾天气说成“罩子”……但他是诚恳的，总是带着微笑把意思给你解释明白。我感觉可以与他相互理解和沟通。心中于是又涌动奢望——能不能改变他回避“痛苦往事”的态度——请出他心窝里的话——让他说说他这辈子最感动或者最值得告诉我的经历。我的感觉是对的，他没有拒绝。

——“‘文革’前我当了 11 年渔业社的主任，统一管理八、九十条船的渔业社的账目。‘文革’中有人说我在账上搞邪门歪道，给我贴了很多大字报。我心里委屈得很，但谁又能相信你委屈呢？事情越闹越大。认为我不清白的人也越来越多。我精神上压力很大。有些人为把我贪污的事搞确凿，把我搞掉，还从县银行请来 5 个人，专门来查我这 11 年的总账。查了个把星期，结果不但年年账目清楚，还多出一分钱。我以为组织会出面给我恢复名誉。但他们只是单独和我谈了一次话，说这是一场误会。要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确对待，就没得了。那时心里真不是滋味。1984 年 5 月 1 日，拨乱反正考试船长，我参加了。考试内容就是基本的行船、引航常识。像长江上的声号、旗号、灯号识别，应急情况处置等等。1986 年县里组织成立水产公司，但我再没有心情干下去。为什么？夸张一点儿说，捕鱼的船都快比江里的鱼多了，能捕到多少鱼？”

袁大荣所言“痛苦往事”依然不过几句话。实际上他只说出“痛苦”原因，并没有表达出“痛苦”的结果。他，一个世代出没风浪中的渔者，被一场本来就不该发生的“革命”枪弹，击中了仅有一颗的诚实的心脏。他还活着，但生命的激情却在无声中悄悄死掉了。他清楚宜昌至万县这几

百公里水下情况，却不知行在芸芸众生里自己该怎样活。1990 年的一天，他心灰意冷地告别了打渔船，连头也不回地走了。那天他喝多了酒，他举着酒杯训斥立在一旁的两个儿子“你们，谁也不准……咱家再也没有人打渔了……”他哭了，堂堂七尺汉子生平头一遭泣不成声。哭声之高，惊动四邻。大家争相劝慰。老袁伏案告曰：“让我痛快地哭一回，我哭的是长江，江里没鱼捕啦！”

“近江者渔”的传承，注定消失在商海大潮中。

3

我雇了蔡天的小船再次飘进巫峡。去寻前数日往神女峰采访途中遇到的一户船上渔家。巫峡里已不见蒸腾的雾气——一夜秋雨过后，峡间撒满金色阳光。上午峡里过的船多，虽然相互避让，每每大船迎面驶过，一房多高的浪涌也要饿虎扑食般地向我们的小船“咬”来——浪花在小船里飞溅，小船在巨浪的包围中颠簸——好一会儿才能逐渐归于平静。那艘造型古色古香棕色的“三国”号豪华游轮又开过来，蔡军怕我紧张，离得好远就把船靠到南岸烂礁滩上。“三国”号顺流而下，气势磅礴如泰山压顶从我们眼前驶过。眼瞅着此时的滔滔江水把整个峡谷搅得摇晃起来。我想起我们要寻的那只像片枯叶似的渔船，不就是成年累月地在这样的江上，这样的浪中，这样的峡里为生存而抗争而飘流吗？

蔡天眼力好，他最先看到了我们要探访的那只船“你看！哎——”，他指着前面靠江边飘荡的小船大喊。那只船和蔡天是老相识。彼此经常在峡里擦肩而过，熟悉是自然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前方小渔船也发现了我们，先一步把船泊在岸边等候。我们与他们相逢在登龙峰对岸的江滩。

江滩到处是散乱的白色滩石。小船的主人和我各找到一块得体的石头，面对面坐下。他很拘束，憨笑着等我发问。

“在巫峡里待了多少天了？”

“一个多月。”

“离家多少日子？”

“正月二十从家出来，有十个月了。”

我们的交谈渐渐地流畅。船主的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围在一旁。我惊讶地得知，泊在岸边这只破旧的小船，竟然是越过了万重山，跨过万条水，穿过万层浪从上面千里之遥的铜梁县驶来。

图 2.5 巫山打渔船

图 2.6 打渔人家

船主罗大江 35 岁。她的妻子向春玉 37 岁。他们的两个女娃娃大的叫罗明，小的叫罗红。其家本住在重庆市铜梁县虎峰镇。罗大江 13、4 岁时即拜师捕鱼。他先后共拜了 4 位师傅。外出捕鱼已经二十多年了……往年他们一家都是漂泊在上面的乌江。今年闹过元宵节再进乌江，突然捕不到鱼了。原因是这些年乌江上炸鱼、电烧鱼的规模越搞越大，鱼也差不多死绝。罗大江调转船头把船开进了长江。沿着长江一路顺流而下，直到了巫峡里鱼才多些。以前他不敢到长江来，他知道长江的风大浪子大。但现在来了——用大女儿罗明的话说“没办法，要生活!”

12 岁的罗明搂抱着 4 岁的小妹妹蹲在爸爸身边脱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真让我感到伤心。那么小的年纪，就知道豁出命跑在浪高风急的江里是为了生活。她的生活全部内容除了沉重还能是什么呢？ 罗明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略有些上翘的嘴角上，好像挂着永不消失的微笑。毕竟她还是个孩子，真正的“沉重”担在爸妈的肩头。我问她“江上的风浪这么大，你不害怕吗？万一把船打翻怎么办？”罗明的回答太让人感到意外“刚上船时害怕，现在不怕！要是船打翻了一家人就一起死!”她的语气很坚决。

罗大江说，罗明很喜欢读书，刚上学时得了甲亢病，到四年级也没好。家里又穷，就让她跟着上船了。初到船上，她还在渔船泊岸的空余时间里，找一个地方读书写字。有一天她问妈妈“我还能回去读书吗？”“读书要许多钱，我们没得钱!”被问愣了的妈妈想了半天才回答。妈妈不会想到，于情于理说出的这句话，竟然是对她所心疼的女儿无言的伤害。罗明难过地低下头。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夜晚，她偷偷地把书和本全部扔到江里。那个星空闪耀的夜晚，那个浪花吟唱的长江，它们一定看见了也听见了罗明低声的啜泣，但它们都无动于衷，仍然无情地吞噬了罗明的读书梦——那个梦曾告诉她夜空是多么星汉灿烂，那个梦曾告诉她长江是条哺育她的母亲河……

罗明请我参观了她家的船。方寸之地，极尽家庭功能。长两米多宽一米半的棚舱是家人睡觉处。棚舱两端空余处，一端放着杂什，一端摆着已经涮洗好的衣物。罗明把放衣物的盆盆挪开，掀起一块方方正正的船板，告诉我，下面是活水舱。果不其然，盛满江水的舱中几十条黄姑头儿游得正欢。

时下巫山神女市场麻花鱼的价钱每斤 4 块，黄姑头儿每斤可卖到 15 元。罗大江这些天运气好，不用网而用钓钩就钓到 30 多斤黄姑头儿。他想去巫山城神女市场把鱼卖掉，但听说县渔政部门近来查外地船风声紧——凡是

外地船捕鱼到市场贩卖，一律没收。卖与不卖，他一直在犹豫中。不过卖鱼已经和过去不一样——躲避工商渔政，与买主讨价还价——女儿罗明已经完全能够胜任此差。

罗大江的渔船飘过数不清如诗如画的山和水，但一家人的生活却充满艰辛与苦涩。遇到雷雨天心惊肉跳生怕突遭不测；峡里捕鱼怕渔政船追来罚没；捕不到鱼卖不到钱，大人好将就，最怕饿坏了孩子。在乌江捕鱼曾经有一天船出了毛病靠不到岸，风雨飘摇之中，小船猛烈地在浪尖上颠簸，又惊又怕又饿的小女儿连哭的气力都没了。而对罗大江来说，夜半醒来想起失踪多年的妈妈已成习惯——那年他刚驾船离家，妈妈就失踪了。有人说她失踪前曾说过要去给孙女讨口饭吃。可她一走就再也没回来。妈妈自年轻时守寡，辛辛苦苦把罗大江养大。她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罗大江心里老觉得愧对妈妈。妈妈在时他认为天经地义很平常；一旦她去了，大江猛然感觉到没有妈妈的家就没有了支撑，真正地空了。他独自往四周邻县找过她，敲过无数人家的门。其中一户人家为她寻母的精神感动，看中了大江那颗善良美丽的心灵，不嫌他穷，决意把女儿嫁给他。这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向春玉。我悄悄问她，“嫁给大江过了十多年苦日子，你后悔吗？”她说，“他人好，人好我就不后悔！”

大江的四口之家，打渔将够糊口。捕鱼却舍不得吃鱼。摆在船头的铝锅里，装满了刚择好的青菜。能填饱肚子，他们就很知足了。罗大江说，他们夫妻最大的心愿，是把女儿拉扯大嫁出去。当然，最好招一个入赘女婿。而当我问罗明“将来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突然失去了光亮 。“你想打一辈子渔吗？”她摇头“想读书吗？”她扭过脸，哭了。一旁的小妹妹拉紧她的手，用那双含着怨怼和同样茫然的目光望着我——仿佛在说，你不该提出这样刺激的话题。人常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殊不知他们孩子内心的哀伤也许并不比他们少。

我们谈话的间歇，罗明领着妹妹正忙着晾晒妈妈刚刚洗好的衣服——把一件件衣服展开，平铺在江边的石头上。衣服铺了一大片，花花绿绿。两个女孩子，穿着一样桔红色上衣的罗明和罗红则像两只漂亮的蝴蝶，在花绿衣服间飞来飞去。

分手前，我给罗大江全家照了像。罗明以试探的口吻问我“伯伯，再给我和妹妹照一张行吗？”“行行行！”我连连点头。罗明微笑着面对镜头站着，她的妹妹却是噘着小嘴贴着姐姐的胳膊斜着眼睛望着我。快门响了两次之后，罗明还站在原地微笑。这在城里孩子们几乎不会有任何感觉的

照相，对罗明姐妹来说，是个快乐的节日。

4

2002 年 4 月，我再次到巫山，向蔡天打听罗大江，他告诉我，大江的小船还在巫峡，常常碰得到。我决定趁补拍孔明碑的照片时抽空再去看看他的一家。临出发前，我还特意到新华书店给罗明姐妹买了几本精装的儿童读物和几袋小食品。大约下午两点多钟，还是乘坐蔡天的小船往巫峡里开去。是个晴天，峡中却雾气蒙蒙难得望得很远。蔡天说，罗大江一般靠南岸行船，泊靠也是多在南岸边。我们的船就擦着峡江南面逆水缓行。过了登龙峰，将到神女峰对岸青石滩西边神女溪入江口，才找到罗大江家的船。等拍好孔明碑的照片，掉转船头回到大江的船边时，已是暮色将临。淡淡余晖的光影在江面上摇动，浪息船也静。大江在整理渔具，妻子春玉正在岸边忙着用气化炉烧饭。见我们到来，她赶紧从舱里抱出一个塑料暖壶，给我和蔡天倒水。小女儿罗红似从天降，突然出现在妈妈身边。

“姐姐呢？”我问。

“她不在。”春玉眼圈一下子红了，而依偎在她身边的罗红“哇”地大声哭起来。

我感觉到罗明肯定出了什么事，肯定！但春玉不说，大江不说，我又怎能去追问？下意识环顾四周，根本没有罗明的影子。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几袋小食品送到罗红面前。她没有伸手去接，扯着妈妈的衣角，抬起挂着泪珠的小脸望着妈妈 “谢谢伯伯！”妈妈示意罗红。罗红还是不动。春玉把小食品袋接过来哄着她回到船上。起了寒意的江滩上，只留下大江、蔡天和我。暮色苍茫，峡顶的天空已渐变成暗青色。峡江浪拍打礁滩的声音温柔而清晰。因为罗明，我们都沉默。我一直在想，那个一心想读书的罗明，那个在市场上叫卖鲜鱼的罗明，那个时时护卫着妹妹的罗明，可能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蔡天催着天黑要赶路，我也只得起身告辞。罗大江从舱里唤出春玉和罗红送我们上船。不见了罗明，就没有上一回分手时的快乐。当小船离去，岸上的罗红摇动着小手向我们告别的时候，我真是禁不住掉过脸去——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结尾的那段话：“我怀着沉重的忧郁，用眼睛送着他们……本来，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可以平安无事，可是，凡尼亚用一双短小的腿连跳带奔地跑了几步，忽然向我回过头来，挥动一只粉红色的小手。刹那间，仿佛

有一只柔软而尖利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慌忙转过脸去。不，在战争几年中白了头发，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儿重要的是能及时转过脸去。这儿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们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样滚动着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小船逆流而上，西天还透着没有退去的光亮。江上此时已不见雄赳赳的巨轮——几乎所有的船都靠岸歇息了。天幕转暗，巫峡两岸的群峰和峭壁，间或有红、绿信号灯闪烁外，一切皆不见。涛声，星空，沉默的山，野性的风，你完全可以想象是回到了没有人类出现的远古年代——就算是回到了那个时代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没有你，没有我，没有罗明，也就没有了不绝的哀伤。我拿出了那几本买给罗明的画书，一页又一页撕掉。峡风很猛，只要一松手，书页自然就随风而去。看不清它们飞向何方——飞到哪里都一样。要是世界在永远的蛮荒里有多好！

罗大江说，铜梁县常年有一千多只船在家乡外面的溪河上捕鱼。每一只船都是一户人家，大多人家都带着孩子。每年春节回家时，都能听到有船遇险遇难的消息。危险归危险，春节过后，小船照样飘进嘉陵、乌江和长江……虽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捕鱼对人、鱼和江是等同的灾难，但这是他们为了生存的唯一选择——不得不为也。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
出没风波里。

烟水如歌，雪浪如奔，请保佑我们的这些命系一线的小船吧！

补记：后经了解，验证了我的判断。罗明是在一个雷雨天，收拾晾在船篷上的衣服，滑坠江中而死。

第九章 巫山血案

1

2001 年秋天。

巫山老城的神女夜市仍然热闹非凡的时候，其上方山坡的新城已经初具规模。新城不再像老城有 12 条完整的以巫峡 12 峰命名的街道。而是一条贯穿县城东西的“神女大道”将广东路、滨江路、平湖路、暮云路、净坛路串联在一起。比起老城巫峡镇，号称“全国贫困县”的巫山新城，气派得如同天宫。但因老城尚在运转，新城的市街仍然冷清。

这一夜，我站在神女大道中段的金汇宾馆 7 楼的一间客房的窗前，焦灼地等待巫山的朋友约请一个我渴望能够见到的人——一起曾震动巫山县的血案的当事人田特捷的父亲田先生，想听一听他关于案件的叙述，以及此案审判终结后的故事。

初秋的风带着丝丝清爽从窗口吹拂而进，窗外望不见远处的峡江，近处灯光暗淡的街上也是人迹寥寥。只有晶亮晶亮的星星在乌蓝的夜空眨着诡秘的眼睛——巫山之行，让我总有一种万事难成的宿命感觉——莫非这感觉今夜仍要延续?

客房虚掩的门终于轻轻的开了。失望与宿命又有了新篇章——朋友告诉我，田先生找不到，他家的人说，即使找到了他肯定也要拒绝——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位记者能采访到他。这是我意料之中可能的结果——采访这类的案件，背后总有许多令当事人一方说不明白抑或是不敢说的事情——因为某些龌龊的司法勾当常常被掩藏在冠冕堂皇的法律条文里。

我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决定转天即奔重庆，到西南政法大学去找曾为这个巫山血案当事人田特捷做过无罪辩护的赵泽隆教授。赵泽隆是我的朋友，我认定这位多年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教授定能向我敞开心扉。当金山号飞艇擦着江水逆流“飞”向重庆的时候，我本来那种急切的心情反

变得坦然。

我终于如愿以偿。

2

1998 年 9 月 23 日清晨，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闪电般传遍巫山城：昨夜，巫山县县长蔡军在家中被人枪杀。

一时间巫山城风雨声急：茶楼酒肆，街谈巷议，蔡县长被杀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的话题。

自古至今，杀人与被杀的血案不计其数。但真正留名后世者似乎少之又少。人类文明史上共有的认同是，当生命与邪恶冲突之时，正义被视为比生命更尊贵。惜今者道德精神退化，人们越来越将生命当做绝对私产：富贵者极尽生命享乐之美，甚至不知廉耻发布“享乐者宣言”；贫穷者任凭权势者敲骨吸髓，忍气吞声。成帮结伙的泼痞坑蒙拐骗满街游荡，却少有人敢于持刀与贫穷的真正制造者抗争。

巫山县长被杀一案，该做如何解释呢？

3

1998 年 9 月 22 日晚，一个普普通通的秋夜。巫山县政府大院内种子公司楼顶出现了一个人影。其向对面县政府宿舍 401 房张望片刻，望见了正在家中闲坐的县长蔡军。黑影从楼顶下来，走进县府宿舍大楼，来到 401 房县长蔡军门前。黑影没有马上敲门，楼道没有灯，正可以在暗中戴上面具和手套，掏出手枪。一切准备就绪，黑影右手握枪上前轻敲蔡军家门。几乎没有什么间隔，门很快就开了。黑影一步跨进屋内，枪口紧对蔡军。

“你是谁？干什么？”蔡军不知所措。

“不许动！”持枪蒙面人用未持枪的左手抓住蔡军肩头，将蔡推进蔡妻吴南飞的卧室。

“不许动！”对着要从其手中挣脱的蔡军再次发出警告。

此时的蔡县长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生死劫。拼命扑向对方夺枪。一米六的小个子县长虽然敦实，岂是身高力壮的蒙面人对手。他又被推逼到墙角。墙角有一个桌子，蔡军一边阻挡蒙面人，一边用手去拉抽屉。蒙面人将蔡军拉开，再次把他逼到墙角。

图 2.7 巫峡峡口

“你再动，我就打死你娃娃!”此时屋里还有躺在床上的蔡军妻子吴南飞和其襁褓中的孩子。

蔡军自感不妙，抓起摆在墙角的花盆，狠狠向蒙面人的枪砸去。几乎同时，蒙面人不由得右手向上一抬，随后一声枪响。二人相视片刻。蔡军又向蒙面人扑来，蒙面人后退了一下，对准蔡军的胸口连发三枪，这次射击，有一发子弹准确地击中了蔡军的心脏。蔡军缓缓地倒下了。蒙面人转过身不慌不忙地离开蔡家走了。枪声并没有引来多少注意，如果吴南飞事后不报警，沉寂的夜晚，仍是如常地沉寂。

9 月 25 日,一位名叫田特捷的县公安局巡警被传讯。当天被押往万州。在传唤讯问时，田特捷毫无推诿之意，当即承认“蔡军是我杀的”——蒙面人原来就是他!

4

真是想不到，当射杀县长的“凶手”浮出水面，巫山人不是怒目对“凶手”，而是展开了一场空前的营救。

两千多人签名上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为田特捷请赦“我们是重庆市巫山县 58 万人民为田特捷求情的代表。请高级法院对人民的好警察田特捷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称，田特捷杀县长，在重庆库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不！在巫山人民心目中，人民没一个人憎恨田特捷。相反人民非常地同情他。人民看了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大家心中不服。县长蔡军在巫山人民心中确实是一个贪官，他的犯罪事实也一并邮给你们。望上级领导明断。下面是我们联名为田特捷求情的名单……”

这封两千余人签名的求情信写于 1998 年 10 月 16 日重庆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处田特捷死刑以后。

暂抛开蔡军究竟何许人不谈，此案的审理真可谓迅速——距案发仅仅 25 天。因为杀了县长，所以必须速审速杀，此风不可长，否则了得！而老百姓被杀被害，可以久拖不决，甚而不了了之。重庆大渡口区的李裕芬老人，好端端的儿子明明被民警打死在派出所，到今天拖了 20 年，“联合调查”多次，仍无结果。有一位参与“调查”的司法干部曾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人命关天的事我们必须慎重”。反过来田特捷一案连调查到宣判仅用了 25 天。如此快捷的审理，“慎重”又体现在哪里？无论“快”与“慢”，两个案子都让人感觉执法者在法律的实际运用上也太缺少公平与公正。田特捷杀人案，其辩护律师赵泽隆先生就对田的杀人动机提出质疑，但无人理睬。

重庆是个怪地方，其中一怪就是历史上此地官府之人多有被杀。唐代诗人杜甫晚年流落万县（今万州）一带写过《三绝句》。其中一首道“前年渝州杀刺使，今年开州杀刺使。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不知杜老先生所云赛过虎狼的群盗有否将渝州或开州的刺使包括在内，但当今命丧田特捷手下的“知县”蔡军，绝不是巫山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岂止蔡军，重庆的某些公安干警形象简直是百姓心中的对头。随便走的老百姓中间，你就能听到一段又一段顺口溜：“一等警察刑侦队，案子未破酒先醉；二等警察治安队，赶走嫖娼自己睡；三等警察交通队，站在马路收小费；四等警察联防队，全是一帮黑社会！”更让人倒吸凉气的是奉节街头一个卖冷饮的年轻人，指着一个赊他帐的民警后脊梁大骂“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

5

搬迁前的巫山县府在巫峡镇南北走向的朝云街北端。大门口遥对滚滚长江。江南岸是南陵山。晴天望阳光下的南陵山，山体凹陷形成的阴影刚好是个大写的“巫”字，这也是巫山之“巫”来源的另一说。巫峡镇的街道破旧又肮脏。除了上升街街道一侧那七、八棵长成 L 形的黄桷树，还算是看点外，到处破败不堪。多少年了，穷得叮当响的巫山人就是住在这些名称极美的街道上，做着由穷变富的黄粱梦。但有些人不同，他们能很快把梦想变成现实——县长蔡军就是其中一个。

1998 年 11 月 15 日，巫山老干部局的部分同志上书中共纪委，请求宽赦田特捷的同时，举报了蔡军“迅速”发家致富的“问题”。

中纪委:

我们是重庆市巫山县库区的老同志。曾多次向重庆市及中央各部门反映重庆市巫山县县长蔡军(现已被愤怒的人民杀了)趁移民搬迁，重建新县城之机，利用人民没看清他真面目，给他委任新县城总指挥的特权，大肆贪污移民资金，行贿受贿，买官卖官等违法行为。重庆市、万州区曾派人到巫山，也可能走马观花地进行过调查。由于贪官们的盛情款待，热情周到的服务，戒备森严的保卫，群众及知情者根本没有机会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上级听到看到接触到的完全是贪官们自己的标榜和吹嘘。

为了打击犯罪，揭开巫山以县长为首的一伙贪污份子，今天我们又一次向中纪委写信反映以下几条情况，万望中央派一些正直有党性的人下来，仿学乾隆微服私访的精神，揪出贪污份子，为人民伸张正义。

1. 蔡县长任新城建设总指挥的一段时间，把自己老家重庆市开县的亲朋好友叫到巫山来。外人千方百计，送钱送礼都无法包到工程，蔡让他的人将一些工程全权包下。蔡县长的老俵巫山的富翁熊老板因为有一个好的亲戚，现光存款就是 1000 多万。此人花天酒地，公开的妻子就是两个，还有没公开的……

2. 外地人进巫山来包新县城工程，不管是什么人，不给县长兼总指挥的蔡军进贡送钱，根本包不到工程。现新城包工头一提起总指挥人人恨得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大家异口同声说，蔡县长哪象共产党干部。

3. 蔡县长从外地引进一批良种树苗，叫他的亲戚来承包。树苗没

栽几株，现一棵都没成活，包工费20多万元装进了蔡县长及其亲友的腰包。现巫山县铜鼓乡、青峰村的人民反映相当大。老百姓非常不满。

4. 蔡县长从外地引进三只“驼鸟”。现喂养在官渡当阳的河坝。投资数100万，现一点利润没得到。蔡县长的介绍费，10多万元早已装进了他的腰包。

5. 号称重庆市东大门的渝东第一镇碚石乡（紧临长江南岸，位于巫峡中段 笔者注）的搬迁居民为搬迁问题，经常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中央领导派人到培石调查，巫山县的领导说碚石群众反映情况是要造反。从县里抽调1000人，每家进驻带枪的公安，把人民群众关在自己家中，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准接近中央领导。等中央领导一走，碚石的人民才获得自由。满腔的苦水只能面对滔滔的长江诉说。人民不服，就连值勤的人员也不平。

6. 蔡县长被杀，为了破案，首先对他的家人及房屋进行监控……从县长家、办公室里发现了美元、人民币数万，金银首饰无数，还有一个铁保险盒没打开。具体数字县里有指示，任何人不准外传……

7. 贪官的尾巴已清清楚楚地暴露。现查出的所有财产全部交给家人妻子，并不允许说关于蔡县长家财产的事。巫山县58万人民强烈要求对蔡县长家的钱、物进行清理，查证。身为一县之长，每月工资400多元，每天进高档饭店、娱乐场所，玩女人、泡小姐、高消费，请问他家是否有一个造人民币的工厂？

8. 身为一县之长的蔡军，在今年7至8月份，重庆市巫山县连降暴雨，全县人民搞抗洪抢险之际，重庆市组织全市县级领导出国考察。其它县的领导鉴于灾情严重，主动放弃了出国考察机会。而我县的蔡县长，置全县58万人民的灾情不顾，在抗洪的紧要关头，公然出国。由于全县人民群龙无首，给巫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县长此时出国，在全县产生了极坏影响。县长出国带回来的宝贵经验是自己腰包又一次装进了不下10000多元的美金。

9. 蔡县长被杀后，从他家中查出一本小账目。其中包括2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今年全县换届选举时各部局的同志买官给蔡县长送的厚礼，及送礼人的名字和本人的照片。其中数额大的高达6至7万元。最少也是1万多元。另一个内容是蔡县长的夫人生小孩，各部局领导的厚礼，及新城建设中的“包工头”赠送的人民币数量。其中金额最少也是上万元。这个行贿受贿的小本子，是蔡军的罪证，望中纪委从

这个本子查起。

10. 田特捷是巫山县一名出色的巡警。曾多次为追歹徒立功。此人有一个公正、正直的个性。看不惯蔡县长等人的吃喝玩乐，贪污国家财产及人民血汗的搞法。9 月 22 日，田特捷代表巫山县 58 万人民杀死了蔡县长。直到今天全县人民从机关到工厂、农村，都在奔走相告。人民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声，蔡军死有余辜，田特捷是巫山人民的英雄。一个县长被杀后遭到人民如此的憎恨，一个杀县长的人被巫山人奉为英雄，从中可以知道蔡县长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想当年我们解放大西南刚进川，人民是何等的尊敬我们。没想到今天的人民是这样地仇恨党的个别领导干部。

11. 巫山小三峡前两年每年交给县里 7 千多万元。每年上缴的钱只用在县里开几次会议，就把辛辛苦苦的收入用完，没给巫山办一点正事。

12. 巫山烟草公司去年偷国税 1500 多万，被检察机关立案侦破。由于政府出面干涉，并给检察院一次付出 30 万，最后以不揭盖子的办法硬是把案子压下来了。1500 万元的国家资产就样泡了汤。此案，检察机关卷宗还在，只要上级来调查，可以立马破案。

13. 现巫山看守所关着一个人，此人由于不服县里对移民搬迁的搞法，他又喜欢上北京去告状，领导害怕他坏事，为此他被长期关押在巫山看守所。

14. 巫山领导不修路，光买豪华小车。现全县高档小车如沙漠王子、奔驰、皇冠、三菱有 100 多部，广东赠送的也不下几十辆。上级领导下来，所有的好车全部出动，对上级百般殷勤，人民只好长叹！这哪是共产党的搞法。

15. 蔡县长是开县人。去年他父亲去世，巫山县委、县府及各部局光小车就去了 30 多部。车队从巫山出发确实威风。那一次为悼念他父亲送礼就是 20 多万元。此事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人们敢怒不敢言。

中纪委刘书记，我们不敢直接向你们反映以上情况，这封信是我们从外地寄出来的，如果被县里发现，我们的下场可能很惨。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还是把以上事实反映出来了。万望你们对巫山的事引起高度重视……

巫山老干局部分同志

1998 年 11 月 15 日

我手捧这封沉甸甸的“上书”，心情也是沉甸甸的。这“上书”分明是一封声讨巫山赃官的檄文。它展示了一幅巫山官场丑陋的长卷。昔者，骆宾王在《讨武曌文》中曾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之语，今日巫山亦应如是。一个蔡军倒下去，还有一群前“腐”后继的“蔡军”犹在。

天下，属“蔡军”。

6

对杀掉县长蔡军的田特捷的死刑判决，在巫山平民百姓中引发的激烈情绪，多少使“有关部门”感到意外。

一审判决书说田特捷杀蔡军原因：其一，田的婚姻遭到父母反对，其心情苦闷；其二，田经营的“迷情网吧”亏损，单位又急催上交集资建房款，田走投无路，遂起杀机，抢截县长蔡军。

判决后，田特捷上诉。田的父亲和律师并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送交了被告人患有精神病的有关证据，和请求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意见书。这其中对田的精神病鉴定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终审判决的核心依据。为此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特别委派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重庆一级律师赵泽隆先生担任了田特捷案的二审辩护律师。

1999 年 3 月 25 日，赵泽隆将二审辩护意见书送交重庆市高法。在辩护意见书的最后，赵律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辩护人请求：一是对田特捷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且为保证鉴定的客观、公正，建议到川、渝以外的精神病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二是撤消一审‘故意杀人’罪之判决。”

送交辩护书时，赵律师再次口头告之，如若办案经费有困难，北京法律中心可提供帮助。承办法官某某表示，精神病鉴定上海最好。

赵律师对鉴定难，虽有思想准备但他没想到情况变化得这么快。

送交辩护书后的第二十天，重庆市高院电话通知赵律师速去高院。上次说过“精神病鉴定上海最好”的某某法官将一纸“鉴定意见书”摆在赵的眼前。鉴定结论是田“患精神病证据不足，有刑事责任能力”。

时光过去了三年，2002 年 4 月 12 日夜，我第三次就田特捷一案在重

庆和赵泽隆律师会面的时候，他仍然表达了对于“鉴定”的遗憾。但他坚持不肯告诉我是哪个医院，哪位医生填写的“鉴定书”。赵律师只是告诉我这样一个时间顺序：

1999 年 3 月 16 日，重庆高院出具关于对田特捷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委托书函。

1999 年 3 月 20 日，鉴定意见书问世。

1999 年 3 月 23 日，赵律师会见被押解到重庆的田特捷时，田亲口对赵律师说过，前两天法院来问过一次，无其他人来问过，也未到过其它地方。

1999 年 3 月 25 日，向重庆高级法院送交二审“辩护书”，请求对田特捷进行精神病鉴定。

1999 年 4 月 2 日，考虑到对此案审理可能出现的情况，赵律师，再面交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份“关于请求对田特捷故意杀人一案依法进行开庭审理的意见书”。

1999 年 4 月 14 日，赵律师在重庆高院被告之，早在 3 月 20 日即已完成了对田特捷的“精神病鉴定”。并向赵出示了‘鉴定书’原件。

1999 年 4 月 15 日，田特捷被押解至万州。

……

作为一名律师，赵泽隆经历了很多。但如此令人深感蹊跷的“鉴定”，仍让他心情沉重。“如果有一个公正的医学鉴定在前，即使判了田特捷死刑，包括田本人在内大家都无话可说。况且直到把田特捷处死时，连他杀人的动机还有重重疑点没有搞清”，赵泽隆对我说。

我与赵泽隆律师已有多年交往，而且我们的交往是从为百姓伸张正义开始的。我深知他是一位刚毅、智慧又充满爱心的人。他说过，千古沉冤的事，历朝历代都会有，但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事应当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否则，所谓的“法制”从何谈起？社会进步从何谈起？就是一个明摆在那里的杀人犯，你在未搞清其杀人的动机和过程前就把他毙掉，同样也是冤案。赵律师让我看了他为田特捷杀人案的二审辩护意见书。节录如下：

现仅就本案田特捷供述中之行为与动机不符，反差甚大，有明显

精神异常征兆，杀人之“故意”有疑点等，提出如下意见:

一、本案对田特捷“杀人”经过的情节和动机认定，除田特捷本人供述外，还有现场勘查、尸检报告、枪、弹痕迹检验等佐证……但对于田特捷“杀人”经过的情节、动机的认定，尚存疑点……

其一、……如果田特捷早生杀人动机，且作了物质准备（做了面罩、带了手枪等），其正常逻辑是：进屋见人后应尽快开枪杀人，尽快离开现场。但田却是进屋后一手持枪，一手将蔡从客厅推至卧室；在蔡不从，且企图夺枪、两次去开写字台抽屉，田认为是去拿枪时，田皆未开枪；田将蔡两次推向墙边时，仅对蔡说“不许动”，“你再动我就打你的娃娃”，且把枪口从对准蔡移向对准床上。甚至在蔡用花钵砸田后，田仅将枪打开保险、上膛，以示有真枪相威胁而未开枪。直至最后蔡军扑向田夺枪之际，枪才击发射中蔡军。从当时的行为过程而言，与田早有“杀人”动机，且有杀人条件不相符合。

其二、……田特捷进入蔡家客厅之后，一直居于主动地位……但田一直未提“要钱”之事。蔡妻吴南飞笔录也证实田未提出来“要钱”之事。这与抢劫动机不符。未显示出动机、目的和要求。

其三、……纵观全案材料，从田特捷进入蔡家至蔡军用花钵砸田，田特捷都是一手持枪，一手推蔡没有一句“杀死你”、“打死你”的语言，且未打开枪的保险，子弹并未上膛。其威胁的语言也是“你再动，我就打你的娃娃”。甚至把枪口由对准蔡军移动为对准床上，直至蔡军用花钵砸田之后，田认为蔡以为自己的枪不是真枪，才将子弹上膛，以示自己手中是真枪。从上述过程考察，只能说明田无“杀人”之故意或动机，与早有“杀人”动机之作法全然不同。

……在蔡扑向田夺枪时，枪响中弹，是否“故意杀人”证据不足。根据田特捷供述“我子弹在上膛时，枪口是正对准蔡军的。这时蔡就扑来抓我的枪，我拿手枪的右手往上一抬，枪就击发了。我和蔡军相互间愣了大约一秒钟，蔡军又来扑我，我左脚后退一步，枪口对准蔡军又击发了。连续击发了几枪记不得了……”就这一情节而言，并不能说明田是“故意杀人”。因为枪被击发是主动扣动扳机击发，还是被动触动扳机击发，是得出“杀人”致死，还是伤害致死或是误伤认定的关键所在。在多种可能性并未排除，又无其它证据予以确认的情况下“故意杀人”结论不能认定。尤其是从枪响后双方都“愣”了这一情节说明，枪响，对于双方都是意外……

田特捷虽承认“杀人”，但这是一般人不准确之语言表述。是否主动扣动扳机，才是确定是否“故意”杀人行为之关键。

三、田特捷的预谋、准备，与“杀人”经过不合常理。

1. 选择进入蔡家的时间不合常理。无论是“杀人”或者“抢劫”，一般都不会选择在晚上 8-9 时，家人团聚，邻人在家，人多之时作案。因为这样过于冒险。而田特捷却偏偏选择此时，不合常理。

2. 行为与动机不合常理。已如前述，田特捷持枪而见人不杀，却与之久久推拉、周旋，甚至不打开枪支保险，子弹又不上膛；“抢劫”而不言要钱，亦不用暴力强制交出钱财，这些皆与常情常理不合。

3. 对力量对比不加考虑，亦不符合常理。田特捷明知当晚蔡军及其妻子等多人在家，而他自己却孤身一人，入宅后，纵然有枪，也是众寡悬殊。从全案笔录观之，田特捷对此并无考虑。特别是早有预谋和行动准备，对此却毫无戒备措施，不合逻辑。

4. 对可能出现的反抗，没有心理准备和防备措施，亦不合情理和逻辑。田特捷从事公安工作数年，对蔡家早有多次观察，明知蔡家有数人，且有电话。蔡军又身强力壮，且县府大院宿舍上下左右皆有邻居，对可能出现的反抗和不利因素毫无考虑……简直不可思议。

四、蔡军死后，田特捷无常人的恐惧、不安、逃跑、狡辩等行为表现。

蔡军死后，当晚巡警队通知执行任务，至 9 月 25 日被传讯，田仍能吃饱、睡着，正常工作……在 9 月 25 日下午传唤讯问时亦主动供述了杀人经过……

五、在二审律师会见田特捷时，田仍对其“杀人”动机说不清楚。

1999 年 3 月 23 日上午，在本人会见被告田特捷时，告诉田“我是律师，是司法部援助中心委托我为你的辩护人，你是否同意”时，田目光呆滞，直视我约两分钟。我出示了律师证，援助中心委托书，他才点点头，但仍不言语。

我问他：“对一审判决有何意见？”

他说：“杀人事实我承认，我说不出来任何理由，任何目的杀人。”

我再问：“当时你为什么要去杀他？“

田答：“当时我不是想杀他，他来抓我，我就子弹上膛，说明我是真，吓他。谁知他又来抓我。我吓倒了，才拖响的枪。当时没有意识，他手抓我右手，我往后退，枪就响了。他没放手，又拖，枪是连着响

的？（与蔡军邻居聂宗绘、黄明儒听见的枪声节奏相吻合），听到枪响，我啥都晓不得了，心里就害怕了。”

虽经多次询问，田特捷对其“杀人”原因和动机一直说不清楚。

六、结语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田特捷供述其早有“杀”蔡、“抢劫”蔡之动机。但在此 98 年 9 月 22 日晚上田特捷进入蔡宅后，其行为恰恰反映不出上述“杀”和“抢劫”的动机。田特捷供述早有“杀”蔡，“抢劫”，并有踩点、观察等预谋准备。但当晚田特捷进入蔡宅后，却反映出其行为具有盲目性。关于蔡军扑向田特捷夺枪而中弹身亡，是主动扣动扳机“故意杀人”、伤害致死，还是田被动触动扳机击发子弹，误伤蔡军致死，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存在多种可能性。而在这多种可能性未排除的情况下，就将其认定为“故意杀人”显属证据不足。

鉴于上述，辩护人请求：一是对田特捷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且为保证鉴定的客观、公正，建议到川、渝以外的精神病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二是撤销一审“故意杀人”罪之判决。

以上意见，请贵院认真考虑。谢谢。

本案被告辩护人 静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泽隆

1999 年 3 月 24 日

7

1999 年 4 月 17 日，重庆万州市（原万县）长江边上的一声枪响，结束了田特捷 26 岁的生命。

田特捷杀人案的审理算是终结了，但在赵泽隆律师的心头，此案留下的思考仍未停止。他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份心昭日月的“结案报告”。在此报告中，他对此案审理的司法程序直言不讳地提出质疑。由于某些原因，我在节录“报告”部分原文时，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

……

二、关于鉴定：

1. 鉴定单位和鉴定人：四川某医院医生二人。

2. 鉴定时间：法院委托鉴定函的落款时间是 1999 年 3 月 16 日，

鉴定意见书书的落款时间是1999年3月20日。

3. 鉴定地点和方式：3月23日，我会见田特捷时，田告诉我（押解到重庆后）前两天法院的来过一次，无其他人来问过，也未到过其它地方。4月14日（重庆高法）某某对我所说，为方便专家鉴定，把田特捷弄到重庆来，因专家到万州不方便；5月6日去法院领裁定书时和有关人员谈话，我才得知，田被押解至重庆后，由承办法官等人和鉴定人一起去看守所与田谈过一次话——这就是对田进行的医学鉴定。根据鉴定意见书的表述，其体检是“健康”、“正常”，而无具体体检项目和数据，其实验室检验栏目是空白。其与鉴定人谈话栏目填写的是“神智清楚，谈话正常，在看守所无异常表现”。鉴定地点栏目写的是“重庆市看守所”；鉴定方式栏目写的是“鉴定人和法官一起到看守所和田特捷谈过一次话”。

4. 鉴定结论是“患精神病证据不足，有刑事责任能力”。对于是否构成精神分裂症、精神忧郁症，其它精神障碍及相关临床体征，以及使用过何种检测手段等无表述。对作案前后反常表现、作案时行为表现与动机、目的不符合，一审开庭时反常表现等无说明，无解释。

5. 仅有二人参与对一名死刑案件当事人的精神病鉴定，如果二人意见分歧如何决定？总体而言，显得马虎，不负责任。

三、鉴定结论，不经庭审质证，也不给辩护人异议机会。根据刑诉法第42条2款，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1款，包括‘鉴定结论’在内的证据材料，都应经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鉴定结论”，本人曾有意见书要求开庭质证，但法院置之不理，仅告之“鉴定结论”，不同意辩护律师复印、摘抄。甚至说“鉴定可以不给辩护人看，只是因为本案影响大，多家报刊 报道，才将结果告知辩护人。希望配合”。

四、关于法定程序。本案因在1998年12月12日，（中国法学会）陈光中等五名教授联名“建议书”建议对本案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且依法进行开庭审理之后，才于1999年3月16日委托鉴定。由两名“专家”到看守所与被告人谈一次话就算“鉴定”。于4月14日、4月16日分别将“鉴定结论”给一审、二审两位辩护人看后，4月17日，将田予以执行。既未开庭审理，又未让辩护人提异议，且将裁定、复核合而为一，实则取消了死刑复核程序。就此案而言，仍是无视法律规定的一种司法专横行为。

五、值得深思的是，在二审其间，有2000人左右签名，要求对田特捷“从轻处罚”，称田为巫山人民除了害。“巫山老干部局部分同志”也于1998年11月15日给中央写信，反映巫山县长蔡军等人的问题，称田特捷是杀贪官。

本案辩护人　赵泽隆

1999年5月7日

这份短短的“结案报告”，凝结了一名法律工作者的勇气和良知。一个人即使他犯了死罪，他同样拥有人的尊严。审判他，直至将其执行死刑，都要依据相关的法律程序。但在田特捷一案的审理中，我们看到的正如赵律师所云“是无视法律规定的一种司法专横行为”——漠视苍生，一切可以从简：生命如蚁，所以叫蚁民；生命如草，所以叫草民。如此，不知葬送了多少冤魂！

8

2002年7月末，我再次来巫山。县机关早搬进了水淹线以上的新城。老城内的街道愈发显得破败。一些尚未搬迁的居民，心气不定，在为今后的生计发愁。给我做过向导的毛继才，拿不到搬迁费，一怒之下，举家流落广东谋生……码头上边的那个神女市场，冷冷清清，空空荡荡，只有夜间聚鹤街东端起云街上的“神女夜市”还算红火。此“夜市”，有几户卖服装的做陪衬，其实就是条食品街。但这食品街上，除了“川辣”而外，毫无特色。

从远远的北京走到长江三峡的巫山，坐在“神女夜市”填肚皮，很有举目无亲的感觉。虽然借助于现代交通工具，只用一天时间，即可从北京赶到巫山城。但我总觉得它离我很远。特别是在了解了田特捷杀人案的全部过程之后，踏上这块土地，“犬吠茅店夜，悲思凝秋霜”——心中油然而生的竟然是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曾为重庆李裕芬老人无端被派出所民警打死的儿子范李一案，打抱不平而奔走二十年。其间饱尝了“法律”对公正、公平的惩罚。我写了长篇通讯《从黑发告到白发》，出了《尊严》一书，策划中央电视台拍摄了“新闻调查”——“范李之死”。用尽了气力，指望对范李之死的调查有个转机。但结果呢，节目才播出，自称是“中央的电视台”的制片、编导、记者即全线撤退，理由是“进了雷区”。他们只顾自己

“安全”，李裕芬的安全就管不了许多了。后来，李裕芬 2003 年人大召开前夕到北京告状，重庆派出 8 名干警，手中拿着枪也跟到北京，欲将老人捉拿回重庆。藏在乡间的老人电话里哭诉“这是干什么嘛，他们拿枪来捉我哟！好人成了坏蛋 ，坏蛋成了好人，我一天到晚躲躲藏藏，实在想不通！”

重庆仍然是重庆，那里像是个法律真空地带。2003 年，该市高检副检察长秦锡联在法学系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振振有辞声言“什么黑发告到白发，分明是记者瞎说，有我这个检察长在，我就要公开声明，我不能跟着记者瞎说再制造冤案！”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秦副检察长，够可以了！

现在，一个饱吸民脂民膏的赃官县长被打死了，他的罪再无人追究。而杀死赃官的田特捷，却被调查得死去活来。最终可以置法律程序于不顾，随意决定了一个宝贵的个体生命的去留——“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难道是这块天底下永恒的真理？

“上面”，对田案的干涉更在田特捷死后。

姑且隐掉姓名吧，田特捷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田在万州被执行后，尸体就地火化。“上面”有人对田父施压“如果你把骨灰带到巫山下葬，后果自负”。此话更激怒了田父，他在万州将儿子火化后，不顾多人阻挠，毅然双手抱着儿子的骨灰盒回到巫山城。事先得到消息的巫山人，自发地默立在县城码头和街道两侧，迎接骨灰，向一个年轻的英灵——表达了无声的敬意。

蔡军死了，无人再追究其横其贪，只留下骂名千古；田特捷也死了，留下了世代的传说。

蔡军死了，阴魂还在。由他恩准其亲属承包的巫山至骡平公路，至今仍在修修补补。而其亲属在蔡被杀后私逃，再无声息。

第十章 巫山医者

1

若不是亲眼所见他神奇地医好我摔伤的左腿，我与他决不会有机缘相识。他是谁？就是此刻与我相向而坐的巫山医者郑永厚。

那天晚上下雨路滑，我不慎在县武装部招待所门前摔倒，膝盖和脚踝肿得老高。招待所的看门的周师傅忙去起云街请来郑医生，让他为我用土方诊治，说郑医生医术好品德也好。很快郑医生冒着雨来了，除了身上披着的一块薄塑料“雨衣”，双手空空什么也没带。可能注意到我有些惊诧的眼神，他解释说“先来看看我的伤情后，回去再配些土药对症治疗。”

郑医生 50 多岁，清瘦的脸庞，操一口让我这北方人听着费劲的巫山乡音。摸了摸腿上的伤处后他说：“膝盖包儿（膝盖）伤势重些，等我回去配好药，明天来给你敷上，两三天就可以告口（痊愈）。”

第二天中午，他抱着一个砂罐子来了。说是当面将药煮好给我外敷到伤处。我不大相信郑先生的药能有多大神奇，但两天后我的腿不但消了肿，走路上街亦无大碍，又不由得使我信服。我由是萌生了了解这位再普通不过的乡间医生愿望，决定与郑医生做一次长谈。

坐在江边码头一个简陋的“长江茶室”里，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郑医生的谈话如同这沁人心肺的雨丝，涌入了我这灌满记忆的笔端。

2

1968 年秋天。

背起二十公斤的行囊，19 岁的郑永厚跟着他的堂哥郑永银进山采药了。这山在陕鄂交界处名叫九湖山，是神农架的余脉：高入九霄，连绵无边。可怖的原始森林随着山势起伏，云气、雾气在身旁飘动，很难见到阳光。

森林是天然动物园，却决没有游逛动物园那样的快乐。这里一切都是纯天然：长蛇在身边爬，猴子在眼前跳，稍不留神，干蚂蝗就会钻进你的衣服，吸吮你的血当作一顿美餐。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诗人笔下的采药人，浪漫如入仙境。实际上采药如同走进了一个出生入死的战场。有时米袋空了，就靠山中野果充饥。五味子、铁瓜、野荔枝都好吃。最可口的是被称作“猫屎”的野果，打霜后吃起来味道和香蕉一个样。采药的地方，山高林密，下午 3 点多就黑天了。避免迷路，进山时需一路走一路甩掉药秧子做好记号。1991 年，在云阳竹溪大河农场采药时，永厚曾因未做标记迷过路，一个人惊恐地在山中过了一夜。从此永厚记牢，不管路径多熟，必须记准归路并找好水源和过夜的山洞。山中的夜晚寒气袭人，在山洞中过夜，洞口要点起一堆篝火警戒猛兽。但耳畔不时传来的一声声虎啸狼嚎，足以让你彻夜难眠。随身行囊里没有任何防身器械。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医者治病救人，岂有再伤害包括人在内的其它生灵之理。进山，至少一个月。多选择在秋天，药材成熟的时节。“采大留小，采密留稀”是采药人的规矩。

神农架，传说是炎帝神农为拯救苍生支起天梯采药的地方。其后神农恩泽所及，这一带保存了民间采药行医的传统。巫山大昌的乡间，如此医者有很多，但近些年，以“钱”为轴心的市场经济主宰了人的精神，甘愿忍受清苦生活的民间医生越来越少了。郑永厚说，他最初进山采药那些年，经常能遇到上至六、七十岁，下至与他本人年纪相仿的青年人。有时相互间还通通采药的信息。三十多年过去，再进深山老林，不但再难见到同行以及香獐等好多野兽的脚印，药材也愈发不好采了。

3

巫峡镇起云街是一条紧临江边的古街。街道曲折狭窄，上下高低，是条不折不扣的步行街。街是顶多两米宽的石板路，两旁则是鳞次栉比的店铺。卖山货的，卖杂食的，卖衣服的，卖烟叶的，卖火腿腌肉的，发廊，饭馆，菜店，药铺应有尽有，简直就是一个被浓缩的老巫山。

巫山医者郑永厚现就在这条街的 24 号租起的一个门面行医治病。他并不是巫峡镇上人，他的家在小三峡里面的大巫昌镇官庄四社。

我们乘着船主叫付少军的一条小船，从巫山码头起程，经大宁河小三

峡跟着郑永厚回家。

小三峡清丽而俊美；大宁河澄澈而轻柔。细浪银波，天泉飞雨，绝壁悬崖，一道道美丽的风景在郑永厚的眼睛里钩起了不尽的回忆：过了龙门峡，再过巴雾峡，再进滴翠峡，两岸陡峭的山壁上，不时可见山猴在林间嬉戏跳跃。还有一些肥硕的猴子趁游船往来的间歇，跑到江边大餐人们定时为其投放的美食。

滴翠峡里鸳鸯成群，船过时，它们扑楞楞贴着江面飞起，难得让你看得清其亮丽的真貌。郑提醒我们看在高山上跑动的野山羊，并描述野山羊通体青灰色，跑起来经常登下来石块，因此要小心。但我们终没有看到野山羊——后来 5 进 5 出小三峡，到了最末一次终于见到了其神秘的踪影，而且是一白一黄两只。

大约经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的小船行到了旅游船只的终点——马渡河。马渡河是大宁河的一条支流，因其狭长的河道两侧山势雄奇，景色幽深，水流湍急，又有“小小三峡”之称。“马渡河”名称的由来，有几种说法，其一说，明崇祯十三年秋（1640 年），农民造反领袖张献忠攻占了明军土地岭据点后，分兵三路，从此渡河，连夜攻陷大昌城；其二说，这里古无渡船，以马代船渡人，故名……。

11 月也算是枯水季节，游览小小三峡，要乘坐当地人称之为“神驳子”的柳叶形小船。因是逆水行舟，船到水急处，要靠纤夫用纤绳往上拉。幸好水急的地方水也浅，虽然拉船颇费气力，我们仅用了 40 几分钟，就到了尽头。“小小三峡”由“三撑峡”、“秦王峡”、“长滩峡”构成，总长 20 公里。我们游览的仅是小小三峡第一峡——三撑峡。不足 5 公里的这三撑峡里，精致的风景也是美不胜收：寿星峰、鹿回头、白龙泉、仙乳石、遐想谷、菩萨岩、笑脸相迎、陡口子、群兽出山、喊水泉……

坐在“神驳子”上，郑永厚神情凝重。他有十多年没进小小三峡了，一来小峡成了游览景区，收费高昂；二来峡内已无往日的清幽，无药可采；三来这峡里留着老郑一段锥心泣血的回忆——将他领入医门的堂哥郑永银就是在这峡里，在他的眼前被旋涡吞没——要不是陪着我，他再也不想旧地重游！

1985 年秋天，郑永银带他到小小三峡采“铁海棠”。“铁海棠” 性温祛寒，是此地民间认同的治疗腰痛病的特效药。它长在小峡间的陡壁上。采得它，要冒相当的风险。这天清晨，吃罢早饭，师徒二人从官庄的家步行二十多里地，来到小小三峡“陡口子”附近的崖壁下。欲从此处登崖采

药。采药人登山攀崖是基本功，登不得山就采不得药；但不谙水性的却不少，郑永银即是如此。即是如此，也不能退缩。涉水向那张高耸天际的崖壁走去，永银在前试着水深，永厚跟随，一步步靠近壁下。河水湍急，雪浪千堆。突然间，师傅的脚踩空，转眼间沉入水中。就在刚刚踩空的瞬间，永银半回身往后用力推了永厚一把，永厚得救了，师傅却没了踪影。一切发生的突如其来，从生到死就像隔了一层薄纸那么近，让永厚连想的工夫都没有。他愣愣地站在那里，望着阳光照耀下银波闪闪的河水，哭都没有了声音。

郑永厚跑到附近的山上告诉熟人，代他通知家里人。他又找来小船，顺流而下到马渡河汇入大宁河的河口处，请人下水寻找师傅的遗体。整整三天，从早到晚，他就在河边不停地向过往船只打听消息。第四天下午师傅的尸体在巴雾峡入口处漂上来。峡里的风俗，死人不能上船，郑永厚翻山越岭，把师傅的遗体背回家。

我们的小船再临“陡口子”，离永厚的师傅遇难的时间已有 16 年。山水依旧，白发已经爬上了永厚的双鬓——他行医也有 33 年！“陡口子”附近那张宽大的黑色崖壁上，铁海棠还在，扒崖姜还在，万年青还在。小小三峡里常见的中药材有淫羊藿、三百棒、岩白菜、红藤、石菖蒲、石火炮、马蹄细辛、竹根细辛等二十多种。永厚还十分肯定地说，攀上崖顶，还能采到少有的南星草。但他不想再去，这一带山里的药材，总是会钩起他对师傅——堂哥郑永银的思念。有时一想到这里，他就要流泪。

4

郑永厚立志当个民间医生，最初是受母亲的影响。他清楚地记得，乡亲邻里大人孩子头疼脑热都来找母亲求医。母亲不识字，但她会配药，能够口授数不清的偏方，还擅长推拿和按摩，救助了太多的人。因为懂医道，逢年过节乡亲们都来看她——她受到乡亲们特殊的尊敬。

永厚兄妹八人，他排行老三。因其早慧，深得母亲器重。她宁可家里的日子过得贫苦，以一斤酒，一斤烟，一斤茶，一斗米的代价请来一位教私塾的老先生。那年从正月初八到五月二十七，让永厚读了不到半年书。就是这半年，他起早贪黑，读了背了《三字经》、《百家姓》、《女儿经》、《孟子》等六本半书。但凭家庭的能力，再喜欢读书的他也只能到此为止。私塾老先生惋惜之极，对永厚父亲说“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没见过这么聪

明的娃儿，不让他读书可惜了！”可惜是可惜，但读过的这六本半书，为他日后能读懂文字艰涩的古代医书打下了基础。

沿大宁河继续逆流而上，穿过滴翠峡，小船在八角丘码头泊岸。讲好五十元来回雇上一辆“130”卡车，往官庄四社郑永厚的家。除了刚上码头有一段路好走一些，直到官庄，凹凸不平的土路、山路搞得汽车一直像在跳着摇摆舞。还没见到永厚家的影子时，土路已成断头路，我们只能下车步行。上坡下坡再上坡，穿过一片菜地，一丛茂密的竹林前的土砖房就是永厚的家了。家门口一群老鸡和小鸡在竹林清凉的阴影下，悠闲地觅食。晌午的天气，走出一身热汗。我们先在房前的空地上歇息。清风拂面，不经意间回头一望，却原来已站在了高山坡上，如诗如画的大宁河就在我们的脚下。

“你家真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

“穷啊！”郑永厚苦笑着感叹。

巫山至今还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历任地方官中，有不少不以“贫穷”为耻，反以此为由，伸手向国家讨要或背地里干些偷鸡摸狗勾当的为荣者。不然过去闭塞时“贫穷”，现在旅游收入已占全县财政收入 1/3 的巫山依然“贫穷”，当做何解？没听说过哪个贫困县的县官穷——真正“贫穷”的承载者是像永厚一样的农民。

郑永厚为了在儿子身上实现自己未曾完成的读书梦想，欠下一笔外债。1996 年，受郑永厚影响爱上中医的大儿子郑超考取了万州市中医学校。按说是件好事，但三年的学费 1.1 万元，却让家里犯了愁。永厚四处求借，但他的乡亲都是和他一样贫穷的农民，又哪里有那么多钱。后来，有人同意借给他钱了，但要还本息 1.5 万。就是说借到 1.1 万元，要还回 2.6 万元。

三年后，儿子以全优的成绩完成学业。但因父亲“无能”找不到工作。外债只还了 1 万，还欠一万多。为了多承担些父亲的辛苦，年仅 17 岁的郑超决定离开家乡去打工。临行前他对郑永厚说“爸爸，您想过没有，您救了那么多人的性命，可他们有了活命，还是在贫穷里挣扎，一年到头陪着您一块儿过苦日子，值得吗？”

真是一句把心刺出血的话，惊得郑永厚哑口无言。因为在永厚看来，生命从来不是为了获得贫穷而来到世上。他还记得“文革”中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语录：“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财富”。这语录讲到他心窝里。永厚以为，他和他的乡亲们生命不息，劳动不止仍然被贫穷死死缠绕；面前贪官污吏的种种巧取豪夺，是“中央”政策得不到贯彻落实所致。“中央”，

是其心中美好的天堂；“中央”，是其精神的归宿。难道他想得不对吗？

5

走进郑永厚家的土房，贴在迎面墙上的是已经作古多年的毛主席的画像。画像已经发黄，且已落上一层灰尘，但老人家慈祥无比的面容没有变。正是他改变了像永厚一样的中国农民的命运。“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日复一日，他注视着郑永厚家的空空四壁，注视着一家人风雨中的辛劳……幸福富裕暂还没有来到，只是迟早的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注定要照亮大宁河。郑永厚已经盼了五十年。

大儿子报考中医学校那年，小儿子也正好考初中。郑永厚为多采些药卖钱为儿子筹措学费，没等到秋天——1996 年阴历 5 月，就带着徒弟何其春进山了。

永厚说，每次进山采药都意味着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譬如 1976 年秋，他与师傅郑永银冒着危险，在湖北兴山县灶门子村边的洋溪河畔采到了罕见的“九龙盘”。“九龙盘”顾名思义是由九条毒蛇环盘住肉质似党参的一棵草。此药入心经，兼补肾、肝、脾、肺。是非常名贵的中草药。但采到此药颇费一番周折。要把紧紧缠住那棵草的毒蛇一条条引开，还不能让那棵草受到任何伤残。郑永银请来当地的捕蛇能手，在保证草药不受折损的前提下，讲好价钱。果真灵验，九条毒蛇乖乖地顺从捕蛇能手的指引，纷纷撤离。一棵尺把长的“九龙盘”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永厚上前，由师傅指挥小心翼翼把“九龙盘”掘出地面。正当永厚兴奋地就要将其捧到手中时，一条突然窜出来的毒蛇，对着永厚的手背猛地咬了一口。多少有些救急常识的他马上用嘴对着伤口吸吮。但毒蛇的毒性太大，手背象气吹的一样肿胀起来。幸亏一旁的捕蛇人随身带着防蛇咬的药面，永厚逃过了一劫。

再如 1980 年，永厚独自往巫溪与陕西省交界的镇坪县黄花垧采怀通。他登至坡度很缓的一个小山坡时，不小心踩掉了一块石头。只见一个受惊的大家伙突然从草丛里窜出来。定睛细瞧，是一只好大的黑熊。永厚知道黑熊既会上树，也会爬崖，心里十分紧张。好在这是个没头脑的大家伙，嗷嗷叫着往山下林子里跑了。

1985 年，更不用说了，眼瞧着师傅在小小三峡遇难。

1990 年，还是陕西镇坪县，在五谷包这个地方，一只豹子呼啸着从他

身边不远的林丛里跑过。

……

1996 年 6 月，永厚带着徒弟何其春进山了。他从来没有这么早这么热的天出来过。为了让儿子读书，为了给两个儿子缴上学费，他不得不如此。神农架林深山大，天然药材多。光永厚在神农架采到过的中药就有 487 种。“文王一枝笔”、“江边一碗水”、“阴山一枝蒿”……都是此山特有的名贵中草药。

师徒俩爬到一座海拔 2000 多米的大山半腰，发现了这儿有沙金还阳、细辛、参叶子等好几种中药。那是个大晴天，头顶上艳阳高照，山谷中弥漫着看不见的热浪。永厚抬手去采长在高处的参叶子的时候，仰头恍惚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人正站在他的头顶，再细看此人还挺着溜圆的肚子。永厚怕是精神幻觉，极力控制住身体，告诫自己千万不能紧张。人在山腰，稍有不慎就要坠落百丈悬崖。

“何其春，过来！”他连呼离他仅 5 米距离的徒弟。

“师爷，我这儿有细辛！”何不解其意。

“何其春，给我过来！”永厚几乎吼起来。

徒弟挪到永厚身边，此时再抬头，那个黑乎乎的人不见了。

是野人，是黑熊——郑永厚说不明白那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虽然他至今仍坚持这是个神经错觉——但归根结底他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他忘不了那一天——1996 年阴历 5 月 27 日——师徒俩背着 300 斤的草药回村时，妻子没有如往常嘘寒问暖欢笑着接过他们的行囊，而是扑到他的肩头号啕痛哭。和先前的预感一样，正准备考初中的小儿子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在村外的大水塘里淹死了。突如其来的噩耗，老郑也懵了。他把药袋子一扔，直跑到那个大水塘前。一切都已经归于平静：清澈的水面在夕阳的晖光下泛着金色的涟漪。四周青竹摇曳，悄无人迹。老郑也哭了，他伤心给孩子的爱太少太少——连孩子去巫山县城逛一逛的愿望到死也没有实现——做个好父亲，做个好医生真是太难太难了！

又过一个多月，考中医学校的大儿子郑超拿到录取通知书。但郑超一脸愁容地拿着通知书站到永厚跟前……

难过的 1996 年，一身重负的郑永厚挺过来了。不为别的，他以近乎完美的精神穿透了苦难。这精神，可用他讲过的一句话概括——“病人一来，我恨不得马上把他治好，就什么都忘记了！”

6

唐代医圣孙思邈在其医着《千金方》首卷中，敬告行医者必要以德为本“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之则是吞灵巨贼。”医圣之教，薪传至今，已是人心不古。怀有一颗菩萨心的医者，鲜如凤毛麟角。何者？世风日下也。

当今的医生都明白，患者是为活命才来求医的；当今特别是绝症患者也明白，不给医生“红包”少有医生想救你——当代相当多医生的眼睛里，病人已成为赚钱的商品——铜臭早已驱散了人间可贵的温情。我曾领教过一位心如冷冰的医生。该医生号称北京名医，叫李干构。我陪重病的老母亲去医院请他治病，名医绷着个长脸，没说出所以然，也不容我们细问详情，就说他太忙，催促我们赶快起身离开。后来我又一再见他在电视、报纸上露面，知道此人原来是个社会活动家……医者太热衷于功利，遥离医之本意也。虽如此，李先生比起卖假药，开大处方，置病人死地而不顾者还算“好”的多！

假如你是个病人，来到郑永厚面前，那就是你的幸运。他的亲切的问候，慈善的目光，让你顿时就会感到春风拂过心头。30 多年了，他治好了病人无数。他背着药袋，无数次往来于乡间的小道上，皱纹渐渐爬上了眼角，脊背也有些弯曲，但他好名声传遍了家乡的山水。莫以为他的好名声只因为医德高尚，其高明的医术更为人称道。

官阳区安宜乡的女娃万爱菊因腿病瘫痪，87 年底其父万家谋带她到上海治疗，月余未见效果。老万又把女儿背到了永厚家，求其医治。永厚管吃管住，治了 8 天，万爱菊即行动如常，父女俩高高兴兴回家过春节去了。转年底，万爱菊又患“摆头风”，再次登门求治。仍是管吃管住，永厚用了 21 天，又将其治愈。现在万爱菊已经是两个娃子的妈妈了。

永厚名声在外，武汉市洪山区青林乡 7 组的宋桂芳患病曾由他治愈。后来宋桂芳结婚，数年不育，她到武汉协和医院求医，一位何教授告诉宋要通过减肥怀孕，没有成功。宋桂芳的父亲宋世德想到了远在巫山的郑永厚。去信一封，问能否有办法。宋世德正等待回音时，永厚已经来到老宋的面前。永厚用自己的处方治疗一个月，宋桂芳就怀了孕。消息传到何教

授那里，教授请永厚去一趟。

永厚向来高看教授和城里的医生。他虔诚地自费到武汉，以为既可以求教又可以交流。

“你把土方出献来化验化验，我们可以从科学角度看看是否有道理。”教授说。

“土方是我这个土医生多年摸索总结出来的，献出来可以，但也要有个手续，不该这么随便吧!”永厚没想到教授如此盛气凌人，心里不快。

“现在宋桂芳怀了孕，也不能说明你成功了，是男是女你知道吗？要是畸形胎儿怎么办？”教授见永厚不买账又气又怒。

“你是教授，但你要尊重事实，不要乱扣帽子!”永厚也急了。

……

此事过去已快十年，在永厚的记忆里却留下一道深刻的划痕。不止何教授，老宋一家也让他寒心。辛辛苦苦治愈了老宋女儿的不孕症，宋家转眼就变脸。当初写信请永厚来时的急迫之情没有了，正可谓“用人脸朝前，不用人脸朝后”，完全把永厚当作一个陌路人。

人间的冷暖，永厚尝得多了。但我还是特别想了解，得到上面的那些“待遇”之后，他如何面对。永厚说，经过了那一回，开始真有些不理解。后来，他终于想明白了。他问自己，给病人治病，一定要人家感谢吗？如果，认为“是”，你就是动机不对；如果认为“不是”，你才是个合格的医生。而何教授摆出来的城市压倒农村的气势，加倍激发了他继续刻苦钻研医学的精神——“只有好心，医术不行也是要‘杀人’的。”，郑永厚说。

永厚让我看了他家中一个竹筐里装着的全部采药家当：小锄、锅铲、塑料碗和三只药口袋。一尺多长的小锄上还带着泥土，是前次上山的纪念；药口袋则大多了，每只都有近两米长三尺宽。通常是每将一个药袋装满，就留下记号放在一处，最后撤离时雇当地人背下山。有的常用药材，随手就在原地卖掉了。

回到土房前的空地上，永厚妻端着一大盆刚刚煮好的红苕，招呼我们这些外来客品尝。见我们个个吃的津津有味，站在一旁的永厚妻一边微笑着，一边不忘当着我们向永厚抱怨，说他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用不着年年上山，万一出了事咋办。不如进些药安全，况且也贵不了多少。妻子的用意很明白，特别在暗示我劝他收住上山的心。“药还是自己采，自古有‘医药同工’一说。自己采药能保证药的质量，给病人治病有把握些。”永厚抢先堵住妻的嘴。

永厚真是个山村天使，心中只想着病人，他很少想到个人安与危。妻子不知道，一个多月前，他刚在神农架又躲过了一劫。那天在梯子崖采罢怀通，背对崖壁背着药包（类似背包）下山，不经意间药包突然碰上身后凸出的崖石，不由自主永厚的身体失去重心前倾。即要失足跌下百丈深谷的瞬间，他急中生智，见脚下三米处有一个梯台，顺势将身体一斜掉在了那个梯台上。

7

郑永厚家所在的官庄，因地势高不属淹没区。全村 1300 多人，以农业为生。主要作物是水稻、土豆、小麦、玉米、红苕、芝麻、绿豆、花生……水果有杏、李、桃和少量的梨、桔、广柑。永厚一家 4 口，种着 6 分薄地。连永厚算在内，全家辛苦一年，顶多有 5000 块钱的收入。又要还债又要顾及女儿读书和一家人的生活，困难可想而知，永厚盘算，无论如何三年内也要把债还清。

好人的日子一般都是清苦的，因为好人不奢望；好医生日子一般也不会太富裕，因为他的心思用在治病救人上。古来悬壶济世的杏林医圣，诸如华陀、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皆出自乡间，其中没有一位是大款，没有一人留下为人治病讨要“红包”的记录。反观当今名医，但分有点儿本事，架子端得十足的盛气凌人者，恬不知耻乘人之危向病家敲诈“红包”者大有人在。他们忘记了医生责任，把良心变成狼心。

郑永厚不会去想苦日子和做个好医生之间的因果。但不经意中上天也有时给予他微笑的回报。二十几年前他去陕西镇坪采药途中，住在一户山里农家。他分文不取，以精湛的医术，为这户农家的老人治愈了腰腿痛的顽疾。老人得知永厚因生活穷苦快三十岁还没有成家的时候，感叹万分“这么好的医术怎么会讨不到老婆？”

就像做梦一样，那次采药归家，再住老人家休整之时，老人做主把女儿张久春嫁与永厚为妻。久春虽谈不上闭月羞花之貌，却也堪称小家碧玉。明月为证，对酒当歌。月光下，灯影前，乘着酒兴老人对永厚说：“赖食猴儿（油头滑脑者）我看不起。我把女儿托给你，看中了你的人品。往后你成了家也就能安心多些为穷人治病。你要是同意，就把这碗水酒喝下，你要是卯起（别扭），我就是哈巴儿（傻瓜）!” 永厚理解老人一片心，从不喝酒的他，捧起大碗酒一饮而尽。

面对大宁河的一座山顶上，永厚安了家。春去冬来，冬去春来，澄澈的大宁河永不停息地流向长江。小时候，望着大宁河，他总盼着有一天能跟着它到长江，到武汉，到上海，一直走得很远很远。他不知道走得很远去做什么，他也不知道穷苦的日子注定使他寸步难行。他是在与命运无奈的抗争中选择了医生这一行，不管儿子郑超怎么看，他认定了为他人解除病痛，是人生至乐。“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务，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的古训，他牢记在心。一本本完整的医案记录，浸透了一个普通民间医生的良知。

三峡镇起云街 24 号，永厚坐堂行医的小店后面，是一间小房，小房的后面是滚滚长江。每天晚上，只要不接诊，他都坐在那里读医书。《伤寒论》、《身经通考》、《素问》、《难经》、《内经》、《红虎药性 400 味》等是他的反复读诵的经典医籍。三斤半重的插图本《本草纲目》，都被他读烂了——“现在，我一天还背一个汤头”永厚说。

离开官庄时，已然夕阳西下，桔红色的晖光涂满半个天。永厚送我们直到八角丘码头。刚巧碰到了从上面巫溪县来的人下船，他们专程来请永厚去那里治梅毒等流行的性病，永厚爽快地答应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他就是这样一年四季奔忙着。累，的确是累，他说，等将来跑不动了那一天，他再抽时间写出一部治病心得的医书留给后人。在这部医书里，他将对当代人的生命质量作出这样的表达：永厚认为当代人平均寿命的延长，不是体质高于古人，而是西医药科学进步的结果。相当多的人是靠药物延续着生命。古人不同，如治胃实热，胃虚冷等病，六、七位的中药足矣。现在则至少要开出二、三十位药的大方剂方可——不仅是人体对药性的抵抗越来越强，而且是因为药质也大不如前——这是未来人类生存的潜在危机。

我在灯下追记郑永厚的故事时，也许他又已经游方至神农架的青碧山水间。他是仙，总在山里餐风饮露——站在这座山头一望，就知道对面山上长着什么药材；他是清贫诚实的医者，把爱心撒满人间。但是，他也有说不明白的遗憾：救得了乡亲的性命，却救不了他们的贫穷！

第十一章 大昌之恋

1

到过巫山乃至三峡的人少有不知古镇大昌者。这个位于大宁河中段小三峡深处的袖珍小城，可记录的事情太多。

从永厚家返回到八角丘码头。花两元钱雇一辆三轮“麻木”，沿大宁河顶多跑上 10 分钟就到了大昌城。不过现在的大昌城早就以“欢喜坡”为界，分为新旧两部分。所谓“新城”只是相对袖珍老城而言， 论年纪，实在“新城”比老城的年龄也少不了几年。因其无城墙封围，存留发展空间，解放后，尤其“文革”以来，大家“革命”不忘生产，人口突然膨胀。老城住不下，增殖的人口就都“憋”到“新城”这边。没有规则的建筑，把“新城”的街道挤得喘不过气来。“新城”人多，是大昌集贸中心。商店、饭馆、茶楼、酒肆、烟摊、百货挤满百多米弯曲铺满石板的市街两侧。每天清晨，四面八方的农夫挑担、推车将新鲜的蔬菜汇集于市街东面纪家坡叫卖，那里就荡起一片亲切而又嘈杂的乡音。

大昌镇初建于距今已有 1700 年历史的晋初之时。其后，大昌作为郡县治地也有 1300 年。据明正德年间的《夔州府志》记载“大昌县古无城池，弘治二年（公元 1489 年）始筑土城。正德七年（公元 1512 年）砌石门三座，东曰朝阳，西曰永丰，南曰通济。”又据清光绪《巫山县志•城池》记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 1547 年）大昌城得以重修；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又“增高其城，深浚其池”。明末再被战火所毁，清初又得恢复。道光元年（1821 年），大宁河水暴涨，再将城墙和城门淹没，门楼炮台陆续倒塌。道光四年（1824 年），知县杨佩之捐廉补修城墙和东、西、南门，分称其为紫气、通远和临济。但此时城墙已不复存在。现今的大昌古城基本保存了清末以来的格局。

我在大昌的时候，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的师生，正在现今

大昌南门和西门间紧临大宁河的地方，发掘“大昌古城遗址”。希图通过这次发掘，绘制出大昌古城原貌。补充史学界对三峡库区城镇变迁史的空缺。据一位参与此项工作的名叫金国林的研究生介绍，早期大昌城的城墙均是先挖沟槽，再填充石块或青砖垒砌而成。目前，古城的石头基脚已见天日。城内的一些房屋基址也已“亮相”。引人注目的是，靠近内城墙处，挖出了一个完整的酿酒灶。

但若想探出古城全貌已是妄想。2003 年三峡二期工程蓄水，遗址肯定被淹——到那时最多也只能完成对大昌古城遗址 40%的发掘。也算是历史的巧合吧，古大昌荒芜缘起于天然水患，而今日大昌的消亡则是出自人工引水。兴于水，亦亡于水的大昌，只有这一次才完成了最彻底的毁灭。

孤立在我们身后大宁河河滩上，是一段大昌古城的断垣残壁，它以伤残之身展示着其数度变迁的往事。大宁河水缓缓在墙下流淌，一条条小船在它的身侧悠悠飘过……宁河夕照：渔歌和晚霞，轻风和细浪，水色和山光构成一首瑰丽的田园诗章。我恍然彻悟，原来我们永远是历史的孩子。我们没有气力找到它的正门，只能淘气地从它严守阵势中觅到一个缝隙钻进去，匆匆窥到它的局部，再匆匆跑出来。万一我们找到了目标，它就要和孩子们玩捉迷藏的游戏，把好东西藏到我们够不着的地方。

2

欢喜坡这一侧大昌“新城”的和平街，在大昌人的眼里，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或大栅栏。1999 年之前，移民尚未外迁，此街商贾云集，终日人流不息。但当我走进和平街时，此街已然物是人非。入夜倘佯街头，灯影昏黄，人迹寥寥。只在街西还有几个亮灯的铺面透着点儿生气。大昌人也有摆“龙门阵”之好。和平街 47 号的录像出租的小店，现在是整条街仅存的一个“阵地”了。白天经过此店时，见到店门边上还保存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文革”标语，引起我的好奇。上前打探，店主叫王成群，好客十分。我还没迈进店门坎，他已经边打招呼边把小竹凳摆好。说是小店，其实面积有三十平方。小店迎街一面是木墙木门，四敞大开，进出方便又随意。

这些年，远方来此“告别游”的客人多了，“上面”来视察的干部也不少。大昌人见的世面随之扩大，气度也随之增容。对我这个陌生来客，人家并不以为如何。那夜“龙门阵”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名叫黄定轩的 70 岁差

两月的老汉。他坐在屋中央的小凳上，正在给一群后生讲过去大昌恶霸孙敬堂轶闻轶事：

——“孙敬堂的喉咙最大，牙齿最长，地方都喊他袍哥孙大爷。大昌人怕他。这个人过去也是个吃苞谷稀饭的穷人，文化水平不高，人心可最凶。他靠卖食盐起家。他从巫溪贩盐到大昌卖。方圆百里的大昌人吃他的盐的人最多。他勾结官府，有一套经营办法。譬如有一次，税务部门来大昌镇通知第二天盐要涨价。来人最先到了老孙家，他好吃好喝招待一番把来人灌醉。然后安排人上阁楼休息——大昌镇的阁楼是靠活动的木梯上下——等人家上楼歇息，他就把梯子撤掉。然后孙亲自出马，把镇上所有盐铺的盐买光。等他买盐回来，税务的人休息后下楼，找不见梯子正在着急，孙就假装责怪家人撤了梯子，让贵客为难——他就靠这些坑蒙拐骗之法发了横财。

他虽霸道，也有死对头。对头不是别人，是他的拜把兄弟胡一成。最早以前两人都在长江河驾船，常一起打屙屎主意。他俩曾合伙劫过一条船，把一个贩运木耳的商人推到长江河淹死。后来孙敬堂发家狠了，就疏远了胡一成。胡的日子越过越穷，不露声色的他起了杀心，要搞掉老孙出气。他摸到老孙每天晚上到镇上各盐摊结账收钱，决定在这个时机动手。一天晚上，老孙走到镇东头纪家坡盐店收钱，胡一成跟了进去，胡将抽出藏在后腰的短刀时，孙有点警觉，但被胡嘻嘻哈哈敷衍过去，孙也就没在意。从那个店出来，孙继续往东到水田坝，胡跟踪而至，乘孙不备，抽出腰间那把杀羊刀，当场把孙的肠子刺出来。然后扭头就跑。孙用长袍捂住肚子到区公所报了案。事情很快传到孙敬堂的弟弟孙敬川那里。孙敬川提着枪去打胡一成。胡早躲起来。过几天，胡见外面追杀他的风声紧，自己到区公所自首投案。这边被刺伤的孙敬堂经名医调治渐渐好转。胡不甘心，又花钱把医生买通，让他用药将老孙毒死了。这个姓胡的棒老二，解放后也没得好死，被镇压了。”黄定轩给围坐在身边的后生完整地讲完这段大昌往事，还不忘指着门外幽他一默“瞧，老孙和老胡，那天晚上都是从这门前走过的!”后生情不自禁地都向门外转过脸去，然后是一阵哈哈笑声。

黄定轩是大昌街上的“文化人”。解放前在巫山读过初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学过 ABC”。依照解放后的“革命”观点，解放前能读得起中学，肯定“出身剥削阶级”。他于是过了几十年饱受歧视的日子。黄本是迁到广东的移民，但不适应那里生活又回来了——他还有两个儿子住在大昌街上。

图 2.8 大昌古镇

图 2.9 倚门读书的大昌老人

图 2.10 大昌古南门

——“人在大昌，户口在广东心里踏实吗”我问他。

——“户口到哪儿都一样。到哪儿儿子都得让我快活。现在我过的日子是神仙比不了。往后的日子怎样搞不到（懂）。反正每天二两酒，二两肉，打麻将，乐颠颠。到了广东可把我憋死了。地是白的（盐碱地），春天麦子、豌豆没有看见。只看见水稻跳摇摆舞，鸭子乱飞乱吼。捡垃圾还得走半个小时到城里去。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欢喜种田。为种田要施农家肥，常要串茅厕掏大粪，这在广东实现不了。那边人住小区，活动不方便。拉回屎不珍惜，自来水哗啦一下子冲跑了！大昌这儿人屎值钱，撅着腚露天屙屎，人人产化肥！”黄定轩话音落地，又引起一阵笑声。

录像出租的小店对面，是镇上只此一家有些规模的“红辣子火锅店”。我们这边热闹的时候，对面的火锅店也忙着做晚间的生意。那个店的老板抽暇也跑过来旁听黄老先生的“书场”。老板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我们这里人都欢喜背着手走路。因为我们老祖宗是被反绑双手‘移民’到这里来的。黄老伯不同，他走路从不背手，所以他祖上不是移民，除了大昌哪里也留不住他！”老板的话中分明含有对黄老先生的钦羡之情。羡慕他活的潇洒，活的快乐。不似老板自己天天为生计绞尽脑汁，累死累活。但老板看不到，1949 年“解放”以来到“文革”结束，30 多年间黄所遭受的命

运磨难。老板还年轻，正处在人生欲望不断增值的年纪。还体味不到人生快乐往往在于“知足”，在于饱尝了漫长的苦痛之后的豁达。

3

欢喜坡西面的大昌老城被冠以“袖珍”之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有诗为证“一灯照全城，四门可通话。堂上打板子，户户听得见”。踏上老城空寂的街道，高高的封火墙，斑驳的粉墙，凹凸不平的石板路，还有暮色中袅袅升起的炊烟，仿佛让你在默读一部无声的史书。

实在说，“袖珍”大昌古城保存得并不完整。所幸长约 300 米的横贯东西的胜利街和长约 150 米的解放街基本完好：已经磨圆棱角的石板路，散发着沧桑气息的古民居，加上东、西、南三座条石搭砌的城门，尚可吊起人门的怀古之情。

明正德《夔州府志》载“大昌县（当时大昌设县属夔州府 笔者注）三街一坊，有二百二十户”。现在当然不同了，如此袖珍小城怎么也要“挤”上 300 户。漫步城中，如果有人提示，你还会突然觉察到，即使你站在城中连接东、西、南三座城门的丁字街口，你也望不到其中任何一座门。大昌古城弯曲的街道其实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此种街道的独特之处在于假若敌方攻入城内，也难以洞悉城中全貌。此等城市格局思路，起始于宋元。如宋太宗使足气力灭掉当时建都太原的“北汉”小王朝后，就将太原夷为平地另起新城。为防将来有人谋反，而将新城相连的大小干道全部建为丁字街。

古大昌城现存明清时期的民居30多座。其中最著名的是解放街上的“温家大院”。温家第十代媳妇付少香，对每位来客都是一套相同的导游辞，说他们祖上是广东梅县人，祖上做过不知是哪省的巡抚。按十代推算，温家最早应是康熙年间落户于此。也就是说温家的“巡抚”如果属实，其尊姓大名在《清史稿•职官志三》中肯定能有记载。但无人认真去校核此事，“巡抚”姑且就一直由他去。

温家大院始建于清初，与温家十代居此相和。大院坐西朝东，建筑面积 320 平米。由后厅、正厅、前厅三部分构成。飞檐和厅门均有镂木雕花，山墙多用阶梯式，不知何故，整体架构竟表现着浓郁的江浙建筑风格。

先前，温姓与蓝姓人家共为城中大姓。民间有“温半头，蓝半边”之说。后来两姓人大都外迁不知所往。现在的温家大院仅剩下“巡抚”十代

孙温光林。温自幼和父母同居大院。1959 年“大跃进”，全家被轰出来。大院办成了通往“共产主义”的公社食堂。直到“文革”后，“巡抚”的第十代独苗温光林才重新“回家”。

温家大院，现已空空荡荡，像是一座等待存货的仓库。后厅墙上残留的“总路线万岁！”的标语至今还在，记录着半个世纪前的一场“人造灾难”。那场灾难中，温光林父亲和兄弟因“饥饿”失掉了性命。

古人云“公子王侯，五世而斩”，但温家自“巡抚”之后，即在官场断了声息。再观一世温公以“巡抚”之身兴建的“温家大院”，尚不如今日京城“处长”甚至“科长”的宅邸豪气冲天，足见温一世公如若真当过“巡抚”亦应归属清官之列。

大院前厅前是一个风水池，此池不方不正斜似菱形，据说也是为了保守温宅“官运”风水之故。当地人给我念了四句顺口溜“凤凰对石榴，洋溪水倒流。富贵无三代，清官不到头”。说是大昌虽古，却绝对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凤凰”对“石榴”不伦不类；洋溪河与长江流向相悖可谓一怪；三代富贵之家大昌人没见过；清官在此地更是闻所未闻。温家风水池看来到底没能把风水校正，其子孙因此多遭变故。温光林的两个儿子：老大一家移民到了广东高要；老二留在大昌，靠做豆腐谋生。1994 年起“温家大院”开始对外开放。门票由每张五角涨到现在的每张两块钱。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美事维持不了多久，2003 年 6 月 1 日三峡二期工程蓄水前，大昌古城要完成整体“原貌搬迁”，“温家大院”自在其中。老城迁到距十公里远的邓家岭上，据说规划得很气派。温家人把祖宗的产业卖给政府，拿到一笔移民补偿金之后，即开始新滋味的生活。

2004 年 1 月，我再次走进大昌古镇的时候，镇上的人已迁走大半。镇东门胜利街 25 号的颜家宽是仅留的未迁户之一。他告诉我，1998 年大水和 2003 年 6 月三峡二期蓄水后，大昌已经被水淹了两次。但现在，大昌是真真正正的将要永久地全淹了。空荡荡的街面上，人影稀疏。颜家宽经营的杂货铺已经绝少有人惠顾。过去，店里的黑塑料粪桶卖得很快，多时一天能卖上 4、5 只。现今，百十来个粪桶码在墙根成了废品。颜家宽说，生意勉强维持，最忧虑的是，他定位将搬进大昌新城，但至今不知道，住新城要在什么时候，要花多少钱？心里讲，他舍不得离开大昌，他感觉离开大昌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大昌就要搬走了——比起奉节、巫山城一炸毁之，大昌城是除开住民以外的基本建筑“原貌搬迁”。这是三峡库区唯一整体搬迁的古镇。但你细

琢磨，这其实是古镇另一种形式的毁灭。因为它是割断历史血脉的迁移，徒有形似，没有灵魂。

4

每一个到过大昌的人，都忘不了矗立在大宁河畔的古城南门。一棵浓荫如盖,直径一米半的黄桷树，其长长的须根紧抱城门与城墙连为一体。它以蓬勃的雄姿，浓缩了大昌人的精神和历史，令人叹为观止。

大昌人的先祖，就是跨进这座南门辟出一片生活新天地；现在，他们的后人却是跨出南门顺着大宁河而远走他乡。南门，是大昌人生命的坐标，是大昌苦难的见证。

千百年了，血雨与腥风从没有忘记“光临”这座于艰难中跋涉的古镇。远的不说，明末李自成余部郝摇旗等率领的农民造反大军，即曾以城为垒，与官军激战；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王聪儿、冉天元亦曾率众据城抗清；1926 年，大昌人不堪官府盘剥，由农民领袖谢崇德带头揭竿而起。拥众数万，杀富济贫，在此独守四年；最使大昌人难忘的是 1932 年，贺龙统领红三军由湖北竹溪取道巫溪，经过一番激战占领大昌城。贺龙在祝捷会上讲话，宣传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当场没收了几家大户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第二天，红军就开拔往湖北巴东而去……。

南门啊南门，是大昌的眼睛：它目睹了城里城外千百年燃烧过的血火，流尽了大昌人辛酸的泪水。2001 年 8 月 3 日，又一个悲壮的时刻来临了。一千多移民要在南门外码头登船启程远迁广东，一万多乡亲送行。码头的平台上，镇政府为移民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鞭炮声声。

背对走过沧桑的大昌南门，面对奔腾不息的大宁河，上任仅半年的镇党委书记刘敬安即席讲话：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你们为了三峡工程舍小家，顾全局。你们为了国家建设今天告别世代生息繁衍的故乡，后代子孙将永远感谢你们。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我们的祖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可敬可爱的人民！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再见了！祝你们一路顺风，祝你们万代昌盛！”

刘敬安动了真情哽咽着把话讲完。乡亲们也被感动得泪花滚滚。但是徒有美好的祝福毕竟不能当饭吃。大昌人背井离乡重新去创业，走得似乎

毅然而悲壮，但他们中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乡如梦，前程茫茫。

当刘敬安向我追述这段往事的时候，不由自主我居然产生了这样一种联想：我想起了红军，当年打进大昌城，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二天队伍即远走高飞，他们走后呢？被“打”的土豪，“分”得了田地的农民又当如何；我想起了游击队，说是“为民族抗日”，时不时在外边开枪放炮杀死有数的几个鬼子，然后跑到村子里隐蔽，招得鬼子进村，遭殃的百姓数不胜数；今天大昌的乡亲们被罩上“舍小家，为国家”的美丽光环，离别故乡，但他们的“以后”呢，衣食住行，又是由谁来保障？

离乡背井的那一天，大昌南门外河滩上曾响彻一片感天动地的哭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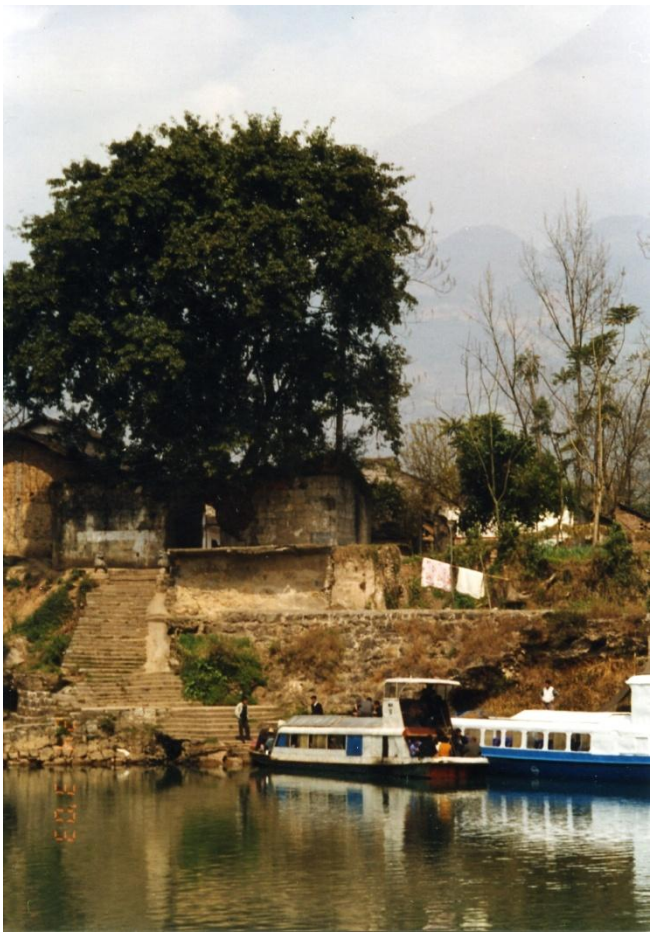


图 2.11 南门码头

第十二章 巫盐沧海

1

滔滔大宁河自宁厂经巫溪城和大昌古镇直到流出小三峡之龙门峡口汇入万里长江，共计 270 里。

虽然这是一条看似平常的水路，但只要你留心河右岸的山壁，就会看到一个个横向排列直向下游延伸的正方形石孔。石孔为 20 厘米见方，深约 50 厘米。孔距大都在 1.46–2.18 米之间。有位叫朱守贵的老船工细心点数，结论惊人：自龙门峡口溯流而上至巫溪县宁厂镇整整 135 公里的崖壁上，现仍存石方孔 6880 多个。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石方孔起自宁厂镇，终点在今日巫山。

疑问就此产生了。何时开凿了这些石孔？石孔又做何用？学界曾展开争论。有观点认为，石孔是古栈道所用；宋代《舆地广记•图经》则云“汉永平七年，尝引此泉于巫山，以铁牢盆盛之，水化为血，卒罢其役”；另有光绪《巫山县志•古迹》载“石孔，沿宁河山峡俱有。唐刘晏所凿，以引盐泉。”

无论石孔开凿肇始于汉或唐，其为特引盐泉说，或许较为实确。理由在于其一，石孔起点宁厂镇自古为盐都；其二，6880 余石孔均在大宁河右侧山壁，且在整体上略向巫山方向倾斜，符合盐水流动规律；其三，在某些地段，石孔凿在人连匍匐前进都困难的山石大夹缝间，足可断定其绝非人行栈道；其四，今宁厂盐泉以东百米处临河的巨石上尚保存有与引泉栈道相同的 10 余方孔。方孔上方即为盐场，其功能显而易见；其五，今人徐中舒所著《论巴蜀文化》一书记载道“近年在（四川）新津出土的东汉时代画像砖，其中就有利用竹枧（竹筒），引井盐度山越涧至盐锅内煎熬的图象，足见这一创制必然在东汉以前即已存在，这就是‘土自来水’。”以此可佐证，史载东汉永平年间，以栈枧引巫溪盐泉至巫山确为历史事实。因

为我们想象不出 6880 余石孔除此而外的其它功用。

至于盐泉引至巫山“以铁牢盆盛之，水化为血，卒罢其役”，很可能是盐水长期浸在煮盐铁盆中发生化学反应，将盐水变红。古人难释其由，于是停止了引盐水煮盐，200 多里的盐栈道随之废弃，渐渐被人们遗忘……

史书上关于巫山“铁牢盆”最后的记载见于南宋诗人陆游的《入蜀记》：“县廨有故铁盆，底锐，似半瓮状，极坚厚。铭在其中，盖汉永平中物也。缺处铁色光黑如漆，字画淳质可爱玩，有石刻鲁直作《汉盐铁盆记》”。

牢盆做何解？《史记•平淮书》注“牢，廪食也。古名者廪为牢也。盆者，煮盐之盆也”。现代史家范文澜云“盐官雇贫民，按盆数给工价，称为牢盆”，可见牢盆乃煮盐器具也。

巫山城本无盐，全靠巫溪供之。巫溪之盐来自宁厂盐泉。让人魂牵梦绕的“巫文化”发祥地，就是这样环绕盐泉演绎了数千年的中华早期文明史最为璀璨的一章。

2

去宁厂看一看吧，那仙人山，那后溪河，那盐泉，那古镇，今日究为何等模样？

2004 年 9 月 10 日，我自大昌古镇搭乘班船沿大宁河前往曾有“盐都”之称的巫溪县宁厂。

出发前的前一天，秋雨唰刷足足下了一夜也没停。大昌人醒得早，清晨赶到八角丘码头，准备赶最早一班客船去宁厂的时候，沐浴在一片秋雨中的码头上已是熙熙攘攘。我以为大家皆似我要顺大宁河而上往巫溪或宁厂。及到踏上空无几人的小小客船，方知等船的人绝大多数是往河下面的巫山去。往昔繁华竞逐的巫溪城，早已是风云不再！坐在清冷的小小客船上，倚窗而望，心情与这秋雨飘飘阴云低回的天气一样，不自禁地也沾上了丝丝凉意。

巫溪，本是大宁河的别称。以此名称县，始自民国三年（1914 年），至今不过百年。其设县治则可追溯至东汉，初称北井县。《巫溪县志》（1993 年版）载“建安十五年（公元 210 年），刘备既得荆州，欲以盐利制荆……将巫溪地方及巫溪盐泉纳入其政治、军事、经济的战略决策中”。可见我要去的包括宁厂在内的巫溪县，曾是个非同凡响的盐城。岂止是盐城，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峡江人心目中的盐都。

大宁河自大昌起，河床逐渐被峡谷自然拉直，成为一条标准的由南向北奔腾的清流。秋云秋雨中客船悠悠穿过 70 里宽谷。举目远眺，雾荡云飞，青山隐隐，宛若不断变化的恬淡的山水长卷；人烟稀少，农舍点点，此情此景颇具世外桃源的意境。如果你熟悉巫盐的历史，你就不能不对眼前这条清净的大宁河，曾经是樯桅林立，商贾不绝的商道而平生感慨。

巫盐生产的历史据传至少有 3000 年，但其最彻底的终结却仅仅发生在 8 年前——即 1996 年 2 月。那天突然刮起的大风将宁厂盐厂的大烟囱掀垮，宣告了巫盐历史走到了凄凉的尽头。

遥想当年，荒山僻岭中的巫溪盐泉，成就了一方土地的繁荣。到如今，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比巫盐成本低得多的海盐、井盐运过来，自然地冲跨巫盐的市场。巫盐的消亡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因果，人们所以将目光再一次投向它，是因为“巫盐”曾伴随着远古的峡江人走过了几千年辉煌。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巫盐”就没有今日的峡江。

我们的客船，逆水而上，不紧不慢地在水流湛碧的大宁河驶行了近 3 个小时，近午时分冲过了 11 公里长的险峻秀美的庙峡驶行到水路终点巫溪城。舍舟上岸，花上 3 元钱，再换乘小“面的”沿大宁河左岸上行约 20 里，经过绿色与云雾交融为一体的剪刀峡，就是我前来寻找的宁厂古镇了。客运小“面的”在镇口的狮桥停站后继续前行——它们早就不屑往冷清的镇街开进了。下车后，只得步行跨过架在大宁河上的狮桥，沿着与南北流淌的大宁河垂直相交的后溪河北岸（右岸），走进坐落后溪河两岸的群峰脚下的宁厂古镇。

此时已是雨过天晴，太阳挂在朗朗青空。镇口的宁厂镇中心敬老院门前，两条黄毛小狗相互追逐着嬉戏正欢。另一条拴住链子的杂毛大狗趴在路边高台一个人家的矮墙上，死盯着打闹的小狗，眼睛里透出不知是羡慕还是警觉的目光。

秋天明亮的阳光白白地洒满长街，除了我和向导陈仕海老师傅，几乎见不到一个人。我们只好将目光转向河对岸——陈仕海告诉我，对岸“七里半边街”才是昔日繁华的宁厂真正所在。

3

盐为何物？明代《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道“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终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可见，自从

人类的始祖发现了盐，人的生理本能即注定了盐为人生活之必需——没有盐的生存简直不可想象——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伴随着盐的发现和食用开始的。在这个意义上，判定宁厂镇是整个三峡重要的文明发祥地当不为过。

曾成就了玄秘“巫文化”的宁厂之盐，出自于后溪河北岸王家滩街道的公路旁的盐泉。自宁厂镇口行约 7 里，经过已然荒弃的国营盐场旧址，再前行约百米,即可见一股尺来宽的盐泉从 3 米多高的山洞垂直喷泻而下，泉声哗然，白水四溅。今人用管道埋于盐泉前的公路下，将其主流引入清清后溪河，另有部分从空中管道引至后溪河对岸新近开张的度假村盐泉泳池。

这口盐泉，这口决定了宁厂人命运的泉，这口决定了巫文化发端的泉，对着已经不一样的大山和天空，依然在不知趣地倾泻流淌。

此泉究竟被发现于何时，史不可考。当地广为流传的“白鹿引泉”的故事，被认为是人与泉相识的发端。

很久很久以前——还是没说出到底有多久——宁厂四周是一片毒蛇猛兽到处横行的榛莽地带。只有一些原始人类在此渔猎为生。一天，某青年猎手来到一座高山下，眼前突然闪出一道刺目的光团。再一细望，竟是一只白鹿。猎人煞是高兴，决意要把它活捉到手，他召唤随身的猎狗冲向白鹿。哪知白鹿跑得奇快，猎人与狗翻山越岭只见白鹿踪影，却始终不得靠近。不知跑了多远，白鹿跑进大宁河与后溪河交汇处半山腰一个山洞，闪过一道亮光就消失了。也正在此时，猎人看到一股清泉从洞口奔突而出。跑了许久的猎人已经口干舌燥，捧起泉水就喝，没想到泉水是咸的，不仅咸回味还有些甜。而且猎人喝罢泉水，顿觉神清气爽——他断定这是一股神泉。

猎人在附近砍了一段竹，将神泉水装满带回家。乡亲们将竹筒里的水喝过大半，皆曰神奇。谁想剩余的那部分被猎人的猎狗碰洒在一块青石板上，引来一片叹息。事情似乎到此打住。但第二天，猎人发现，洒过泉水的青石板上泛出一层白色的结晶，尝一尝味道很别致。用烤熟的猎物在上面沾一沾，猎物味道更加鲜美，盐泉之妙用就这样被发现了。

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陈绪昌，已经 82 岁，他是宁厂盐场退休老工人，是宁厂“盐”从兴旺走向最后衰亡的见证人。

4

坐在与盐泉隔河相望的“七里半边街”的一座老宅里，陈绪昌老人关于宁厂“盐”的回忆，拉开了我的眼前一幕幕历史的活剧。

——“民国以后，宁厂逐渐发达的盐商有向、罗、杨、江、沈、陈 6 家。那时，宁厂镇红红火火，长驻人口有两万，而流动人口则有 10 万之多。那时后溪河上，船与船首尾相连，镇街上银号、商号、茶楼酒肆整日人声鼎沸。6 个盐家中，其中以向佑文经营的规模最大。我们陈家不是最大，但经营得也还算可以。解放后公私合营，盐场归国家经营，生产规模更大了，百十家大小盐场合并为 4 个生产车间。但由于盐泉的出盐量是个定数，产盐总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据说，每年盐泉自溢盐总量为 1 万 6 千吨。宁厂盐因盐质好一直在陕西湖北甚至湖南都有销路。宁厂盐的生产过程听着简单，操作起来也蛮难呐。先是把卤水（盐泉水）引到盐池，由盐池将卤水扯起（用梨木轮子不停搅动），再将扯过的卤水加放冰土（提高卤水盐浓度），倒进铁锅，用火烧煮才成为食用盐。我说的这些还是较早的土锅产盐过程。盐场最后二、三十年大都用几百斤重的平锅熬盐了。这种生产更现代化一些。方法是将钢板放成斜面做坩埚，用钢板下煤火将钢板加热，然后让盐卤从坩埚流过，经过高温快速蒸发得到盐。当然还有更早的砂锅制盐，久而久之，现已失传了。”

历尽沧桑的陈绪昌，是宁厂镇老一辈人中的文化人。年轻时家境较好，曾在万县（今万州市）读过中学。他向我娓娓道来往昔热闹的宁厂时，语气里分明带着久远的怀念和隐隐的感伤——那是一段即使花上万金也买不回来的历史。

宁厂镇的核心一直在沿后溪河南岸的山脚下，前面提到过，是一条绵延的“七里半边街”。这条街现分为彼此相连的胜利街、解放街、中心街、生产街。从街名能看出来，都是“解放”后改的新名。但宁厂老人还是习惯将老街以“一段、二段、三段、四段、五段、六段”相称。

从喷发不绝的盐泉走过跨越后溪河的镇上的第四座吊桥，就是今日“七里半边街”的西端。与人行摩肩接踵的时代比起来，当今长街已是声寂人稀。宽不过两米余的沙土路清洁整齐。临河的一侧，或是砌上石台摆上花草，或是立起架子晾晒衣物、辣椒、鱼干。被荒弃的木板搭建的老屋长满蒿草。有人住的房子里，绝多的是老人和孩子——青年人大都去巫溪城或外省打工去了。

——“盐场停产后，工人无所事事。镇上现在退休在家的工人，一个月才拿二、三百元。后人工作也不好找，娃儿还要读书，家家生活好困难。

现在又要进行企业改制，听说改制后给每个退休工人发点儿钱国家就什么都不管了，我们这些盐场退休的老人很担心今后的生活。”陈绪昌言语中透出忧虑。

在与陈绪昌接触中，我能感觉到，这位人生大起大落的老人看似平淡，实则藏着一个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

他经历了盐商之家由富足转向衰败的全部过程，但他的回忆中最心痛的却是弟兄之间手足之情。

——“我们弟兄 6 个。公私合营后，大哥、幺弟和我三人在盐场干活。另三个弟兄两个早就死掉了，活着的四弟在哈尔滨也已经 70 多岁了。在盐场上班的大哥 50 年代初被断落在自家门口的高压线电死。幺弟的命运就更凄惨了。1941 年 8 月 8 日，日本人的 7 架飞机炸宁厂的时候，躲飞机的幺弟头部被乱石砸伤，身体一直不好。上个世纪 60 年代困难时期，当水土工的幺弟干活时被突然倒塌的厂房砸伤，送到镇医院抢救不成又送到巫溪县医院，仍然没有救过来。幺弟临死前拉住我的手说，煮一斤饭给我吃吧，我饿得很。但医生说他一点儿东西不能吃,否则就更危险。我心疼幺弟，偷偷煮了一碗蛋羹，还没等送到他嘴边，幺弟就死了。幺弟从小一直跟着我，我没带好他，家里穷,很少让他能吃到一次饱饭，到现在想起来还是难过。幺弟死后，连一件新衣都没有，我请求当时厂领导谭天华发一套新工作服将幺弟安葬，但谭死活不肯，‘你们家的事，厂里管不着!’弟弟就是穿着打着补丁的破衣服下葬了。”陈绪昌师傅说罢，双手捂住脸呜呜在我的面前痛哭起来。我明白，八十余岁的老人在我面前如此恸哭，只能说明，这深藏在心中的往事对于他该有多痛多沉!

陈绪昌因为父亲是盐商，出身属“资产阶级”，解放后，一直在沉重的压力下生存。但出身的“血统”改变不了，他注定永远是被猜忌怀疑的对象。为此，他被当成破坏生产的“反革命”，险些送命。为了向人家证明自己是个一心无二意的“革命派”，他任劳任怨拼命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体瘦小枯干的他，每天肩膀上要过的煤炭和煤渣重量有万多斤！如果厂里另有什么难办的活计，也要找到他。产盐扯卤这道工序，需要用梨木制的大轮子在卤水中不停地搅动。那年有一个扯卤的梨木轮子坏了，听说西边山里轿顶村有梨木料，厂里派他去看。陈绪昌师傅揣上两个苞谷面饽饽就出发了。

正是冬天，山风猛烈寒刺骨。陈吃力地翻过宝源山来到轿顶村。但看过木料不是梨木，只得无功而返。但此时天色已晚，又下起了小雪，渐渐

将山路淹没。他只好独自在二仙山半腰的仙人洞过夜。这仙人洞为宁厂四周百姓烧香供佛之地，相传明代状元罗洪先在此留诗并羽化成仙。诗曰："案读曾经数十年，事事非非几千般。一家饱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有人问我红尘事，云在青山月在天"。那天夜晚，站在仙人洞口，望山下飘飘雪花中宁厂镇上暖意盈怀的万家灯火，他想家，想有一个仙人一样，远离纷争是非温暖温馨幸福的家，但他知道，这样的完美的家他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了。岁月在他心中划过的道道伤痕已经不可能有愈合的那一天。他在仙人洞里一个人哭，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伤心最痛快的一哭——哭原来也这么难！

最初从住在"七里半边街"生产街路段的陈师傅家门口走过时，看他悠闲地坐在屋前的模样，我曾在内心感叹，人生到了老年或许真正如《名贤集》中所言"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完全想不到这位神态安详的老人，眼前飘过的世界竟然是如此纷乱。

他领着我去看生产街52号在宁厂有"百万富商"之称的向佑文的老屋。向已经在"文革"中自杀。老屋现住着一位姓谢的老先生夫妇，他们也是盐场退休工人。然后，我们一起到老屋后面寻向佑文自杀所投的那口老井。老井在紧临后屋墙的角落，现已被黄土填平。陈绪昌回忆，向投井自杀时脖子上挂了一个7、8斤的秤砣，而且是头朝下投到井中——他是抱定必死的决心了。向佑文投井后，是陈绪昌腰系绳子把他从井里抱上来的。对向佑文之死，陈绪昌不愿多说，岂止不多说，他甚至连那口井都不靠近。老远地站在那里静听谢家老两口陈述36年前的那一幕——一幕他深埋心底永不愿再去回忆的往事。

离开向家老屋，一个小女孩迎面向我们跑来"要不要古钱？"她跑得气喘吁吁。

"多少钱？"我问。

"你看都是好几百年的，一个一元！"

宁厂附近河段里常能挖出古钱币。民国年间，有人在庙峡竟然找到四、五十万枚唐代"开元通宝"。这些钱想必是当年盐船倾覆的遗物。现在这"奇迹"尽管难得再现，但知道古币可以卖钱的改革开放年代，只要你下到宁厂的溪河里找到一块沙地挖下去，总会有古币向你露出笑脸。

"买一个吧，随你挑！"

接过小女孩递来的几枚铜钱端详，都是清代的，最早的是嘉庆通宝。

小女孩求我买铜钱的时候，陈绪昌站在一旁沉默不语。

我没有收集古币的雅好，但小姑娘渴求的眼神，就足以让我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在冷落人稀的宁厂街上卖出几枚古币，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跑回家，欢喜是不言而喻的。

陈绪昌师傅和我告别回家了。本来我还想听他摆摆龙门阵，但遭到婉拒，只得作罢。沿着后溪河，我往东去，他往西行。他的面前远处就是曾掀起他情感波涛的高耸的二仙山。那座山看上去还是那样高，那样险，除了山树被砍光“开放”了全貌，一点也没变。而他却已经步入满头白发的暮年。80 多个春秋岁月，痛苦、悲伤、压抑的愤怒，强忍的泪水，他都承受了。他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活着。

——“活得太窝囊。”他说。

5

向导陈仕海师傅从老友家喝罢“老鹰茶”出来，在生产街东口等我。

“看过吴王庙没得？”

“去过了。”

陈说的吴王庙在向佑文老屋后面的半山坡上。这座古庙县志上没有记载，却是宁厂镇人人都知晓的名胜。此庙的来历说法很多。一种说法是，为纪念东吴大将甘宁而建；一种说法是为祭祀周武王而建，吴王庙其实是武王庙。陈仕海找了几位盐场老人为此庙正名。大家一致的说法：吴王庙是早年，大约 2、300 年前由湖北填四川来宁厂谋生的 18 姓共同筹钱而建。至于是吴王还是武王还是说不清。但多数较倾向为武王。说是武王庙像是靠谱，说是吴王有点儿不伦不类。武王伐纣平天下还是值得一祭呀！

自打武王庙建好之后，该庙就成为了每逢年节宁厂人祭祀和集会的场所。几十间殿堂的院落里有神像有供台还有戏台，俨然渐成了庙会。后来，“公私合营”，武王庙再变成小学校，直到“文革”破“四旧”墙倒屋塌。

眼下的武王庙断垣残壁，荒草摇曳，粉蝶飞舞，秋虫唧唧。曾经到这里体味过宁厂繁华兴隆的一代人，多已长眠在四围或路边的坡岗。陈仕海师傅指点给我看几个黑底白字的墓碑“嘿，他没了！他会唱川戏打板子！”，“这也是个熟人，一起跑过船，不然我还想去看他呐！”……

陈师傅 75 岁，现已搬到巫溪城。年轻时他常年在大宁河上跑船拉纤，对宁厂的兴亡更替他似乎看得很淡。结发夫人死于 1941 年 8 月 8 日日本人

那次大轰炸——死得很惨，肚子都炸烂了。 这是他唯一耿耿于怀的大事。80 年代，有日本人来巫溪，陈师傅的大儿子拦住日本人质问“为什么侵略中国？为什么炸死了我的母亲？为什么不赔偿？”

大宁河的风和浪，山和水陪伴着陈仕海走过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日复一日，拉着满装宁厂盐巴的小木船到巫山，再逆水拉着船返回宁厂。没有词儿的大宁河的号子他现在仍然可以唱得很响：

嗨喽嗨喽嗨喽，嗨—喽，嗨—喽，嗨—喽……

在宁厂镇街上走，闲来无所事事的老人许多都聚在一起玩麻将或纸牌打发时光。其中不少老人陈师傅并不相识“他们是从山上农村搬下来住！”陈师傅腻烦整日“搓麻”，他认为这很让人家看不起。过去宁厂人很有钱的时候就有“搓麻”打牌之好。外边人还专为宁厂编了一套顺口溜“大宁厂，崖对崖，男人女人好打牌。男人输了卖铺盖，女人输了仰起来。”

物是人非，仍在为自己和儿孙的温饱忧愁的陈仕海，只能将人生最值得回味的记忆定格在他青年时代拉纤跑船的日子。他拉纤时跑的是 3 丈长 4 尺宽的“鹅儿船”——有帆有浆。一趟一趟常年顺着大宁河往巫山跑。去时顺水支起帆来容易些，回来逆水就难了，通常要跑上 3 天，哪像现在上下水只要几个小时。

大宁河里的险滩很多，行船要分外小心。像大落滩，小落滩，银窝子都是不好过的鬼门关。陈师傅跑船多年无惊无险，至今仍感到幸运——毕竟幸运的人不多呀！

当年和他一起跑船的人一个都没了，在四道桥桥头北边的一间小房里，一个老伙计的老伴还健在，陈师傅与她拉家常，“拉”出来的却是当今每月 150 块生活费的穷日子——宁厂离“小康”还远着呢！

6

已过正午，我和陈师傅又走回镇东口的狮桥上。依着桥栏，向北仍可见紧贴大宁河右（西）岸的山壁向北方延伸的古栈道；向南望，沿后溪河南岸转向大宁河西岸，直至往南通向万山丛中的栈道同样清晰可辨。数千年来，以宁厂为起点东南西北连接川陕鄂的盐运栈道总长计有 4000 里！其中由宁厂东北经青龙坡，交湖北竹山县，再经长坡坝、麦池垭、象鼻岭接湖北房县界，再经九道梁、安坝、学堂坪、干沟子、高桥河接湖北兴山县，下南阳河、丰玉坪、大花坪直到兴山县城的盐栈道长达 705 里。民国年间

修订的《川陕鄂边防记》云：大宁盐道“东连房（县）竹（县），北接汉（中）兴（兴山县），崇山巨壑，鸟道旁通”，“山中路路相通，飞鸟不到，人可度越”。在记述山道峻险的同时还以不无赞叹的语气道“房、竹、兴、（秭）归，山内重岗迭巘，官盐运行不至。山民之肩挑背负，赴（宁）厂买盐者，冬春之间，日常数千”。

想想看吧，上可追溯至商周时期，以盐泉为轴心，蜿蜒于大宁河畔盘旋于万山丛中这条条曾充满生机的漫漫古道，如今已经荒草摇摇满目苍凉，谁人能不感慨万端？

“以前挑夫走栈道，最多要或挑或背两担，一般一担半，最少也要挑上 100 斤！”陈仕海道。

“走船运多方便，为什么要用人挑？”

“雇人挑的地方都是行船到不了的大山里！”陈师傅纠正了我所说的“用人”这个词，因为挑夫大都是盐商的雇佣。

“我看后溪河水不深，也难行船哪！”

“那时有相当于现在航道工的工人专门扒漕口。就是常年疏浚后溪河道，将河道挖的很深，枯水时也能保证每天两、三百只盐船来来往往！”

已过晌午，陈师傅热情不减，他又带我去看镇东北处山上的“和尚拜塔”和塔旁边山腰上的“令牌石”。

“这些地方都是以前来宁厂必到之处”，他说。

但现在，所有热闹的镇街都转变为沉寂。“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的宁厂，已是越来越让人陌生的地方。盐道不再，生存该如何重新开始，这是今天不仅宁厂，也是所有曾经依托“盐泉”生存的巫溪人必须面对的新的生存课题。

7

史载，历代官府设盐监。唐代天下有 10 大盐监，大宁厂为 10 大盐监之一。宋代，宁厂年产盐即达 400 余万斤。极盛时期为清康乾时代，号称“万灶炊烟”。 这“万灶炊烟”所指，人们以木炭为燃料，烧卤制盐，简称“烧垅法”。该法是宁厂延续年代最久的制盐方式。其又分为“土垅”和“塔垅”二法。土垅柴灶日产花盐 8 至 15 担；塔垅柴灶日产优质花盐 18 至 25 担。此法烧盐，数百盐灶青烟升腾，弥漫盐泉喷涌的山谷。道光年间，制盐曾由烧柴改为烧煤。但盐质受到影响，烧煤没有坚持下来。直到 1956

年，宁厂制盐才基本改为煤灶。真正产盐记录诞生在以煤灶烧盐之后的 1988 年：年产量为 1.56 万吨。

因过去制盐的薪柴来源皆为宁厂及巫溪四围山上的原始森林。数千年的砍伐，此地被林木覆盖的崇山峻岭渐变成座座秃山。到 1958 年，“大跃进”，巫溪组织 5 万人上山伐林“大炼钢铁”，巫溪包括宁厂山山剃了光头。迫不得已，“文革”前，最后仅存的一个柴灶熄火。但宁厂老人说，说到底还是用木炭烧出的盐好吃。盐厂至今还有职工存着这种炭烧盐。

盐泉哗哗日夜飞流直下，除了观光客，巫溪人已与之疏远。没有盐的日子，本来就没有工业可依恃的巫溪沦落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宁厂小镇更是苦不待言。年轻人可以远走高飞去豪华的大都市，老人怎么办？看到独守那些藏着寂寞的空巢的宁厂老人，看到那些篮子里装着 7、8 个鸡蛋的乡下妇女，那些或挑或背着地瓜、葡萄、核桃、或枣子到巫溪城叫卖的老人，你就会明白贫穷的含义——几元都市里随手就花掉的人民币，对这些贫苦百姓来说价值有多重！

连续两个清晨在巫溪县人民广场看到的同一幕，让我愤怒。我决心在第二个清晨挺身而出：一位女士揪住一位卖鸡蛋的女孩要罚款，理由是不许在广场周围摆摊做生意。女士的凶猛之态简直像要吃人。我劝她有话慢慢说，老百姓挣几个钱不易，何必一定要罚款。此女士了得，放开卖鸡蛋的妇女用手掌向我肩膀使劲一推“你是干什么的？”——“多管闲事！”又出现一位官太太似的人物添油加醋。“我是专管你们的！”我愤然回答。此女士和彼女士听我是外省人口音，可能怕有什么来头，一起骂骂咧咧地走了。卖鸡蛋的女孩眼里含着泪花依旧呆呆地站着，像是还在等待着那位凶猛的女士“处理”。“快走吧！”我提醒她。

在这个少有“爱”的地方，我的脑海里此时情不自愿地闪现出“可怜”和“可悲”两个词。

巫溪古名大宁河而外亦称灵水。此刻我所在的人民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以灵水为名的雕塑。这座过于抽象的雕像据说是盐水女神的化身。旧志载“山灵发祥以示人也”。可惜这灵气只给了少数人，雕像四周挑担卖菜的乡下人还没轮到享用这福分。岂止乡下人，贫困的巫溪县，工人的日子也过得艰难。

在宁厂采访后，宁厂盐厂 7 位退休的老工人和不顾年高体弱，乘车赶路到巫溪县城来找我，要求我替他们向上级反映退休工人不能按国家政策增加退休金和呼吁对盐厂法人在企业改制前进行审计的问题。

又是“企业改制”——我在三峡采访碰到的太多的问题。

巫溪县盐厂 100 多名职工写给重庆索特集团（将收购盐厂的私企）和巫溪县人民政府的公开信中，有如下几条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

“我们强烈要求重庆索特集团、巫溪县人民政府、巫溪县纪委在盐厂改制解体前对法人代表进行离任审计，不能叫盐厂法人代表胡建中欺上瞒下，要对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交代。

我们要求对胡建中在任期间的每年经济收入进行重点审计：查明 1.每年由重庆市盐务局补贴给盐厂的 218，000 元，都到哪里去了？2.每年我们这里都有不同的灾害发生，重庆索特集团和市、县救灾部门拨来的救灾款到哪里去了？3.中和电站（装机容量 450 千瓦）运行工由厂里发工资，现在工资拿不到。请问发电收入哪里去了？4.盐厂法人代表胡建中没当法人之前一无所有。现在他家里小孩上学读书，屋里各种家电齐全，还有了桑塔那轿车。养辆汽车要花 1.6 万元，胡的年工资不过 5000 元，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工人们的集体上书写得虽不够严谨，但基本表达出了他们要求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意愿。当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工人，老泪纵横地哭诉他们难得温饱的苦涩窘况时，不由得我也同工人一样，对盐厂即将面临的“企业改制”问题流露出深深的忧虑——这是在三峡 4 年采访中的第一次。

对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应当承认我是门外汉。但我毕竟看到了当前这种“企业改制”，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学者说形成此种局面，首先是因为“改制”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来实施。其次，由于相应的法律条款不健全，相当部分的素质低劣的企业领导与民营企业以“改制”为名相互勾结，以非法手段故意将企业亏损面做大，然后贱卖国营企业财产给民营企业。

“改制”倡导者的初衷是，如此，可以根本解决国营企业长期经营亏损问题。但事实正相反，“改制”的结果形成了一股将国有资产向私人腰包的“合法”转移黑潮。而企业主体——广大职工在“改制”过程中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权力没有，权益没有，失去了几乎所有。几百、几千元的工龄买断，就把他们统统赶回家。医保难，住房难，今后的生活更难。

2001 年秋天，我在巴东县采访巴东县国营装卸运输公司工会主席谭林魁。他一腔悲愤告诉我，他们这个有在职职工 200 多人，退休 131 人，遗属 98 人的企业，“改制”过程中 159 万元（国家评估）企业财产被以 100 万元的超低价出售给单位原副经理冯霞。工人用一年工龄 500.33 元的价钱

买断，全部打发回家。而属于库区搬迁移民的职工 91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每人发给住房补贴 2000 元。91 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只有 1000 元。巴东县移民局则是只给每户移民 200 元搬家费，移民补助一分都没有！这点儿钱，这点儿说不明白到底是企业还是国家发的“补贴”，简直如儿戏。因为在县城新址西壤坡的新房一套最便宜也要缴 3 万元！

装卸运输公司的职工，因为“改制”后买断工龄拿的钱太少，有不少人没有去拿这笔钱，怀疑冯霞与原企业领导之间有交易。坚持上告讨说法。“改制”后从原来国营企业副经理摇身一变成了私营企业经理的冯霞坐不住了，下达最后通牒：某年某月某日前再不来签字拿钱，就连一分钱也不给了！

哪里还有法？哪里还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

“改制”把“当家做主”的工人变成了阶下囚。说的本质一点，它最充分地体现了对职工生存权利的漠视。

53 岁的老工人刘兴魁“改制”后，身染重疾，没有钱医病，活活痛死无人过问——因为巴东县政府 1999 年下达 10 号文件，颁布县属企业“改制”统一标准，退休职工一律不准上医疗保险。

谭林魁最后说道：“我 15 岁参加工作，在装卸公司干了 38 年。当过副经理，当过船长，我对共产党是忠诚的，但是现在……”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和巴东人一样，巫溪盐厂的职工在时隔 5 年后，面临的是相同的生存窘境。在宁厂“七里半边街”上，退休老职工李安府诉完其艰难生活现状及对未来生活的重重忧虑后，忍不住关上屋门失声痛哭。我木然立在屋门外，听着屋里面传出来的刺人心肺的号啕，止不住鼻子阵阵发酸。

纵贯宁厂镇日夜低吟的后溪河，在我的面前缓缓流过，河上曾驶过的万千只商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消失了踪影；河岸镇街上曾响过的万千商贾的足音，也一起淹没在回视的时光中。以盐兴而兴，盐衰而衰的宁厂的结局，竟然是这飘荡在冷寂荒凉的古镇上的哭声。

第三部 移民泪

就中国历史而言，“移民”从来不是生僻的名词。当代学界对“移民”的界定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的移民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统治者运用官方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或者强制推行的，以及在社会的或自然的外力压迫下大规模爆发的迁移；另一类则是下层民众为了逃避天灾人祸、维持生存、追求温饱而自发进行的生存转移。

历史上，三峡曾是外迁移民的首选地。国人皆知的“湖广填四川”，即表明了其移民的规模。

其实，移民入三峡，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了。历经两汉三国至西晋朝，川西战乱频仍，引发成都平原居民再度东迁。于是有了“益州（今成都）流民十万户入荆州”之说。这一部移民中相当部分，滞留在了三峡。

唐宋时期，三峡水运交通由于过境贸易日渐繁忙。尤其到了宋代，北方之地尽失辽金。南宋小朝廷的国力多仰赖成都平原经济支撑。因之逐渐加快了对三峡的开发。现今三峡的经济地理格局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固定成形。

但三峡由于其为连接四川“天府之国”的重要通道，也就成

为历代兵家的战场——峡民从来在动荡中谋生存。南宋末年，蒙古军队两破四川，峡民再一次大逃亡。千里无鸡鸣，百里无人烟的三峡，直到元末至明朝开国之初局势初安，才有移民前来安居谋生。这就是史家所云的“湖广填四川”。

关于“湖广填四川”，历史上共有两次。

元末明初的移民大潮只是第一次：缘起于元末徐寿辉红巾军在湖北大起义后，湖北富庶之家纷纷入蜀避战祸。后有红巾军徐寿辉部将明玉珍攻据重庆，建立了明氏大夏政权，也曾率大批湖北军民进入川东；更大规模“填川”年代，是在数年后的明洪武初年，朱元璋一方面将入川控制四川政局的部分军队留在那里，另一方面由明中央强制性安排了大量的湖广移民入川，垦殖因战乱荒芜的土地。形成了首次“湖广填四川”的高潮。

三峡是移民必经之路，因之不少移民在这一地区落了户。据《巫山县志》，这一时期有明确迁入时间记载的仅明代就有 23 姓。

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肇始于清初，因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义军 5 次进出四川与官军开战，同时滥杀无辜百姓，再加上水、旱天灾及瘟疫，造成四川人口锐减：由 1587 年的 310 万减到 1865 年的仅存的 9 万余人——再现了元末明初人烟荒凉的景象。以至于“川东各属尤为空旷，草蓬蓬然而立，弥山蔽谷，往往亘数十里无人烟。”（民国《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九）。民国《宣汉县志》则记载明代移民，此时已经是“数万不存一”了。鉴于此，自清初顺治年间一直到乾隆当朝，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垦殖政策，吸引了大批湖广移民入川，形成了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大潮。

此次移民历时 100 多年，初始阶段，有时一天经三峡入川的“楚省饥民”多达千人。又因三峡仍是移民的主选地，相当数量的移民滞留在此。康熙年间，清政府还在三峡设“招徕馆”以“招募客民”。到嘉庆年间，三峡人口达 160 万，密度亦创记录：每平方公里 38.24 人，渐趋于饱和。后期移民不得不进入深山开垦种植，从而改变了过去移民仅滞留于沿江平坝、丘台和台地地区的布局。人口的迅速膨胀，以及传统的稻菽等农作物亩产过低，移民温饱成了问题。恰在此时，来自美洲的高产农作物红薯、玉米、土豆、辣椒被引进三峡。三峡地区由此掀起了一次种植革命。有文字记载此时三峡“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到清朝末年，三峡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已达 83.65 人。至于解放后，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什么人间奇迹都搞得出来，三峡人口更达到难以想象的每平方公里 244 人！据统计，人口的创记录增长，使三峡地区的垦殖指数最高已达 38%，人均耕地却仅有一亩。

虽说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潮，造就了一条峡江经济带：山有所产，水有漕运。

但地理环境所限，也形成了三峡地区经济上结构性的贫困——峡民不可能获得梦想中的富足。

今日三峡蓄水，为了生存，峡江两岸的峡民不得不沿着他们先人当年进峡的路线逆向而行——扶老携幼别离他们曾用几百年的血汗垦殖的热土——这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生存转移。

如果按有人所说，这是三峡人命运的轮回。那么，下一个轮回要等多久？这般轮回终点在何方？

第十三章 “一发”移民

1

我第一次接触三峡移民是在夔峡东出口外长江北岸的巫山大溪乡二龙村。这里已经没有了峡中壁立千仞的气势。两岸变成了柔和的缓坡。

二龙村就在江北边的缓坡地上，郁郁葱葱的柚树掩映着这个散落在山坡上的小小山村。2003 年 6 月 1 日，小山村将被淹没，此地水淹户大部统一安排迁至同属重庆管辖的梁平县。从小码头上岸，踩着黑泥湿滑的林间小径，直到汗水浸透衣衫，才到了村中。时间已是下午，村民为避暑热多数在家中休息。有人通知村民，说有北京来的记者了解移民安排情况。

我坐等在王姓农户的家门口。门前是一块条形平坝。平坝左端是一个生产挂面的家庭作坊。几棵高高的黄桷树遮住了西南方向射来的阳光，洒下一地清爽的绿荫。我以为要等多久，没想到，大家好像早有准备，呼啦啦一小会儿就将小小平坝坐满了。老实说，此前我意想中的移民问题，应当是有喜有忧，即便是“忧”，如此规模的迁移也是在所难免。但出乎意料，与移民对话一开场，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紧坐在我身边的丁训豪最先发言。

——“我响应政府号召，迁到梁平，生活不好过。在本村人均一亩地，到那里一人只剩五分地了。政府说每人给搬迁费二万八千元，现在到手里只有一万元。我 64 岁了，到梁平要种水田，生存也实在困难……”。丁训豪满脸愁容。

丁本是江苏东海县人。60 多年前为躲避日本轰炸，母亲怀抱着他，逃到万县；到万县再遭轰炸，转到奉节；到了奉节，仍遭轰炸。一家人无奈，第三次转移到巫山二龙村落户。丁是听着看着日本鬼子的轰炸开始人生的记忆，等到他长到年轻力壮，又因父亲是国民党兵而被受歧视。“改革开放”，年过花甲独身一人的丁，才过了几天安定一些的日子，又要搬迁到一个完

全陌生的环境中去种从没种过的水稻。如果说从前丁家人为躲避日本轰炸，三迁而至二龙村，尚且还具备一些与命运抗争的主动权，那么今天的迁移，他连这一点儿权力早已丧失殆尽——他和他们都成了一个大棋盘上由劣等棋手摆弄的棋子。

——“我也是外迁到梁平的。地点是屏锦镇兴河村。政府说到梁平每人一万一，先每人付三千，另八千到了梁平再付。我家四口人，到那里要起屋，这点钱盖不起房子。可现在，还差半个月就要走了，钱一分还没到手。我们移民到底拿多少钱，是本糊涂账！外迁地政府规定让我们先去移民点看一看，好就搬，不好就不搬！但乡里不让我们看，我们找曹乡长论理，他指着我们鼻子说‘你们这些移民太刁！’我们还问他，到梁平每人只分到四分地，打三、四百斤谷，还要交税，我们咋个吃法？曹就笑，根本不回答。”说这席话的是 47 岁的曹仁群，又气又急。

二龙村是个有 200 多农户的山村。三峡二期蓄水前，村里仅二队就有 15 户迁往梁平。迁到湖北沙市和公安县的有 16 户，还有若干户迁到安徽等地。迁到沙市已经走了，近况不得而知。但迁到梁平的移民，许多事关其生存的大事都没能得到妥善的安排。

——“梁平给我们分的房基地是个坡，坡的后面是臭水沟。要砌房，先垫高地基，房子盖不牢靠。一下猛雨，安全咋保证？我们要求先解决好迁入地房基地问题再搬迁，大溪乡不管，一定强迫我们先搬家。还说，你们不走，移民资格不能老保持。我们担心，取消移民资格，但搬到那儿，又没得法子砌屋，咋个办？乡政府说，他们是‘一发’移民，不走也得走！”

——“陈记者，‘一发移民’是什么意思？”许多人皆困惑无比地问我。

如此‘一发’，真正让我有了伤透心的感觉。很显然，所谓的“一发”其实就是“依法”。这么简单明了的一个常用词汇，就把这些老实质朴的山民，唬得六神无主。坐在县乡政府里的“他们”，明目张胆违法，却用“一发”吓人。那么，“他们”又是‘一发’了哪条法律，可以恣意严重伤害移民的权益？

走在峡江两岸，我深切感受到所谓“移民问题”，其实是“中国农民问题”的延伸。而“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命运由“别人”主宰——他们几乎丧失了所有能够捍卫维持自己生存的权利。

2

图 3.1 正在离乡的大昌移民

图 3.2 惜别

至今想起我在巫山城集仙街上遇到曹孝国的一幕，心中仍充满了愧疚。

正午的艳阳，高照在巫山顶上。灿烂的阳光如同见不到的火焰，烧满了整个巫山城。我走进集仙街，饥肠辘辘，想找家小铺吃顿两块五毛钱一碗的杂酱面(当地人就这么称呼)。小铺还未找到，看到了远处一个行色匆匆似曾相识的瘦小身影——他就是曹孝国。满头白发，身着浸透汗渍的白色土布褂，敞着怀，一瘸一拐地迎面走过来。当他也看到我时，停住了脚步，“陈记者”——先前在二龙村一面之交他记住了我的姓氏——“我去到移民局，要求给我落实移民政策。”他把手伸进怀里，掏出用一块手帕包裹着的上诉材料。我没有让他把手帕打开，一街炙热的阳光，连个阴凉的地方都难找。况且手帕里那些他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上诉材料，内容我已知道大概。

曹孝国就是大溪乡二龙村人。别看他银发满头，像个 60 多岁的老汉，其实他才 51 岁。那天在二龙村座谈，他拄着一根长棍从山上赶来，就坐在靠近我的门坎前。一样的粗布白褂，一样敞着怀，将一纸起诉状递到我手里：

起诉状

起诉人：曹孝国 51 岁 大溪乡二龙村二社人

被告：大溪乡政府

案由：对移民安置不公，执法非法乃不法法也。

请求：1.请求按移民政策对本人问题作出秉公判断；

2.对我承包土地付予合理经济赔偿；

3.被告给我办理漏统“单淹”户籍申请；

4.被告单位付全部诉讼费。

事实：本人祖辈皆以耕种为生。自解放以来，土改分划了应得的土地。1981 年间，又按人口承包了六口人共六亩多土地，一直以该土地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后由于我的房屋住宅“屋场”大，各事身感厌倦复杂下，于 79 年间将原房卖与他人，自己向偏上方修建了一新宅居住，耕种的田地也根据住宅的方便与他人调换到了本房屋的周围。但我原来的田和所调换的田全属生产队 1748 亩水淹地之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的房屋和土地更动，并没有任何违反政策，也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不想大溪乡政府不顾事实，硬说我房屋和土地不属淹没范围，

因此剥夺了我的移民权利。试问，三峡二期蓄水后，我这个淹掉房和土地的一家人该怎么生活？

……

应该说，这是一份并不规范的诉状，虽然，曹孝国读过中学，是二龙村里的文化人，但“文化”从来斗不过“政治”，更何况他又是一个无钱也无权的末等蚁民。

曹孝国家境并不好，他与残疾的儿子一家相依为命。这次移民，乡里来做“单淹户”统计时，不知何故，将其家漏记。于是户口没了，承包的山地赔偿也没了。他所要求的其实很简单，一是承认他是外迁户，二是补偿其承包山地因水淹而蒙受的损失。而且这个问题的产生——说的好听点儿，完全是由于乡、镇干部的工作失误造成的。如果再往“阴险”处想一想，明明一家大活人，祖祖辈辈劳作在村，镇里干部将其漏统还算情有可原，村干部对此视而不见，就不可能让人想得明白。

曹孝国开始上访了，先访乡里，无效；再访镇政府，无效；只能拖着一只残疾的腿，再去巫山，结果一样为零。凭着残疾之身上山，下山，乘船，乘车，一趟又一趟。他的上访之路比别人要艰辛十倍百倍！

在巫山的大街上，曹孝国一定要我收下一套完整的复印件诉状，让我带到北京替他想想办法，“陈记者，你帮了我，我死了变成鬼，也要报答你！”他哭了，两行热泪顺着枯瘦的脸颊滚滚而下。我惊诧，他何以讲出“我死了”这样的话。他哽咽着告我实情“我得了肝癌，活不了几天了，我是为我的残疾娃子今后的生活才拼命地跑来跑去的呀！现在看是没得希望了！”他不能忍受肝区的剧痛，蹲在街道边的一家小店前，泪水汗水，不停地淌，不停地淌！

两个多月之后，曹孝国抵不住癌魔的侵噬，死在了他家那个四壁空空的破屋里。

他死了，他能闭上那双心事万重的眼睛吗？

3

巫山新城建在行将淹没的老城上面。不破不立，比起老城，新城要漂亮得多了。

新城最具气势的建筑当然是政府大厦，新城最好的住宅当然归属政府

公职人士——“吃苦在先，享受在后”那是说说而已，“为人民服务”更是无稽之谈。“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才是真理。曹孝国曾多次走在这条街上苦苦地寻求救援，但这条街没有任何一个门对他敞开。

2001 年 9 月 11 日，曹孝国辞世前数日，巫山县的新县府大门终于大开，一个相当级别的“考察团”光临巫山。巫山县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对这个“考察团”的活动，做了周到细密的安排。至于如何“考察”，请看印在精致小册子上的如下日程表：

9 月 11 日（星期二）

11：30 县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在新城行政大楼集中，乘车前往十码头迎接

12：00 新华社领导一行抵县住鸿都酒店

12：30 午餐

15：00 考察新县城及章家湾小区

16：00 考察七星移民新村和生态农业

18：00 返回鸿都酒店，晚餐

20：30 在鸿都酒店观看小三峡艺术团表演

9 月 12 日(星期三)

7：00　早餐

7：30　乘车前往龙门码头，乘游船考察小三峡

11：10 马渡河小憩，野餐

12：00 进小小三峡漂流

18：00 返回龙门码头及鸿都酒店

18：30 晚餐

9 月 13 日（星期四）

7：00 早餐

8：00 乘车前往十码头

8：40 乘快艇离巫前往宜昌

“考察团”团长是位新华社的副社长、常务副总编，大名何平是也。团员尚有 6 位。外加警卫 2 人。

“陪同考察团”规模就更大了，不大不足以表明巫山县领导的“高度重视”。计有开道车一辆；团员 15 名：其中列在名单第二位的就是曹孝国

跨越千山万水也未得一睹芳颜的移民局局长——刘道生先生。

当浩浩荡荡的“考察团”和“陪同考察团”在高级宾馆的灯红酒绿间喝得酒足饭饱的时候，当响着警笛的开道车引导这两团浩浩荡荡的车队驶行在巫山新城神女大道的时候，当车队又变成浩浩荡荡的船队纵情于山青水绿的小三峡和小小三峡的时候，何其威也，何其壮也！

整体的“浩浩荡荡”，各怀其想：得意的，得志的，拍马的，被拍的，“考察”风景还不够工夫，哪来闲情管你移民的屌事！

巫山对外向来哭穷。一句重复不断的套话是“巫山县是一个山区贫困县，财政穷县，移民大县”。可他们安排“上级考察团”衣食住行，分明像个阔少，哪里有丁点儿穷的影子。从巫山县府的角度考虑，这也许出于无奈。但你县里穷，县里的移民就更穷，总不能对像曹孝国这样一肚子苦水的移民上访无动于衷吧，把哪怕些微爱心献给移民总是你们可以做到的吧——能做到的事情也不做——请问人民政府，人民在哪里？

4

2002 年 7 月 2 日，新华社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移民法规今起实施

由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颁布的《重庆市实施[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办法》于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有关移民的地方性法规，它将使百万三峡移民这个“世界级难题”有法可依。

正在建设的长江三峡工程是世界水利史上移民最多的水利枢纽工程，最终动迁移民量将达 100 多万。为了将移民搬迁纳入法制轨道，保证移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务院于去年颁布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对地方政府和移民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全面概括。重庆市担负着八成以上的三峡工程建设库区移民任务。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从今年初就开始了实施办法的起草工作。

《重庆市实施[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办法》对移民安置办法、淹没区和安置区管理、移民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移民扶持措施等进行了详细的法律描述。

我们不必对该部有损移民权益的移民法做过多的评论。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此法是在大规模的移民已经进行和实施了 4 年之后出台。作为三峡库区移民主体的重庆市，对此前，移民实施没有移民法参照的大搬迁——这难道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所为吗？

5

二龙村口，有一棵枝干粗壮的大榕树，树围足有 3、4 米。当头的阳光猛烈地照射，大树下仍是一片浓荫。一群鸡鸭绕着树荫忙着啄食。江风从坡下吹来，树下总有徐徐风凉。据说这棵榕树已经在此挺立了 300 多年。丁训豪说，当年他家沿江逃难，母亲抱着他，就是看到这棵大树才在此落脚；曹孝国说，他家几辈子传下来，逢年过节都到这里给老树挂红布条。其实挂红布条不仅是曹孝国一家，也是整个二龙村的习俗。你抬头仰望就会发现，新的旧的红布条或红线绳几乎缠满了伸手可及的枝叶。村民告诉我，他们往这棵大树上挂红布条，是把它当做神来祭。为的是让它保佑大家心想事成，日日平安。春节时祭祀最隆重，有的人家还在树下摆上猪头或各式小吃当祭品。但这种祭祀的风俗，不可能为受难的村民带来福祉。

事实是，在中国，农民从来是权力宰割下的弱势群体。至今占国民人口总数 2/3 的农民，拥有的财富与 1/3 城市人口的比例却是 4：96，如此状态下，一贫如洗的农民拿着少得可怜的“移民搬迁费”背井离乡，他们出头之日究竟在哪里？树神，尽管寄托着无奈的农民对未来的向往，但它永远仅仅是棵树而已。“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眼下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只能是乡镇市县那些“领导”。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比过去“恶霸地主”更加“恶霸”，农民未来的日子就很难说了。

江风过耳，仿佛有一阵对唱的歌声吹来：一方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另一方唱“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第十四章 5650

1

大昌是整个三峡库区移民最多的乡镇。全镇人口总数为 3.4 万，动态移民总数计划 1.7 万。2001 年 11 月 11 日，我与大昌镇书记刘敬安摆谈的时候，他说："今年年初上级给大昌下达的二期外迁移民任务是 5000 人，我们实际移民5650人，超额完成650人，截止目前，大昌已安置移民1万人。"

刘敬安很善谈。那年还不足 36 岁，高高的个子，给人的第一印象，精明又强干。调任大昌前，曾是巫山罗坪区党委书记。再之前，1992 年至 1995 年上半年，曾在大昌镇当过三年半副书记。2001 年初，大昌移民最较劲之时，巫山县的领导想到了刘敬安，让他重回人熟，地熟的大昌。

刘书记的到来，以其魄力，其能力，果真将移民工作迅速推动。他有一句在负责移民的干部中广为流传的名言："世界上最好的减肥药就是移民！"

移民的过程确实很难，但这艰难后面说不清楚的东西太多。

宁河、河口、兴胜、青云、兴龙都是散落在大宁河两岸的村庄。这些年随着小三峡旅游热的兴起，驾船揽客的村民生活刚刚有了转机。尽管如此，大多移民还能"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定外迁。眼下外迁"梗阻"，真实的原因在于，移民眼见许多与政府签了协议办了公证外迁承诺，迟迟得不到落实。还有的移民去外迁地"考察"发现，他们的新居竟然建在分洪区！

发动移民报名工作进行了两个多月，任凭 5、6 个镇干部磨破了嘴，反复召开村社和党员干部会，没有一个人报名。僵局时刻，新上任的大昌镇书记刘敬安来了。他首先把工作重点瞄准了几个重点移民村的支部书记。刘敬安"以党组织名义"的谈话，谈出了"深度"。村民一致反映迁入地安徽安庆市宿松县耕地少，水质差，最让人想不通的是移民新居竟然建在分洪区！马副县长听到了最不想听到的话，指着移民鼻子道："你们说话要有

证据!”“县长，我出钱你去看，我要是说假话刀砍火烧由你!”移民王远大气得和马县长对吼。

对坐在大昌城外石滚槽山包两块平展的石头上，亲自参与了宁河村移民工作的大昌镇的一位党委委员，追叙此段往事，仍不乏得意之情：“我们‘政策攻心’，选准突破口!”他把目光投向远方，回忆随之变得深沉。

我们的周围是葱翠的竹林，山风吹来沙沙做响，像是给委员回忆的伴奏。于是乎一整套的“搬与不搬对比”，“既要攻心，又要让他们理解服气”，“抓两头带中间”……等等一系列八股似的套话，都由山风灌进了我的耳朵。

我有过“文革”被“清理”的经历，镇党委委员的“政策攻心”之类的语言，让我怎么听怎么像是在进行“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而不像是在善待要承受巨大牺牲而迁移万里的移民!

委员与我的谈话很长很长，直到暮色苍茫，我们才走下山。幸亏这些年积累的与官府干部打交道的经验，我笃定他不会也不可能把移民最真实的动态和想法告诉我。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移民条例明文规定，三峡库区移民应采取就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政府安置与移民自找门路安置相结合的多种方式。

然而，当新书记刘敬安奉调来到大昌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多种的移民方式统改为由政府强行安置的唯一渠道。客观地说，如此明目张胆篡改国家移民政策，责任在巫山县或者更上面，刘敬安不过是一个受到指示的大胆无畏的执行者。

如果我不做如下记述，你就不可能想得出，这些负责移民的基层干部，会以何种非常办法“调动”移民远走他乡。

2001 年 6 月，离上级规定的 8 月移民撤离日期渐近，大昌移民工作仍然陷入僵局。按期完成大昌移民数额，镇党委书记刘敬安已向上级做了保证。但实际情况是，即使二期水淹线下的移民完全走光，也凑不起上级要求的“5000 人”。况且还有部分该移而不移者。

根据官场下级一贯对上级负责的原则，刘敬安必须要“自谋出路”，火速决断——于是，他从政生涯的这一时期，把移民个体量化为抽象的数字

——就像回到 1957 年“反右”运动，上级指令下级某某单位，无论如何必须按一定的百分比抓出几个右派一样——至于人家到底是不是，错抓之后给其家庭造成的后果均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蚁民生死向来轻如毛！

此举实在过于严酷，县里也支持，这也是为应付更高层领导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副县长马林荣率“移民工作队”进驻大昌。队员有县组织部等相关单位负责人。此行前来，已经“内定”了河口村、青云村的一些农户作为“强制执行外迁”的对象——杀一儆百。

河口村七社、八社和宁河村的九社和十社村民，据规划部分应为大昌新城占地移民或三期水位移民。但镇上将宁河村的移民进行了迁往大昌新城的安置后，为尽可能增加外迁移民总数，突然变脸，强行将河口村七、八两社三期水位移民并入二期外迁。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的河口村村民当然强烈反对。

我在大昌采访时，河口村的王仁福曾在一个天还没有大亮的清晨找过我——斯时是王已被“强制移民”四个月之后。他家没有走，一直在和政府“对抗”。一脸疲惫的王仁福额头上沁满汗珠，解放鞋上沾满了泥水——外面正下着小雨。

——“陈记者，我的冤屈你要帮我解决，我家老小没得活路啦！”他从怀里掏出装在塑料袋里一沓材料递给我。

王的到来我感到突然。他是谁，何以找到我，他有何等冤情，我一无所知。

——“能不能留给我先看一看？”我接过带着身体余温的塑料袋子回答他。

王仍坐在小屋的板凳上，不肯离开。也不管我听不听得进，他还是憋不住把心里话滔滔不绝讲出来。

住在河口村的王仁福房屋和土地都在海拔 143.2 米二期水淹线之上，属三期水位移民。况且他还可以自己另找门路谋生。王不服从镇政府突然让他家随二期移民外迁的决定，认为政府不按国家政策行事。任凭镇干部五次三番做工作，王就是拒签外迁“按国家政策该我们走时我们就走，用不着你们劝。不该我们走，谁来也没得用！”

三峡的民风的确刚烈。王仁福与我的谈话时间不长，他的语调，他的神态，他的目光，即让我感觉到他是条硬汉！

4 个月前，副县长马林荣统率的“移民工作队”坐镇大昌老城西北角的

镇政府。这地方以前曾是座城隍庙。城隍是传说中护佑百姓和城池的神，但现在庙里的群神则一改司职，专以“移动”百姓为己任了。

三期水位移民王仁福、王仁堂因不从镇政府之令，拒绝随二期水位移民“提前”转移，故被视为“工作队”的“工作”目标。

“工作队”搬来王仁福的在县中医院上班的胞弟王仁保，王仁堂的叔伯兄弟、县水管站负责人王仁春共同“动员”分别劝说王仁福和王仁堂外迁。县里祭出王仁保和王仁春可不是走过场，如果二位在规定时间内完不成“任务”，就要被砸掉饭碗。县里指望“株连”方式收到奇效。

水管站负责人王仁春做王仁堂的“工作”，兄弟俩谈崩了；中医院的王仁保做王仁福的“工作”，更是碰了一鼻子灰，连个人影都没见。听说全家躲到山里。

俩人两手空空回到驻扎在镇府的 “移民工作队”。一直等候消息的马县长见二位无功而返，勃然大怒。

由组织部的干部当场填表，宣布县水管站负责人王仁春就地免职下岗；由县卫生局长宣布王仁保立即下岗回家。

这还不算完，“工作队”动用公安，日夜在王仁福家守候，抓到了王仁福家的大儿子，带到镇政府。不容分说，强行要其在镇上做主填写的移民公证书上签字。儿子知道，房屋、土地补偿都没有谈，迁入地如何安置都不明不白，如果他要签了公证，就把一家人毁了。他硬顶着不在公证书上签字，镇上又气又急关押他数日不放。王仁福妻子陈顺堂挂念儿子，赶了十几里山路到镇政府要人。镇政府置若罔闻，陈顺堂急火攻心，找来一瓶剧毒农药一口灌进肚里。旁观者急忙拦阻，已经不及。惊呼声中众人赶忙把人事不醒的陈顺堂送往医院。

上苍有眼，让陈顺堂活过来了。她用几乎一条命的拼争，换得了儿子的释放。但也仅此而已，镇府并不会因此心慈手软——三期水位移民的外迁仍要继续。镇上的“移民干部”穷追不舍，堵上门来一户户强制执行。王仁福一家决心已定，要与镇府对抗到底。他们和另几户人家集体逃进深山密林，热天，雨季，飞蚊，塑料棚支不牢，饭也难做熟，那日子很难熬。

王仁福自认为门上了锁，人不在家，“工作队”拿他不会有办法。但他想错了，人家以 30 块钱一天的价钱雇佣了若干民工，不仅砸开了屋门，将屋内东西又砸又抢洗劫一空，床卸了，箱子撬了，还上房揭瓦，将整个房顶拆得抬头只见一片天！

——“过去国民党也没抄过家，现在可不得了，只有他们的权力，没

有我们的权力！要是再逼狠了，我的女人还是要死！记者同志，我们不是不听政府的话，问题是不该我们迁为什么一定逼着我们迁？我们老俩口辛苦一辈子盖的屋，让他们不到一天就搞光了！”王仁福悲诉自己无家可归的现状。

他让我去他家看一看，以此证明他说的是实话。我应当相信他讲的是事实，但隐隐又觉得，“工作队”雇人拆房抄家似乎还是有些不可思议——执法违法干得未免太出格了吧！但后来接触到青云村陈宗轩被非法强制外迁的冤诉时，我不得不信了——岂止是“违法”，简直是无法无天！

当年 46 岁的陈宗轩体弱多病，早已经很少下地干活。膝下一子是个先天性痴呆。生活全靠妻子肖明英经营一个小卖部维持。他家土地和房屋皆在 175 米三期水淹线之上，根据国务院的三峡库区移民条例，陈家不属外迁对象。但 2001 年上面要求大昌镇二期水位外迁移民 5000。县里和镇里压力巨大，因为明摆着根据先前划定二期水位移民根本没有这么多。

“移民工作队”派下以大昌镇武装部长马正伦为首的工作小组进驻青云村。“小组”实行“包村制”。事先配好移民定额，完不成定额受罚，超额重奖。他们锁定了陈宗轩一家。多次往陈家动员说服。陈宗轩知道“小组”要拿他家凑数，任凭他们怎么说，不为所动。

2001 年 3 月 31 日凌晨两点，陈家的小卖部突然响起急促打门声。还没等屋里人应答，屋门已被砸开，几十个人蜂拥而入。为首者即大昌镇党委书记刘敬安，他们个个一副凶相。其中几位彪汉将陈妻肖明英从被窝里生拽出来。肖明英不明其由，挣扎不肯走，一群人推着拖着把她往镇政府送。肖明英就穿了一条短裤推搡中短裤又脱落了，没人理会这些，肖被精赤条条押到了镇政府。

陈宗轩不干了，他追到镇府大门去说理。一天、两天、三天……陈的亲友也帮忙来讨说法。镇府大门紧闭，他们又去找镇移民办公室，仍是无可奉告。直到第五天，陈宗轩的妻子被放出来。街上风传各式各样的说法，镇府不出面澄清。陈宗轩感到自己的一家受到了羞辱。他要向镇里讨个说法“我的老婆是嫖娼卖淫，还是犯了什么其它王法，半夜三更一个妇女没衣没裤就被抓走，我们往后还怎么见人？”

陈家是个远近都知道的老实人家。因为老实，才遭此厄运。鲁迅先生说过“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但鲁先生说的也许还不够全面，在坏人或有权势的人的眼里，拿忠厚老实之人出出气，凑个数之类或可派上用场。我决不是赞同老实人可以由人宰割，而是看着老实人受到冤屈无处求助深感揪

心。

3

三下大昌采访，看到和平街侧一条小巷字里的“移民专刊”第三期的黑板报愣是一年没变样。耳闻目睹了移民过程的种种怪状，回头再品味黑板报上“致移民的公开信”和“我县农村移民出县安置的原则”两部分文字，让我感到的是不负责任和滑稽。

“公开信”中写道：

……会做事的看长远，不会做事的看眼前。早日选择多机遇，早日搬迁早发展，等待观望误时机。选择外迁，好处甚多。带着我们的优点到迁入地，学习和吸收迁入地的先进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益于自己发展，为造福后代选择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搬迁是决（绝）对的。如现在不搬，机遇和选择面就更小。待已安排的 11 个省市安置地完成任务后，再迁地方不一定有广东、安徽的气候条件和生存条件好。就地后靠，容量有限，种地土质差。经商市场小。内安不享受外迁补偿政策。新集镇（指搬迁后的大昌新城）建设时间长，将直接影响移民自身发展……

我们郑重承诺，严格落实国家政策，严格按照移民外迁办事程序。到时如数组织移民到迁入地作好对接工作，与迁入地按政策协商好安置条件，并作好相关服务工作，

……

祝家家户户：善抓机遇谋发展，兴旺发达早奔康！

大昌镇人民政府

二 000 年十一月

再看“我县农村移民出县安置的原则”：

1. 出县外迁安置，坚持按移民安置规划和政府统一安排相结合的原则。

2. 坚持外迁移民生产安置以土为本，以农为本，以大农业安置为

主的原则。

3. 坚持手续齐全、准确、稳妥，依法外迁的原则。

4. 坚持整户外迁的原则。

5. 坚持外迁后不允许返迁的原则。

4

从大昌城走上 40 多分钟，就爬上了河口村八社王仁福家住的高坡。浩浩清风从山下的大宁河吹过来，令人倦意顿消。望着波光粼粼的大宁河，老王告诉我，河里有国家保护动物娃娃鱼。然后意味深长道："鱼都有人保护，我们这些大活人又有谁来保护？人的命难道还不如一条鱼？"他接着遥指七社告诉我，镇政府强迫搬迁，七社陈祖满的母亲刘长英自杀死了，一家人好惨。

我没有继续问他陈祖满家的现况，不是不想知道，是因为怕。大昌镇的青山绿水后面掩藏的那么多的丑恶，真让人匪夷所思，痛心疾首。

喘着大气往山上又爬了几十米，一片断壁残墙兀现在眼前。那景状比我想象的还不如。整个曾经完好的家，屋顶现被一大块塑料蒙着，屋内一地砖头碎瓦。老王的儿子那间结婚的洞房，婚床散了架，两条板凳歪斜地倒在床前。窗户框子没了，变成了不规则的大洞，成了名副其实的"洞房"。门口两边对联一侧已被撕掉，另一侧"男女并肩建家园"勉强尚可认出。屋外长满了荒草，周围见不到几个人影儿。老王一家和其他应当三期水位外迁的农户知道镇政府的厉害，不禁一吓，都躲到山沟里去了。

王仁福说话声音大，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有人评价他，对朋友恨不得能把心掏出来。与他打交道痛快之极，很快就可以把彼此之间心的距离拉得很近。他引领着我在河口村转来转去，一堆断墙又一堆断墙，一户空房又一户空房，每堆断墙和空房后面都掩藏着一个伤心的故事：带着手铐被拉到镇府做"公证"的王存远；半夜三更被缉拿"公证"的王仁政一家三口；被毁房强行驱逐的王可权、王可军和王仁堂都是每个故事的主角。虽然那些故事已经过去，但留下的伤心的记忆却一直在延续。记忆是无声的语言，这伤心之语日久天长积淀在心就变成了沉重。

大昌人本应是极富生存智慧。在大昌，当地人曾给我讲了这样一个让我感动良久的传说。

说不清是什么朝代，总之是很久很久以前。大昌这一带有一个被人戏

称童赖子的人。此人天性好打抱不平，且机智过人。老百姓若有冤屈难伸，他都乐于帮忙。

离大昌城不远有一个孔家坪村。村里有一个后母心毒手狠。她对前娘留下的名叫来生的娃娃百般虐待。一个三伏天，来生从大昌城做脚夫回来。饥饿一天，指望回家能有口饭吃，哪想到刚进屋后母就叫他去挑水。来生说肚子太饿，吃口东西再去挑。后娘不允，上前对准来生就是一顿拳脚。饿着肚皮还挨打，来生气不过，回了后母一拳。赶上寸劲儿，刚巧打落了后母一颗门牙。这下可惹了大祸，后母把来生告到祠堂，族长听说此事，认为来生大逆不道，要把他活埋。来生吓坏了，他跑到童赖子那里，求他帮忙。童听罢来生讲述，对他说："今天我不得闲，你明天正午来找我再说吧！"第二天中午，来生准时到了童家。一进门，看见童赖子身穿一件破皮袄，头带皮帽子，坐在一盆炭火边。三伏天这副打扮，来生不解其意，惊得刚想喊，童赖子比划着让他住嘴莫叫。轻声唤来生到他面前，称有重要话对来生说。来生把头伸过去，童赖子吭哧一口把来生的一只耳朵咬掉半边。来生痛的大叫，童赖子忙把他的嘴堵住："快莫叫，族长审你时你就说后娘咬你耳朵，你痛不过用力甩头，半拉耳朵就掉了，顺势把后娘的门牙也碰掉了！"

过了一天，族长把全族的人招到一起，审问来生。来生照着童赖子的话重复了一遍。后娘气得目瞪口呆。她判断肯定是童赖子出的主意。就要求族长把童赖子告到县衙，把事情弄个明白。

县衙接了案子，升堂开审。童赖子和来生一道被带到堂上。惊堂木一拍，没见过世面的来生浑身就哆嗦起来。赶忙把童赖子穿皮袄，带皮帽，烤炭火，咬他耳朵，教他说什么的经过和盘托出。县官听罢大喜，即刻准备对童赖子动刑。哪知童赖子大笑着向县官道："县官大老爷，你听听这娃儿一派胡言。三伏天，我能穿皮袄？我能带皮帽？我能烤炭火？你今天要是判了我，人家肯定认为你是天下第一的糊涂官！"

县官听了童赖子的解释，觉得很在理。顾及自己的名声，这桩案子也就这样糊里糊涂没有了下文。没有了下文故事，一直持续到现在。

大昌的老人很多都知道童赖子。关于他的传说段子多的能编出一本书。有人还有鼻有眼告诉我童赖子大名童德华，是清朝人。遗憾的是，童赖子不在之后，大昌人再也没有出现像童赖子那般对邪恶进行智慧反抗的精灵。正不压邪，大昌人到底怎么了？

5

从巫山乘船去大昌，十有八、九都在大昌城外不远处的八角丘码头泊岸。下船走过六、七十个水泥石级，就到了直通大昌城的大路。如此方便群众的码头，建成才十几年。而承建人，即码头的主人卢成明不过是个普通的农民。

以前，或者说自古以来的八角丘以其优良的地理方位，即是一个天然的停靠点。但也仅是没有任何设施的“天然”而已。那时一下船要走上一段几十米湿滑的陡坡。晴天还好说，到了雨天，旅客肩挑手提，走这段陡坡可就难了。经常有人不慎落入水中。时光流转，到了 1987 年，靠开饭店搞建筑有了些积蓄的卢成明和妻子商量，要为乡亲建一个像样的码头。但妻子主张缓一缓——本来嘛，辛苦这么多年挣点儿不容易，歇口气也是应该。转年 9 月的一天，官阳区的一个老婆婆在八角丘上船，离船还老远，就从陡坡滑到河中。刚巧卢成明在场，他奋不顾身把老婆婆从水里救上岸。又搀扶老人到家中，给她更换了衣服。这天晚上，老卢又和妻子议论起修码头的事。两人这回一拍即和，决心等入冬枯水时节捐资把码头建成 。

我在大昌见到卢成明的时候，码头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有十多年。不知情的人会以为这十几年单靠这个码头卢成明就一定赚了大钱。哪成想谈起码头老卢却酸楚荡满心胸。

——“从下决心建码头起，我就没得靠码头赚钱的想法。码头建好以后，我也没向任何人收过哪怕一分钱。”

——“既是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建码头？”我问。

——“为什么，为乡亲们做件好事！这想法我从小就有了！”烈性子的老卢慷慨激昂。

如果不了解老卢的身世，旁人肯定难以理解他的作为。本来嘛，靠双手劳动挣点儿钱，每一分都浸透着血汗，容易吗？

老卢从小就是苦命。九岁时就成了孤儿——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吃的，先是父亲饿死了。没过多久，几天没吃到东西的母亲到施家河去看生病的姑姑，回来的路上倒在洋溪河的河滩上也死了。死时，她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红苕，宁可自己死掉也不吃——她想拿回家给一样饥饿的儿子。那天，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啊！细密的春雨，飘荡的山云，孤独一人扑在母亲身上痛哭的卢成明知道，对只有 9 岁的他来说，童年已经结束，为了生存，他的幼弱的肩膀必须扛起像成人一样的重担。

他替人家赶羊，挑粪，赤裸的双脚踩遍了大昌的山山水水。过年了，他蜷缩在小黑屋里哭啊哭，一直哭到天亮。14 岁那年，他和大人一起到山里凿洞。一声开山炮，把他从几十米高的崖顶上甩到山下，他竟然奇迹般没有死。16 岁，村支书看这孩子实在可怜，千方百计让他参了军。他笑了，记忆里头一回有了饱饭吃。当兵就是个好兵，年年“五好战士”。入伍第四个年头，他累伤了身体，被迫复员回家。老卢的命运像是有人早给他画好了圆圈，注定生死在大昌！

他回来了。生活刀风箭雨的磨砺，他逐渐成长为可以支撑门户的堂堂七尺男儿。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他挣了钱。有了钱就更加忘不掉小时候没钱的苦日子，更加忘不掉那个时候给了他温暖与温情的乡亲们：赶羊回家，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红苕已摆在桌子上；雨季来了，乡亲们主动为他的房修修补补……如今，他熬出了苦日子，不给乡亲们做点儿事，他心里就不痛快。

我与他坐在靠近八角丘码头不远的大宁河边山南海北聊了一天，彼此谁也不觉累。尤其谈到他收集的三峡奇石，老卢手舞足蹈，快乐得像个孩子——他有着与生俱来的质朴和天真。如果要我马上对他下一个评断——这么说吧——要是让他在大昌街上转一趟，他绝对是一个愿意向所有他碰到的有难处的人假以援手的好人。即便兜都掏空了，他也要把兜再翻上几回合期冀有什么新发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一个人，现在可是晦气缠身。他用尽大半积蓄为乡亲们建的客货两用码头，将要淹没在三峡二期水位以下。一系列为难事、伤心事一古脑儿从码头上冒出来。

按移民拆迁条例规定，凡是 1992 年 4 月 4 日之前的建房一律给予拆迁补偿。八角丘码头建于 1988 年，理所当然在补偿之列。但临到这时候，镇里、县里的主管部门负责人，眼睛像是同时出了病：虽然他们照例在八角丘上船下船，虽然他们一次次收到卢成明要求为其码头“验明正身”的申请，但任凭你千呼万唤，他们就是看不见。

眼睛看不见，嘴里可没闲着。让老卢伤透心的流言在大昌城里满街飞。今天说他的码头是临时停靠点，明天说他想借码头大捞一把，再就说他是到政府无事生非的移民中的刁民；一句话，老卢自掏腰包建的码头，不管你建在何时，不管多少人受益，政府该拆就拆，补偿吗？做梦，休想！……初始就是为乡亲们做件好事的再单纯不过的动机，被演义得如此复杂，老卢彻夜难眠。

图 3.3 被抄家的拒迁家庭

图 3.4 大昌移民到镇政府请愿

图 3.5 移民的声音：要钱 要政策 要公理

你说是“临时停靠点”，真正码头又该是什么样？大昌南门外“码头”规模设施皆无，凭什么就叫了“码头”；说是“借码头大捞一把”，从码头建成第一天起就没收过一分使用费，每年还要再搭进 2000 多元的维修费，“捞一把”又从何说起；谁想到码头会被水淹掉?说是“无事生非的刁民”，有了冤屈找政府难道找错了？不为老百姓做主的政府官员，是不是该回家卖白薯?

老卢找政府，他的要求其实一点不过分：收回当初他建码头的投资几万元即算完事.他体谅政府难处，要是以拆迁形式补偿他，起码要十几万——他不想那么做。他的思维很“传统”，“我是个共产党员，做了为民的好事还要‘回报’，算什么共产党员？但做了好事还受诬陷，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2001 年 2 月 22 日，卢成明怀着像进金銮宝殿般的虔诚，捧着一颗颤抖的心，双脚挪进了巫山县委书记王爱祖在巫山新城的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县纪委李书记也在场。

“你又来做什么？”书记一见草民就心烦。

“请王书记帮忙解决我的码头问题。”老卢诚惶诚恐，递上诉状。

“留下吧，我看看再说!”他乜斜着眼睛扫荡了一遍老卢道。

“王书记呀，我为见您一面，从大昌来回跑了十几趟，您是青天，给我的码头做个主吧!”卢成明从王爱祖的眼神里感觉出事情不妙，他扑嗵跪在了地上。

突如其来的场面王爱祖有些尴尬，碍于县纪委李书记在场，又怕老卢再搞出其它名堂，他放缓语气道“你先回去，我方才说看看再说，意思是等县里研究一下，然后再通知你，解决问题总要有个过程啊!”他见老卢还不动窝，“起来吧，我保证说话算数!”他又强调一遍。

卢成明将信将疑站起来，他被骗的次数太多，很难相信这次是真，但他还是给了王书记面子——况且事情弄僵往后就更难办了。中国老百姓惯性的思维：总是天生认定“胳膊拧不过大腿”， 殊不知凡此种种却是对邪恶的纵容。少有人敢去想，或是把胳膊练强壮去拧过大腿，或是抱定死拼之志拧不过大腿也要让大腿挂残挂伤!

6

日理万机的王爱祖果然说话算数，时间又过了整整半年。

2001 年 8 月 27 日，县委县府批示，由巫山县交通局航务所处理卢成明码头一事。老卢在大昌接旨急着赶着乘船再次来到气派十足的新城政府大楼。仍是诚惶诚恐走进了航务所所长办公室。

“梁所长在吗？”

“什么事？”

“我是大昌卢成明，来谈我的码头的事。”

“你的码头，哼，想得美!”

“不是我的码头，是谁的嘛!”谈话一开始就充满了敌意，卢成明没料到。他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谁承认你的码头了，县里哪个文件，何年何月何日说你卢成明有个码头？明明你那个是个临时停靠点嘛。你要是跟我谈码头，我这里免谈。”圆脸庞，带着眼镜一副斯文模样的梁成霸气十足。

“你说我是临时停靠点，那长委会（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报告中说的大昌有三个码头又是哪三个？又有哪个码头比我的码头设施更完善，规模更大？退一步讲，就依你们说我的码头是临时停靠点，你们要拆，依照移民条例付给我拆迁补偿也是应该的吧？”卢成明据理力争。

“吼什么吼？你出去吼！”老卢点到痛处，梁成另找碴子调转话题。

“和你讲道理，啥子吼你嘛！”

说时迟，那时快，老卢任何反应都来不及，所长梁成已经击出相当纯熟的组合老拳，将卢成明的脑袋打成青红相间的彩球“让你不懂礼貌，让你不懂礼貌！”梁成口里也没闲着。

颇富讽刺意味的是，梁所长出拳的时候，巫山县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刘学培就在现场。在现场又怎样？他的“文明”就是死抱住卢成明的腰，让梁成的每一记老拳稳准狠地对准卢成明发挥出最高的效率。

满怀希望一清早赶到县航务所的卢成明，捂着满脸的血污和创伤晕头转向地出了梁成的办公室。长大成人还未曾落过泪的他哭了，“想起这些，我心里要有多酸就有多酸啊！”老卢至今谈及此事，泪花仍涌满了眼眶。

他去找县委书记，找不到；去找县长，找不到。“你们共产党培养的干部打人了，到底管不管！”他最后找到县委办公室主任谭观银的办公室。谭观银问明情况，也很气愤，当即写了这样一张便笺：

新城二派（巫山新城第二派出所）：

卢成明反映被梁所长打人之事，请你们给 2 位做好工作，化解矛盾，防止事态扩大。如不听招呼，可依法依纪处理为谢！

谭观银

8 月 27 日

卢成明拿着谭主任的手喻到了巫山法医验伤门诊。两位法医出据如下验伤鉴定“右上眼睑紫肿 3X3CM，左耳前肿胀 2X2CM，左颞部肿胀 3X3CM。”结论“轻微伤”。

“轻微伤”意味着梁成已构成犯罪，意味着他将面对至少 15 天的刑事拘留或是三个月的拘役。梁成航务所所长的职位七品不如，但有小权有小势，油水总可以沾得。如果为这点“轻微伤”自毁前程，实属不划算。到了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时候，梁成也能猥琐地站在卢成明面前，请求宽容。卢成明呢，认定了官府的人得罪不起，欣然允诺。

老卢独自，梁所长由朋友相陪，相约来到巫山县公安局巫峡镇第二派出所接受“调解”。卢成明口述经过，梁成似乎默认一言不发。“调解”进行得很顺利。梁成的朋友一个劲儿说好话，软话代替梁成认了错，赔偿了老卢 800 元医疗费。拿着盖上巫山县公安局巫峡镇第二派出所大红印章的

“治安调解书”，老卢回到大昌。

回到大昌不识字的老卢才知道，“调解书”真正写了些什么。

在“简要案情”一栏中，派出所的调节人这样写道：

> 2001 年 8 月 27 日上午，10 时左右，卢成明到新城行政大楼碰见梁成，以解决水码头未成为由辱骂梁成，并与对（少一‘方’字，笔者注）发生抓打，造成卢成明轻微伤害。

所有的事实在这里完全颠倒：梁成通知他来县航务所变成了在新城行政大楼偶遇；挨了老拳的卢成明罪有应得，他先辱骂了梁成；卢成明挨了打，但他也抓打了梁成，只是梁成没受伤而已。

更有甚者，在“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一栏，还写道：

> 卢成明承担 20%的责任（赔偿）200 元。

“还有老百姓说理的地方吗？在派出所他们给我说了的，梁成打我没有道理，他负全部责任。没想到写到调解书上的是我先骂了他。他打了我，我还要承担 20%责任。我是共产党员，不要说在政府机关，就是在大昌街上谁听说过我卢成明骂过人？颠倒黑白，印把子在他们手里，老百姓没得法！”卢成明话语中充满酸楚。

他放过了梁成，等于放过了吃他的老虎。从此，任老卢大昌—巫山跑断腿，水码头之事再也无人过问。

老卢啊老卢，怪谁呢，怨谁呢，你要是识字，你要是懂法，结局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当我明确向卢成明表达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回答说，他的不识字，他的不懂法又该去怪谁怨谁？而且，就是识字懂法也没得大用，巫山、大昌官官相卫，“依法”整治老百姓，他们招法多得很。

2002 年 9 月 20 日，在未对卢成明的码头和房产进行核实和确认的前提下，强行用推土机拆除。并将卢成明强制搬家。家在何处？东西放在哪儿？大昌镇镇长王祖乾站在镇政府的院子中央，用手机接听组织这次拆迁的镇武装部长马正伦打来的电话时咬牙切齿道：“把卢成明的家当搬到 175 米以上烧光算了！”

卢成明现住在河口村的一个废弃的水泥厂仓库。他不知道二期蓄水后日子该怎样过。

大昌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卢成明依法销号的决定的专发文件中写道："为了全面完成我镇农村移民安置工作任务，确保二期清库决战决胜，县、镇、村干部曾数十次深入兴胜村三社二线移民卢成明家作思想动员工作，但卢成明同志仍拒绝安置。现根据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重庆市实施《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现决定对该户二人依法实施强制销号。"

强制"销号"即意味着移民手续的完结。大昌镇人民政府说,他们做事手下留情,还有资金10349.84元落在卢成明的名下存入工商行大昌营业所。我请卢成明前去核查这笔存款，营业所回答他曰，压根儿就没见过有这笔钱入账。

7

"大宁大昌,不思家乡",自古良田万顷的大昌就是惹人留恋的好地方。但强劲的移民风吹到此地,纵有回天之力,万多大昌人也不得不泣别故土。2001 年，5650 名二期水位大昌移民就这样，宛若片片白云，飘向遥遥他乡。

超额650人完成了上级限定的5000人的移民任务。巫山县、镇、乡的各级政府有了弹冠相庆的工夫。

"巫山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二期移民工作情况汇报"和"巫山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县二期水位农村移民工作进展情况的调查报告"相继出台。

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情况汇报"，是给包括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在内的"上级"看的，字斟句酌，大模大样。但在我通读"汇报"之后，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原是满纸"客里空"。什么年代了？但凡这类下对上的"汇报"，必是充斥不知多少离题万里的垃圾文字。

诸如"按照《长江三峡二期移民工程验收大纲》和重庆市委、市政府'三个时限'的要求，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实现了'三个第一、四个全面、五个百分百'的目标……坚持依德依法移民，发扬'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的精神，努力帮助移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你去琢磨吧，宏观概括，工作成绩，小有问题，批评指正前后四步曲，并且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部分暗藏杀机或退路，是已经延续许久的上级和

下级非常认可的传统文风。巫山县的这个关于移民的“情况汇报”，亦不例外。它在“二期移民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部分，共摆出问题 5 个：

第一，农村移民生产安置人口的问题；第二，农村移民房屋漏登错统问题；第三，八年试点和一期水位期间开发土地占用生产安置费问题；第四，居民点建设占用基础设施费的问题；第五，库周交通建设问题……

总共五个题目，局外人乍一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移民生产安置人口的问题”，把群众冷暖放在首位——巫山县领导真可谓心系百姓造福一方的好官。可将此五个问题一一细细过目，嚯，原是狮子大开口，伸手向上级要大钱！

什么“全县生产安置人口突破了规划控制指标”，什么“ 居民点建设尚差资金 1110.5 万元”，什么“农村移民安置实施计划资金缺口 1740.11 万元”……至于移民，无论外迁还是后靠或内迁者，他们拿不到的拆迁补偿费，他们办不成的户口落地，他们在迁住地受到的欺侮，他们迟迟不能落实的住房……在“汇报”里则变成了一曲绕梁三日不绝的优美的颂歌“搬迁安置百分之百，自查验收合格百分之百，地质灾害治理百分之百，安全入住百分之百”。

对于巫山来说，钱，是永远不够用的。历任巫山县领导，一直以“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津津乐道。以前懵懂之时，靠天吃饭，巫山贫困情有可原。但后来的小三峡、小小三峡的开发，包括近年兴起的“告别三峡游”，百万游客，一年到头大把大把往巫山送钱，巫山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旅游开发挣的钱哪儿去了？谁能想的明白？

关于“移民”，倒是巫山县人大常委会“犹抱琵琶半遮面”——极为保留，注意，是极为保留地说出了一些实在话。

县人大在“我县二期水位农村移民工作进展情况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当前农村移民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概括地点明“现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在外迁，今后真正的矛盾焦点将在内安”。“报告”罗列的主要问题摘录如下：

……

一、关于内安问题

1. 实行就地后靠“人地挂钩”安置的部分移民，安稳难，致富更难

……农村移民安得比较稳的，首先是自谋职业安置，其次是投亲

靠友，再就是兼业安置。以大溪乡为例，该乡通过这三种方式安置的移民比例不足内安总数的40%，还有60%以上的内安移民是以挂靠土地和一次性领取货币方式进行安置的。通过“挂靠土地”方式安置的移民基本占了内安总数的50%左右。其它乡镇情况基本类似。

挂靠土地的移民，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就只有土地，而各地安置移民的土地状况令人担忧。

第一是淹没线以上比较肥沃的可种土地量少

绝大部分是通过开荒补偿淹没线下的面积。就是情况较好的地方如大溪，按人均1亩地计算，线上熟地最多也没超过人均0.4亩，开荒地补偿在0.6亩以上……曲尺乡大田村四社，180人，原来有280多亩土地，二线以下淹没126亩，二线与三线间有130亩，三线水位以上只剩下24亩；还有绞滩村一社的140多人，原有土地120亩，三线水位以上加开荒地总共只有33亩，还有20多户要建房占地，这个社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土地可耕种；伍柏村一社李永建一家三口，承包土地3.05亩，将淹没2.4亩，还剩0.65亩，线上划荒地1.3亩，总面积为1.95亩，而开荒地实际只有一半左右可以耕作。

第二，移民区土地质量差，产量低

八年试点的开荒地，大多数在40度左右的山坡上，至少有一半的开荒地根本就没有土。余下另一半土层薄，土质差。还有的土地是既不通路又无水源，土地改造的难度很大。双龙镇青龙移民点土地改造成本高达9000元至10000元/亩，把5500元/亩的土地改造费全部划给移民，该村三社16户61人仍不接受。土质差产量就低。2000年，碚石乡搬到上阳坪的谭绍金在1.2亩开荒地里播种了10斤小麦种只收了12斤麦子，从去年起再也不敢耕种了。

第三，移民开荒地普遍存在人地远离情况

最远的有8公里，且道路不方便，耕种非常困难，生产成本太高。“挂靠土地”安置移民比例大、人数多，而他们拥有土地面积少、质量差，相当一部分人靠种田难以维持生计。到一定时候，各种问题就要出来。这些人既无本钱，又没有手艺，想致富确实很困难。

2. 农村进集镇以货币方式实施生产安置的移民生活普遍潜在着不稳因素

……从调查了解情况，农村移民内安这一部分人中，特别是进新集镇居住的货币安置户，有住房，生活安置没有问题，但他们已经没

有土地。虽然家家有门市，由于场镇流动人口少，农村消费水平低，农民购买力差，生意做不起来。眼前还可以吃老本，时间长了就没有生活来源。如曲尺场镇上现有 37 个门市，冷冷清清，做生意收入稍好一点的只有 3、4 户，还有 33 户仍靠种田维生。水淹后土地没了，钱也花完了，生活问题就出来了。

3. 新县城统建房建设进度慢，巫峡镇的居民安置、进镇移民安置工作开展困难

巫峡镇反映，新城管委会总的应交给该镇 4299 套统房，2001 年(到巫山府发[2002]6 号文件出台以前)共交 988 套。2002 年应交 3311 套，计划 4 月份交 682 套房子，到 2002 年 7 月 3 日，巫峡镇还没有收到一套。而 7 月份该交的 1104 套，10 月份不一定交得了。9 月份该交的 1525 套，有可能要拖到 2003 年去……巫峡镇要在 12 月 31 日前完成对居民和进镇移民的安置任务，并接受验收。从目前情况看，形式不容乐观，有可能出现水赶人的被动局面。

……

二、关于集镇建设问题

1. 大昌集镇建设进度缓慢

……移民干部反映，新镇规模过小。大昌新镇……因外迁因素调整为 3000 人（规模）。镇村干部认为场镇规模过小难以容纳。一是邓家岭占地移民有 76 户 300 多人；二是楼层受限，最高只能建 5 层；三是外迁后“锅底”人口仍不少，初步统计为 7000 人左右。其中仅大昌村、兴隆村、凤凰村 3 个村二期水位没走的移民合计就有 2000 人左右。这批住在老镇的农业人口，本来是规划外迁的，但因外迁难度大，而把其它村的人口进行了置换，3000 人规模的新镇怎么安得下。

2. 双龙新镇建设严重滞后。

滑坡治理启动缓慢，水、电、路、桥无法配套……双龙新集镇地址复杂，滑坡严重，一是马家屋场后坪和赵家屋基因滑坡，原设计与地质情况不符，需重新作地勘设计，已严重影响了集镇建设速度。二是新集镇后面的巴雾村滑坡和库岸防护虽已完成地勘，但还没进行可研和初设，也制约了集镇建设速度。1996 年元月 16 日破土动工的新集镇，至今还只建了卫生院、供销社、地税所等 8 个单位。规划应迁的 31 个单位，还无法划地动工。水不等人，二期水位线下的单位和居民均要应急搬迁和二次搬迁，干部群众压力很大，仅租金都是个问题。

新集镇水、电、道路设施不全，建设条件恶劣，专业设施建设进度慢，特别是码头和涧槽沟大桥建设也不能满足二期迁建需要。

3. 新建场镇垃圾污水处理等场镇功能尚未配套

长江沿岸所有新场镇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一无规划，二无资金，垃圾四处堆放，污水直排长江；苍蝇乱飞，臭气熏天，群众意见较大，乡镇政府无力解决。

三、关于移民政策

移民安置的政策配套不及时、不明细，对安置过程中的一部分特殊情况，缺乏解决依据，操作起来很困难……

如：在清库过程中，南陵、曲尺都涉及到土地承包时没有划到户的集体所有林砍伐。现在，乡政府组织把树砍了，而补偿依据，补偿标准和资金来源都不清楚，操作起来感到很为难。

又如：关于长委（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与实际严重不符的情况问题：

1. 曲尺乡清库时实际砍掉柑桔树 2000 多亩，而长委调查数为 586 亩，还有 1400 多亩被砍掉的果树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2. 碚石乡碚石村一社 81 年土地承包时是 93 亩土地，而长委调查只有 46 亩在册，与实际面积相差 47 亩，这样就给移民的生产安置造成很大困难，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

3. 村、组副业设施复核认定困难。有的砖瓦厂、小酒厂、加工厂，本身当时有工商营业执照，有依法交税的发票，长委没有给登记，现在要拆迁清库，这种情况到底如何处理。

再如：对一部分土地被淹，另一部分虽然没淹没，但无法继续耕种的问题因无相关政策不好处理。此种情况在碚石、青石、跳石都存在。碚石的南山擂内有 28 户共 108 人，他们都要移到上阳坪来。留在南山擂还有 28 亩没淹的土地。移民从上阳坪到南山擂种田，先要坐车，然后坐船，最后上山，耕作十分艰难。

四、关于移民稳定的问题

1. 移民乡镇的治安环境，对移民工作开展不利。极少数移民，因个人的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煽动不明真相的移民群众上访闹事。近段时间以来，巫峡镇的移民外迁对象，碚石乡的占地移民，连续发生了几起围攻、辱骂、殴打移民乡镇领导和移民干部的恶性事件。这是目无政府，轻视组织，挑衅法律的表现，应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2. 移民该享受的权利没有及时有效地给予解决。如大昌凤凰村支书杨亨高反映，该村杜之明一家去年 8 月外迁到梁平，从去年 8 月就开始向政府申请解决长委漏登的砖混结构房子一幢 90 平方米，地坝 50 平方米，至今没有办下来。大昌兴胜村吴文章反映他 12 次向政府申请要求补办其漏登的房屋，至今没有结果，怨气很大。他向调查组讲“会经常在开，问题一个都没解决”。

……

我不想再继续抄录下去，我相信读者从这份笔下留情的 “调查报告”中，就已经可以想象和感受到移民所承担的艰难的生存重压。

附件：

关于巫山县王爱祖(县委书记)、郑云山（县检察院院长）向守谦（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大昌镇政府对郑昌省包庇的事实向上级领导反映（三峡移民留下的上访材料之一）:

我们是巫山县百万移民中的一员。我们把上级领导包庇镇人大主任郑昌省的事实举例如下:

一、郑昌省在担任洋河村支书期间，利用自己的职权

坑害百姓。(1)篡改 116 份公证合同（详见移民手上的假公证书）。(2)套购 64 人的国家移民资金。(3)洋河村 96 年搬迁没有给人民公布移民账。(从 97 年起，洋河村公证合同人向县政府，镇政府讨要公证合同，跑了几十次几万里路，形成书面材料有一文柜，花上劳力几千个毫无结果。)(4)洋河村居民点安装点没有新装变压器，郑给移民人均算了 570 元。总共 250 个移民，应是 10 几万元，可郑公布的帐上只有几万元。(5)郑的姐姐是农转非的，也享受了移民待遇，并分到了移民建房地。但他的姐姐又把建房地转卖给了官阳区的肖干威。郑的哥哥郑昌焱的房子不属于拆迁范围，但郑昌省借口“修公路”也给拆了，补偿他几万元。郑昌焱随后，又把拆房后的地基高价卖给了本村蒋瑞安建房。(6)郑用他手中掌握的移民资金给县政府领导如县委书记王爱祖，县检察院院长郑云山，县委组织部部长行贿。有洋河村的账目为证，还可以向村主任吴文春、会计谭天松、村副支书刘兴旺调查。(7)2002 年，洋河村搞外迁时，郑利用自己的权力给洋河村将陈祖明的 95 平方的房屋“公证”给了陈祖国。陈祖国给了郑 5000 元

“回扣”。实际上这 95 平方米的房不属于拆迁补偿房。（8）郑昌省本是小学文化，连 26 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又是超生户，还被劳教过，可是县里听凭他胡说，承认他是大学文化，还让他当了大昌镇人大主任。（9）在搞外迁工作时，郑给宁河村村主任郑福杰多算人口，多丈量房屋，最后还给郑福杰的户口保留在大昌。（10）2001 年，郑在龙兴村负责外迁移民，郑给龙兴村搞了 30 几个假移民。如迁往安徽省的龙益西、黎远权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卖力气搞假移民呢，因为他得到了回扣。（11）郑昌省工资每月 800 元，他却能在移民搬迁的时候，花了 10 几万在巫山城里买了新房。然后又给大儿子买了小汽车，给小儿子买了摩托车、手机。他自己还经常打牌赌博，请问他这些钱从哪里来？（12）郑利用他控制大昌移民工程之便，将镇上几乎所有的移民工程都承包给他的弟弟、哥哥、老姨。这工程也就是郑自己的工程，也就是豆腐渣工程。

2002 年，洋河村的群众全面出动要求将镇人大主任郑昌省法办。但县里的回答是郑昌省无罪。我们移民死不瞑目，一定要继续把郑告下去，不见青天不罢休！

移民向县领导要移民政策，他们说没得；要公证合同，没得；要对郑昌省党纪、政纪处理意见，没得；要应当发到洋河村移民手里的每人 2300 元的基础建设费，没得（搬迁公证合同书上写的是 2300 元/每人基础建设费，但实际只发给移民 1800 元/每人）。洋河村移民总共 558 人，那么还有 30 多万元哪里去了？

2001 年 11 月，大昌镇后靠移民举起写着“要钱，要政策，要公理”的纸牌子，自发向镇政府要求落实移民政策。但就是无人理睬。公安出动，把移民曾祥平抓走，被关了 14 天。真正违法的没人管，要求依法办事的倒被抓，真是逼得移民走投无路。

附件：

巫山和大昌镇政府花样翻新，伪造假移民（巫山大昌镇移民上访材料）

其一、捏造假证据，外迁库区以外农户

为了增加移民数，大昌镇鼓动镇、村干部找库区外愿意外迁的农户以半淹户（淹地不淹房或淹房不淹地）名义外迁。由镇、村干部出面伪造各种手续，如填写无中生有的“水淹面积符合外迁条件”的假

证明等。像洋溪村、祝马村、兴盛村等几个村的不少生存环境差但又不符合外迁条件的农户都是这样迁走了。类似这种“移民”，全镇 23 个行政村都有。

其二、重复安置移民，造成移民资金流失

大昌镇还采取二次安置手段，扩充移民人数。如国家认可的春早村、大兴村、双胜村的村民，有的已经“后靠安置”并得到补偿的村民，只要你愿意外迁，还给你进行第二次补偿。近两年，这类由“后靠安置”变成“外迁移民”的有 500 人之多，致使有限的移民资金无端流失。

其三、大昌移民中相当比例是假外迁

许多移民外迁销号，是由政府强行包办，本人根本没走。大昌镇政府口里说坚持整户外迁，实际许多外迁户中，都不是整户外迁，家中都留下一、两人在原地。这样既可以拿到移民和房屋补偿，又可以脚踩两只船。仅这类不合法的移民补偿金，就有 400 多万，巫山县移民局至今未认账。

其四、以假离婚手段，骗取移民资金补偿金

大昌镇的移民中，有一些是以假离婚为手段，骗取移民资金的假移民。如兴胜村的李邦雄和梁巨成搞的就是这样的假离婚。“离婚”后，妻子成为“外迁移民”获得了移民补偿金，但实际仍住在家中不走。还有的村，拿死人冒充活移民，群众多次向大昌镇政府反映，因这些人填充了外迁移民人数，他们不管不问。

其五、外迁移民因迁入地安置不当，返迁现象极为严重

如河口村 80%的外迁移民都返回大昌。

其六、二期水淹线下移民尚未完全安置到位，大昌镇政府大吹大擂

如兴胜村有 6 户共 25 位移民，在大昌新城一共分到住房面积才 250 米，而且无水，无路又无电，但镇政府在向上级汇报时，却胡吹给这 6 户人家人均分到住房 40 平方米，水、路、电早已三通。

除此而外，大昌镇政府还利用对移民住房故意错漏的统计，假公济私。国家明文规定，凡是 1992 年 4 月 4 日以后盖的房屋，一律不给予补偿。但在大昌，许多外迁户都由村、镇干部串通好，即使 2000 年建的房也拿到了拆迁补偿。他们还从每位外迁移民中克扣资金 266 元，用于迎来送往的挥霍。村、镇干部每完成一个移民外迁任务，镇干部

分红 40 元，村干部分红 30 元。

凡此种种，移民资金花不到该花的地方，最后倒霉的是真正的移民，受损失的是国家。

图 3.6 移民方运国在湖北当阳的“新居”

第十五章 移住当阳

1

2004 年 6 月 1 日清晨,湖北荆门市至当阳市公路间的卢家湾公路桥上。天正下着毛毛雨，气温很低，自重庆巫山大昌自主外迁至当阳的移民蹇兴汉全然不顾一身泥水，带着记者深一脚浅一脚走下公路，向西沿着一条土路向因反映移民问题被抓判刑的移民方运国的家走去。我与方两年前相识于北京。走到摇摇欲坠的方家土坯房门口，方运国的妻子刚从地里背着一大筐洋芋进屋，见是记者来,顿时泣不成声。

方家住的是泥坯房，倾斜的后山墙被一根粗木桩斜顶住。歪歪扭扭的条形泥坯，给人的感觉是整个房体随时有可能坍塌。这样的土坯房，当地人讲就是 200 元卖也无人愿意买——方运国却花了 2700 元加上连带的 2 亩 7 分荒地将泥坯房买下。方运国的妻子说这间烂房他们本来没想要，是村里的有权势的人逼着他们买的，息事宁人——明知道上当也要买，不买就不让迁过来，迁过来日子也不会好过。

但方运国一家人想错了，买了烂房不说，那两亩多的烂地却没了影儿。日子就是这样难过——难过也要过——因为这是命中注定，是天意。我到方家这一天，方运国和其兄方运朝一起还在牢里服刑。他俩和杨庆喜、匡安根、余定华已经被抓半年多了。至于被抓的理由，全写在当阳市人民法院 2004 年 3 月 8 日下达的判决书上：一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二是妨害公务。

判决书上描述“冲击”与“妨害”的过程时有这样一些文字：“10 月中旬（2003 年），被告人杨庆喜从雷国平处得知，松滋市政府答应将移民的‘双安费’70%分期付给移民，便将这一情况告知被告人方运国。被告人方运国、方运朝、匡安根、余定华等人便以此为借口，多次到当阳市移民局上访闹事，提出无理要求……在方运国、方运朝、杨庆喜、匡安根、余

定华的策划、煽动下，移民 200 余人从 10 月 20 日开始，采取堵塞市政府大门、围攻市政府领导及工作人员、殴打无辜群众、哄抢市政府食堂食物等方法，使得市政府机关工作无法正常进行。闹事的移民愈演愈烈……”

而移民对方运国等人被抓被判则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事情起因是当阳市政府没有按安置协议履行义务引起的。如果他们按当初安置协议规定在 2000 年之前将每位移民应得款项 5909 元落实，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发生。

事情的原委说得再具体些，总共 5909 元/人生产安置和基础设施费一拖再拖迟迟不发到移民手里.2001 年 10 月 16 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建委）又出台了针对自主外迁移民的 40 号文件，称“对生产安置费和基础设施费，应由迁出地政府直接拨付给迁入地政府，由迁入地政府掌握并用于外迁移民的生产、生活安置”。由于这个所谓“40 号文件”，将按当初协议该发而拖欠移民的 5909 元合法化，当然引起移民强烈不满。相反却十分有利于地方政府“掌钱”，于是，2002 年 6 月，当阳市马上与重庆市进行了钱财的“对接”。

这个 40 号文件视外迁移民与迁入地政府协议为儿戏，并且特别是给迁入地本来账目不清者混水摸鱼的机会——实际上制造了一种混乱。于是，在上访讨不到说法，问题无人解决的情况下，发生了 2002 年 7 月 1 日数百名移民打砸烟集乡（现更名为庙前镇）的事件。

鉴于移民情绪激烈，2002 年 10 月，当阳市政府从 5909 元/人内拿出 1685 元/人发还移民。但余下的 4224 元/人“双安”费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因为此款交由村委会掌握使用的 4224 元/人，没有规定使用细则，并且极端不透明，由是导致一年之后，移民与当阳市政府的矛盾再度激化。

2

为了就这 4224 元/人讨个说法。2002 年年底，方运国、郑远聪等人专程到北京上访。一到北京，他们就听说前不久重庆云阳县高阳镇外迁至江津的移民有冤不得伸而去美国驻华大使馆“扩大影响”被抓之事。他们表示决不会做有损政府形象的事，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给他们一个说法。他们还将数份反映问题的材料交给我，希望我从中促成与三峡建委办公室副主任漆林“接见”移民之事。漆林曾与移民见过面，并给移民留了电话号

码，说有事可以到北京直接找他。但漆林太忙了，电话难得打通，打通了秘书也会告诉你，漆林主任不在。移民不甘心，电话打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联系到了与漆林见面的机会，方运国他们去了，双方谈得热火朝天，移民也欢喜一时，但回来一想，什么结果也没有，4224 元，还是没说法。

事情一拖又是一年。2003 年 10 月底，当阳移民得知，湖北松滋市政府与移民达成协议，将 5909 元“双安”资金以 3：7 比例进行分配：即 30%（1772 元）由移民所在地政府掌握用于公用设施建设；70%（4137 元）直接用于与移民紧密相关的生产生活安置项目。钱的分配明确，松滋移民的心平静了。消息传到当阳，同是自主外迁的当阳移民要求当阳市政府和移民局就余下的 4224 元/人的“双安”费也给一个说法。数百移民聚集当阳市移民局门前，但根本无人理睬。

有了 2002 年 7 月个别情绪激烈的移民打砸乡政府的教训，这一次在深秋的冷雨中，移民只是举着横幅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自 2003 年 10 月 20 日直到同年 10 月 29 日，前后共 10 天，移民讨“说法”的请愿终以方运国等多人被捕而告终——强权即真理在当阳又有了一次明白的注释。移民这次被捕罪名是“聚众冲击国家”和“非法游行”。

其实，听罢移民的讲述，你就会明白，上述罪名完全是当阳市政府设下的一个圈套：

10 月 28 日，移民多日的诉求有了回音：当阳方市长答应接见移民商谈落实移民资金问题。说好接见地点在市政府，但当移民准点到达市政府后，又有人临时通知接见地点改在市移民局。移民只得浩浩荡荡向市移民局转移，于是乎这就变成了轮番冲击政府机关，变成了违法大游行——其用心何其毒也！

但压服不是真理。2003 年年底，移民代表（姓名暂时隐去）先后两次来到北京讨说法。这次他们没找漆林，直接找到《工人日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卢敏和我一起接待了他们。根据记者先前的调查和这次移民代表的申诉材料，同年 12 月，记者写了“信息专报内参”清样《湖北当阳 3000 多自主外迁移民要求发还移民款过冬》，直接寄给当阳市委。

3

6 月初，黄河两岸一片又一片的小麦已经泛起金黄的麦浪，当阳却刚刚进入水稻插秧的时节。秧田碧绿，水照天光。细颈鹭鸶和色彩斑斓的水鸟

一只只或悠闲地在田塍漫步或匆匆在田里觅食。但田间少有人影，氛围甚至有些凄凉……我来此地，为的是近切地看一看当阳的移民生活究竟是不是如当阳市委上报宜昌的“移民工作总结”和给报社回函所云：外迁移民“确保安居乐业”——具体数字如下：

> 全市共落实移民耕园地 9818 亩，人均 1.51 亩。其中水田 4509 亩，旱田 3188 亩，果园地 1035 亩，菜园地 1086 亩。
>
> 二是及时落实移民住房，使移民有居可安。
>
> 三是抓好“三通一平”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高移民安置质量。我市共为三峡库区移民平整宅基地 6.6 万平方米，修建道路 54 公里，修桥梁 132 座，架设通讯线路 50 公里，供电线路 78 公里，打水井 450 口，整修学校 30 所，配套农田水利设施 3500 亩，大大改善了移民生产、生活条件，为移民安居乐业铺平了道路……

总之，当阳的移民工作做得很好，好上加好，好得赛过天堂！

4

当阳育溪镇九冲村，是个位于当阳至荆门公路东侧 300 米远的小村。记者到此采访由巫山大昌迁来的移民，本来看似平静的小村顿时掀起了波澜。

移民李山林愤愤不平：“没迁来前定合同，什么都好，什么都有。来到这儿以后，1.5 亩/人的农田分不到，‘双安’钱拿不到，生活好难！”

李山林解释说，他家人口多，平均每人几分地，根本不够吃。来到当阳落户，他一直在种一块属于村委会掌握的“地主田”。种这样的田要与村委会签定“合约”。而所谓的“合约”就是由村委会直接向没田可种的移民拍卖 20 年的承包合同。村委会掌握的这些土地不向国家纳税，其实是个变相的小金库（类似的“地主田”在整个当阳普遍存在。像李湾村、英雄村、佟湖村、木林村都有少则几十多则上百亩的“地主田”）。而应当发还移民的“双安费”，移民连钱的影儿都见不到：“实际让村委会的人私分了！”李山林说的十分肯定。

九冲村地处丘陵地带，村周围地势起伏不平。想当初这里一定是岗峦绵延，山林重重。曹操与刘备，刘备与孙权都曾在这一带摆开战场。九冲

村西南不远处，张飞张翼德横矛处还在，再远处关羽被擒的麦城还在——惜游客凋零，颇显冷清。只有赵云赵子龙大显威风战曹兵的长坂坡如今被装扮得热闹非凡：小小长坂坡被圈成一个公园。公园门外的大街上即是跃马横刀的赵子龙的高大雕像——战争过去了，创业的历史要一代接一代牢记。但是如果张飞、赵子龙之类的造反大将，活在今天，他们曾风云天下的历史该当若何——恐怕还没等到“三结义”就被装进了大牢——现在，确实时代不同了，“稳定”压倒一切——只是这“稳定”是说给百姓的——小小酷吏打着“稳定”的旗号，继续不断制造着“不稳定”，把百姓折腾得鸡飞狗跳墙！

细雨中，李山林引领我在九冲村四围看残败的农舍，看毫无生气的农田，看村边流过的污水，看移民一张张愁苦的面庞，出乎意料的景状让我的心很凉很凉。当我们走到村口的时候，一位移民悄悄地将几份九冲村村委会使用移民“双安资金”的“请示”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天昏地暗！

5

2004 年 6 月 2 日，当阳市委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当阳市移民局局长宋天学、庙前乡（原烟集乡）副书记任干、乡移民办公室主任吴在军、市委宣传部某副部长与我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我们是来相互交流“移民问题”的。不过在走进会议室的大门前，我还心存侥幸：为了能给苦苦挣扎的移民有个说法，双方能敞开心扉，真诚交流。然而，我又错了——兴许我太幼稚，总是愿意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美好。

某副部长首先发言，但称对移民的一些情况尚不甚了解；宋局长发言，头头是道，讲的都是光辉业绩。我不得不礼貌地打断宋局长的讲话，请他直截了当就移民要求返还的 4224 元“双安费”发表看法：

“根据三建委 40 号文件，这笔‘双安费’由移民迁入地掌握，不能发给个人。”

“但是，与移民签定协议是在 2000 年之前，并且协议规定‘双安费’应在签定协议的同时落实到位。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没有按协议规定将‘双安费’按时发给移民，而是等到 2001 年三建委 40 号文件出台，才告之移民这笔钱由迁入地政府掌握，这种做法合理吗？”我提出质疑。

“我们已经从 5909 元‘双安费’中拿出 1685 元返还给移民，他们还

不满足。”宋局长有意答非所问。

“如果你们认为移民要 5909 元没有政策依据，那么，你们后来又退还移民 1685 元政策依据又是什么呢？”

“我们，我们……”宋局长关键时刻掉链子。

双方各自理由都已说清，没有必要争论下去。

“那么，宋局长，这笔‘双安费’总数是多少？”

“……”宋局长一时语塞。

“这笔钱既然由村委会掌管，村委会使用这笔资金有没有实行细则？”

“有啊，村委会使用‘双安资金’必须向镇政府提出申请，镇政府批准后方将钱拨付给村委会。”宋回答的非常肯定。

“‘双安资金’的使用方式和去向，事先是否征得移民同意？每笔钱花的是否透明？具体地说，有没有审计？是不是一本糊涂账？”

“怎么能是糊涂账？各安置村都有移民代表参与的财务监督管理！”

“每个移民村都是这样吗？”

“都是这样！”宋局长非常肯定。

“任干书记和吴主任，庙前乡‘双安资金’总数是多少？现在用了多少？”我把话题转向一直静默无言的庙前乡领导。

“……”两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宋局长，全市移民‘双安资金’用掉多少，余额多少？”

“花掉多少不清楚，可能花得差不多了！”宋其实也是一笔糊涂账。

关于“双安资金”还有什么可谈？本应各司其职的市里，乡里连资金总额都不清楚，这笔账不糊涂才怪！

不过，再糊涂的账到了宣传部笔杆子底下也可以说得天花乱坠——这帮文过饰非的家伙也着实可恨。在我这次来当阳前，当阳市委宣传部在 2003 年给报社的回函有这样一段：

对于生产安置费和基础设施资金使用情况，我市严格加强了移民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各安置村均建立了有移民代表参与的财务理财监督小组，村级财务实行村账站管，不断提高了移民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同时，国家、省、宜昌市审计监察部门，不定期地对我市移民资金进行了专项审计与监察，现无违法违纪现象。

“现无违法违纪现象”——一幅清明廉正图——此结论写于 2003 年 12 月 23 日。

6

既然如此，那就再回到我采访过的当阳育溪镇九冲村来吧！

这个土地贫瘠的小村庄接纳了 16 户共 80 位重庆移民。如果以 4224 元/人的“双安费”计算，该村村委会掌管的“双安”资金总数应为 33.792 万元。这笔钱村委会又是怎么花的呢——只要看看 2002 年 8 月 14 日一天之内的九冲村村委会的 5 张“资金拨付申请”你就能够全明白。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同年 6 月才完成的移民与迁入地政府的对接，时间刚过两个月。

第一张“资金拨付申请”：

育溪镇委、政府:

为妥善安置移民,落实国家三建委 40 号文件及市政府移民安置(15 号）文件政策，现需资金 30800 元，用于移民政策落实兑付返还 5 名随迁转双安移民扶持资金。5 名随迁转双安人员补签与原合同相同返还标准的合同，定额 6160/人。明细附后

望审批!

育溪镇九冲村委会回

2002 年 8 月 14 日

第二张“资金拨复申请”：

育溪镇委、镇政府:

为方便移民生产、生活，现需兴建生产桥一座，硬化生产道路 800 米，申请上级拨付移民基础设施 6.5 万元，具体预算如下:

一、生产桥一座预算 4.5 万元（依据农田开发建桥）

二、生产道路 800 米 2 万元。预计沙石料 170 车，110-120 元/车（东风车）

望考察、审批!

育溪镇九冲村委会

2002 年 8 月 14 日

第三张“资金拨付申请”：

育溪镇委、政府:

为妥善安置移民，落实国家三建委40号文件及市政移民安置（15号）文件政策，现需资金11856元，用于移民政策落实兑付返还建房地基费。移民方运中、刘典锡6户新建房屋，其中村收土地费、耕地占用税应返移民个人。明细附后。

望上级审批！

育溪镇九冲村委会

2002年8月14日

第四张“资金拨付申请”：

育溪镇委、政府：

为妥善安置移民，落实国家三建委40号文件及市政府移民安置（15号）文件政策，现需资金19413.72元，用于移民政策落实兑付税费返还。三年来移民共应交税费19413.72元，已上交12256.55元，欠交7157.17元。明细附后。

望上级审批！

育溪镇九冲村委会

2002年8月14日

第五张“资金拨付申请”：

育溪镇委、政府：

为妥善安置移民、落实国家三建委40号文件及市政府移民安置（15号）文件政策，由于前期兑付移民合同款资金不足，借用移民资金154000元，逾期未偿还，申请拨付上述资金用于偿还移民借款。

望批复！

育溪镇九冲村委会

2002年8月14日

全村总共33.792万元的“双安”资金，一天之内花掉5笔共27.206972万元。账面计算，还剩下6.585028万元。但这还不算完，仅仅又过了14天，8月31日，九冲村委会又一纸申请出台。但这次不再叫“资金拨付申请”而改称“九冲村解决移民生产设施所需资金的请示”，上报单位名称也由“镇委、政府”改为“育溪镇镇政府”一家。可见，当阳育溪九冲对于移民款的管理毫无规范可言！

这第六张“所需资金请示”依旧打着“改善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的旗号，说要建一座桥，说要修一座灌溉跌水池，要求镇政府拨付移民款 10 万元！

前面已经算过，8 月 14 日一天之内九冲村的 5 笔花帐之后，移民“双安”资金仅还有 6 万多元，现在又来申请 10 万元，也许是钱花得太快太多——简直是无法无天——育溪镇和九冲村都已经一塌糊涂了！

8 月 31 日当天，“内线”把村委会的“资金请示”透露给移民。移民自发登门找到村支书和村主任，请他俩把移民资金使用情况公示于众。

村支书答：“我不懂移民政策！”

村主任答：“移民无权监督！”

走访九冲村，路没路，桥没桥，跌水池更是没影儿的事，“双安资金”却已经打着移民旗号花个精光！移民围着我哭诉，我的心都快碎了！

7

这些年与一些地方上的官吏打交道，他们的言行举止，让我从另一个层面感到百姓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当阳为例，市委和市移民局长信誓旦旦保证他们以“三个代表”精神，为移民落实土地以及“双安”资金使用如何透明，实际上全都是瞎话。

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哪位移民如果申请移民款透明，他们就认为谁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就罗织罪名抓谁。而那些鱼肉移民，横行乡里的贪赃枉法者则可以任逍遥。说到底，他们所谓的“安定”是以强权对百姓合法权益的压制，而掩藏在“安定”背后的老百姓的痛苦可以视而不见。记者前去采访移民反映的问题后，当阳市委宣传部新上任的女部长王怀兰追到报社“汇报”，她竟然说，记者采访的“移民问题不属实我们就不追究了”，“但本来已经‘平静’的移民，记者一来当阳就又‘闹’起来了……”言外之意，记者采访是在挑动移民闹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百姓当任其宰割的顺民，不许他们捍卫权益——21 世纪了，天下竟还有这样的逻辑！

从当阳返回北京已经月余，因要求落实移民“双安资金”被判刑后今年 6 月 30 日刚刚出狱的方运朝和余定华给我来信述说冤情。听听他们两人满腔义愤的诉说，让人怎能不心潮翻腾。

我二人今天自述冤情。为了三峡建设迁出、迁入两地政府，没将移民

政策按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指示和出台的文件，给我们执行。我们找迁出、迁入两地政府上访多次未果，反倒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赋予的职权来欺压我们。

余定华自述：本人余定华，为了找村书记许新华（查生产安置费、基础设施费，即双安费）的帐目去向。因我们搬迁协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件规定：三通一平，至今一通都没通。修了一段村有路，还人均平摊 13 元的预支费（有证据）。坝陵办事处的徐干部叫我不准查，因为查了很多人脱不了干系。后过了 3 天，就将我抓捕入狱，判处拘役 5 个月。而且刑满后还违法多关了我一天。我去说理，当阳市第一看守所所长徐志鸿洋洋得意地回答说："你不是找法院吗？我告诉你，法院说话不算数，这里我说了算！"

至于方运朝的遭遇，听了更令人辛酸。当这个质朴精瘦的三峡汉子刑满出狱后不仅写信还专程跑来北京找到我，当他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的时候，让我心痛如烧灼一般。

方运朝一家 8 口是 2000 年由巫山大昌兴胜村自主搬迁到当阳庙前乡英雄村落户的。搬迁前村委会硬行作价 23000 元购置该村连带土地的现有房三间。钱由迁出地巫山县统一先拨到迁入地英雄村。但当方运朝一家人迁来时，该房房主却找方运朝讨房钱，方家初来乍到不知深浅，忍痛给了对方一万，并告知对方剩余的 13000 元到村委会去讨。哪知第二天房主又来找方运国讨钱，说是村委会要他向方运朝拿钱。明明钱已经给了村委会，方当然拒绝再付钱。况且为搬迁全家 8 口人拿到的仅有的几个落户钱怎能禁得起这么乱花？拿不到钱，房主锁住屋门，非但不让进屋连院子也不能进！年近六旬的方运朝夫妇和两个女儿、女婿及两个外孙 8 口人就在当街支上雨棚席地而眠。方运朝天天去市里、乡里讨说法，要求上级政府干预让村委会把钱还给房主。

下雨了，一家老小蜷缩着挤在冰凉潮湿的小棚里，一刻一刻地煎熬。他们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来的，迁来前想的是一派锦绣前程。但从老方带着全家人第一天到落户的英雄村时起，他的心就凉到骨髓。那是 2000 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沿着泥泞凹凸不平的乡间小道艰难地找到村中他购置的住房前，看到的却是一把冰冷的铁锁。找不到开门的人——辛苦赶了一天的路程，到了"家"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不见一丝灯光，一滴饮水，更听不到一声问候！旷寂的四野只听得断续的蛙鸣。

方运国为讨回房钱，跑了 7 天。没有结果，只有失望和伤心还有腰腿落下的风湿痛。拿不到房钱的房主纠集了 3 个打手来了，手持铁锹把方运

朝团团围住，一顿痛打，打得老方当街抱头号啕痛哭，活到 60 岁，他从没受过这么大冤屈！他想到死，不死也没法活！村委会此时见事情要闹大，才把老方的房钱拿出来给了房主，但有一个条件，要老方另外拿出 1000 元请房主和村委会成员大吃一餐，将此事“摆平”。老方无奈照办。

方运朝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一家 8 口人迁到当阳，只给了 6 口人的移民搬迁费。也就是说本来就不多的移民费还差 3 万多元没领到手。他去讨，讨来讨去就被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抓进监狱，坐牢 8 个月。坐牢还要交费，每月交 200 元生活费！8 个月 1600 块！监狱“黑”到一个生猪头卖给犯人吃要 1000 元，而 200 斤的生猪则定价 7000 元！而当阳农民养一头成年猪仅获利润 50 元！这还不算，每月还要交 10 元电视费。方运朝因刚来当阳时住在窝棚，得了风湿病，坐牢后腰腿疼得难受，要求去医院，监狱人却坚持让他买狱中的祛痛片，每片 5 元！而他的家，猪卖了，地荒了，冷锅冷灶，老伴日日泪水度日。

方运朝向我讲述他的困难处境时，我方知他还有更悲惨的遭遇没曾讲过：当阳市移民局和村委会合伙还骗了他一笔养猪钱。他现在已经是欠债几万元两手空空的穷光蛋！在那间简陋的小旅馆昏暗的没有窗户的小屋里，60 岁老汉方运朝呜呜的哭声“我后悔来当阳，受人欺状又告不得，将来怎么过生活呀！”

8

多次穿行在当阳的田间小道上，叩访农舍里满怀凄苦的移民老小，听他们讲述家住三峡时的平静生活，诉说今日生活的凄凉，我总是想，他们之命运甚至不如一路上所见悠闲雀跃于田间林木中的鹭鸶或羽翼斑斓的小鸟。自由与平等，是天赋人权。200 多年前西方人即已将其归入囊中。而今，我们的移民却连一块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更莫要奢谈什么人权了。在当阳市委的那个会议室，移民局宋天学局长，还有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将移民描述的简直是四六不懂的刁民。他们异口同声编造新天方夜谭说，你如果为方便移民出行，在一个移民家门口修一座桥，那其它几十户移民就会要求在他们家门口各修一座同样的桥！而且说的有名有姓。但当我提出现场调查此事的时候，他们又推说路途太远，或移民否认也未可知……

那天门外正下着大雨，方运国的妻子陶开秀抽泣着讲述着她家移住当阳这几年的倒霉事：来前买房说是连带几亩田。但搬来后，一分田也没得。

方运国自己开出两亩荒地，结果是荒地刚开垦成熟地，就被村委会收回。方家只好靠租种别人的土地过活。今年春节过后，在武汉读大学的女儿忽然对她说，看到家里欠了那么多外债，爸爸又坐牢，她想帮妈妈干活减轻家庭负担，不想回学校读书了。孩子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当父母的怎能因贫穷误了孩子的前程？女儿后来还是一步三回头哭着走了，但做母亲的知道，家境贫穷，孩子读书心也难安！我望着陶开秀满身的泥水，那瘦弱的双肩和结满老茧粗糙的小手，想象得出，撑起这间摇摇欲坠的土屋，扛起这前程茫茫的贫穷，对于她和像她一样的众多来自三峡的母亲往后的日子有多难！

而当阳市移民局局长宋天学在把方运国送进大牢后，考虑的却是“方运国家我估计还有万把块钱！”开口闭口是钱，此人思路的确与众不同。

“不要老想着榨干移民那点儿钱，如果给你家每人 1 万多块，让你们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愿意吗？背井离乡的移民已经够苦了，我们在管理上应当体现出人文关怀。”我真气愤了。

与宋局长的会面，最后的焦点落实到一个问题上：移民局和代表市委的市委宣传部想知道，我在当阳到底走访了什么村镇，采访了什么人，了解了什么关于移民的问题？

“陈记者，你还了解了什么情况，跟我们说一说，也便于我们今后开展工作！”宋局长言语似乎很恳切。

我心里清楚，当阳移民工作做的怎样，他们比我有数。他们此刻最想知道的是：我到底掌握了他们做的多少“黑事”——心中有鬼还是怕呀！

9

庙前乡李湾村的一个农户家里，我与十几位三峡移民进行了交谈（其中大多人的真名实姓隐去）。谈话的前提是移民对我的信任，而我也必须用行动承担起这份信任——好沉好沉的信任啊！

空荡荡的堂屋，移民和我围坐成一个椭圆形圈圈。老李端着一杯茶水走到我身边：“陈记者，你看，这里的水不干净，不仅浑还发粘，我们刚来时不敢吃。后来就自家打井抽水，但打上来的水还是一样。现在我们都吃这样的水，没有办法。”

“没向上级反映吗？”

“反映了多次，没人管。”

我起身到屋后抽水井去看。老李当场抽出一塑料大盆的水。水浑浊不清，闻一闻还有一股怪味道。我惊愕，这是人喝的水吗？但这就是人——移民天天必喝的“水”。

移民局那位宋天学局长嘴上描画的辉煌灿烂的移民工程，原来如此。“双安费”不知道究竟花在了哪里？从巫山大溪乡迁到草埠湖的8户人家，住在破陋的由厂房改建的危房。房龄已有 40 多年，颓墙裂缝，摇摇欲坠。房中无水无电，无人过问。移民胡兴林自己动手连接电路，不幸触电烧死；李湾村与相邻的鞍山村隔着一条河，移民反映多次要求修一座桥，就是没声息。鞍山村的一位移民（退休职工）自己拿出 2000 元把桥修好。李湾村委会捞到赚钱机会，赶忙上报，说他们村委会出资修桥花了 10000 元——净赚 8000；再有英雄村，修一座单孔拱形小桥造价 2000，上报 40000，一个跌水池造价 30000，上报 150000！

当阳克扣移民款花样繁多，他们想方设法在移民身上敲骨吸髓。当阳采访，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初当阳政府主动派人前往巫山等地动员移民外迁当阳的道理：原来接纳移民他们可以乘机大捞一笔——先见之明，他们一眼看中移民是块不可多得的唐僧肉！

移民来当阳，老人不给上户口，上不到户口的移民费自然就落入贪官的腰包。方运国的父母领不到移民费，含泪返回大昌。我问过移民局的宋局长，为什么不给合乎移民条件的人上户口，宋坚决否认“没人向我反映！”但移民欧修华愤愤告诉我，他家到当阳玉阳镇冯山村落户已经 5 年，17 岁的儿子欧密密至今还是没户口的“黑人”！他找过宋局长，人家管不着！

当阳市委还谎报说他们按国家政策减免移民农业税，可我手中的《湖北省当阳市（县、区）农业税纳税通知书（通知联）》上还清清楚楚写着：

木林村四组匡安根（移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和《湖北省农业税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规定，你户承包耕地面积 13.00 亩，2004 年度应缴纳农业税正税 378 元，附加 76 元，合计 454 元。

缴纳税款地点：村委会

逾期不缴纳的，每日按滞纳税款总额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特此通知！

2004 年 4 月 21 日

关于农业税，当阳一直在向移民收——这是一笔大钱，岂能轻易免掉。奇怪的是，当记者与当阳市移民局对质，移民局局长矢口否认有收移民农业税之事。而在记者离开当阳后，心里有鬼的他们又突击退还了部分多收的移民税款。除此之外每年还要收 100 元人头税，200 元/亩的土地税，孩子上学还要缴上多则几千元的赞助费，更有莫名其妙的“移民暂住费”。更有荒唐的河溶镇，非但把移民“双安费”花个精光，反以给移民安装变压器、打水井的名义强行向移民“借”款万余元，至今不还！

这个税，那个费，变着花样从移民身上敛钱，当阳各级部门简直疯狂得利令智昏！

10

去当阳前，我还没有将移民生活想象得太坏，也没有将移民款的不落实想象得有多么严重。可走进移民村耳闻眼见，我才晓得，移民人均 1.5 亩耕地的落实，资金管理的重重黑幕，远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

移民到当阳前与当阳地方政府签定的合同书上主要是两件大事：土地和移民资金。合同书上写着，到当阳人均土地 1.5 亩。到了当阳却泡了汤，甭说 1.5，人有 7 分地就不错，况且还有人 1 分地都得不到。当阳市委解释说，大多数移民都分够了 1.5 亩土地，即使不够，也达到了当地人的土地平均水平。

实际情况却非如此。以庙前镇五一村（移民 36 人）、李湾村（移民 31 人）、佟湖村（移民 116 人）共 183 位移民为例，人均土地达到 1.5 亩的，只有佟湖村李品红一家。而李湾村的梁巨清一家 4 口仅有薄地 1.5 亩。更有甚者，有的移民搬迁到当阳快 5 年，不要说一分土地都没有，至今连户口都没给上！

我问过移民局的宋局长：“你了解移民耕地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吗？”

“你不要偏听偏信，有的移民很狡猾，整天就是搅浑水！”

宋局长还讲点儿“策略”，只说“有的移民”很“狡猾”而不是移民整体。当阳市移民局等就不一样了，真正从搅浑水中取利的他们，却装得比谁都愿意水“清”。

2003 年 10 月某日，庙前乡李湾村的移民蹇兴汉找村支书李百金要求公开移民“双安费”的花销账目，结果闹得烽烟四起。因为此前小蹇了解到，村支书李百金亲家母是个职业会计，常来为村里做假账。

“查什么账？你查个鸡巴！”李百金一触即跳。

“什么账？查你弄虚作假搞的阴阳两本鸡巴账！”小蹇一针见血揭他的老底。

“老子不给你看，你敢咋样？”

“不给看，到时候我让你乖乖交出来！老子就有这个本事！”小蹇毫不示弱。

“你小子有这个本事，我今天就和你赌起！”李百金气冲冲甩门而去。

但李百金没有坚持住，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到小蹇家说和：

“支书拿了两千元，请你吃饭、打牌。”来人说。

“不用收买我，吃你们的饭我对不起移民乡亲！”小蹇断然

拒绝。

两本移民账，一本是专门用于对付移民，另一本则是对付上

级部门检查。对付移民好办，声色俱厉骂个“鸡巴”就可以镇住。而对付上级则还需要在“生钱”的麻将桌上搞定。

与几个移民村的移民坐在一起交谈的时候，我逐渐明白了，一笔移民款，作成两本账（移民唤做阴阳两本账），并不是仅仅一个李湾村，而是整个当阳所有接收了三峡移民乡镇村共享的横征暴敛移民款的方式。英雄村、佟湖村、九冲村甚至庙前乡、育溪镇的移民账都是如此。其中为庙前乡和佟湖村做假账的都是以前公社时期的会计张浩。坝陵镇的某些村如木林村则做的更绝，新当选的村委会宣称，前任所为他们一概不知，他们对前任所为也不负责任，总之，他们这一任接手就没见过账本！

11

“有的移民很狡猾，整天就是搅混水！”当阳县移民局局长宋天学的这句名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004 年 10 月，当阳市政府派来一位副市长，带领此前曾来过报社的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怀兰以及市移民局局长宋天学，外加不知以谁的名义跟随的据说是国务院“三建委”的一个叫李威威的处长，直来报社找社长，找总编，声言反映当阳移民资金使用存在严重问题的记者调查不实，一定要见报社领导直接把问题“说清楚”。好在报社领导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社会千姿百态见得多了，最后安排了两位主任与之会见。

这一见可不得了，那位李威威处长竟然毫无根据地乱说，向记者反映

移民问题的移民成立反动组织，冲击美国大使馆，受到安全部监控；并向报社发出威胁：如果报社将当阳移民问题上报，最后所有材料也要落到他的手里，由他处理。

当阳市政府那几位则在一旁听任李威威虚张声势大放厥词。后来又拿出一份对我采访的移民资金使用及移民土地不落实的诸问题的答复。报社的卢敏主任将“答复”复印件转给我后，我总算明白了什么是“搅混水”，什么是“狡猾”！

这份“答复”不仅回避了当阳市移民局以及乡镇村各级政府移民资金管理混乱账目不清的实质性问题，在移民反应强烈的土地政策不落实的问题上更有别出心裁的表演。当初记者向当阳市政府列出部分土地得不到落实的移民名单后，市政府曾回函说记者说话没根据偏听偏信，还煞有介事地附了一张盖上村委会大印的土地全部落实的“证明”。记者于是再次回函告之：移民手中“土地经营权证”注明的土地亩数与“证明”不符，那份“证明”纯属伪造。当阳市政府在“答复”中竟然辩称“至于你们所说的移民手中的‘土地经营权证’与村提供的‘移民土地安置核查情况表’不一致问题。核查表上的土地面积是按标准亩计算，而‘土地经营权证’上的土地面积是按当地的习惯亩计算的。村与村，组与组习惯亩计算标准都不一样，这是沿用的农村历史习惯。移民匡永友、匡永科、李云生的土地面积就属于这类情况。”

荒唐！无赖！世界上还找得见这样一帮无耻的“刁民”吗？

12

北京“故乡情”小旅店，是当阳移民来北京上访住的地方。为少花钱6、7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入伏的天气，滋味可想而知。但他们坚持忍受热气的煎熬——比起讨回生存的尊严和公道，暑热又算得了什么！

冬天比较好过得多，但顶着凄厉的北风，迎着漫天的飞雪一趟趟外出上访告状，一趟趟空手而归，那滋味更加不好受。

2004年某月某日，几位移民再次来京上访。短短的几天时间，他们省吃俭用，抽空去书店买了《公民常用法律知识大全》、《全民实用法律大全》、《实用诉讼大全》等法律书籍“在当阳什么法律书籍都买不到！”他们说“回去以后，好好学一学法律，免得再上当受骗！”。

在这个权力可以轻易超越法律的年代，我不相信移民掌握了法律就可

以赢得公道公正公平和人的尊严，不过至少可以让那些“依法”为所欲为的家伙，在某些时候，某些地点不敢轻举妄动。

火车一声长笛，徐徐驶离了北京西客站。8 位北京上访的移民趴在车窗的玻璃上，不停地向我挥手——他们把手中的上访材料交到报社之后回家了。那一个个质朴的三峡硬汉，眼睛里却充满了泪花。的确，他们生活得实在太艰难了：不仅承担了物质上的贫穷，还要扛起精神到肉体的重压。如此移民，与难民又有何别？

是谁，夺去了他们生活中的阳光？

13

移民为生计四处奔走颠簸受苦受难之时，一栋漂亮的别墅式的小楼已经悄然亭亭玉立在当阳市郊窑湾村的田野上。小楼的主人就是信誓旦旦“保证移民资金使用没有问题”的当阳市移民局局长宋天学。

而另有一位水利专家正在北京其舒适的家中悠闲地一边品茶，一边欣赏着自己编纂的新科学童话——写童话是他的另一爱好。

这篇注定流芳百世的新童话的名字叫：三峡二期移民生产生活安定，移民工程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作者，其实大家并不陌生：三峡二期移民工程验收组组长——潘家铮。

附件：一封当阳移民的控诉信

陈老师：

您好！

我是重庆市忠县涂井乡自主搬迁到湖北省当阳市庙前镇李湾村的三峡移民。我名叫谭桂祥，男，41 岁，初中文化，土家族。陈老师，请您在万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帮我伸冤，也让我们三峡移民在迁入地有一个立足之地。我于 2000 年自主搬迁到湖北以后，处处受到当地欺负，并且无处伸冤。

2003 年 7 月 11 日，被人持刀砍伤致 9 级伤残（有当阳市公安局鉴定为证）。但公安机关不依法办事至今凶手仍逍遥法外。我为此事上诉法院费尽周折。当阳市人民法院是打着人民法院的旗号，根本不为农民办事。现在我为治伤残，已经债台高筑，生活无法支撑。

事情经过是，自我家迁入当阳，6 口人只分了 4 亩地。因我家的 4 亩田与本村村民李百良连界。李百良就经常无事生非找岔欺负我。2003 年 7 月初，李百良再次无端将我种的玉米、红苕毁坏，我找他论理，他强词夺理反而说我占了他的地。经两人协商，用绳子将地界拉直后，李百良就跑去把村委会主任李国富找来。李国富来到后，假模假式只在我的地上比划了一下，就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对我边踢边吼，硬说我占了李百良的地。天地良心，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我只好写了书面申诉，去移民局请求评断。但移民局根本就不管，跑了多次也没用。

哪想到 3 天后的傍晚，我放牛刚回家，李百良带着李百发、李海桥、李东升一帮兄弟子侄冲到我家，他们手持锄头、铁锹等器物将我打得浑身是血不省人事。后来打 110 报警，打 120 急救。但 110 来了之后，没有给我任何帮助。第二天，我妻郑松梅到庙前镇派出所再次报案，派出所的值班干警不但不予理睬，还向我妻大吼滚出去，这真令我寒心。

连续两个灾难，已经导致我家困难重重。我被打成伤残，却不追究凶手。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三峡移民是远方人是什么？我为治病，垫付的医疗费用，至今得不到解决。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妻又去找移民局请求解决医疗费用。移民局的领导也不下去实际调查，只是坐在办公室给村委会打个电话，听完村委会一面之词，然后和庙前镇派出所的干警一样，命令我妻立即滚出去。我的生命正处在抢救阶段，医院因为我没钱，见死不救，停止了抢救。为救我的命，在走投无路情况下，我只好卖掉了两头耕牛。

我的一家现在已经没有了活路。听巫山移民提到陈老师，这样才冒昧给您找麻烦，万望见谅。我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恳请陈老师伸出正义的援手，为我昭雪、平冤。为盼感谢！

此致

恳求人：谭桂祥

2004 年 7 月 3 日

笔者注：笔者拿到当阳市法医给谭桂祥的“九级伤残鉴定”原件后，写信给当阳市委请求依法处理打人凶手。当阳市委回信说，经调查谭桂祥属“轻微伤”。

第十六章 道心守望

1

再看一眼危耸在巫峡西峡口北侧的高高的文峰山吧，你看它，守在峡口，酷似一只巨笔直插大江，唯留下笔端，饱蘸天云，记下千年万年峡江往事。巫峡十二峰，峭拔的文峰山曾入其列。明代学人郭棐曾有一首咏圣泉峰词云“峡口云偏肃，宫前水漫流，圣泉风月一轮秋……伫眺碧峰头”。另据清光绪年间《巫山县志》载“巫山城东有孔子泉，亦称圣泉，（故）改名圣泉书院。又巫山十二峰，其一曰圣泉峰，泉所出也。”此外，该县志上刻画的十二峰分图上的圣泉峰，正是今文峰山之状，可见文峰山应为正宗圣泉峰无疑。

之所以将圣泉峰之名挪到巫峡中段是清代末期的事。据考证源于清代乡人李安应试荣登乡榜后，乡绅学士想到巫峡大门口的圣泉峰，无学人之雅，故将其挤走，易名为更有文化含量的现在的文峰山。

几次来巫山，都是站在靠近巫峡镇船码头的江边遥望常缭绕于云雾间的文峰山。隐约在山云和绿树后面的房舍像是神仙居地，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我一定要上山看个究竟。

真乃望山跑死马。在巫山城望着那么近的山，竟是如此路途遥遥。乘出租车从巫峡镇出发，峰回路转，大约跑了一个小时才到了离文峰山还有五里路的地方。雨后山路泥泞湿滑，山坡上塌落的巨石挡住了道路，只能弃车走完余下的路途。几位同行者的鞋底鞋帮沾满红湿的泥土时，我们终于攀上了文峰山。初见一片稀疏的林，继续上登，见一间小小丹房；再上一道坡，豁然开朗，不知觉中已到峰巅。头顶天云瑷礁，峰脚长江如练。本以为此处可见红墙黛瓦，袅袅香火，却原来但见几壁断垣。断垣后面，一位年轻的道士正吃力地将块块青砖搬到靠近墙根处。他默默地劳作没有任何与我们这些陌生人搭讪之意。

“师傅，能和您摆谈请教吗？”

“好嘛！”道士很痛快。

他放下活计，引我们到一个平旷地。

“文峰观始建于乾隆 51 年，1786 年，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直到解放前香火一直很旺。最后被彻底毁掉是在‘文革’。现在我凭自己能力尽量恢复。”道士讲述得很平静——也许出家人皆能看透生死，他们不会将经历的任何事情说得激烈。

“为什么年纪轻轻会想到出家呢？”

“为什么？因为穷！”他略做沉思。

“穷就一定要出家吗？”

“当然不是，但我很敏感，感觉到被人冷言冷眼轻视。”他不再多说。

这位道士，也就是现在的住持俗姓孙名至阳。今年 34 岁，本为巫山官阳镇起阳乡人氏。因其母其舅信奉道教，深受熏陶。稍长愈觉道教高深，遂于 1988 年他 21 岁时往四川青城山出家。其师为天师洞的坤道赖明杰。在青城山修炼 6 年后，独往奉节天仙观做过 4 年住持。1998 年初，来到巫山，发愿复兴荒废多年的文峰观。先到县宗教科报到，宗教科给了他 100 斤小米，经济援助自此再无下文。

孙至阳登上了巫峡峡口的文峰山。倾圮的残墙，散落在枯黄草丛中的碎瓦，连个遮风挡雨的角落都没有。真正出家人的精神是万能的，任凭山顶寒风劲吹，任凭大雪笼盖山野，孙至阳宿露餐风，望着飘飞的雪，夜空的星，听江上的涛，八面的风，度过了创业的第一个月。他的师傅赖明杰也在这时赶来，和他共度苦厄。赖道士已 70 高龄，一样露宿在风雪天，一样每天与徒弟一起咀嚼最便宜的发霉的陈米。

清晨，师徒俩做毕早课，即开始垒土砌墙。一顶可勉强栖身的窝棚搭成之后，师傅走了，顺江而下不知所往。留下了孙至阳，留下了一个修身养德，内功外行的灵魂。

2

峡江道兴，上可追溯至汉代。时汉散大夫王方平弃官学仙，在丰都平都山蒸黄土成金，成仙而去；东汉又有阴长生舍弃功名，入道学仙，同是在丰都“白日升天”。中国民间最看重的“黄泉”，“阴曹地府”，“阎王”，于是奇妙地齐聚于离巫山不远的“鬼城”丰都。

至于中国人为什么要把“死”后灵魂的去处安排在地域偏僻峡江？确实是件值得推敲的事情。或许其神秘的北纬30度的位置对巫山之“巫”也有着某种暗示。

巫山道观可考者，起始于五代，之后渐至发达。古人早有定论“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巫山所在的三峡地区山高林密，虎啸猿啼，气氛萧森，极适于以玄密为特征的道教发展。后蜀黄万户曾为高唐观高道。明万历年间，道教兴盛一时，全巫山设建道观30余处。至民国时期，县境道士有160多人。千年以来，巫山道教共祭的祖师是灵宝大法师。解放后，宗教被统斥为迷信，渐渐消亡，直至“文革”，彻底被砸烂。但为人间苦难而生的宗教，必然与人类灵魂不可分割。如同巨石重压下的小草，总要向着苍穹，顽强地生长。孙道士即以小草自喻“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细，生之徒也。”

巫山人上过文峰山的很少，出峡入峡的人虽然都能看见它，却也绝不会去追想这峰顶终年常飘来荡去的风云，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但道中人都知道文峰观，因为文峰观的开山之祖沈本清在此修炼成仙。而今，山已不是原来那座山，江也不是原来那条江，唯有天不变，道不变。山下阔人灯红酒绿的生活，对孙至阳不过是飘浮的虚幻。他上山了，抱守“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的成仙的信念，誓要将自己修炼成像沈本清那样飞天的仙人。

孙至阳告诉我，我登文峰观前不久，有一位无名者却不是“飞天”，而是极现实地从峰顶一跃，直投百丈崖下的滚滚长江。投江者临前在观内烧过三烛高香，肩上的挎包装满了钱。

生命与生存，精神是根本的支撑。如果人活到穷得只剩下钱的地步，他的生命就已不值分文。

遥看今日文峰山，山腰已被斩断——有人在挖石凿洞——那是要在巫峡西峡口建一座巫山长江大桥。马达声日夜轰鸣，大吊车不停起落。一切都在告诉我，我们的“商品经济”，就是最后让人们在世界上找不到一块安静和干净的地方。

现在，固守千年的文峰观的地基已经晃动了，道士孙至阳对此无能为力。文峰山上，大水将临之时，他能做到的，只有日日在被机械震动的山巅上，在飘荡的仙云环绕中，守望着的一个孤独的心灵世界——一个越来越窄小孤岛似的圣洁的精神家园。

第四部 巴东风

早年读书，郦道元《水经注•江水》篇里所引“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句，即令我意往神驰：悠悠江水，巍巍青山，飘摇的小船，凄婉的猿啼，是我想象中的巴东长卷。

真的巴东老城出现在眼前的时刻，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模样。依着山坡搭建的层层拥到江岸的房舍一片灰暗。从码头通往沿江正街的石阶比奉节依斗门的码头更窄更陡。上得街来，俨然走进了一个热闹的大集镇。背着竹篓，手持打杵的农民熙来攘往。欧阳修诗云“绿丛红桔最宜秋”：深秋季节，潇潇细雨中，拥挤的街两边的小摊上，色泽鲜丽的小红桔确是巴东城最有生机的颜色。

路边的小摊点很多，油条、羊肉汤、面条等却是北方味道。土地贫瘠的巴东是个真正的贫困县，但这里东西卖得不便宜。举例说吧，吃碗杂酱面（整个峡江都将北方的炸酱面改称杂酱面）巫山是 2.5 元一碗，巴东卖 3.0 元；肉丝面巫山 3.0 元每碗，巴东卖 4.0 元。肚子饿了，坐在小吃摊点密集的地方，来个油条，吃碗杂酱面该是个享受。可小摊做饭烧的浓浓硫磺味的烟煤，又真呛得你难以忍受。

巴东，位在古巴东郡之东，故名。有案可稽者，巴东为县，始自隋朝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 年）。即是说，北魏郦道元（公

元 466 或 472-527 年）《水经注》中所云“巴东”，为泛指之地域，与今巴东县并不相关。

今巴东县城坐落于巫峡东口长江南岸信陵镇。该县重峦叠嶂，南北狭长。最大横距 15.6 公里，最大纵距 137.6 公里。北有神农架，南有金鸡口，横贯巴东的长江像是一条丝练系在它的腰间。而巴东城，用诗人夸张的比喻来说，就是镶嵌在其腰间的一颗明珠。此“明珠”因其地势陡峻，成为三峡诸县中唯一不设城池的县城。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 1672 年）九月，济南名士王士正在《蜀道驿程记》这样描述了巴东：“十八日抵巴东，县无城廓，茅茨数十家，枕山临江而居。”足见其冷清与荒寂。康熙年后，随着外迁人口的逐渐增多，小城逐渐显露生气。但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秭归新滩塌方，长江被阻，汹涌的江水冲上县衙大堂，市街房毁大半，巴东复原为江畔冷寂的孤城。直到民国方渐恢复了生机。

日寇侵华，武汉、宜昌相继陷于敌手。自 1938 年末，难民纷纷落脚巴东，小城人口随之剧增至三万余，商铺也达三百多家。惜好景不长，1939 年 7 月 3 日，小日本出动飞机 18 架，将巴东城炸成一片火海。只过 5 天，日寇这 18 架飞机再次出动，巴东再遭劫难。死伤军民 116 人，连县城金字山脚下的唐代古刹寿宁寺亦夷为废墟。

日人战争风格，兽性一样残暴狂虐。它相中了巴东，就要将巴东一毁到底。

1940 年 5 月 23 日起，日寇连续 4 天，开始对巴东县进行新一轮轰炸。一座县城仅留下 17 栋完整的房屋。

同年 7 月 12 日，空袭又来。已无房可炸，日机就追着逃命的人群炸。仅躲在古秋风亭侧的国民党恩宜师管区进城来领米的新兵，就被炸死数十人。

小书店的老板畲明诗和怀孕的妻子毛宗香藏身城外的一道土坎下，炸弹将土坎炸翻，俩人被活埋而死。畲父畲勤轩惊闻噩耗，从巫山赶来，痛不欲生。因畲明诗是畲家独苗，他死后，畲家再无传人。畲老先生，安葬了儿子儿媳，第二天，乘“民贵”轮匆匆返回巫山。不想途中再遭日机轰炸，他也被炸死在船舱里。

“民贵”轮是四川爱国工商人士卢作孚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的客轮。抗战时期，迎着日寇飞机猛烈的轰炸，民生公司的客轮，慷慨赴国难。从未停止运营。该公司有数艘客船均是被日机炸沉于巴东。

1941 年 4 月某日，冯玉祥将军乘“民主”轮往宜昌三斗坪抗日前线视察后，返回途中在巴东下船。“民主”轮刚刚离岸上行，天空 6 架日机突现。这群飞虫，死死咬住轮船不放，终于在巫峡火焰石处将其炸沉。

“民生”轮被炸沉不多日，“民源”轮再临厄运。这天上午，9 架日机轰炸巴东。因见江面浓烟密布，水柱腾升，停泊在县城江北覃家沱的“民源”轮暂逃过一劫。但下午三时，日机再来，“民源”轮连中两弹旋即下沉。另一艘“民铎”轮，方才离开巴东港驶进巫峡，日寇的一颗炸弹刚巧投进了客轮的烟囱，在惨烈呼救声中，轮船很快被江水吞没。

自 1939 年 7 月 3 日至 1944 年 2 月 12 日，四年多的时间里，日寇共计轰炸巴东 51 次，投弹千枚。死伤之人，可想而知。

巴东是一个屡经劫难的古城。

劫难中，只有一处巴东人心目中的圣地没有倒下，那就是挺立在县城金字山脚下的秋风亭。我所记述的巴东就从秋风亭开始吧！

第十七章 临风怀寇公

1

乘船驶过巴东，只要你稍加留意，即可望见江南岸老巴东城中那个面江而立的秋风亭。

掩映在灯笼树丛中双层翘角飞檐的古亭，如同欲飞的凤凰，一心向往着展翅蓝天。

古亭负载着巴东之魂，是巴东的象征，也是巴东人的期待。其创建者是千年之前曾在此地任三年知县的北宋名相寇准（公元 961–1023 年）。原亭本在江北旧县治所，后县城移至江南岸亭址荒圮。现今所见秋风亭为明代重建。又历经清康熙、嘉庆、同治三朝维修，得以完好保存至今。该亭木石结构，飞檐两层。高 12 米，周围树木葱茏。亭前曾有古碑多座，可惜“文革”中古碑全部被毁，唯碑上诗文流传下来。宋代文人苏辙和陆游分别各写下一首格调截然不同的《秋风亭》:

人知公惠在巴东，不识三朝社稷功。
平日孤舟已何处，江亭依旧傍东风。（苏辙）

江水秋风宋玉悲，长官手自茸茅茨。
人生穷达谁能料，蜡泪成堆又一时。（陆游）

寇准来巴东，年方十九。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还是个稚嫩未脱的孩子。他本山西人氏，少年即有大志。曾作《纸鸢》诗言志：“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因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 980 年）中了进士，才有了派任巴东之缘。

寇准来时，县衙尚在江北，即今之旧县坪。巴东从不是人口密集的繁

华之地。南宋，常有县令不肯来补。而不得不来补缺者，必搜刮殆尽而去，百姓不堪其苦。史载，明万历年间，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足 4 人；及到清中叶，平均每平方公里仍不到 40 人。推想寇准任上，“百姓不足千户”的巴东县境当是何等苍凉！

寇准来了，向在这片穷山恶水中生息的苍生，展示了济世忧民的情怀。

尚未开化的原生民，“农人以山为田，刀耕火种，备历艰辛，地不能任旱涝，虽丰岁不能自给，小荒则粉蕨为食”。由于寇准的努力，仅三年之功，巴东就变为“俾以此邦之人咸安耕凿，得以乐其乐而利其利”的乐土。“寇青天”的桂冠于是戴在了寇准的头上。

其实，如若准确地评判一个千年前的巴东寇准，绝对是个难题。翻遍史书有关于寇莱公为政巴东的文字，除开空泛的溢美之词，几无任何史实可言。何则？实无可言故无可言耳！

想当年，“百姓不足千户”，“讼庭终日静，琴鹤亦长闲”（寇准诗《巴东县斋秋书》句），县衙堂鼓终年难得响一回的巴东，寇准再有经世之才，也难有用武之地。巴东百姓是因为巴东之后的寇准成为了治国良相，才把他纳入巴东的记忆的。

“寇准审石头”的故事，就是巴东人为寇青天的造像：

话说县衙对岸江南的古寿宁寺，是寇准公休时常来休闲之地。古寺密林环抱，溪水淙淙。某日，寇准游罢寿宁寺来到溪畔眺望。忽见一农夫坐在溪中一块巨石旁痛哭。巨石旁是一筐破碎的陶罐。寇准上前问其缘由。农夫指着石头答“我被这石头绊了一跤，陶罐都碰碎了。”寇准看看四围，思忖片刻说道“明天，你去衙门大堂去告这块石头，我包你官司打赢！”农夫虽说将信将疑，第二天还是去了衙门。寇准升堂，一本正经地接过案子道“既然石头毁了你的罐子，那咱们就到溪中去审那块大石头！”

听说县官要审大石头，众人都跟着去看热闹。

寇准来到溪中，对巨石吼道“你为什么要跑到溪中把人家陶罐打碎？”

站在一旁的一个小娃觉得好笑“这块石头是死的，怎么会跑？”

“是呀，大石头是死的，怎么会跑到溪中来？”寇准接着问小娃。

“前天下大雨，我放牛时看到这大石头滚到上面张老大苞谷地里了。”小娃道。

寇准马上派人传张老大来问。

“石头是滚到我的苞谷地里，我把它推到王老二田里去了。”张老大老老实实承认。

图 4.1 秋风亭

寇准又传王老二。

“是有此事，我把它推到李老三菜地去了。”

寇准又传李老三。

“大石头毁了我的菜地，我把它推到溪里去了。”

经过一番追查，寇准查出了张老大，王老二，李老三只顾自己，不管他人最后把大石头推到溪中的经过。

“你们看怎么办？”寇准问。

“是我们害的兄弟打碎了陶罐，我们赔，我们赔!”张、王、李三人跪在农夫面前赔不是。

寇准见大家知错认错，很高兴“认了错固然好，但也要给这块拦路的大石头搬搬家，不能让它给人找麻烦。今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用这块巨石做桥墩修座利民桥吧。!”

桥很快修好了，这就是后来成为巴东名胜的“相公桥”。

相公桥今还在，但已被挤在一堆民房的中间。不是有人指点，你是决看不到“桥”的真模样。桥下已无流水，长满了青苔和蔓草。还有两座不知何人之坟，立在萋萋蔓草间。

千万莫将“相公桥”当做正史去解读，从“相公”二字你就可以判断，这座桥的传说，是闲不住的文人们在寇准做了当朝宰相之后演义的故事。“寇青天”，实在寄托了巴东百姓太多的期待。

2

记述巴东老城的历史，一定不能遗漏鲁家巷中那一组共三块石刻。

石刻展开在巷中的一面遥对大江，高约三十米，宽约八十米的巨型崖壁中段的正下方。三块与人等高的石刻，巧妙地组成一联。从横批“楚峡云开”开始，到下联“须知天下苦人多”完成，历时 150 年。

第一块石刻“楚峡云开”，为“荆南观察使者 西蜀李拔题书”。

李拔，字峨峰，四川乐山人。乾隆辛未年（公元 1751 年）进士。乾隆庚寅年（公元 1770 年）腊月，李拔自四川顺流东下。水路悠悠，天雨绵绵，加上冬季猎猎江风，令人压抑而郁闷。然当行船驶出巫峡口，天气忽变——雨霁云收，江上洒满阳光。船抵巴东，李拔由是浮想联翩：他想起寇准。三年知县，使得浑沌难见天日的巴东政通人和，“无旷土，无游民”“井里桑麻，今称沃壤”。当下江山依旧，却已物是人非。感慨历史兴替，李拔题书“楚峡云开”四个半米见方的大字，凿于面江的一块平滑的石壁上。

巴东自从来了寇准，百姓心中即有了“青天”、“好官”的标准。对于后来官者，无形中是一种传承的压力。巴东因之历朝知县得民心者不少，如明代知县鲍宣安、盛杲等。但政体所限，比之百姓所望，真正敢于为民请命的“青天”还是太少。晚清秀才吴骏绩有感而发，在横刻于崖壁的“楚峡云开”四大字右侧再刻一竖联“历叹古今良吏少”。联高约两米，每字约 20 厘米见方。关于吴骏绩身世，史料甚稀，只知其为巴东江北人。但我们透过此联，可以想见吴秀才定是一位有胆识，有傲骨，愤世嫉俗的文人。与此同时的那一任知县，即使平庸，起码也是一位容得下不同政见的人物。不然决不可以让一幅直截了当针贬时弊的石联，公然刻在衙门口近旁。

又是几十年过去，紧临前一幅石联旁又出现了与其工对的“须知天下苦人多”联句。此联作者冯锦文为江西宜丰人。民国六年至民国七年间（公元 1917–1918 年）任巴东知事。 冯是一位体察民情，深解民众疾苦的好官。他不仅刻下上述联句，还将经 150 年风雨吹打的前人刻石，一并重洗，焕发新容。三块石刻，如同一面鉴官之镜，立在巴东城，立在百姓心。

但如今，城中鲁家巷中段崖壁上的那三块石刻却已被冷落。石刻上下

爬满荒草，长满青苔。只有阴刻的文字依然清晰。巴东的朋友告诉我，“文革”中“破四旧”到处砸庙砸碑，就没人想到来砸这三块石刻。可见，是非曲直，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本帐。

三峡蓄水，巴东老城要变成水底龙宫，三块石刻也将要作陪。没有官方人士关注其命运。最新 1993 年版《巴东县志》甚至没提到它。“历叹古今良吏少”“须知天下苦人多”，是中国历史的真实。唯其真，立在城中的这副石联，很讨当权者嫌，成为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良吏少，贪吏自然就多。而探析“古今良吏少”之因，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贪官”是社会政体的必然产物；“清官”只是官吏的个人行为。而我们仅有期盼 “清官”的渴望，却没有向滋生“贪官”的体制发起挑战的勇气。

政体，说穿了是国民自己的选择——什么素质的国民选择什么样的政府，难道不是社会真理？

3

寇准在任时的巴东，县衙落在江北，即现在的旧县坪。宋干道六年（公元 1170 年），诗人陆游往任夔州通判途中，曾到旧县坪凭吊“是日重阴，微雪，天气飂飘。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那时节，县衙早移至对面江南岸。移也就移了，没人去用心理会和记忆。

当现代人将要用江水埋葬所有过去的存在之时，突然想到了，我们还不清楚或者说还不明白，巴东城由江北迁移至江南的动因和历史。

2001–2002 年，经过武汉大学三峡考古队一年多的发掘，终于在巴东江北旧县坪约 6 万平方米的地域中找到了宋城的完整遗址。考古界称“这是我国第一次全面发掘一座宋代城池”。

从发掘现场看，古城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两个区域中间是一条大冲沟（即陆游《入蜀记》中所提到的慈溪）。全城又分为官府区、居民区和宗庙区三部分。整体格局完整对称，展示了北宋时期一个完整的县治布局。城西区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大型建筑遗址——据称也是 2002 年三峡考古的最重大发现。东端建筑室内地面上，出土了完好的执壶、瓷碗、大陶瓮、秤盘及铁刀、石杵、灯架、瓢、印章等器物。西端则在房舍的废墟中出土了多达 20 多种的以浮雕花卉和兽面文饰为主的瓦当和具有宗教色彩“佛手”泥塑、鎏金铜佛像、石雕菩萨残像等。专家推断，这里是一处重要的宗教

寺庙建筑。

重见天日的县衙仓群呈方形。一座方形的仓内台阶上两个用做量器的黑陶钵还在，静静地摆在那里，仿佛还在等待着离去千年的主人。县衙基址上衙门、围墙、回廊、天井、水池、排水沟甚至青瓦拼花坛都清晰可辨。

民居遗址上，一只酒壶似乎还飘散着酒香……。

古城北端的山地上，是一批保存相当完好的砖筑结构的单人或夫妻合葬墓。墓中发掘出金、银、玉、铜、陶瓷、钱币和地契砖、雕花石窗等实物。

在对整个巴东城的考古发掘中，留给考古学家的难题一个接一个：其一，县衙遗址没有发现南宋遗存，基本可以判定县城迁至江北当在南宋之前。但也有人持另说，理由是南宋诗人陆游在其有闻必录的《入蜀记》中对于江北的旧县城记述较详，“井邑极于萧条，邑中才百余户，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无片瓦”，却不见其关于新县城的任何文字。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巴东城为什么要由江北迁到江南呢？其二，出土的两件“超时代器物”让在场专家一头雾水。一件是个铜烟斗，另一件是在明代地层中发现的一片青花瓷片上有非常清晰的“England”（英国）字样。众所周知，烟斗，明清时期才传入我国，而英国势力侵入中国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那么，这两件文物的出土该做如何解释？

专家解释第一个问题说，考古证明，宋城位置离江边太近，古城遗址中淤积大量泥沙，而且县衙大门两次重建都与洪水有关，所以说宋城可能是因水害而南迁。但尚没有发现相关史料，仅仅是推断而已。

第二个问题，专家没有发表看法。因烟斗和留有“England”的瓷片可以肯定是明清之后的遗物，因此，考古学者研究定位在是某种偶然的机遇，使得上述遗物出现在旧县坪的遗址上即可。近一步说，此课题的研究与巴东古城的淹没没有干系，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研究价值。

再回到寇准时代的巴东古城吧！

当年，十九岁的寇准来巴东任前，写过五言诗一首：

秋做西南使，千林覆去程。
四时无日影，终夜有猿声。
路入溪云过，人穿鸟道行。
不堪孤驿望，风雨动乡情。（《书山馆壁》）

其来人稀地荒的巴东后，果真尝到了难酬大志的苦闷：

春雨潇潇寒食天，远行犹在楚江边。
人思故国迷残照，鸟隔深花雨断烟。
薄宦未能酬壮节，良时空自感流年。
因循未学陶潜兴，长见孤云倍黯然。（《巴东寒食》）

寇准《春日登楼怀归》被史家断为“谓有济川之才”证明“其后必有大用”的名诗：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深树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时光是一位这样的老人——他见过所有你想见到却永不可能见到过的人物；他目睹了所有的沧桑之变，却从不会告诉你；他把所有发现和发生的一切变为记忆，却脚步不停永远往前走。徜徉在巴东宋城寇公祠遗址曲曲折折的小径上，我们只有迎着江风和天云，去追怀一代贤相寇准：正是“人生穷达谁能料”——无语夕阳中。

4

2002 年 12 月 26 日，这是一位巴东城的斗士生命的最后一天。斗士名叫高思贤，已然是八十高龄的老人。

一清早起身，他即提上行囊，准备赶早班船去武汉，到湖北省纪委告状。用他自己常用的口头禅“去告赃官儿”。

为告此状，他已经奔波 3 年！虽说已经成功一半：他主告的脏官——巴东原粮食局局长龚万能已被绳之以法，但一直跟着龚一块儿干坏事的几个家伙仍逍遥法外。老高咽不下这口气，他认为自己晚年的“反腐败战役”没有真正胜利，他必须将这个战役打到底！

高思贤是巴东县粮食局离休干部吃不愁，穿不忧。他本可以天天游金字山，登秋风亭，像与他年龄相仿的老人一样，悠哉悠哉安度晚年。但他

不，自打他知道粮食局局长龚万能在 209 国道边上，公然大兴土木，为自己盖豪宅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了誓将这个腐败分子拉下马的行动。

1999 年 1 月，一片惊天动地的鞭炮声中，龚局长的豪宅落成。那豪宅气冲斗牛：上下八层，造价百万，总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甭说在巴东县，就是在整个恩施地区都是独一份！令人难解的是，这么一座金光灿烂的私宅，在巴东县领导眼皮子底下高耸了一年，直到 2000 年 1 月，才由巴东县纪委、监察局根据当时的县委书记程远斌的批示立案侦察。这一查不得了，豪宅里面包藏的果然是个吃里扒外的巨贪。龚万能被送进了大狱，有司即正式宣告，龚万能的案子已告结束。

龚万能一案，高思贤心如明镜。看到那些与龚多有瓜葛的人却落得一身“清白”，他问县里的有关领导“凭龚万能一个人就能那么多把公家钱揽到自家腰包？我就不信咱巴东就一个龚贪官！”。

他告状不止，春夏秋冬无数次往来于巴东–恩施（巴东属湖北省恩施地区辖县）–武汉之间。但遗憾的是收效几乎近似无。他不是想不开的人，他是看到群贪鲸吞国家财富而忧心如焚。尤其是他这边告贪官，那边政府官员仍在贪赃不止，老高更是怒不可遏。

我在巴东采访时结识的向光荣向我介绍了老高的事迹时，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等老向带着我去见他时，他去告贪官，刚刚又去了船码头赶往武汉的客船。我们又跑到码头，想不到经常不正点的班船，那天偏偏正点。眼看着响着汽笛的客船已经向下游飘去。

那次在巴东，听说老高此去告的即是巴东县某书记。此人擅文墨，曾编篡了《寇准》一书行世，并著文称“我来巴东，常听人们谈起寇准政绩，油然而生研究寇准之想，希借此进行爱国兴县，勤政廉洁教育，以振兴巴东”。

说归说，文章之外的书记则别是一番模样。有人说他收过龚万能的钱，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将龚端出来；有人说他在其老家开了酒厂，把酒卖到巴东发横财 ；他的亲戚偷盗国家物资 40 吨，可以“无罪释放”；巴东人有目共睹的是他孙子过三岁生日，轰动巴东城。陪同我采访的老向说，凑热闹送去 500 元的人，都没敢留下吃饭，比起送“大钱”和“大家伙”的人来，500 块实在是小意思，根本拿不出手。

现今官场官话、假话、大话、套话蔚然成风。多贪的官，讲起“三个代表”，都能让你肃然起敬。那些动人的言辞，能让你感觉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清官满神州的伟大时代。

高思贤告状辗转复辗转，总也得不到结果。而他所告发的贪官，有的还在不断高升。他准备了一套完整的揭发材料要去中共湖北省纪检委做最后一搏。如若再无回音，他将不辞辛苦，以年近八旬的高龄把状告到北京去。他收拾好一挎包的材料郑重上路。此刻我所在的轮船码头，正是后来老高生命之歌唱罢最后一个音符的地方。

才出巫峡的长江水浩浩荡荡继续向东边的西陵峡奔去，晨云和峡雾在码头上空弥漫。那天已经听到了上水船开来的汽笛声的时候，吃力地刚刚走下 230 多个石阶的老高，一个趔趄突然倒下。倒在秋风亭下，倒在出征路上。他紧紧地把装满材料的挎包抱在胸前——即使在这一刻他也没有忘记生命的责任。

清点挎包中的文字材料，不能不让你感动。因为字里行间不仅仅是举报和呼吁，还有老高对腐败滋生之源的深刻的思考“干部的提升和选拔，一定先要通过群众的评议，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群众考察准确性胜过上级领导。现在这种漠视群众意见，领导说了算，代表举手走过场的提干方式，只能助长‘跑官’、‘买官’的不良风气愈演愈烈。”，“现在是关注自己钱袋的领导多了，关注老百姓疾苦的领导少了。五、六十年代，各方面条件那么艰苦，我们县还有一个一心为民的郝振元县长，现在的县领导口口声声讲‘三个代表’，郝县长式的人物为什么出不了一个？好领导不是靠美丽的语言装扮出来的，是凭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干出来的”

老高提到的郝振元是巴东另一位百姓至今不能忘怀的人物。

自古以来，巴东人皆是饮用长江水。每天天刚蒙蒙亮，人们便从沿江的石阶下到江边。男人肩挑水桶；女人背着背篓，提着篮子：背篓里装满要洗的衣物，竹篮里是要洗的菜蔬。水桶满了，衣物菜蔬洗净了，大家又攀上高高的石阶步履艰难地返回老城。这不变的一幕，已经由巴东百姓上演了千百年。人类的活动一年又一年逐渐改变着江水的质量——江还是那条江，水不再是彼时水了。1958 年，郝县长不忍见巴东人再喝污浊的江水，便亲自翻山越岭找水源，他相中了距县城 5 里远水质清彻的无源洞。正当全县民众摩拳擦掌准备开渠引水之际，郝县长遭到了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理由是他面对全国“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去大炼钢铁，而是专搞“邪门歪道”。郝县长没有向来自上面的压力屈服“我可以写检讨，受处分，水渠一定要修！”

1959 年 6 月 24 日，巴东人 14 个月的奋战，终于把甘冽的无源洞的泉水引进了巴东城，结束了巴东人千百年沿袭的饮用长江水的历史。巴东人

至今还记着郝县长。无源洞前一块新立的石碑上刻下了这样一段碑文：

> 无源洞水渠全长二千七百米，自一九五八年动工兴建，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建成送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从而结束了巴东城人下长江挑水吃的历史。
>
> 无源洞水渠开建之组织者——郝振元同志，于一九五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任巴东县长。他主政九年，体察民情，勤政清廉，做了不少好事。开建无源洞水渠和倡导峡江两岸全民义务植树，是其政绩之一。其功其业，为国有三峡林场的建立和巴山森林公园的建设，奠定了先期的基础。

说起郝振元感人的故事还有许多：他为巴东江北地势险恶的长丰乡架起三座石墩桥；他为巴东山区修了几条可通汽车的公路；他不赶时髦“搞浮夸，放卫星”。清太平公社新胜大队二小队给县里“报喜”，说是苞谷亩产十万斤，受到他严厉批评。“三年困难时期”，看到百姓吃观音土和漆树叶充饥，他心如刀绞。冒着违反政策的风险，从县粮食局调拨粮食，挽救饥民……

中国官场向来有这样一个传统：忠君者兴，忠民者亡——“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因之，正直的文人，就有了一个苦难的轮回。

郝县长不幸成为又一位注定忠民而亡者。有人撰文“悲哉，人民的好县长，却太早离去。痛哉，他虽被百姓拥戴，事迹却不见巴东史册。”

其廉如清官海瑞“官至二品，死时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殓葬之资”；其悲如贤相寇准，以“澶渊大捷”捍卫了北宋河山，却因误用小人丁谓，反遭丁谓诬陷，终落得远谪天涯，客死他乡。

无源洞今还在，清纯的泉水顺着沟渠仍在日夜不停地流淌。据传古无源洞之水，一日之内三变其色“早清，午混，晚清”。但我两临此洞，水皆清冽。洞口前，小桥亭榭，绿树成荫——清幽得只听见啾啾鸟鸣。巴东人仅存的甘甜的生命之水，有一个永久喷发的源头。

巴东，巴东，因为有了寇准，有了秋风亭，在你的怀抱里，总也寻得到一股悲壮的清新之气。那四字“楚峡云开”，那副联“历叹古今良吏少，须知天下苦人多”，难道是不可变更的历史？

第十八章 峡江纤夫曲

1

1988 年年初，乘车自宜宾往云南水富县采访途径嘉陵江，平生头一回看到逆水拉船的纤夫。长袍挽在腰间，弓着身体，足登草鞋，挎着长长纤绳，吃力地沿着江边的纤道步步前行。高低起伏的号子声随着风，随着浪，弥漫在浩浩大江之上。

纤夫，是扯着大江走船的人。当我真正来寻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已渐渐从江边消失了。只有在巴东城对面，江北的神农溪才可见他们的身影。神农溪全长 60 公里，发源于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南坡，然后呈叶脉状向南穿越崇山峻岭在巫峡东出口处汇入长江。其入江口以上共 20 公里江段现辟为游览路线。有纤夫裸体拉着“豌豆角”（船名）招揽旅游生意。神农溪向有“一里三湾，湾湾见滩”之说。棉竹峡、鹦鹉峡、龙昌峡，纤夫们背着纤绳扯着游船，踏着溪滩的碎石吃力地一步一步逆水而行。这是一个赤裸的群体，四、五人为一组，在青山碧水间将古铜色身体与自然溶为一体。但我观此景，心中却别是一番滋味。裸，曾为原始人生活方式。随着文明进步，人类最先要做的就是“遮羞”。似眼前这般为挣钱而“还原历史”的拉纤者，与那些卖淫女又有什么两样–——况且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

2

巫峡东口北岸的的官渡口镇是个土家族聚居的古镇。镇上远近闻名的第一号人物，即是现已年满九旬的土家族老人谭邦武。他是峡江两岸仍然健在的最年长的纤夫，11 岁开始在江上行船，至今已经八十年。初时，父亲驾船掌桡，他只是跟随左右打下手。15 岁，身体还没长成，他就做了纤夫跑船了。第一趟船，是拉着一条 6 丈长，2 丈宽的“麻瓤子”（船名）从

沙市到巴东。算上谭共 6 个人足足跑了 12 天！那时候年纪小，大家都关照他，等到干了几年后，他才明白这碗饭要舍得命才吃得下。

——“我跑船那些年，见着柏木船,大家伙看着就很新鲜了。小火轮没见过。后来才有了几个‘民生公司’的小火轮。要说拉纤苦，夏天不穿衣，冬天不穿棉还算不得什么。那时不穿衣不是为省钱。一是峡里人少；二是你看我们拉纤都是把纤绳挎在单肩膀，衣着简单，防止万一水上有情况，可以便当把身体与纤绳脱开。跑船最担心过大峡（指巫峡、西陵峡），那里抢犯太多。从汉口装棉花到重庆，或是从万县装货走下水，经过西陵峡太平溪一带最多要遇到几百个抢犯。我遇到几回，骇人得很。”

谭邦武的讲述带着相当浓重的乡音，我力所能及听懂和记下了大半。我不敢说记得准确，但大半准确应该是不错的。坐在他的面前，犹如贴进了长江一段古老的行船史——一段原来如此或纷杂或悲壮或阴暗的岁月。

——“重庆到汉口这一段江上，跑船的要分八个帮。每个帮含三个县，每个帮有自己的旗子。在江上走一看旗子就知道这船属于哪个帮。我们巴东和归州（秭归）兴山一起是‘楚帮’。白旗，上面有一个‘顺’字；还有荆（荆州）宜（宜昌）庙（庙河）帮，旗子是青天白日旗；奉（奉节）大（大昌）巫（巫山）帮，简称奉巫帮，是黄色三角旗；云（云阳）开（开县）万（万县）帮，简称云开帮，旗子也是三角形，但有黑边加上穗；丰都、涪陵和长寿又是一个帮，旗子是一个圈中间是空的，围着圆圈的边上是红花；还有上五县帮，五县指重庆以上的县，具体记不清了……”

谭邦武生于 1913 年 10 月 13 日，接受我采访时周岁 89，虚岁整 90。数月前的一个瓢泼大雨天，不小心他从 20 米高，70 度的陡坡上摔落下来。家中无人知晓，他一个人在急雨吹打的泥水中坐了两个多钟头，才被家人发现送到医院急救。头上缝了几十针，连院也没住就回家了。谭邦武说，要不是摔了那一回，他身体比现在强得多。谭邦武个子很矮，身高顶多一米六，黑亮的容颜上布满饱含沧桑的皱纹。走在山路上，看他敏捷移动的双脚，你只能想到两个字：年轻！

3

2002 年 7 月 24 日，一个太阳初升的早晨，谭邦武的小儿子、两个孙子驾着一艘机动船，从北岸官渡口开到南岸的雄滩来接我。这天，谭邦武要带我上水进峡，沿途指点水路和纤道，直到湖北与四川交界“楚蜀鸿沟”

石刻处返回。我与其小儿讲好价钱，来回百里水路 400 元。

为节省时间，前一天下午，谭邦武已经带着我先到官渡口对岸的巫峡纤道起点看过。起点处一块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由“监修委员渝州童天泽”题书的“我示行周”摩崖石刻，引人注目。据说此四字含义为，若大水将字淹没，水路交通行将断绝。童某何许人用不着深究，此四字却着实无用。“我示行周”，大水未至，是个摆设；大水一来，苍茫一片，与船与人又有何干？

石刻所在的山体一侧的凸起处，几十道上下排列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纤痕，才是撼人心魄所在。那是世代纤夫泣血留痕，那是万千江船刻在山壁上的记忆。谭邦武抚摸着道道纤痕喃喃自语“现在没得了，现在没得了！”沧桑的脸上掠过丝丝惆怅。我猜想，他不大可能留恋拉纤走峡江的岁月，人生活到 90 岁，怀念那些曾与其共渡苦难的纤友才是他的本意。150 里大峡（指巫峡，过去纤夫习惯此称。实则巫峡总长不足百里），过去如果没有纤夫，无风时是绝对不能走船的。想想看，大江咆哮东奔，船要逆水西去，两股力量——人力与自然力的对抗，该是何等惊心动魄！

纤夫所行的纤道，俗称“猫道”。因其在很长的凹形路段紧贴临江崖壁，须弓背猫腰方可前行。切莫小看了三峡中早已荒芜的纤道，想当年它曾是鼎鼎有名的“川鄂大道”重要的组成。这条纤道上，这无声的纤痕，也燃烧过谭邦武青春的血汗，也录下了他悲壮的足印！

谭邦武说，有时傍晚坐在江边平洁的白沙滩上，叼着长长的烟袋锅，看船，看江，耳畔经常情不自禁地响起那些早已随风而逝的川江号子。从武汉“起旱”往四川，那只各路纤夫唱的最多最熟的思乡号子，他至死不能忘。

望见南津关，两眼泪不干。
要想回四川，买个广砂罐。
望见兵书峡，心里乱如麻。
想起爹和妈，钱也用完哒。
过了鳊鱼溪，肚子有点稀。
想起儿和女，没带一颗米。
到了长寿塔，砂罐打劈哒。
还有好多路，二九一百八。

图 4.2 谭邦武老人

图 4.3 纤道上的谭邦武老人

图 4.4 巫峡古纤道·一

图 4.5 巫峡古纤道·二

图 4.6 山壁上的纤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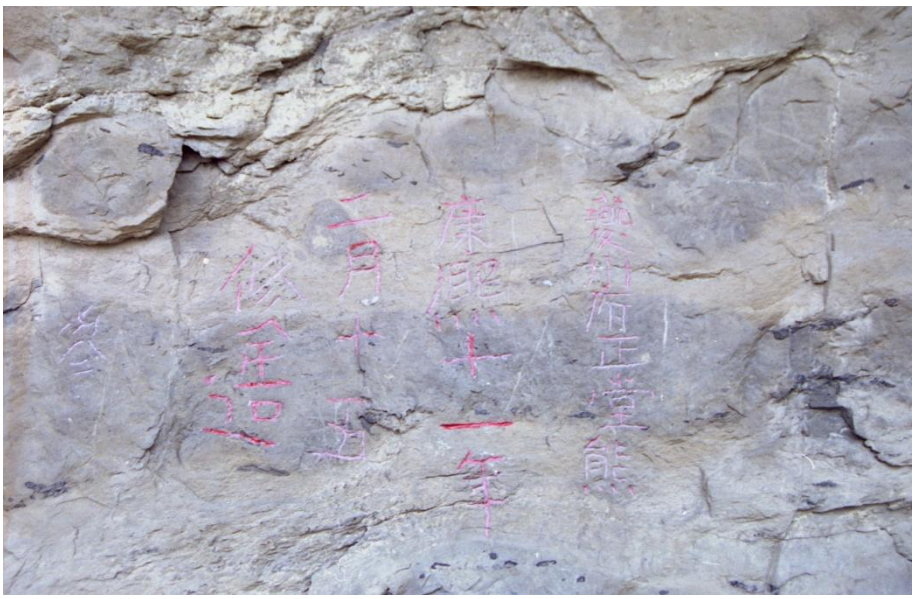


图 4.7 纤道石刻

飘荡的号子声中，眼前是一幅幅飘云似的图画：冬天水冷，再冷也是只穿袍子不穿裤。踏着草鞋的双脚整天泡在冒着白气的江里被冻得通红——痛啊，痛得眼泪哗哗地淌；有一年拉纤回川，走到湖北塔石驿，一个纤夫病了，狠心的船主就把他甩上坡，纤夫挣扎着坐起来喊“老板儿呀，把我装回去，我还没有死呀”；巫峡涨大水，顶着大雨，拉纤走到打卦石，突然间船体失控，往江心“打张”去了，紧靠江边的姓杨的纤夫被带进江里，他只在江面上晃了两下就不见了。那个船老板心眼好，让大家和他一起给姓杨的烧纸。一会儿，天晴了，谭邦武心情非常难过。他一路都在想，姓杨的家在哪儿？家里人该多惦记他。他明白了，干这一行，船今天靠岸晓得今天活过来了，明天活不活谁也不知道……

谭邦武本来是有条件多读几年书的，10 岁前他在官渡口私塾读过《三字经》，可惜长江河的船更吸引他，腿杆比筷子粗不了多少时，他就在江上的大风大浪中跑来跑去了。他说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多读书。

上水拉大船的时候，火烧一样的阳光下，一个重庆戏子撑着伞在坡上紧跟，领着大家喊号子，是令谭邦武最激动的时候。他是从这些唉嗨——，唉嗨——的号子声中解读了中国历史。

盘古开天呐——浑沌初哇
唉嗨咿——唉嗨，
天皇地皇与人皇。
女娲炼石补天上，
伏羲画卦定四方。
神农炼草留世上，
轩辕黄帝织衣裳。
尧舜历山把贤访，
禹王治水分九江。
夏桀无道把国伤，
一统河山归成汤。
挖心死了比干相，
西岐又出周文王。
渭水河边把贤访，
凤鸣山上访贤良。
平王东迁运不旺，

五霸诸侯各逞强。
孔圣列国常来往，
三千弟子读文章。
齐陵绝壁归幽死，（此句按音记录，意思不清，笔者注）
孟子去见梁惠王。
六国归秦始皇葬，
楚汉相争摆战场。
九里坡前打一仗，
逼死霸王在乌江。
新朝皇帝是王莽，
刘秀十二跑南阳。
吕布杀死董丞相，
桃园结义刘关张。
圣人五关斩六将，
三请诸葛卧龙岗。
二统河山司马掌，
东西两晋宋陈齐梁。
杨广无道施乱棒，
白虎将军三投唐。
存孝打虎太原伤，
犯辽水守王燕章，（按音记录，意思有误，笔者注）
柴王善阳□把位让，
河东又出宋贤郎。
八虎曾把幽州闯，
十二寡妇逞刚强。
宋朝出了包拯相，
铁面无私保宋王。
……

人生如梦，转眼一辈子就要走到尽头。日夜东流的长江水，带走了谭邦武的青年、壮年的几十年时光。长江之水不苦也不甜，但它有惊天大浪——就好比是谭邦武的一生，看似平静，其实走到今天也没有那么容易呢！

4

谭邦武 90 年的生命足迹，只印在武汉–宜昌–重庆的 1500 里的长江两岸。气势磅礴的江水是他的眼睛里的全部世界。他投入了所有生命的激情解读长江——一本他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宜昌至重庆是谭邦武走的最多的水路。千里江段上，素有九滩十三峡之说。自西陵峡起至重庆的九滩他记得深：泄滩、灯滩、鳌滩、咤滩（黄魔滩）、雄滩、焦滩、铁滩、寸滩和福滩。如果再细分，还有一百零半个碛坝。而实际上，川江航道滩险和碍航礁石多达 311 个，平均每 3.3 公里即有一处。

高亢的川江扳桡号子（数板号子）里唱的由重庆至奉节再至宜昌的千百里峡江的丰富物产和风光险境，就足以让你领略行船之壮之难！

第一首：

好耍要算重庆府，
卖不出去能卖出。
朝天门过船往下数，
长寿进城爬陡坡。
梁平柚子垫江米，
涪陵榨菜露酒出。
石柱黄连遍山种，
丰都出的豆腐乳。
脆香原本是万县做，
其名又叫口里酥。
夔府柿饼甜如蜜，
巫山雪梨比昭通。
残言几句随风散，
书归正传来扳船。
奉节本来叫夔府，
古迹白帝城托孤。
臭盐碛武侯显威武，
河下摆下八阵图，
石板峡口水势猛，

仁贵东征立桩拦匈奴。
二十四珠船随摆，
一点儿航向不要输。

第二首：

夔府开头把艄出，臭岩碛摆的“八阵图”。
滟澦石，孟良梯，“倒吊和尚”半岩里。
推“黑石”，望“黛溪”（大溪），一声号子下“帽须”。
螃蟹碛，鲤鱼滩，错开峡，在南岸。
梭罗树，斩龙台，“烧火佬”对岸升子崖。
“宝龙”摆渡下马滩；红石梁，望巫山，
巫山有个孤王沱，喊不得号子打不得锣。
龚家坊的猴子多，“跳石”的豆腐下不得河。
“霸王杵”，不算恶，“金盔银甲”两面托。
青石洞，两条河，推了“大磨”推“小磨”。
孔明碑，黄石窝，不知不觉碚石过。
鳊鱼溪，两交界，四川走到湖北来。
棺木峡，冷水碛，楠木园好猪蹄。
楠木园的猪蹄下得大，梁家棚的柚子赛珠砂。
西壤口，万户沱，东壤口的炭圆子（煤球）装过河。
好个巴东县，衙门像猪圈。堂上打板子，大河听得见。
无源洞，宝塔河，横梁子的梨子多。
“牛口”的泡漩还好躲，“八斗”放滩要掉舵。
“荒草背”，有一啃，“石门”的漩涡赛天坑。
蟒蛇寨，雄黄山，“七姊妹”（七块礁石）下头柳树湾。
羊子石，卢家坊，“两个幺姑”睡泄床。
流来观，沙镇溪，树坪的柿子甜如蜜。
真武碛，墩子石，黄鳝洞，斗蓬子。
方滩拗滩滩对滩，“老虎”“乌牛”肩靠肩。
眼莫眨，手莫停，秭归是座葫芦城。
四季荡，滚子角，莲花三漩屈原沱。
屈原庙，烧炷香，保佑连手下宜昌。
鲢鱼山，蚂蝗沱，“楚王（城）”就在对面坐。

仁爱石，灯盏窝，香溪煤炭真是多。
香溪河里出美女，昭君姑娘桃花鱼。
没奈何，“耍和尚”，“兵书宝剑”抬头望。
锁柱山，米仓口，“白狗”朝天一声吼。
小青滩，对北沱，“太公钓鱼”生得确。
大王山，对新滩，一不小心把船翻。
“凤凰”展翅龙马溪，“牛肝马肺”真稀奇。
大、二、三珠把路拦，“崆舲”更是鬼门关。
上“虎头”，下“鹿角”，“红石子”一关难得过。
“黄猫”“灯影”真好看，狮子龙灯玩得欢。
平善坝，南津关，快数票子把税完。

峡江的船工分工很细：推下水船时叫桡夫，拉上水船时才称纤夫。在船头撑篙的叫掌篙。掌艄的为前驾长，大船后面掌舵的为后驾长。给小船拖艄的就是人们熟悉的艄公。桡夫首领被唤做领桡，纤夫首领称头老。而船工号子按在岸上和江上一样分出多许门类：如拖杠号子，扳艄号子，推桡号子，摇橹号子，掌纤号子，拉纤号子。

万峰壁立的三峡，道道急流和慢水，演变成不同节奏的船工之歌。这其中最浪漫悠长的当数在慢水行船时的数板号子了。试想，下水船在与急流险滩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之后，平安驶入宽阔平静的江面上，激越高亢的号子响彻在大江与群峰之上的时候，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冲天气概！

年复一年，峡江两岸的号子唱了千百年。水急滩多的大江之上连绵不绝的声声号子，是世界上最悲壮的命运交响曲！

谭邦武迎着这只交响曲，认识了人生，认识了峡江。

那天，我坐在谭邦武亲自驾驶的其小儿子的机动船——老人也会驾驶现代的机动船——逆水而上。个子矮小的他，身穿白色土布衣，头缠白布帕，手握舵轮，任青山巍巍从船体两侧滑过,炯炯目光只是直视前方水路——俨然一位老船长——他就是真的老船长。他告诉我，2000 年美国人到三峡拍《熊猫和女人》，让他演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船长，他连妆也没画。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说“你这个船长太棒了，根本不需要化妆！”

当年的谭邦武拉纤跑了十几年之后，他有了自己的船。不是买的，是自己造的船。生而知之不是神话，谭邦武造船即可为证。没动手造船时，他就感觉自己能造船，及到动真格的，毫不吃力就把船造成了。这辈子他

造的大小船只足有 3、40 艘之多。且他造船不是死守一格，在江上行船，他十分注意观察过往船只与自造船进行优劣比较。待造新船时，取长补短。因之谭所驾驶过的每条船皆是得心应手。

有了船，他当上了小老板儿——即一船之长，船长。只是他这个船长与众不同：他敢于夜里走船，而且走险滩！

——“你是不是不怕死，或是年轻爱冒险，才不计后果闯滩走夜船？”我问他。

——“我决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不会拿命不当回事。我敢走夜船闯滩，因为我了解水路的情况。”

谭邦武带我行船在巫峡，他不驾船时，指点两岸青山诉说记忆中无穷无尽的故事。

10 岁，他随父亲上船时，父亲就告诉他，“十年能读一个举人，决难造一个江湖”。他记住了，并为做一个真正“江湖”奋斗了一生。

从宜昌到重庆，一路汹滩恶水。谭邦武走过多少回，他说不清，但要问他这一条水路的水情，他至今如数家珍。

他记得大水，小水时江边石头的变化，每个险滩不同的水流声音；他也记得，千里峡江水下两条路，生路和死路的流向；他还记得，峡江上空不同时节不同时辰星宿的位置……

西陵峡的青滩（即新滩）是峡江上距离最长的的险段。古名亦称豪三峡。汉晋时大山滑坡，江流被堵，故更名新滩。新滩全长三公里，自上而下由头滩、二滩、三滩（又称上滩、中滩、下滩）组成三个险段。头滩由鸡心石和天平石将江水分成三个航漕。三漕中只有南漕是主航道。看似宽有 50 米，实际可航宽度仅为 30 米。稍有不慎船体即要冲上暗礁；二滩水势更为惊险。从头滩到二滩要走一条 S 形航道。滩内有靠把石、黄腊石以及巨石圆如豆突出江面的“豆子石”。豆子石周围泡漩滚滚，吼声震天。而三滩亦是“石多激成泡漩。滩北曰射洪碛，石逼水狭。滩南曰鼓沉滩，滩声怒吼如鼓”。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行船过新滩时，曾以“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城”的诗句描绘新滩激浪如雪的壮景。

自古以来，外来船过新滩，都要找当地人领水“放滩”。历代沿袭，“放滩”也成了新滩人独有的职业。峡江上自从出现了谭邦武，新滩的老“放滩”才长了见识。开天辟地，只有谭过青滩无须他人领水；只有他本事比老“放滩”更胜一筹——不仅白天，连夜间谭也可以从容闯滩！新滩人瞪着大眼看谭邦武：“这个人是神！”他们惊呼。

5

自官渡口逆水行舟 30 里，终于到了链子溪纤道。链子溪纤道是巴东县境共 66 华里的纤道中最为险恶的一段，其位在江南岸。整个纤道开凿在临江的悬崖峭壁上。纤道宽 3 尺许，最窄处宽不盈尺。拉纤走到这段路上，常有不测之险。纤道内侧石壁上的一块石刻有如下文字：

夔州府正堂熊
康熙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修造

康熙十一年即是 1672 年，算起来至今已经 330 年。此次修造，不是造路，而是在这一险要地段的绝壁上，凿置了横、直、斜三条铁链。我们来到这里，三条铁链只余下两条，那条直链已经不翼而飞。据说，纤道将被水淹没，有人相中了铁链的文物价值，偷将直链掠走。还不止纤道上的铁链，从链子溪上水两里路的南岸火焰石信号台下的江边，还曾有一大两小三柱纤夫石。涨水时节，石体一半沉入水中，远远望去，赭红色的圆柱宛若一团火焰燃烧在江心。纤夫石上刻满道道纤痕，它记录着峡江风云，也记录着纤夫的苦难。

谁想得到，当岁月的激浪把纤夫和声声号子冲向遥远的天边的时候，峡江边留下的一柱柱纤夫石，也成为文物大盗的目标。1998 年 5 月起，文物大盗频频出入巫峡火焰石村。一年以后，纤痕最深的那柱最高最壮的纤夫石终于被盗走。据目击者言，该石是一个外地人租用官渡口的私人机动船盗走的。盗石速度奇快，从船靠岸，到搬石上船前后只用了 40 分钟。另两柱纤夫石，消失得也很蹊跷，摄影圈里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有个别人，为使自己的拍摄成为“绝照”，故意雇人将残存的纤夫石推入江底……我对此说深信不疑。因为在西安昭陵陈列馆参观唐代石刻珍品时，有好几块书法名碑都遭到类似厄运：前人拓片之后，毁掉部分碑文；后人再拓，再毁掉部分，一代一代谬种相传。直到今天，我们的面前空见满石碑的凿痕——中国文人丑陋的心灵史！

文化人狭隘、自私的劣根性曾导致多少文化精粹毁灭，没有人算得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感叹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其实，中国的文人岂止仅仅是“相轻”啊！

6

谭邦武和我坐在链子溪纤道旁的一块平滑的大石上，此地阴凉，不知何处吹来的清风使人惬意。老人突然豪兴大发，唱起来：

吆吆喝喝走川河，
无可奈何走泥河，（指沙市以下船夫不喊号子，笔者注）
好吃好喝走糖河，（指汉水行船，笔者注）
爱玩爱耍走香河。（指老河口，笔者注）

唱罢一段还觉不过瘾，又在我的鼓动下，唱了几段“生活”的号子：

太阳一出照白崖，
白崖一束牡丹开。
黄花带动黄小姐，
白花引动白秀才——
梁山伯引动祝英台。

挣了一滩又一滩，
转弯就是泥巴湾。
湾湾里头好气派，
吹吹打打闹翻天。
轿儿抬得是新娘。
滑竿里坐着舅老倌。
老子还是单身汉，
无儿无女好心酸……

当年在峡江上拉纤，很少在江边上看到女人。如果见到有妇女出现在江边洗衣或挑水，纤夫们顿时就会情绪高涨。

二四八月天气长，
情妹下河洗衣裳。

手中拿根捶衣棒，
活像一个孙二娘……

此时的号子随编随喊，喊得惊天动地般的火烈。船靠码头，更是吃的快活，玩的也快活。纤夫是个有今天不知有没有明天的职业。用纤夫自己的话说“是骑在青龙背上吃饭的人”。他们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酒足饭饱，随便找个女人就去睡。重庆、万县、沙市妓院多得很，高低档全有。还有“私窝子”，因价格便宜，是纤夫常光顾的地方。

1949 年解放后，一切都不同了。拉纤的号子的内容也为之一变：

想起从前我错得多，
滥嫖滥赌都搞过。
外吃几口洋大梭，
三亲六戚都劝我。
我反说他龟儿子哒胡乱说。
田地房屋遭不住我几家伙，
烟瘾发作莫奈何。
老婆改嫁散了伙。
卖娃儿一块一个就得脱。
南门外的鸡公我偷过，
北街上我拿过几个铁秤砣。
1949 年人民解放了，
解放军把我送进戒毒所。
每天三堂政治课，
中午还扭大秧歌……

链子溪勾起了谭邦武太多的回忆。唱罢号子，顺手拔起一缕谷草对我说，这叫“龙须草”，巫峡里最多，专门用来打草鞋。以前拉纤，纤夫穿的草鞋都是用这草打的。他还告诉我，那时拉船走到这里，总要格外小心。民国二十年夏天大洪水，上水拉纤刚走到我们现在脚踩的这个地方，水流太急，用力太大，纤绳突然嘣断，算上他四个纤夫一下子就带走了三个。谭邦武一个人听着呼呼峡风和野兽的叫声，惊吓地过了一夜。

川江行船，纤绳皆由竹子制成。用竹不用麻的道理在于竹绳可以飘在

水面，不易被水下乱石缠住。根据船的大小，决定纤绳的长短。最短三十米，最长可达几百米。纤绳规格依次为 12、18、20、24 条篦片编成。纤绳编好后，须用石灰水煮过。这样一来纤绳不仅可以变软而且结实；而拉纤的人则最少一人，最多百十号人。船在江流行，每过险要处，拉纤的程序相当地明确和严格。1898 年驾驶“利川”号轮船首航峡江的英国人阿奇博尔怕德•约翰•立德，曾于 1883 年春天乘木帆船从汉口至重庆，在峡江上走行了一个半月。他在《扁舟过三峡》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拉纤过程：“一艘 150 吨的大帆船拥有 100 多名船员。其中 70 至 80 人为纤夫。他们的行动以击鼓协调。鼓手在船上由舵手指挥。12 至 20 人留在船上撑竿。当船要擦过卵石或岩石时要将船撑开，还须操纵用一整棵小冷杉树造成的船首大桨。另外 6 人离船在岩石上像猫一样跳来跳去，从岩石角上拉开总是不断被挂住的纤绳。此外，还有三、四名特殊的游水人，称作水纤夫——像亚当一样光着身子；他们跑动着，有时在前方的岩石上蹲着，随时准备跳入水中，从在岸上够不着的岩石上将被钩住的纤绳拉开。胳膊粗的纤绳（竹）……纤夫需要有高度技巧才能不断地将它卷起或展开，以适应所走路线对纤绳长短的要求。尽管纤绳有极大韧度，但被岩石不断磨损，一根纤绳只能使用一个单程旅途——在拉纤沿途的巨石（原文错为花岗岩）上，留有纤绳出的深深凹痕，就足以说明这一事实……”

重踏六十年前走过的纤道上，望着脚下滔滔江水，谭邦武有些激情难抑：

重庆开头两条江，
上有坛子下有缸。
寸滩过时要搭帮，
唐家沱靠头要打桩。
好一个缎子铺盖抱不上床;
好一个铜锣敲不响……

谭邦武说，这六句是上五县的号子，唱起来味道不同。而船过西陵，那号子唱起来气势更壮：

西陵峡上滩连滩，
崖对崖来山对山。

青滩泄滩不算滩，
最怕是崆岭鬼门关。
船过西陵我人心寒，
一声号子我过了青滩，
一声号子我一身汗，
一声号子我一身胆……

怪我不会记谱，记不下这号子的旋律。我所能记下的是，听到这号子在大江和山谷间响起的时候，我感觉天高了，山高了，江阔了，仿佛看见有队队纤夫，拖着远古的苍凉向我们走来。

7

如果仅仅是拉纤走峡江也就罢了，事实却远非如此。峡江两岸是个多彩的世界：扯不断的人情，读不完的社会。

船老板儿最怕船宿沿江荒滩。因为劫犯往往此时光顾。每遇此，下个力的纤夫固然可以“棒老二，棒老三，穷人不相干”而保住性命。但船遭大抢，也意味着他们将要一趟白白辛苦。

有时船老板儿被抢狠了，他们也要使出杀手锏。旧时万县码头有个川江都出名的袍哥大爷叫姚汉卿。船老板儿要算计货主的时候，常要先与其勾结。那时大宗值钱的货要数盐巴。货主将盐巴装船，船老板儿要是瞄上了他，在船还没启程前，悄悄将盐巴托付姚大爷在岸上卖掉。然后换成一船石头将船重新伪装。船走下水，待其行到烂石滩，即放船冲过去，俗称“放炮”或“腾空放炮”。按江湖的规矩，逢此情况“船老板儿不要船，货主不要货”，而纤夫当然是不要命。

万县而外，沿江码头甚至各个滩险皆有一个“大爷”顶门立户称王称霸，且“大爷”非青即红，皆在帮会之内。各个滩口，还有“滩王”，亦是如此。船不入帮会，靠岸也困难。头解放巴东的码头大爷叫孔金山，人称孔大爷。此人生性凶残。仇人到他手里，必由他把人带到县城高处校场坝，亲自血刃。

但在帮会内却也看重江湖义气。如果你从巴东初到奉节大南门泊岸，临时有难处求救，找到码头红帮“龙头大爷”，亮明帮会身份，这一套江湖话是必须要说的。

——“兄弟姓谭，草字邦武。坐于巴东小码头。久闻你龙贵大码头，山青水秀，地利人贤。兄弟恐请示不到，特带来单张草片（名片），恐款式不合，有掉红掉黑，卷边折角。恐言语不清，吐字不明，礼节不周。兄弟多在山背，少在书房，一切不周不到，请大五哥高抬龙袖，亮个膀子，给兄弟搭一个龙凤旗，朝阳旗，花花旗，给兄弟搭一个好字旗……”

对方听罢此语认定是“自己人”，就会多方关照，走时还会送上盘缠。

在往鳊鱼溪去看石刻“楚蜀鸿沟”的水路上，谭邦武讲述了沿江码头种种旧事之后，回过头来又讲起我们眼前奔腾翻滚的峡江。

自链子溪逆水而上，过了火焰石，过了楠木园，渐渐可遥望见铁棺峡……七月的艳阳像在头顶上燃烧的火，烤得你眼睛都难睁得开。

——“江上平安驾船不容易。人家都羡慕我家，六代驾船没出过事。没出事，除了一代传一代记住了川江水上水下的情况，我还教育子孙，要懂得在江湖上怎样与人交往。‘逢人宜结交，遇水搭浮桥’。老百姓生活就是为儿为女为吃穿，江湖上遍是仇人，不要说养家糊口，连性命都难保。在川江河里跑了这么多年，我一做到了宁可自己吃亏，不伤别人，二是尽量做有人道的事。舍得命不贪财，才是个好水手……”

谭邦武不是好吹牛的人，但你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品出侠气——这是饮了峡江水，吸了峡江风而得的精气神。

我没有料到的是，老人竟然是个强烈的爱国者。他平生最恨的是日本人，“日本人无恶不作，太过份了”他说。抗战时期，其亲见日本飞机在巴东扔炸弹，把船炸沉了，炸飞了，人死得多，有不少是震死的……遇到日本轰炸过后，只要他在场，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到江里去救人。

一次轰炸之后，谭邦武驾着木帆船上水而行，将到火焰石，突见一条比他的船大几倍的货船顺水急飘下来。百多个人扒住船舷急呼救命。原来是此船过火焰石的时候，听到前方日本飞机轰炸声，开船的心慌，忙乱中将船尾撞在礁石上，船舵被打烂，船体随之失控，急速下飘。谭邦武清楚，如不及时救助，该船很快就要再撞到下面的险滩。他从容地迎过去，凭多年行船的经验，他麻利地将自己的木船绑在货船的尾部，充当临时船舵。货船就这样，安全地在巴东靠岸。谭邦武从船尾泅水上岸后，眼前的场面让他惊呆了：百多货船上的老老少少，一起跪在了他的面前。他们纷纷拿出随身贵重物品送给他。谭拒绝了大家的好意，只收了船老板儿几十元修船钱。

谭邦武说，以前的老规矩，开船之前必须要敬镇江王爷菩萨。菩萨是

用黄裱纸糊的，供在船头。还要点蜡烛，摆酒肉。嘴里要念“镇江王爷菩萨，请保佑我的船亲亲切切去，亲亲切切回。”谭邦武是如此供奉的最大收益者，他家六代都得到了镇江王爷菩萨的保佑。现在不兴这一套了，谭邦武很为此惋惜“不敬菩萨，行船就没规矩，半散法儿，没有不出事！”不管别个怎样，他家的船上路前，供奉依然。他和他的后人都相信神灵：

打青滩来绞青滩，
祷告山神保平安。
山神若要动肝火，
人船定要上阴间！（《船工谣》）

8

人活到 90 岁，生活就改变为另一种方式，另一种内容。

二期水位蓄水前，他每天作息的时间表是，黎明即起，自己清扫庭院，吃罢早饭，去到江边，把自养的几十只山羊赶上自造的白龙舟。然后摇船到江南岸，把羊放到山上，自己再摇船回到江北官渡口的家。接下来，一整天在田里干活。傍晚，再独自摇船去南岸把那十几只山羊接回来。有时因为忙，让山羊在山上过一夜也是常事。那些羊似通人性，不见谭邦武的船来，躲在山上，绝对不露面。

他家的房舍就在离巫峡东出口不远的小山上，老伴前些年去世，空荡荡的家只住了他一个人。他戏称住的是庙。不是儿子不孝顺，独居是他自己的选择。

周而复始的生活确实也无聊，遇到涨大水的时候，有货船找到他引路，从巴东到宜昌来回 50 元。他不在乎钱多少，别人还记得他，他就感到莫大的满足。老人抽了一辈子旱烟。巴东的土烟颜色黑的像雪茄，劲儿足得很。我要到街上给他买一捆，谭邦武说，不行。一定他亲自去挑才行。买了烟，我抱着土烟跟在老人后面回驻地，老人乐得像个“老小孩”。但他还是孤独的。土烟成了他晚年寂寞生活的的伴侣。人生到了他这把年纪的时候，所有经历过的感情都过滤和沉淀了，只把最深的思念留在心头。

谭邦武的内心世界远比我想象的丰富。那天从川鄂交界的“楚蜀鸿沟”的石刻返回巴东的水路上，他十分动情地回忆起早已故去的妻子和母亲。妻子彭碧秀与他青梅竹马，十八岁结婚前即约定“一辈子不求荣华富贵，

只要共苦共难。”那时从重庆到汉口拉船来回要走半年，通称“汉半年”。估摸着谭邦武拉这趟船要过巴东时，彭碧秀就站在江边拿着好吃的等他，一天，两天，三天，不见谭的影子，等到天黑也不回家。最让谭邦武感动的是前面写到的链子溪遇险那一次，妻子在江边眼巴巴望着过往的船只足足等了他两天一夜！当他狼狈不堪地回到官渡口时，妻子抱住他哭声震天响。

那首道尽峡江船工妻子哀怨的《望夫愁》，妻子曾当面唱给他，谭邦武一直记在心：

望夫愁，望夫愁，
夫不归，妻不走。
日日望，月月望，
年年望，不回头。
化为石，望不休，
夫归来，妻开口。

而母亲在谭邦武的心目中更加神圣。只要走到官渡口那条长长的古街上，母亲的身影总会浮现在眼前。曾经立在街口的一个小庙是谭邦武幼时读私塾的地方。母亲攥着省吃俭用攒下的钱，把10岁的他送到这里的时候，心中曾升起祖祖辈辈企盼振兴的希望。整整一年里，家中祭祖的神龛天天都燃着香火。可惜了老母亲一片心意，书读了一年，禁不住江涛的诱惑——他上船了，开始了跑船的生涯。他说，一辈子就见母亲哭过两次：一次是他告诉母亲决定不再去学堂，要随父跑船；另一次是他第一次离家上了父亲的船的那一刻。而在当时，小小年纪的谭邦武面对母亲的伤泣却是一脸茫然。后来他懂了，越来越懂——但他已经失去了母亲，失去了读书的大好时机。

如今谭邦武也老了，闲在的时候，他喜欢叼着长长的烟袋锅，一锅接一锅抽提神的土烟。烟气随风而去，思念随江而去……突然有一天他想到了有生之年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把病故在秭归弟弟那里的母亲灵骨运回官渡口与父亲合葬。

2000年秋天，他带领百多个谭家后生，赶着5条船去秭归为母亲起灵，了却了平生最后的心愿。谭邦武抱着母亲的灵盒返回官渡口上岸时起，到母亲的灵盒下葬，他的眼泪，他的哭声感动了所有的乡亲。他们说，官渡

图 4.8 楚蜀鸿沟

口古来没见过 80 多岁的老翁如此痛哭老母。谭邦武也说，他一辈子没有这么哭过，那一次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完了。在新起的墓碑上，他专为母亲写了一段话“我的母亲是治家的母亲，是助人为乐的母亲，是真正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

90 岁的谭邦武能够喊出自己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真让我深受感动。

谭邦武至今仍是过去行船的装束：头缠白布帕，身着粗布衣，足踏茅草鞋。90 高龄的他仍然步履轻盈。他走在江边上，你从背后望，多像是一位走向木船，即将远行的纤夫。

上坡打赤脚，
拉纤无奈何。
这是为什么，
为了爹妈好生活……

从“楚蜀鸿沟”石刻处回来，将要在官渡口泊岸时，谭邦武又唱了这最后一曲峡江号子。太阳将要落山，江面上隐隐升起蒸腾的雾气。他紧靠船舷，对着烟水苍茫的大江，唱得十分动情。我猜想，这号子声中，包容

着太多人生的辛酸，太多遥远的思念。

人生本来就是一条奔流的河，一首凄婉的歌。当这条河最终流向大海的时候，所有经过的人生风浪都会显得渺小；当最后一曲歌声唱罢的时候，即宣告人生最动人的时刻的终结。

谭邦武，纤夫曲，峡江水，将与时光俱东去。

往者已矣，唉，往者已矣！

第十九章 巴人何处寻

1

2002 年早春时节，我与湖北长阳县的几位朋友，乘一只游艇在清江访古。清澈的江水，因下游隔河岩水库大坝拦截，变得如湖面一样宽阔。春光在天，春风拂面，江面上翻动着翠蓝的涟漪。远山近水，妙景如画，令人心旷神怡。莫小看了我们这次清江之旅，因为我们前来追寻的是弥漫在整个三峡的巴人文化的源头！

清江，古称夷水，是长江在湖北省境内除汉江外第二长的支流。它发源于长江南岸鄂西南山区的利川市齐岳山，由西向东流经利川、恩施、宣恩、建始、鹤峰、巴东、五峰、长阳等 10 个县、市，在湖北枝城汇入长江。干流全长 423 公里，流域面积 17000 平方公里。

清江是一条神秘的江。其 800 里流程的两岸，埋藏着一个多少年来一直牵系着历史学者心魂的巴人之谜。

巴人有别于中华56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民族。他们曾是孤独的原始部落，又曾是生存在峡江两岸有着自己图腾的族群，还曾自周至秦汉以骁勇善战威震四方。巴人、巴山、巴峡、巴县、巴东、巴蜀，巴王沱、巴山寨、巴王洞、巴雾峡……川鄂的山山水水遍布他们留下的足痕。但自秦汉以来，巴人悄悄地收起他们的踪迹，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

巴人究竟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多少年来，一直是史学界困惑的话题。

2

关于巴人初始，史学界有过多年争论。一说起于嘉陵江流域，一说起于汉水之滨，一说起于清江两岸。应当说，三处巴人源起地各有其理各有

所据。但经过数十年研究争论，现已基本达成共识：最早的五氏巴人就源自我们此刻面对的武落钟离山。该山立在水库边。山不大亦不高。满坡拥翠，亭阁危耸。故老相传，远古一个名叫廪君的人物相传为巴人首领即出生于此。有关这一段史实的记录出自《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皆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后汉书》记述的廪君部落，尚处于原始的渔猎时代。作为部落，为求发展它当然要不断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于是《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中继续有如下记载：“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上面文字中“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句，引发了史学界多年的争议。“从夷水至盐阳”之“从”字是顺流而下抑或是顺流而上？盐阳究是确指今日何地？这是事关巴人后续发展的又一个争论焦点。依我所见，上与下，无可无不可。早期巴人，能力所及，活动的区域不会比方圆百里或几百里的地方更远。当地一首创世古歌唱道：“向王天子一只角，吹出一条清江河”及《水经注•卷三十七》有云：“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皆可为佐证。廪君的生命至多不过几十年，直至其死在夷水之滨化为白虎，巴人的生存能力不会有质的改变。巴人出夷水入长江，理应是廪君之后若干年的事情。

3

五氏巴人是不是从远古的清江两岸走来——让我们再去追寻一段曲曲折折的往事。

1943 年，正是日寇进犯湘鄂时期。距长阳县西南百里的大堰乡钟家湾中心小学附近的一个“龙洞”里，突然来了十几个流浪汉，说是要挖“龙骨”做药材为他人治病。他们的举动引起学校孩子们的好奇，学生下课也跑到洞里找“龙骨”。这事被当地地主周古育知道后，他气势汹汹找过来，

说此洞是他家地脉龙神不许再挖，把流浪汉都吓跑了。然后，用大块石头把洞口封得严严实实。此后 10 几年，再无人涉足此洞。直到 1956 年 7 月，当地为办“副业”挣钱，有人又想到了挖“龙洞”的“龙骨”出售。洞口再次被打开。此时，巧遇长阳县中学教师陈明智带着学生到钟家湾采集化石标本。他们在水田子供销社收购的数万斤“龙骨”中选出一大箱化石，其中有一块人的附有两枚牙齿的上颌骨化石。稍后不少“龙骨”被转运到武汉，被湖北省主管部门发觉。当即电告长阳县文化科“长阳县破坏古脊椎动物化石严重，必须立即调查禁止。”省博物馆的毛在善先生遂即赶到钟家湾。其从数万斤“龙骨”中选了 3 箱标本后，又得知陈老师此前曾挑走了一块人的上颌骨，毛与县文化科的另一位同志就到县中学去取，可能是态度过于生硬，陈老师难以接受，拒绝出示。虽然最终上颌骨还是交到毛在善先生的手里，转交到中国科学院。但此时在陈明智老师心中却结下块垒。加上转年“反右”开始，陈老师又被划为“右派”，其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份了，哪里还顾得了那块人骨头！

科学的发现往往是在不经意之中：就是陈明智老师珍藏的这块上颌骨，改写了中国古人类的历史。

4

九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宿舍的一套极为简朴的寓所里与贾兰坡教授倾谈。那时他的身体尚可，只是眼睛读书有些吃力。老人是河北玉田人，与我家祖籍滦县同属唐山地区，因此我们是老乡，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日我们从周口店“北京猿人”谈到长阳人，我清晰地记得他曾极为惋惜地叹息说“长阳古人类遗址发掘，投入财力不够，留下的空白太大。后来许多遗址又被水库淹没，那是十分可惜了。我们 1956 年秋发掘到一颗‘长阳人’臼齿的那个洞子，如果能再找到古人类遗物，对‘长阳人’的研究价值就更高了！”

贾兰坡教授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曾参与过北京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的发掘，学风十分严谨。陈明智老师献给国家的那一个上颌骨，被贾兰坡教授命名的“长阳人”。这个“长阳人”竟然把清江的古人类史往上推移了 19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向世人宣告，“长江文明”亦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祥地——以此向传统的“黄河中心”说发

出了最具冲击力的挑战。

1984 年 10 月，也就是“长阳人”发现 27 年后，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之际，贾兰坡教授寄来题词写道：“‘长阳人’不可能单独存在，附近还会有更多的材料，应进行大量调查工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贾兰坡教授的推断是正确的。1988 年和 1989 年冬至 1990 年春，为配合即将在清江上兴建的隔河岩大型水电枢纽工程建设，湖北省和长阳县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位于长阳县西 97 公里清江北岸的香炉石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结果是在不到 400 平方米的发掘现场，上下共 7 层的地质剖面上，共出土自夏、商、周至汉代文物万余件。其中在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的第 5 层剖面，出土了湖北省乃至长江以南地区最多的卜甲和卜骨。尤其卜骨，相当部分是就地取材，由大鱼的鳃盖骨制成的——这是我国甲骨考古中所仅见。

香炉石的考古发掘既展示了继“长阳人”之后，清江文明自夏至汉，层层衔接的完整过程，也表明其文明早期独立进化的特色。如鱼卜骨，如陶网坠，如迄今为止最早的陶印章……，以此可以断定，“中华文明”决不是仅仅由一个点或是一个局部，比如说以“黄河文明”或“长江文明”为中心发展而来。客观地说，“中华文明”应当是以多个不同地域的“大中心”和“小中心”在其各自独立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再融合的结果。因此，当我们今天常常堂而皇之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时候，我们实际已陷入了“黄河文明”中心论的历史误区。“炎黄子孙”，这是一个极端伤害其它几十个民族心灵情感的称谓，一个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自白。

“长阳人”起码应是五氏巴人的始祖。

5

关于巴人，除开清江流域的五氏巴人一说之外，史学界还另有七姓巴人一说：所谓“七姓巴人”，即罗、朴、昝、鄂、度、夕、龚 7 个姓氏。七姓巴人主要活动在古渝水（今嘉陵江）流域和汉中一带。这一支巴人，天性劲勇强悍。《白虎通•礼乐篇》引《尚书》文所赞称的“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指的就是这支巴人。顺便说一说“前歌后武”，曾经有学者如范文澜，认为此句特指武王伐纣归来，巴人载歌载舞以示庆贺。经过考证，此说已被“战场上巴人凌舞威吓敌方”所替代。

笼统地说，周克商后，巴成为西周封国。骁勇善战的巴人仍然活跃于

峡江两岸。这时期最著名的巴人当属一个名叫巴蔓子的人物。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云，巴蔓子据传生于距今约 2500 年前的临江城（今忠县）。东周末年巴国发生内乱，巴蔓子求楚国出兵相助。“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弥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谢授楚使。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今长江北岸的忠州城，传说就是巴蔓子许诺给楚的三城之一。忠州本名临江县，为纪念巴蔓子之忠勇，唐代特将临江城改名为忠州。有民俗学者告曰，至今每年三月三巴蔓子遇难日，忠州一带百姓，还举行三月会。这天，人们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抬着巴蔓子像绕城走一遭。

巴蔓子刎颈留城处据说至今仍在——忠州古城墙东门桥头留下一个不起眼的标记：“巴蔓子刎首留城处”。2004 年 9 月，我去忠州时却是茫茫皆不见。倒是在城西当地人为纪念曾做过忠州刺史的白居易而建的白公祠内见到了一块从前不久拆毁的巴王庙移来的石碑。石碑并且被嵌在号称丁房、乌杨、无名三阙之一的丁房阙下做了基座（迁到白公祠内的三阙中的乌杨阙是复制品，原件搬到重庆）。可怜巴蔓子，你忠忠州，忠州人何时忠过你？而其用块石搭垒起来的陵墓，据传在重庆市渝中区。我曾辛苦寻了好一番工夫，才在解放碑附近一个叫七星岗的地方找到了墓址。但陵墓已被一个家具市场包围。被两道铁栅栏两个大锁隔开。呜呼，巴蔓子！

公元前 316 年，崛起的秦王朝西进，将巴国灭掉。但虽经西周封国的此时巴国，历经 2000 余年，仍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大部分地域尚为渔猎经济，国民以部落形式散居。因此，秦灭巴之后，继续依其原生产和生活旧制。

自四川涪陵向武隆方向南行不远，乌江西岸的一个不高的小山坡上就是秦灭巴后的巴王墓地。此地叫小田溪，想当初应是泉流淙淙，绿树环拥之地。但现在不同了，小山下乌江边挖沙的大车忙忙碌碌来来往往，小山上农舍相连，菜畦片片。如果不是见到嵌在山腰小路一侧的“小田溪发掘遗址”的石碑，简直无人能相信，这就是埋葬巴人先王的墓地，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土了极精美的有错金纹饰的编钟及秦始皇时期兵器等文物的地方。

还值得提一提的是，战国时期楚国郢都中的“下里”，亦为七姓巴人聚居的地方，而他们所唱的“下里巴人之歌”在郢都曾经广为流行。还有，

汉高祖刘邦建国前，曾被项羽封地汉中，称汉中王。刘邦此后也是使用七姓巴人攻入关中，最后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

6

殷墟甲骨文上的“巴方”两字，是有关“巴”的最早的文字记载。郭沫若有诗赞曰“巴人由来古，殷周已见传”。

史书有关巴人的记载，应是战国之后。而战国之前巴人种种基本是传说。因此，五氏巴人和七姓巴人何来何去，两者之间究为何种关联，史学界一直难有定论。

如五氏巴人，有学者说廪君率五姓部落一直沿清江流域活动。另有学者称廪君带领五氏巴人后来离开清江入长江，溯流西进直到了巴东、巫山、忠县和涪陵一带。而七姓巴人则是由五氏巴人分化而来。

两种说法不为传说就是推断。但“清江流域说”传说而外尚有实地作为印证。而“七姓巴人与五氏巴人相关说”仅见于《晋书•李特载记》称十六国时期属七姓分支的李氏为“廪君后裔”——只是一家之言。

巴人何来？在峡江两岸奔波采访，我深感这是一个事关长江文明属性与发展的太大的课题。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巴人或巴文化所以被研究得“复杂”，可能忽视了追究“巴”字的真正含义。极少有学者研究说，“在川东方言中，又长期地呼石为巴，那么巴最初的含义可能就是指‘石’或‘石穴’而言”。另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言“巴”，“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凡巴之属皆从巴”，即巴蛇吞象是也——并未对巴字加以考证。而据《巴县志》载“巴之得名，以阆、白二水曲折如巴”。上述三种说法都不能准确地说明“巴人之巴”到底何指。如果我们稍加留意，所谓“巴”之称谓，在旧石器中晚期之后，就逐渐在包括清江流域、三峡直至重庆千里地域流行。那么“巴人”之称则应是泛指这一带的或大或小的土著渔猎部落的统称。在这个意义上讲，“五氏巴人”和“七姓巴人”可能毫无血缘干系。只不过都包含在以地域划分的泛指巴人的范畴之内罢了。

巴人虽被周王封国，却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其部落逐水而居，哪里鱼多兽多就奔向哪里，从夏、商、周、秦、汉一直延续了数千年——直至魏晋以后悄悄消失。

考古界多年致力寻找早期巴国君王之墓，只是一个浪漫的期待。周王册封的巴国君王，至多是助武王伐纣那一个大的部落的领袖而已。在没有国

家意识沿千里峡江而居的松散的渔猎部落，“国家”徒具虚名，众望所归的一国之君可能并不存在。

7

巴人的消亡，是再自然不过事情。

周之后，自重庆以下千里峡江两岸散居的巴人部落，逐渐受到了来自东西两个方向文化的逐渐侵润。公元前 316 年，秦灭巴后，这种强势文化的侵润逐渐加速，只用几百年，巴人所依的渔猎文明终于敌不过东向来自中原和西向来自成都平原的农业文明的夹击而瓦解。巴人连同他们的语言、文字随之不知去向。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巴人文字，尚是文字起源时的象形图语，其多现于铜戈或錞于上，成为难解的谜。

巴人从峡江消失，一般说来，应当是这样一个过程：一是本地部分族群逐渐融汇于峡江东西两个方向汉文化的时潮。这一点可通过近些年这一地区发掘的西汉中期的墓葬得到证实。如汉墓中出土了类似巴人服饰的陶俑；秭归、涪陵的汉墓中经常出土的巴人器物虎形铜代钩；另有相当部分族群，不习惯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弥散到峡江南北两岸群山深处依然去过临水而居的渔猎生活。已故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考证说，现在土家族即为上述族群——巴人的后代。其刚健飞扬的“巴渝舞”即透漏着骁勇善战的远古巴人的信息。此说得到当今学界普遍认同。

上面所做的关于“巴人”的种种推断，还有一个大前提需要明确：峡江“巴人”是由新石器时代进化而来的土著居民还是外来的侵入者。若在以前，这个问题难有定论。现在好了，只要条件具备，运用 DNA 的基因检测手段，其一可以断定“五氏巴人”和“七姓巴人”是否血脉相承；其二，将峡江一带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族群进行 DNA 比照，可以结论“巴人”是否土著。话虽这样说，做起来绝对不会那么容易——材料的来源太难了。

近几年已经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他们对三峡中某一个村落中的古代墓葬中的死者与村里几户谭姓土家族人的 DNA 进行比较，惊异地发现除一户谭姓外，其余几户谭姓与死者一脉相承。断定此谭姓乃巴人后裔。但此种检测方式也还有可商榷之处——其一，将古墓中的死者断为巴人证据是否充分；其二，权且将这几户土家族人家看做巴人后代，还是难以得出巴人是否土著居民的结论——墓葬距今才 2000 多年，而巴人在峡江的历史至少已经 5000 年——战争、灾害、洪水、迁徙、中原强势文化的

冲击，在这相差的 3000 年中已经使峡中族群发生极大的改变。

8

土家族确实保存了古代巴人的信息，其对白虎的崇拜即为其一。但此说还有存疑：如果土家族确为巴人后代，为什么不索性自称巴人而偏改为“土家”；土家族之“土家”由何而来；再者，当初巴人部落陆续离开峡江沿岸，足迹应遍布江北、江南广阔的地域，因此巴人后代不应仅为土家一族，那么其它遗传至今的族群还有谁家？纳西、苗、壮等族有没有巴人血统？都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峡江北岸支流澎溪河东侧云阳县境发现了一片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群。经过前后 10 年的发掘考证，证明这里自商周至战国曾经是巴人传统的活动地区。而巴人墓葬与生活区相连是三峡考古迄今为止所仅见。20 多座战国巴人墓葬，首次发现了“人殉”。这正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云“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相和。墓葬中人殉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在棺椁外侧的，有独立葬在棺椁内的，殉葬的人没有挣扎的痕迹，应是在被杀之后下葬。

李家坝战国早期巴人人殉的葬俗，是同一时期中原早已废止的习俗。这说明此时巴人还保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时间差。之后的巴文化，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逐渐消融在汉文化的潮流中。李家坝遗址最多厚达 26 层的文化堆积，清晰地记录了巴文化自商至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轨迹。

类似李家坝早期巴人遗存近些年在峡江两岸发现的还有许多。如万州塘房坪、涪陵石沱、奉节新铺村、巫山双堰塘等。其中位于巫山大昌镇以北，大宁河中游的双堰塘遗址极可能就是商周时期较大规模的巴人聚居地——“巴墟”。

2001 年 10 月 30 日午后，搭乘一辆手扶拖拉机沿着大昌往水口镇的公路前去双堰塘探访。双堰塘遗址呈条状布落在大昌镇北 4 公里处公路的两侧。南北长 1000 米，东西约 300 米，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中科院考古所的梁中合先生在考古队员暂时借宿的一幢二层的农舍里接待了我。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一窗绿色，一室清风——我们开始了交谈。交谈中得知，梁是因三峡文物“抢救性发掘”时间紧迫，人手不够，临时抽调来此。此前对双堰塘遗址了解并不多。他听说，遗址的发现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由渔民在大宁河上捞到了一个 80 多公分高的商代铜尊开始的。一个群山环抱的大昌盆地一条平缓流淌的大宁河竟然出现了精致的商代器物，当然要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注意。1957 年，四川省博物馆川东调查组率先发现和确定该遗址，过了又 25 年，1992 年才由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对其进行了初期试掘。果然出土不凡，于是就有了 1994、1995 直到 2002 年的规模越来越大的发掘。我们谈话的房间里，墙根码着几件陶器和一堆陶器的碎片。梁中和说，此遗址曾经出土的西周陶器，如黑皮磨光陶，陶纹丰富多彩和自成风格；还有大量花边口沿器，流行尖底器，流行各种小型的球腹圜底罐等，都表现了鲜明巴人风格。而且，这些正与鄂西出土的同一时期的巴人器物吻合，从而佐证该遗址为巴人旧地无疑。

双堰塘遗址出土的文物和文化断代判断，此地是一个类似部落中心的较大规模巴人居住地。梁中和先生引领我来到考古发掘现场，现场东西各有数十人进行着野外考古作业。另一些人在忙着为下一步发掘“布方”（用拉直的粗棉线将考古现场划出一个个正方形）。“布方”的地点坑坑洼洼，是当地百姓烧砖取土的留痕。梁先生指着远处的一个地方道，“那里曾挖出过窑址、灰坑、网坠，想当初这里的巴人生活定是很热闹呢！”

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紧临南北向遗址平行而流的宽阔的大宁河闪着碎金似的波光。河岸对岸不远是连绵的群峰，我们的身后的远方也是万山相连。狭长的大昌盆地，只有沿大宁河东岸的滩地最富庶和平坦，并且，大宁河往上不远是盛产食盐的巫溪。这里是一个自然环境相对闭塞，地域则是相当富足的地方，适宜巴人长期生存。但实际情况是，地质剖面表明，双堰塘遗址文化堆积层很浅，文化内涵单一，这里虽是辉煌一时的巴文化的一个中心，但绝非是巴人久居之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此地巴人匆匆离开，他们离开又往哪里去了呢？

站在夕阳洒满绿野的双堰塘遗址上，我想象可能是他们集体开拔前往战场，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毁灭了他们的家园，也可能是另一支更强盛的巴人部落将他们全部裹挟而去……每一个知道双堰塘的人都想找到一个答案，都想知道这一群巴人的历史——这其实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链环。答案可能就在我们的脚下，可能找得到，可能永远找不到！

梁中和先生不无惋惜地说，“10 万平米的遗址人力财力所限，到 2003 年 6 月 1 日，三峡二期工程蓄水前，至多仅能发掘 1 万米。而且，被水淹没的恰是古代巴人最活跃的地方！”听罢此言，我心中升起绵绵惆怅。我明白，峡江巴人的历史，虽然我们找到了一个又一个链环，但我们却还没有

能够把这些文化链环衔接在一起。以前我们曾经有机会，但三峡蓄水，这些链环之间的缺失，恐怕要成为永久的遗憾了。

未来呀，你能不能告诉我，谁还能为我们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巴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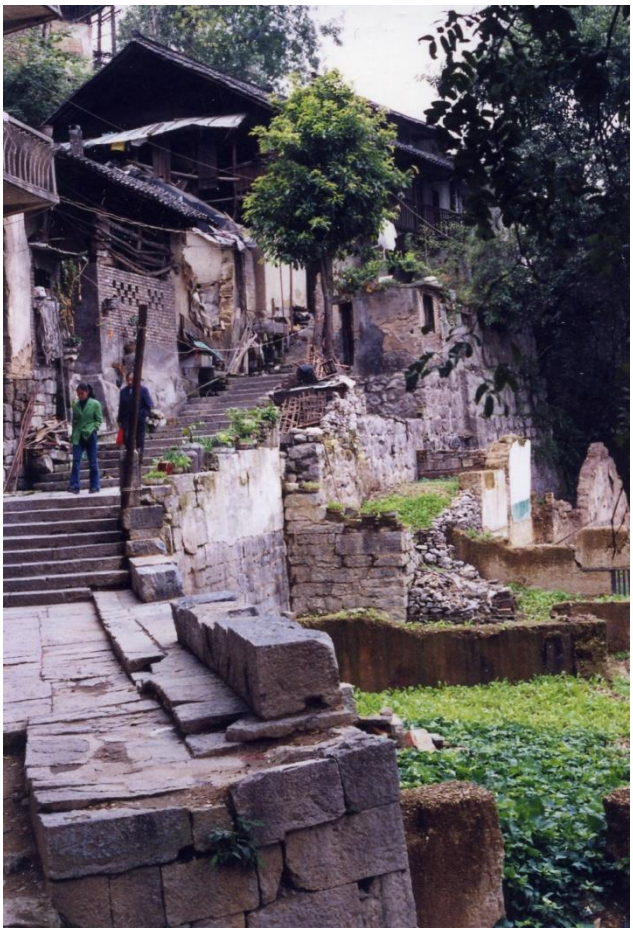


图 4.9 巴东古巷

第五部 西陵魂

船过巴东,顺流东去便进入了 47 公里长的香溪宽谷（亦称秭归宽谷）待到香溪宽谷的尽头，气象萧森的西陵峡西口就呈现在眼前。贴近峡口外的江北岸卧牛山坡面上，一座葫芦状的城池，即是峡江又一座名城秭归了。秭归，不仅是屈原和王昭君故里所在，也是楚文化的摇篮——楚国最早的国都丹阳城曾在县境内挺立了数百年。而秭归城亦有“刘备城”之称谓:“故老相传……盖备征吴所筑也”。其地扼西陵峡西口，自此入峡，驶行 66 公里(中隔 31 公里庙南宽谷)即可钻出西陵峡谷东段完成整个三峡最后一段航程，迎来滚滚长江一泻千里的开阔。

我数度到过秭归，最末一次是 2002 年 4 月 8 日。那天晚上完成了在屈原故乡乐平里采访，驱车沿香溪河走了 3 个多小时，近午夜时才赶到秭归城。此时新秭归城已在三峡大坝南端拔地而起，搬迁中的老秭归城刚刚经历了一次大爆破，江边 18 栋楼房 2 万平方米的建筑，已在定向爆破中化为一片瓦砾和碎石。好在电还通，借着路灯的光影，在废墟中盘了几个圈圈，终于找到一个下榻之处——“八一”招待所。本以为可以在名字如此动听的招待所好好歇一歇，哪想到拖着疲倦之身刚躺下，一股腥臭味道就从窗外一阵阵袭来。跑到外面一看，原是一堆垃圾。中国人向

以忍耐著称，忍着吧，谁请你在这儿住了。忍耐，是美德，是对付屈辱和无奈的灵丹妙药。

第二天大早，去江边看爆破后的秭归景状。才出街坊口一群开“麻木”（三轮摩托）的青年人就围上来，争相拉我上车。5 元钱可以游全城。我上了一个姓熊名开荣的司机的车。要他拉着我一直沿江向西跑，以便拍几张秭归全城的远景照。一路上，到处可见断壁残墙中，有人叮叮当当敲敲打打——他们在不遗余力地为拽出墙体中的钢筋而忙碌。

熊开荣是本地人，家里种了一亩半脐橙，但赚不到钱。他算了一笔账，大、小年平均下来，脐橙年收入 7000 元。去掉化肥农药 2000 元，特产税 500 元以及吃穿花销以外的冤枉钱，最终所剩无几。他晓得我不懂“冤枉钱”的含意，特别解释说，“冤枉钱”就是贪官酷吏借“工程”之名，敲诈勒索的百姓血汗钱。比如修公路，和农民无关，也要农民摊派：18-60 岁都要出钱。男 80 元，女 50 元；比如 1999 年电网改造，他们收了钱不给正式收据，结果买的材料全是水货。

为了生计，1999 年末，熊向亲朋好友借了 3000 多元买了“麻木”搞起拉客运输营生。但车买了快半年还没有办好上户手续。国家规定，交了车管部门钱，半个月必须上户。熊早就缴了钱，收钱的人好找，办手续的人却一直找不到。手续没办好，“麻木”也不能闲着，因为欠账是要一点一点还的。交警摸透了没办入户手续的这批人，专在路口街心隐蔽处等着，未入户的“麻木”一到了他手心，上帝来了也没用，一律罚款 210 元。熊开荣被罚过，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请求减免。此间流行一句话“交警是开车的爹”，但熊激愤至极地大骂“交警是我的龟孙儿”!

我问他是不是移民，他说当过假移民。那是 1999 年应招去新滩镇拍个叫《移民县长》的电视剧。熊在剧中当移民，只说一句瞎话：“县长为我们着想”——“好县长谁碰到了？”熊又反问我一句“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讲？”我接着反问他。“三天能挣五十元，比开‘麻木’有保证”，他答得并不是理直气壮。

换一个话题吧，在峡江，只要和老百姓话家常，实在鲜有顺畅者。熊开荣拉着我冲出城外，沿江边沙土路一直往东。清晨没有太阳，江边雾气腾腾。但见几道黑色的礁石颇具气势地直指江心。熊告诉我，这就是秭归一景“九龙奔江”。后来翻县志知道了它也叫“黄魔滩”或“咤滩”、“人鲊瓮”。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朝思暮想的川江天险原来就在眼前。现在，咤滩除了几道与江岸垂直的黑石以外，东逝的江水看似平静又温柔。而在早先，江流至此，白浪排空。九条从江岸直插大江的“黑龙”，行成八道暗流。道道暗流如相互扭绞，凸起千奇百怪的巨大泡漩，发出骇人的怒吼。明代诗人孙蕡这样描述道“人鲊瓮头翻

白波，怒流触石为旋涡。舵工敲板助船客，破浪一撇如飞梭”。史载，洪水季节，“水涨盈满，鼓浪翻波，漩如鼎沸。过往船只，即轻舟快楫，误落江心，十无一全。逐年坏船、死者不可胜数”。因为咤滩轰声实在大得可怕，明代万历三十五年（公元 1607 年），时任归州知州的张尚儒为削弱震天涛声，缓解过往船夫恐惧心理，特指挥在咤滩中段“开凿‘雷鸣洞’下口，以杀其势。凿去大横石梁前阔五丈，后阔五丈三尺，高深二丈六尺，横厚七丈五尺。凿去二珠石梁高深二丈五尺，横厚三丈。工费约用二百六十余金。侥资用之饶，将新旧口中大石块尽凿，则江水直绕州城”。

“雷鸣洞”至今还在，但在葛州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第一次截流后与“九龙”一起已将身体的一半沉入水下。我今天所见不过是青黑坚硬的“龙脊”。而再往后，三峡工程二期蓄水后，咤滩连这点儿影子也没了。

突然掉下了星星点点的雨滴。此时站在“九龙奔江”的江岸远望秭归城，几抹雪白的云像是要飞过山城的仙鹤，引人遐思。秭归置县与得名始于西汉。缘其地为楚国三闾大夫之故乡“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因名曰秭（姊与秭通）归”。之后，县名与县属变来更去，直到民国元年再改为秭归县直至今日。县名县属而外，县址同样历经七迁。1999 年最后这一迁迁到了江南岸——三峡大坝南端茅坪剪刀峪。新城建得漂亮又豪华，但它不是我来寻找的秭归城。我心目中的秭归，是到处皆见的石阶石板路，和打杵敲击在石阶和石路上发出的醉人的音响。那是包括秭归在内的江边小城独有的歌，那是逐渐离我们远去的歌，今天我还能勉强听到，明天，我只能在记忆中去回味。

托守西陵峡西口的秭归城，已经结束了他的千古使命，走了。

船入西陵，再不见秭归城亲切的召唤和祝福。江啊，滩啊，山啊，船啊，像是突然失去了心灵的依托。

“秭归圣迹溯源长，峡到西陵气混茫”。西陵，西陵，混茫之中，藏着沧桑，藏着惆怅。

第二十章 泛舟西陵峡

1

在秭归码头雇了一只标号为“秭归 107”号钢板机动船。

船主吴术学，当地郭家坝人。自称已开船在江上跑了十年。我与他讲好，此行要带我去兵书宝剑峡、新滩、牛肝马肺峡和崆岭峡一看。“崆岭已经淹掉了！”他接话很快，“淹掉了你也要到那里指给我看一下！”我去意坚决。

我这次所要领略的其实是“归峡”，而隔着庙南宽谷东边的灯影和黄牛两峡为“宜昌峡”。上述两个峡区并称即是三峡中最长最险的西陵峡了。

因是顺水，船离码头便轻快地悠悠而行。本以为吴术学可以顺便讲一些关于行船和峡江两岸的掌故，出乎意料，他除了船，除了标志性的地方，其它知之甚少。临到兵书宝剑峡，他也没有讲出一段像样的故事来——我为他感到惭愧——峡江两岸的百姓对峡江人文历史的漠然，是我采访中极为困惑的一种感受。

兵书宝剑峡，1966 年 10 月，我当红卫兵时曾乘“东方红 34 号”轮亲近过。正处“文革”高潮中，没人敢逆潮流而动，提及属于“四旧”范围的兵书宝剑之类的景观。只是一位好心船员在我的央求下，略向我指点迷津。但那时只似乎见到了称为“兵书”的崖隙里的悬棺，宝剑却未看清究为何物。这回船到近前，才明白所谓“宝剑”，原是在“兵书”左下方贴着山体浮雕似隆起的一块形似宝剑的崖石。剑锋直指青天，剑身另一半部则沉于水中。

又据《归州志•山水》载“兵书峡，又名白狗峡”。《水经注•江水》又记“西峡崖龛中，石隐起有狗形，形状足具，故以狗名峡”。准确地说，兵书宝剑峡在江北，白狗峡在江南，两峡隔江相对。此峡所以常被人提及，因其是下行船只进入西陵峡险段的起点。白居易诗云“白狗次黄牛，滩如

竹节稠”。即是说，白狗至黄牛峡，滩险相连，行船少有喘息之机。被称为三峡险中之冠的崆舲滩就在这个江段上。崆舲得名于“空舲”。“舲”意为有窗的客船，“空舲”即船过此滩必须卸货空船之意。《归州志•山水》载，崆舲滩“悬崖削立，飞猿不能渡。水势汹涌，山石荦确。夏水涨时，必空其舲，方可上下。”具体地说，该滩本是一条 200 余米长的礁石纵卧江心，把江水劈分为南北两道水槽。槽内水似天锅大开，沸腾翻卷；槽口处，大珠之后的头珠、二珠、三珠呈品字形排列，更似恶鬼当道。行船过此，只听涛，但见浪，根本分不清方向。

在包括三峡在内的整个千里川江段上，唯崆舲滩吞噬的人与船难以计数。仅轮船在此就沉没了 7 艘。被称为“大珠”的巨石尾部刻凿的“对我来”三个大字，尤是刻在多少往来舟客灵魂上的印痕。我的几个忘年交朋友，像“人艺”老演员郑榕、堪称中国出版界编书最多的老编辑常君实就分别对我讲述过赫然于这块石头上三个醒目的红色大字。常老先生还特别描述，其过此地时但见崆舲滩岸上，摆的都是粉身碎骨的木船残片。

新滩广为流传着这样一段往事：1900 年 12 月 27 日，德国一艘“瑞生”小火轮冒险入川。船开到崆舲滩，船长见此石水相击，浪如雷吼，就找到当地一名“引水”掌舵过滩。当引水掌船向着“对我来”开去时，惊慌万状的德国船长以为“引水”要与其同归于尽，瞬间将“引水”推到江中，然后自己掌舵，调转船头摆开巨石。哪知此时又一股强劲横流，猛然将“瑞生”带向“三珠”，一声巨响后，轮船就势沉没。

“对我来”是千百年来峡江船工生命的凝结，也是一个保全生命的警示，告诫每只过往之船，抢滩过此，方法与过滟滪堆雷同——只有先以船头冲向其身，待到近前顺势而转，方可避开毁船之劫。可见当年在猛浪激溅，涛吼惊天中的或顺流摇船扳桡或逆水紧紧扯住纤绳与江涛相搏的场面，当是何其壮也！这川江滩险之冠，葛州坝兴建前，尚有遗存，1966 年我乘船当曾与其擦肩而过。惜不知其身价，又无人点拨而失去与其相识之机。葛州坝突起，长江水涨，崆舲没了，变成湖样宽阔的水面。

回想往昔船过崆舲求生之道，犹如人之处社会，对邪恶之势力直面而斗，不失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又一法也。

“秭归 107 号”船的老板吴术学开船顺水进西陵，过了新滩，还没到牛肝马肺峡，即指着前面一片水域骗我说那里是以前的崆舲滩。我也煞有介事地拍了照片一张又一张。但上岸后我才知道，崆舲滩要过了牛肝马肺峡才是。吴老板没说实话——骗了人脸不红心不跳让你无可奈何——像吴

老板这样江上跑了 10 年的人，不可能不晓得崆舲真正位置所在。

我没有因未能去到淹没的崆舲凭吊而遗憾。因为水面浩荡，即使到了那个地方亦是眼空无物。听之任之，吴老板把我渐渐带到牛肝马肺峡。此处已远离秭归城有 20 公里，山势陡峭，下插江浪，上指苍天。西陵纤夫谣唱道：

怪石生来此肺肝，
俨然悬挂碧云端。
三春阴雨淋不朽，
六月炎天晒未干。
船中过客频相顾，
隔岸渔翁仔细观。
老鹰为它空展翅，
欲待充饥下喉难。

如若将牛肝马肺峡准确定位，它应西起新滩凤凰嘴东至茅坪烟家洞——简言之，即在新滩与崆舲滩之间 4.5 公里长的江段上。此峡还有另一简称：马肝峡。图省事，姑且就叫它马肝峡吧！马肝峡得名，诚如前面纤夫谣所唱——“怪石生来此肺肝”，实指峡南石壁上两组形状分别酷似牛肝和马肺的巉岩。以地质学角度讲，此石乃石灰岩地区惯见的，地下水与石灰岩常年作用生成的与钟乳石同一类型的次生岩。1925 年，前来三峡进行地质调查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认定其成于 5 亿年前寒武纪。

与观赏许多声名大噪的风景一样，及到近前，也不过尔尔。峡江转弯处的矗立的山体上，三个“牛肝”像三个盆大的黑蘑菇上下相叠，紧贴在崖壁。而“马肺”则有一叶已经残缺，有气无力地在“牛肝”旁喘息——那就是百年前英国冒险家蒲兰田开着汽船过峡时留下的杰作。今人论中国近代史，都说此君是英帝国主义的代表，是死敌，是匪寇。郭沫若先生诗云：“兵书宝剑存形似，马肺牛肝说敌狂”——小题大做，我是这么看。

我们的小船在马肝峡前往复徘徊，我举着相机拍下一幅幅照片——这是遗照，这是诀别。

逆水返回秭归城时，蓦然发现“马肝”对面的山上，小煤窑采煤正忙得热火朝天。将近山顶上挖出的煤，通过一条几乎直上直下的滑道，一直送到江边的船上。峡江上，类似小煤窑有不少，但这些窑的煤质很差，烧

起来有一股呛人的硫磺味道。即使如此，就地取材销路也不错。趁三峡还未涨水，贩煤者争相拼命开掘，时不我待也！

小游西陵峡，江面简直静如止水。至此我才搞明白，那个峡江如“竹节稠”的险滩，解放后进行险滩整治，已被炸弹夷平大半，七十年代葛州坝建成发电后，又有仅存部分被淹，即使今日三峡二期蓄水尚未开始，我眼前的三峡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2

我在兵书宝剑峡和马肝峡之间的新滩上岸时，本意是想采访 1985 年 6 月 12 日凌晨 3 点 45 分发生在此地沙子岭稍上江家坡、广家岩至望人角一带的毁灭了整个新滩镇的大滑坡。那次滑坡，约有 600 万立方米泥石脱离山体，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下滑动 82 米。其中下段约 340 万立方米的泥石冲入江心继续推进了 80 米！那一刻，三分之一的江面被沙石塞满，冲向对岸的涌浪最大爬坡高度达 49 米！巨大冲击力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下游距新滩 5 公里的香溪入江口涌浪亦达 8 米；距新滩 26 公里的三峡坝址三斗坪涌浪也有 1.3 米高。此次滑坡，毁掉房舍 1569 间，农田 780 亩，柑橘树 3.45 万株……一个人烟密集的古镇，数百间建筑风格独特、设计精巧极富保存价值的古代民居顷刻间烟消云散。

站在江边碎石瓦砾向上望去，依稀可见昔日新滩垛垛断墙，歪斜在漫坡的荒草杂树间。间或穿飞在废墟上的小鸟，让人感到的是昔日不再的荒凉。我想，三峡就是不蓄水，大概也不会有人再来此生息。新滩 1985 年的这次滑坡，由于科学观测和提前预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留给人心头的恐惧，却长久难以消失——认清了沙子岭面貌的今人，谁还敢再与大山叫板？

新滩大滑坡，仅自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有文字记载始至 1985 年的 1800 多年间，就发生了 10 余次之多。其中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公元 1542 年）的那一次，规模之大，甚至惊动京城。《明史•五行三•山颓》篇载“二十一年六月乙酉，归州沙子岭大雷雨，崖石崩裂，塞江流二里许”。另据嘉靖年间《归州志》载“嘉靖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归州新滩北岸山泉涌出泥滓，山势渐裂，居民惊骇逃避。顷之，山崩五里许。巨石腾壅，闭塞江流。压民舍百余家，舟楫不通”。这次滑坡过后 16 年，即嘉靖三十七年（公元 1558 年）新滩再次大滑坡，造成 300 余人死亡的惨剧。

图 5.1 牛肝马肺峡之“牛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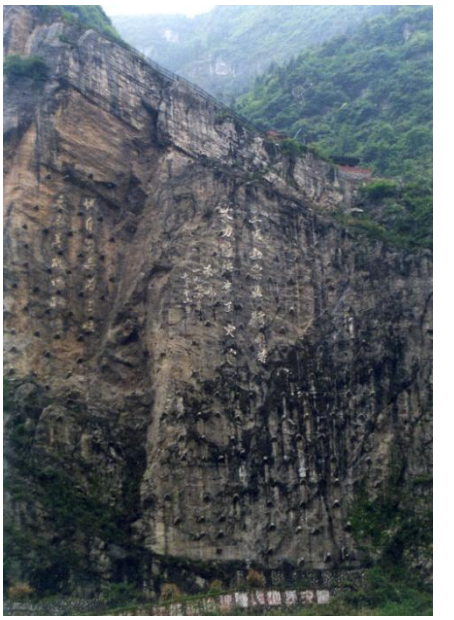


图 5.2 链子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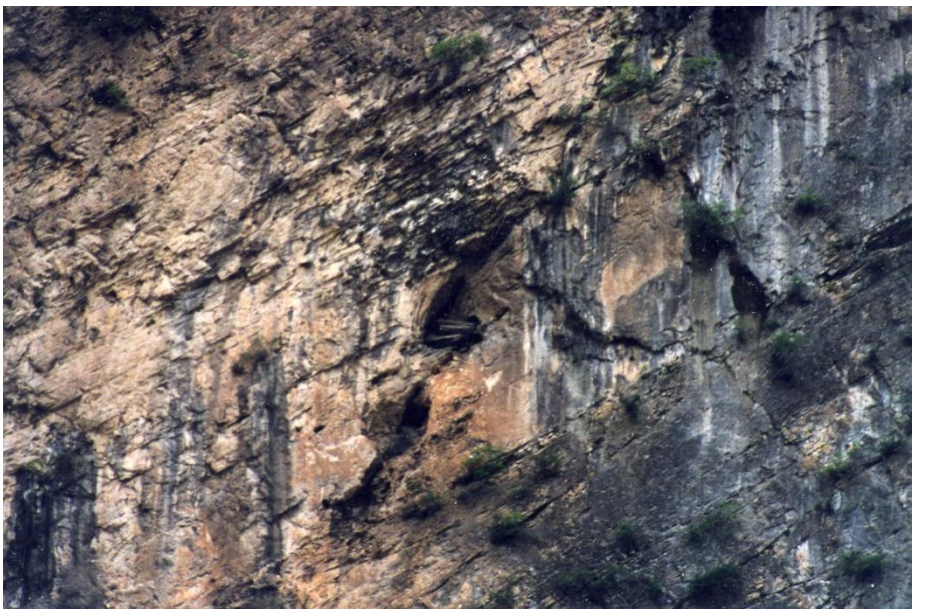


图 5.3 兵书宝剑峡之“兵书”

直到明天启四年（公元 1624 年），投入财力疏凿，方复通舟船，此时长江已断航长达 82 年！

本名“青滩”的“新滩”，因为一次次滑坡而更“新”，才改叫了“新滩”。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其著《吴船录》上说“新滩旧名豪三峡。晋汉时再崩塌，故名新滩”。但新滩没有因以往多少次大滑坡而衰败，相反，正是滑坡后江面上不断变化的险滩，成就了新滩的繁荣。尤其是枯水时节，峥嵘嶙峋的巨石出水，舟楫过此，无论上下行，必得靠人引领。新滩港湾，一年四季皆可见舟船待发樯桅林立的壮观景象。

3

此前我以为，新滩滑坡滑过去也就滑过去了。到了新滩我才了解到，不仅新滩仍然在蠢蠢欲动，类似新滩的中型以上的变形山体如香溪镇滑坡、黄腊石滑坡、王爷庙滑坡、大坪滑坡、向家湾滑坡、鸡扒子滑坡以及链子崖滑坡，在峡江中竟有 140 处，总体积达到惊人的 20 亿立方！近年城迁新建的奉节、巫山、巴东城都是建在巨大的滑坡体上。其中奉节近 5 年就已是三易其址，仍未“逃离”滑坡。

奉节县县长陈孝来还煞有介事地向记者介绍，新奉节城里人口 12 万，是三峡库区人口最多的县城之一。因地处“渝东门户”的优越地理位置，今后奉节城的人口将进一步增长。现已被重庆市政府列为中等城市发展县。按政府规划，2010 年这个目标就能够实现。届时奉节县人口将达 20 万！

我的天，看看奉节新城窄小的顶多只有十几平方公里连装下 10 万人都困难的的城市用地，你就知道把奉节建设成为 2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意味着什么了。况且，既然后续仍要发展人口，今日千辛万苦移民意义何在呢？

新滩南岸的链子崖，是所有从事滑坡研究的人共同注意的地方。此崖高耸江边，崖体中一条大致与长江平行的裂缝近百年来，每年都以十几毫米的速度扩展。这个巨大的危岩体，石质为栖霞灰岩，其危机其一，更在于本来整个山体坐落的软弱煤层今已不保——煤层已被采空；其二，除了上述那条与江流平行的大裂缝外，岩体纵横交错还被另 6 条大裂缝和 11 条小裂缝切割。链子崖危岩，体积达 250 万立方米，因其紧临江边，一旦失稳跌落长江，不仅可截断 60 米宽的航道，而且巨大的涌浪将直逼三峡大坝，危及三峡工程的安全。

我从新滩南岸桂林村起步，用尽气力，爬到了链子崖山顶。链子崖和链子溪一样，原是因过此崖需靠手扶设置在崖壁上的铁链而得名。陪同我们上山的熊辉元，虽然已有 70 岁，上得山来仍是心平气定。

熊辉元是链子崖的守护神，他负责日日观测崖体的变化并记录之。崖顶上，两道分别被称做“一号”和“二号”的深深裂缝，让你情不自禁地产生山体向长江倾斜的错觉。指着足有近两米宽的 2 号裂缝，老熊说，“现在它仍在活动”。看出我们的忧心，熊辉元继续解释说，从九十年代起，有关部门就对链子崖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在已经被掏空的链子崖下方灌注了水泥沙石，加固了整个山体的根基。并在裂缝发育的区域，打进去几百根钢筋，用于牵拉向江面倾斜的山体。但所有做到的这一切，只治标，不治本。就目前人类的能力，还不可能彻底征服像链子崖的危岩。其崩塌是迟早的事。

站在链子崖顶，往来的江轮，北岸的新滩，皆清晰可辨。回头看身后，为三峡而后靠安置的桂林村村民，无处可迁，只得将新建的房舍仍然建在滑坡体上。就像是码放在山坡上的积木，说不准什么时候呜呼到江底下。桂林村干部说，“上面”有话，如果要治理桂林村所在的滑坡，要花掉人民币 1500 万元以上；要是把住在滑坡体上的人迁出，要花 1000 万元。究竟怎么办？为了人的至高无上的生命，外迁，是唯一的出路。

登罢链子崖，想起了乘船几过链子崖，一次次映入眼帘的链子崖山体上的两行竖写的白色大字：“三峡勘察业绩卓著　大力防治库区灾害”落款是“李鹏 1996 年 7 月 13 日”。好题字，好请官人题字，是中国官场另一大特色。远的不说，就说清代吧，乾隆御笔到处开花，但乾隆的字体功力深厚，不称书法大家，也算说得过去的小家。现在不同了，歪七扭八不堪入目的领导题字，都敢上街现眼。医院、学校、风景名胜——简直数不胜数。既污染视觉环境，又贬损中华文化。某几位中央领导即是此等书法“名家”。其中一位题字勉强尚可，而那位总理的字则让人大倒胃口。三峡人中流传这样的笑谈：说那位总理在三峡留下两道大菜：长江火锅和三峡鸡汤。初起我不解其意，后当某天经过西陵长江大桥时，向导指着大桥桥头横额上的题字让我看。我登时明白了，那位总理所题字的“西陵长江大桥”中的“大”字写得如“火”，桥字因其卖弄学问改用繁体，弄巧成拙，远看浑似“锅”——长江火锅由来即源于此。至于“三峡鸡汤”即三峡机场，出源与此雷同。

我之所以按捺不住对领导题字感慨一番，是想让那几位大肆挥墨的“领

导”明白，高职位不等于高品位，有权力不等同有文化。如李鹏瘦鸡架似的题字，敢于不知羞耻亮相于光天化日之下——古今第一人，第一人！这等题字能够出现，也反证了现实的中国丑陋的社会与文化心态——捧领导臭脚的和领导臭脚欢喜别人捧的交相辉映——政治和文化于是就有了这样被扭曲的标准——领导所好就是唯一。

西陵峡链子崖上李鹏前言不答后语的题字，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链子崖，为隐藏在三峡库区的 20 亿立方巨大滑坡体的潜在威胁而担忧——谁能放心得下，这等到处张扬并乱题乱画“惯于作秀显聪明”的领导（李锐诗句），能够有诚心为国家为百姓去解决实际问题；又有谁能相信，库区里一帮专捧领导臭脚的家伙，能够全心全意为三峡人民服务！

三峡库区 20 亿立方潜在滑坡体的“未来”很难说啊——但愿不会是“西望长安”的结局！

第二十一章 新滩之上

1

我从江边叫寺大岭的地方登上新滩老码头。滩坡上几十辆等候的摩托车，争相往新镇拉客。搅得此处每当有船靠泊的时候，就要热闹一番。

寺大岭虽地名颇具怪异，但孤立于岭上那个棱锥体像把直刺青天的宝剑一样的蒲兰田纪念碑，却记录着峡江航运史上的一段不容忽视的往事。

蒲兰田何许人？即是我前面才提到过，将牛肝马肺峡中的马肺用火器打掉一叶的那个英国人。

纪念碑的碑文写道：

> 蒲兰田君，英国福蓝林冈镇人。中国海关任以巡江工司之职。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长江上段第一次航行汽船，司驾驶者即君焉。君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 1866 年）六月二十八日，民国十年（公元 1911 年）初春航海返国，一月十九日卒于途次。君之旧友及有志振兴长江上段航业诸人，感君情愫，思君勤劳，醵金刻石，以志不忘。
>
>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吉日立

蒲兰田只身把“肇通号”汽轮开进三峡那年，他才 34 岁。行至泄滩时，还将两只中国木船撞翻，淹死两人。这本是一次相当危险航行中的意外，但在我们的文字记述中，却大加渲染，“霸气”、“敌狂”“帝国主义侵略”。

如何看待蒲兰田其人，其实涉及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对于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的整体评价。首先，若不是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国人恐怕还沉浸在昏昏沉沉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梦中。鸦片战争打出的洋务运动，让国人初识了西方和科学。但其妄自尊大的恶习没有根本的改变：明明被西方

船坚炮利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骨子里仍是心有不甘——“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洋务领袖李鸿章的这番言论，就是极典型的中国夜郎心态；其次，在上面的思维逻辑指导下，就很难参透西方民主体制与发展科学间的必然关联。时任浙江巡抚的梅启照“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力则极力讲求”的“高论”更道出了洋务运动最终陷入困境之根本。

想想看，往昔天无二日的帝王权威，被西方的大炮打得落花流水之后，我们非但不低头深刻的自省，反厚着脸皮仍在硬称“老大”，以鄙夷之态仍称西人为“夷”，为“胡”，为“外夷”，为“敌寇”，为“帝国主义”该是一副何等滑稽的阿Q嘴脸。

我还在想，我们将“鸦片战争”描述的如何悲壮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关于这战争，国民应当承当的责任？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没出息的烟民，焉有鸦片市场，焉能“鸦片战争”得起来？

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踏进中国大门的“夷人”，有敌，有友，也有师。独身进入三峡的蒲兰田则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和英雄：他不是一次而是数度亲自驾船往返川江航线，并详细考察和记录了沿江险滩和暗礁的航行旨要。还是他，最先提出在川江上设置航标信号和绞滩站等助航设施。1915 年，他搬到新滩后，向当地船工传授航行技艺，培养了相当数量的驾驶轮船的船员、舵手和领水。民国时期的川江四大领水中的两位就是新滩人：杜嗣祥、杜俊祥。虽然，他因购置渔坊最终与新滩人不欢而散。但新滩人心中有数——明白蒲兰田是个值得怀念的英国人。历经“文革”暴风骤雨，立在新滩岸边的蒲兰田碑安然不动就是明证。

2

新滩已经更名——因所在地北面 20 公里处，即是屈原故里，许是商业目的吧，现改叫屈原镇。一个开摩托的小伙与我讲好价钱，5 元拉我直到镇上屈原小学，并保证可以帮我找到住在学校里的一位知晓新滩掌故的老人。

刚下过雨，山路十分泥泞。摩托车盘旋在山道上足有一刻钟，才到了山顶。摩托车在学校门口停下，车手当即变卦，说是要找的那个人不在学校，谁也不知去了哪里。我清楚又上了一当，三峡的采访过程中，这种小“当”我“上”得多了。多了，也就习惯了。但总不能白来一趟吧——虽然我刚刚知道屈原新镇还远在另一个山头上——干脆，就看看这个小学吧！

图 5.4 蒲兰田碑

图 5.5 滑坡后的新滩

此小学全名为“秭归县屈原镇新滩小学”。

一座三层的堪称“古老”的青灰色教学楼，楼前被唤做操场的一块 50 平方米的水泥地，教学楼对面一座同样“古老”却透着寒酸的小小四层教师宿舍。这就是屈原镇上最好的小学的全部模样。

正是学校上课时间，信步倘佯在静悄悄的校园里，忽见掩藏在教学楼边侧角落的一块石碑（碑文竖排，分为两部分）：

新滩小学创始人杜元白纪念碑

1931 年秋，杜元白先生首创官学——新滩北岸小学，自任校长。抗战时期改称新滩国民小学。先生治校有方，誉满全县。新滩滑坡前的 1984 年，学校迁至现址后，长江小学和沙子岭小学先后并入本校。由于政府和办学单位的重视，建起了实验室、图书室，完备了操场、围墙等配套设施。因而这所小学更趋完善。近几年来，曾先后获得县、镇先进单位和双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新滩小学创办七十年来，在本校就读学生以数千计。其中大部分升入中学和高等学校。这些莘莘学子，为国家建设贡献出聪明才智。我们深感元白先生首创学校的艰辛和育人的高尚品德，特此立碑，以资纪念。

长江村委会　新滩小学

2000 年 4 月

皮健华君于 1993 年从台湾回乡探亲时，曾为杜元白先生立碑于校园内。后因故撤去。现再建纪念碑，为不负皮君盛情，特原碑文照抄如下：“元白先生早年为故乡创办官学，培育不少学子。我于四十年代受业于先生，颇得教益，后去台湾至今。每一怀乡，无不念及先生。今幸两岸‘解冻’，得以还乡探亲。然先生早已作古，不胜叹悼。特此立碑，以志不忘。”

杜远年主任长江村委会和新滩小学为先父立纪念碑，江朝顺校长主其事。谭众孚、杜慧二位老师亦付出辛劳。我们铭感不忘，谨致衷心谢意。

杜敦发　杜兆复

2000 年 4 月

这块闪着光彩的纪念碑，讲述了新滩官办学校的由来。但没有道出创

办人杜元白的后来的命运。碑上的最后落款是杜元白的儿子，寥寥数字，却让人有诚惶诚恐的感觉。大胆推测一下，杜先生遭遇可能很不妙。不然皮先生第一次为其立的碑，就不会“因故撤去”。

三峡的采访经历，有三个人遭遇尤让我感到沉重，一个是杜元白，另两个是巫溪的向佑文和重庆的卢作孚。先说说向佑文吧！

1993 年版的《巫溪县志•人物》关于向佑文的介绍如下（节录）：

> 向佑文（1904-1968），名传学，大宁县大河乡（即今巫溪县大河乡）人。其祖父医商兼业，家道渐兴；至其父掌家，置田产，办煤窑，烧盐灶，开商号，已成一方巨富。向佑文 17 岁时辍学从商，帮父经营筹划，精明干练。
>
> 民国十九年（1930 年），向佑文与其兄向执中承袭父业，分管商号及盐、煤实业。他先后筹巨资扩大煤炭开采，复后购置 3 座盐灶，添造运煤船只，使煤盐实业联为一体。继后，把目光转向农业商品生产和扩展商业经营。投资开办黄连棚，兴办党参山，年收黄连 3000 多斤，党参 1500 多斤。然后将这些药材以及收购的其它山货加工包装，运往武汉、广州等地销售，获取巨额利润；又从外省及渝、万等地购进绸缎布匹、京广杂货、烟酒糖类，设店批发和零售。
>
> ……

抗战胜利后，长江航运疏通，向佑文东出三峡在武汉设立商号，购销总额每季度达 30–50 万元。其时，已将采煤、制盐、种植、商业、运输联成一条龙。家产发展到拥有田产 780 多亩（收租粮 35 万斤）、煤矿 2 座、盐灶 5 座、黄连棚 36 个、党参山 8 处、木船 70 余只、商号（分号）7 处，拥有管事、帐房、职员、工人 500 多人，成为下川著名的“百万富翁”。

向佑文曾因得罪政府官员被捕入狱。为了在工商业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他一方面跻身政界，加入国民党，出任大河乡长、县参议员，另一方面置身社团，参加洪帮，广交朋友；有时还慷慨解囊，捐资赈济灾民，接济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

解放后，向佑文深明时务，变卖武汉商号财产，换成黄金 97 两全部上交人民政府；解散私人武装，上交全部枪支弹药；在减租退押中，主动将应退押金全部还给农户。1951 年土地改革，向佑文被划为工商业资本家，注明“表现开明”。

1954–1956 年，向佑文积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带头并动员制盐全行业与人民政府合作，进行公私合营。随后，他担任公私合营大宁盐厂厂长。1956 年 12 月，巫溪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向佑文为巫溪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副县长。同时还被选为工商联执行委员。

1957 年开展反右派斗争，向佑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撤销副县长职务，安排到盐厂任副厂长带职改造。1960 年，撤销其副厂长职务，监督劳动改造。1968 年 8 月，他被盐厂“造反派”揪斗，遂投井身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对向佑文错案进行了复查、改正。1984 年 10 月，中共巫溪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发文，对向佑文按革命干部正常死亡对待，并按规定对其家属子女予以抚恤。”

向佑文所投的是在其祖居屋后的老井。现今早已被填平。“文革”中，他头朝下投井自杀，脖子上还绑了一块 7、8 斤的秤砣，以示必死的决心。

三十多年过去，宁厂的老人还都记得他。每当向他们问起对向佑文的印象，几乎异口同声，没人说个“不”字。但天地不容，在红太阳照彻天地的岁月里，他一年年极其痛苦地挣扎了十多年，左不是，右不是，不得不以死作为最后的解脱。

向佑文而外，第三个令我喟叹良久的人物就是我在本书中多次提到过的卢作孚了。

卢作孚 1893 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为重庆辖属合川市）。自幼怀有报国的宏愿。他的青年时代，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确立了以实业救国的信念。1925 年，卢作孚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投入了与多家外国轮船公司竞争的川江航运之中。由于他善于经营和管理，到 1932 年，民生公司打败了所有国外的竞争对手，成为拥有 46 艘轮船和 4 个分公司、3 个附属工厂以及多个码头货栈的长江最大的航运公司。

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战争中长江航运陷入困境。而卢作孚面对国家危难挺身而出。他认为，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保卫国家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1938 年 10 月，日寇占领武汉。其西面百余里的宜昌形势危急。3 万待运人员，9 万吨急需运往重庆的物资积压在岸边。码头上人心惶惶，秩序一片混乱。并且当时长江正逢枯水期，行船十分困难。此时卢作孚临危不乱，从容应对。他召集下属各轮船公司，制定了人员和物资转运的详细时间表，开始了川江上 24 小时全天候的抢运。只用了 40 天即圆满完成了任务。卢作孚回忆说，这次川江上昼夜不停的抢运，像是一曲悲壮的交响乐，唱出

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心声。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却倒在阳光灿烂的五星红旗刚刚升起的时候……

在新滩小学的校园里，由杜元白联想到向佑文、卢作孚。让我不由得回过头来审视生命和尊严被视为政治玩偶的五、六十年代，特别是该如何评价那些像向佑文和卢作孚一样丢了性命的人。

我想起李商隐的一首诗："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恨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不尽长江水呀，不是你总欢喜人叫你母亲吗？但你这个母亲磅礴万里发泄不尽的波涛里，"永远正确"地吞噬了太多的执着的真正爱着你的灵魂。

3

外表像回事的新滩小学，禁不住倾泻的山雨。每当此时，学生们要不停地移动各自从家中带来的桌椅；那座摇摇欲坠的教师宿舍顶楼的4间房，漏得更是一塌糊涂。教师需要四处去寻栖所。向当地政府申请修缮资金，两年多还没消息。不是地方政府舍不得拿钱，是因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实在也没钱。好在当地有重教的传统，2001 年，村民自筹 5000 多元好歹总算把学校修了修。

在学校一楼的一间简朴的办公室，穿着也一样简朴的，教了 25 年书的江朝顺校长与我娓娓而谈。

——"说起我这些年做教师的酸甜苦辣，苦最多。这个苦中的内容是教师这个职业，这种工作，长期得不到社会上的公正的评价和尊重。比如说现在，我们学校的教师平均每人每星期 29 课时，包一个班的教学，从早上 6 点起床干到晚上 10 点以后才能休息。教师每月 600 块钱工资因地方财政困难，还不能按时发放，有时一拖就是几个月。而地方行政虽然解决不了教师工资不能足额发放问题，对教学却另有一套要求。个别领导说，教师教书教什么？就是教分数。教的分数不高，就是教学质量不高，就不是好教师！就要被淘汰！我们的教师就这样一方面为学生拿高分数起早摸黑，另一方面为拿到一份本来就不多的工资操劳。这其实是对教师尊严的伤害。"

——"让人痛心的还有来自社会的对教师的压力。教师工作这么辛苦，还有人认为教师是享清福。瞧，那些教师不晒太阳，还拿那么多工资，没干什么事！中央现在强调素质教育，这在地方根本行不通。你在学校苦口

婆心教育孩子如何如何讲道德，顶不上家长一句话，就把老师的教育全‘解决’了！我们学校有个同学，一夜之间父母因中煤气双亡。学校为了让他继续读书，发动全校给他捐款。大多数学生都拿出自己的零用钱，但还是有 20%无动于衷。问这些学生为什么，他们回答这与我不相干，我没责任献爱心。六年级的一位学生家长私下教育孩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位学生到班上就说‘人人要为自己，对其他人不能有爱心’。虽然我曾写过一篇《优化德育环境 提高育人质量》的文章，但讲心里话，对当前社会和家庭对学生教育的负面影响，感到相当无奈。学校请高年级家长座谈学校教育应为当地经济振兴发展育人的问题，有些家长公然表态说‘读书目的不要扯得太远，简单说就是为了当官发财。我没赶上好时候，读书少了。孩子赶上了好时候，不靠读好书找出路，升官发财，读书还有什么意思！’。像这样教育目的的私有化，是相当危险的社会倾向。要将其扭转，必须取得全社会共识，但是难啊！”江校长一声长叹，结束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分手时，江校长送了我两本关于屈原的小册子。他说这是学校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素材。去年（2000 年 4 月）全镇举行了一次屈原故事为题材的演讲比赛。新滩小学获得了小学组的第一名。虽说得了第一，作为校长他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清楚被过分神化的屈原在学生心目中的真正位置：“他们知道屈原，但几乎没有学生相信屈原的事是真的。不是真事，让我们学什么？学生振振有词。”

翻读两本小册子中的一本《屈原的故事和传说》，真的与孩子们的看法相同：屈原哪里是什么忧国忧民的诗人，分明是个无所不能的孙悟空般的神话人物。你看看书中的“仙女为其授书”，“一口井能照出人心好坏”，“只因屈原挂过书包，马桑树再也长不高”，“屈原长剑往地上一戳，就是一眼清泉”……

历史，只有真实才能让人感动。当我们把历史无限制地夸张和虚化的时候，不单人物和事件失去了份量，随之也失去了其本应具备的教育功能。

4

古籍《清会典事例•工部•船政》上明确记载：近 400 年前明末天启年间，凶险的新滩江段，出现了峡江航运史上第一条救济红船：船身、桨片、篙竿，皆为漆红。船头画着象征吉祥的鹚鸟，水手身着红坎肩。每只红船配备水手 6 人。至清康熙十五年（公元 1676 年）荆宜分巡道李会生、归州

知州邱天英将救济船改为救生船。船身依旧红色，分置于归州境内黄牛滩、泄滩、崆舲滩和新滩。

清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途经三峡，亲眼目睹了多起船毁人亡的惨剧，有感于红船救生力量单薄，特捐银 4000 两。用于增造大小红船 15 只。此时峡江水程共有红船 54 只，救活人口，每年约千数百计。但因水运逐年发展，海损事故愈来愈多，仅过了 16 年，即公元 1892 年，多艘红船毁损，峡江段的红船所剩寥寥。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湖北巡抚谭继洵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云“近来重庆开设海关，商贾行船更倍提前。滇、黔两省运办铜船、军械亦皆由峡江行驶，尤关紧要其安全实赖红船之力。官商船只大为百余人，小者亦数十人，覆溺延颈待救。而每之红船仅可载数人”，“峡江险滩过密，覆溺尚多，归（州）设红船不敷分布，特请添设红船十五号并（舟巴）板船三号，以保行旅”。

做为洋务派领袖人物的张之洞的上书，他看重的是用红船为清廷运载铸造货币原料的铜船以及那些为数不多抵御列强急需的军械船保驾护航——船系危亡——这是智者的远识。但张、谭两位大人的上书，却如一张废纸飘向天朝——日理万机的慈禧连一个字的回音都没有。

红船的生命每况愈下，苟延残喘地混到了民国初年，三峡救生红船实行川、鄂两省“分局管理制”。红船所需经费改由地方船捐和地捐中列支。

之后的萧条的峡江运输，以至船捐、地捐样样清淡。1928 年，“奉令以各救生船年久失修，腐不中用，饬即停办”。三峡红船终于在峡江消失了……

新滩小学采访后，返回江边寺大岭码头上船前一刻，站在江边，想起新滩曾经有过的只只红船，在惊涛骇浪中拯救了多少稍纵即逝的灵魂。而现在呢？救人的红船不见了，新滩江面已经看不到突兀峥嵘的礁石，老码头前樯帆竞逐的繁华情景已成往事，码头到处是一片荒凉。但我想，险滩不在，新滩的学堂里，精神品格教育日益失去份量之时，何尝不需要再次开来救生的红船。

救救教育吧——教育不是商品！更不是产业！教育是打造民族灵魂的基地。不要再靠老百姓掏腰包的“希望工程”，靠收取学生的高额学费去“兴学”了。教育主要应靠国家投资而运转。似现在这般，口口声声九年义务教育，却有钱盖宾馆、买轿车，无钱建学校，而让我们如此众多的儿童失学，难道不是泱泱中华大国的奇耻大辱！

救救孩子们吧，告诉他们，教育，要让他们懂得：人生在世，首先要

做一个明是非，懂礼貌正直诚实的好公民。如果，把分数和个人的名利当做教育的唯一，将孩子分成三、六、九等；如果，我们教育出的孩子只会讲不着边际的“三个代表”“八个代表”之类的空话、大话；如果孩子们搞不明白爱国主义和爱共产党是两回事，那么将来——我们还能指望有什么美好的将来吗？

猛烈的峡风，从西边阵阵吹来。中午，正是过往江轮冷清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我所祈望的救生的红船突然在我的面前出现，一只又一只，把我们的孩子们送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第二十二章 屈原故里行

1

从兴山城驱车南行出了县界即是秭归县游家河（实为香溪河中的一段）。我们一行赶到这里的时候，太阳已快落山。当地人告诉我们，从架在香溪河的铁索软桥上徒步走到对岸，过七里峡，就是乐平里——即我们要访问的屈原村了。

软桥上只是横向铺了一块块拼接的木板，而且有的地方木板已经残缺，双足踏上去不仅整个桥体都会摇动起来，稍有疏忽还极有可能从残缺的木板间隙堕落江中。幸亏没有恐高症，我们很快从这个长有百十米的软桥通过。过桥就是山壁，往左再行数十米就到了远近闻名的七里峡峡口。七里峡，顾名思义，长有七里，是屈原村百姓与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通道。

一入峡中，顿感凉风拂面。冷雨潇潇窄小的峡道上，怪石嶙峋，古木森然，溪水淙淙。幽邃莫测的氛围，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屈原的《山鬼》篇“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有学者考证《山鬼》意境即源于此。

山鬼究为谁，学界尚有争论：有人说泛指女神，有人说指巫山神女。争论归争论，就山鬼性格而言，说她是个多情、执着、高傲的山中美女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义。但我希望有奇迹突现，俊俏的山鬼自烟雾缭绕的山隙中向我们走来。我将会迫不及待告诉她，把那颗真诚的爱心收起来吧——她仰慕的心上人天底下就从来没有过。

七里峡还有屈原的影子。据传，当年 19 岁的他离别家乡，就是穿过此峡奔向楚国郢都，开始了政治生涯。不过那时的七里峡中没有路，清溪涧

水，杂树蔓草，禽兽出没，充满神秘荒凉景象。现在不同了，1984 年，乐平里的人凿山开洞终于在峡中修出一条小型汽车可以通行的公路。只可惜待三峡工程二期蓄水后，这条乐平里人盼了两千多年，修了不到二十年的公路及峡口的软桥一道又将归于无。乐平里人被告知，到那时，公路虽然没了，但水大了，来乐平里游览方便多了。船只可以从香溪驶进七里峡直达村口，村民靠旅游能增加不少收入。

走出七里峡，感觉如同晋太元年间武陵人寻到桃花源：景象豁然开朗。近前良畴万顷，远处屋舍俨然。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挺拔在一片葱茏之中。“乐平里”三个大字赫然其上。与世隔绝看来的确也是一种宁静中的幸福，只是不知里面“内容”究竟如何。顺着牌坊旁一条石子与泥土混合铺垫的道路一直前行，就是我们此行准备造访的屈原村和屈原庙了。

关于屈原祠、庙，秭归城有多处。最早的屈原祠建于大唐元和十五年（公元 820 年）。祠址在今秭归城东 5 里的屈沱。宋元丰三年（公元 1080 年）宋神宗赵顼封屈原为“清烈公”，归州百姓又集资在屈沱将原屈原祠改建为“清烈公祠”。祠为硬山顶，四合院式，总面积达 350 平方米。陆游淳熙五年（公元 1178 年）诗《楚城》所记“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前事，只有滩声似旧时。”当指此祠。该祠历经元、明、清、民国、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兴建葛州坝，长江水位抬高，不得已将屈原祠再次迁移秭归城东 3 里的向家坪。如今，三峡再建大坝，已经移建到半山腰的屈原祠面临再次搬迁。听说这回要搬到秭归新城——但愿这是最后的搬迁。

至于乐平里，史载曾有过两座屈原庙，一座始建于明代，清末荒废；另一座于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 1703 年）建于远离乐平里的界限垭，后来也废弃了。我们眼前的这座新屈原庙是 1984 年新建筑。提起这座庙，现今的守庙人，73 岁的退休教师徐正端给我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1980 年，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慕名前来乐平里。徐正端与其有过一次夜话。徐告诉胡，屈原庙和那些与屈原有关的遗迹“文革”以来被破坏的惨状，以及屈原村百姓多次向上级申请重修屈原庙而不能实现的苦衷。之后，胡德平找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要来 5 万元，终于修成了坐落在降钟山上的这座新屈原庙。也算是缘分，此后不久，胡耀邦总书记参观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建在司马坡上的该祠同是因年久失修，山体有坍塌之虞。地方又拿不出钱修缮，胡耀邦请国家有关部门出资，使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重新焕发光彩。胡氏父子所为，让我们看到自屈原至司马在

其心目中的份量。胡耀邦在政坛上敢做敢为，忧国忧民，光明磊落的胸襟决非逞一时之勇，而是有着深深的文化根基。

2

方停的小雨忽然又至。冒雨登上屈原庙：高高石阶，白墙黛瓦，红漆大门，肃穆庄严。推门而入，即是一个小小天井院。左右配房一侧是守庙人徐正端歇息之所，一侧是客堂。正殿则恭奉着屈原的立身石雕像。但雕像上已罩上一层灰尘，散发着说不出的凄凉。

——“你要问我屈原故乡人怎么看屈原。先说地方百姓，此地穷乡僻壤，人民是勤劳的，对屈原是景仰的，历代五月五的纪念是相当隆重的。当代执政就不同了，他们不尊重屈原，也不尊重我们。现在嘴上都是屈原，广告上也都打着屈原旗号，根本不用在实处，做什么？要钱！我们这个屈原村，自古有一个读书的好传统。从明朝到清朝，秀才就出了 1000 多！有一个家庭就考取了 13 个秀才！因为读书人多，村风相当好。村里要是出现什么矛盾，首先要报官，让官府评理。由于报官次数多，外面人还把我们这地方叫“讼棍乡”。叫什么由它去，但直到解放前，没出过杀人放火的大的刑事案件，却是事实。现在可好，杀人偷盗抢劫无所不为。世风日下，连屈原精神的影子都没了！”徐正端的讲述，愤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

雨愈下愈大，哗哗的雨声为我们之间的谈话平添了韵味：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透过谈话，我感觉到徐正端忧国忧民之心。真是想不到，在这个僻远的小山村，能仰见到一个如此高尚的灵魂。徐是屈原村“骚坛诗社”的成员之一。该社成立于八十年代初，成员皆为本地“泥巴腿子”。诗社以吟咏屈原精神为主旨，在当地民众中很有声望。但随着光阴老去，诗社逐渐凋零。成员由 12 人变成仅存的 5、6 人了。但就是这几位饱经生活磨难的老人，坚守着诗社这一方圣土。“我们约好，哪怕就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徐正端的语气斩钉截铁。

诗社老人“坚持”的，其实是他们所理解的屈原精神：“哀民生之多艰”“宁正言不讳以危身”。

我们谈得投契，他对我朗读了自己一首直抒心臆的诗作：

屈子生平竟若何，事君事楚谏常磋。

纳贤助政求真实，反腐除贪招怨多。
累惹奸心深触怒，谗迷昏主暗施戈。
忠臣自古频含恨，饱受睚眦伴冷漠。

——“现在听到的腐败的事太多了，一介书生，人微言轻，唯一拯救自己心灵痛苦的方式就只有写诗了。”感慨万分的徐正端又把自己的诗集拿出来。他翻到七律《民瘼冷》的那一页。

诗前有几行小注：游家河移去宜昌的顽氓姜兵于两千年 6 月，突来乐平里纠集在案的土流独霸公路，只许他的，而不许本地的车辆运载客、货。时达半年，终被制止(流氓滋事，明目张胆闹了半年，足见“公安”的可以)。

大难临头草木哀，黑帮压境烂包胎。（当地一种胎生蛇，笔者注）
恶人猖獗善人苦，邪气专横正气颓。
执政员工亦怯怖，摩托驾驶更遭灾。
难闻难受真难忍，非法权刑睁裂开！

言为心声，诗见其人。目睹不平与不公，徐正端从来是个拔剑而起的好汉。如果说性格即命运的话，他的人生经历恰恰印证了此说。1958 年，已经当了 8 年教师的他，仅因为路见不平，说了几句真话，被定为“右派”坐牢。后又发配至湖北沙洋农场劳改。那是建在洞庭湖畔的一个大农场，聚集的劳改犯有十万之众。每天的工作就是围湖造田。劳动繁重不说，湖里的血吸虫成堆。劳改者十之八、九要染病。病死者多少说不清，但徐正端侥幸活着熬到了“解放”。当下，时光把徐正端雕琢成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时候，再回首那段往事，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我把一切都交给历史了，因为过去的事情我没有能力挽回!”

天色渐晚，春雨未息。相对青灯，热血奔涌的徐正端老师又讲述了新近正在心头萦绕的另一件事：屈原村本有一所初级中学，但上面连招呼也不打，硬要把这所中学并到屈原镇（即新滩）去。新滩那边离屈原村有 70 里险峻的山路，且迁校以后，学生要住宿，往返车费花销，大大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村民因此群起反对，徐正端也跻身其中大声疾呼。但均不见回音。他于是再赋诗抒愤：

撤屈原中学有感（两首）

其一

屈原中学并龙江，家长闻之心恐慌。
儿女雏形筋骨嫩，往来负苛路途长。
冬天霰雪风霜冷，夏季山洪暴水狂。
万望“皇天”多保佑，灾殃一降毁无偿。

其二

掌上明珠似肺肝，求知何必下新滩。
山遥路远母常挂，车往船来经费殚。
义务几年该享受，增耗数额又添难。
读书就近全民利，放掉忧心各自安。

3

端阳节是屈原故里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其过法亦是闻所未闻。此地将节日分为三段来过：五月初五为头端阳，十五为大端阳，二十五为末端阳。头端阳这天，民间采辽叶包粽子，煮鸡蛋，吃大蒜，喝雄黄酒，挂昌蒲，悬虎艾。屈原庙的守庙人到各家讨“喜钱”，送“端阳符”。并将写有“祛邪扫瘟”的红纸贴于各户神龛下。这张红纸待三个端阳过后必须用火烧掉。到十五这天，家家户户备好佳肴接姑娘和女婿回家同享，俗叫“大端阳”。在过头端阳和大端阳时，还要到江河里摇桨鸣锣，船头悬着“魂兮归来”的幡旗，船上岸上，众人齐唱《招魂曲》为屈原招魂。曲中唱道：

我哥哟，回哟嗬，嘿嗬吔！
大夫大夫哟，听我说哟，嘿嗬吔！
天不可上啊，上有黑云万里；
地不可下啊，下有九关八极。
东不可往啊，东有漩流无底；
南不可去啊，南有豺狼狐狸；
西不可向啊，西有流沙千里；
北不可游啊，北有冰雪盖地。
惟愿我大夫，快快回故里！
衣食勿须问，楚国好天地……

我哥哟，回哟嗬，嘿嗬吔！

跻身于声声齐唤屈原魂的沸腾的人群中，苍山与江水像是与众生融为一体，显示出不唤魂归不罢休的冲天气概。

当男人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里的时候，或许就能听到女人边包粽子边哼的小调《粽子歌》：“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洁白，半世熬煎”。粽子当然由世人享用，但沿袭古老习俗投入江中的粽子，不少都扎上了五彩丝线。

我相信，屈原村的百姓都是怀着高山仰止的情怀来纪念家乡的翠谷苍山出现的这位伟人。他们将屈原视为人世间无所不在的最完美的英雄。之后，又为他编篡出一个又一个无所不能的故事。今日屈原，已成为不仅在屈原村，亦是国人的楷模。但这是个经过加工的屈原，这个屈原已远离历史，他已成为一个超负荷承载着大众理想、期冀的化身。岂止“屈原”，上下五千年的万千英雄，先祖都喜欢如法炮制，以至我们现今所闻说的历史因此丢掉了太多太多的真实。屈原是爱国的，是忧民的，是高尚的，但同时他屡屡表白的“事君而不二”，“思君莫若我忠”的忠君之念，也多少带着独立人格中的丝丝卑微。我们当然不能以此“微瑕”否定整体的屈原精神，但毕竟不能放弃应有的批判，尤其是“忠君”。都知道，对于文化，对于传统，没有批判就没有继承，没有批判就没有进步。广义而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只有在自我批判中获得升华。而在实践中，我们过于陶醉在“传统”和“文化”的芳香之中，而忘记了批判的重任。

从沉醉中醒来吧，不要总是在沉醉中制造“完美”。实在我们的“传统”的组合中，包含着相当沉重的急需摈弃的糟粕。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白絮似的云朵在乐平里的山间沟壑四处飘荡。站在屈原庙前，清晰可见隔着一块平坝对面隆起的一座山包。那就是屈原诞生地香炉坪。晋人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亦载“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南北朝盛宏之《荆州记》载“县北一百里有屈平故宅，方七顷，累石为屋基”，可证传说不虚也。

这个香炉坪，因为出了屈原，被当地人视为风水宝地。有人家铲净了屈原故宅根基，另建了新宅。徐正端讲到此事言道：“不靠自己靠风水，还是愚昧呀！”

远眺朦胧雾气中香炉坪，未见屋舍，宁静得如同没有人烟。徐正端告诉我，香炉坪虽说是屈子出生地，但现在不单在香炉坪，就是在整个屈原

镇也找不出一户屈姓人家。民间口头流传，屈原后人远迁他乡，现居乐平里的谭、李、向、黄四大姓氏是明代从江西迁来的。

屈庙的石阶下，是条在绿野中飘动的小溪，有人叫它屈坪河，也有人叫它凤凰溪。蜿蜒清澈的溪水直通远处的七里峡。过不久，三峡的浊水将要注满这条溪水。乘着船，可以从这里直接摇向香溪，进入长江。古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而今，在山的泉水也要被"浊"掉了。环视四围，散落在青青山坡上的农舍，均是与屈庙一样的白墙黛瓦。不知何故，此地的农舍和庙宇，风格如此相近——也许这是表达圣洁的一种隐喻吧！

忆及屈原故里行，重温楚辞《渔父》中最末两节颇获新得：

屈原曰：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

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复与言。

人生执着地追求精神的完美，结局必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近似；而水清濯缨，水浊濯足，乐得随遇而安，则可活个潇洒。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啊，究竟该怎样活？

第二十三章 石碑大血战

1

“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早年初读这首汉代民谣，尚不知黄牛是峡，而且是我心仪已久的三峡之一西陵大峡中的小峡。后来知晓了此情，几过三峡，又苦于无人指点，终难寻到其准确的方位。直到这次，双脚踏进西陵峡中段南岸的黄陵庙，抬首仰见大庙后山的黄牛岩，才真正领略了黄牛雄姿：那是青山顶上突立的一段长约百十米的白岩。白岩最西端的岩壁上，一幅土黄色的“壮士牵牛图”浑然天成。“黄牛峡”缘此得名，黄牛庙缘此而建。

古来黄牛峡是上、下行船经过第一个或最末一个大的滩险（江下游还有一个小滩险莲沱），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诸葛亮率师入蜀经此，曾留下《黄牛庙记》文曰“……乱石排空，惊涛拍岸，敛巨石于江中”描述此峡之险；诗仙李白则以极尽夸张手法宣示了行船至此之难之险：“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复三暮，不觉鬓成丝。”

绝险的黄牛峡中祭黄牛，曾是千年以来过往舟客必行之举。上行船客到此企盼一路平安，下行船客到此已经平安一路。那个深深惧恐自然力的时代，山顶石壁上的形似黄牛的影像，在人们丰富的想象中，就变成了护佑行船的神。但黄牛形象终有些憨愚，人们对其跪拜心有不甘，久而久之将其与大禹治水的传说联到一起。据考：将黄牛与大禹相连尚与诸葛亮《黄牛庙记》有关。此文中，诸葛亮写道：

> 平治洪水，顺遵其道。呜乎，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焉？仆纵步环览，乃见江右大山壁立，林麓峰峦如画。熟视于大江重复石壁间，有神像影现焉。鬓发、须眉、冠裳宛然，如彩画者。前竖一旗

> 旌，右驻一黄犊，犹有董工开导之势。古传所载黄牛助禹开工治水，九载而工成，信不诬也。惜乎庙废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开江，不事凿斧，顺济舟航，当庙食兹土。仆负而兴之，再建其庙貌。目之曰黄牛庙，以显神工。

有了诸葛文章在先，传至唐代庙里就有了禹王殿，创祭禹王之先河。大明王朝万历四十六年（公元 1618 年）禹王殿扩建，成为峡江两岸气势最为恢宏的一组建筑群，黄牛庙自此改名为黄陵庙。再以后，清咸丰十年（公元 1860 年）和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两次大洪水的光临，皆将禹王殿齐腰淹没。至今禹王殿的中立柱的 3.6 米和 3.7 米处，还保留着那两次洪水到处的标痕。

尤其是 1870 年那次大水，是峡江人记忆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新编《万县市志》云“城墙崩垮，灾民十多万人”;《重庆市志》云“川东大雨，长江、嘉陵江暴发特大洪水。南充、合川、江北厅、巴县、长寿、涪州、忠州、丰都、万县、奉节、云阳、巫山、等州县城垣、衙署、民田、庐舍多被淹没”；光绪《奉节县志•灾祥》云“十九日（六月）又大涨至府署牌坊下，城中不没者仅城北一隅……水退后，城中淤泥高数尺”；光绪《归州志•祥异志》云“六月二十九日，江水暴溢归州河一带骤涨，高逾屋楼，沿江水势几有越岭之虞，实国潮二百余年所仅见”《清史稿•灾异志一》云“六月，归州江水暴溢，枝江、公安大水入城，飘没民居殆尽”；那次大水还使得荆江黄家铺决堤，冲出一条松滋河，淹没了洞庭湖……据推测，宜昌地区当时的日水流量达 11 万秒立方！

然而神牛也好，禹王也罢，两千多年了，当真的洪水到来之际，他们其实毫无作为。但人们对其的虔诚敬畏一点儿未因此减弱丝毫。黄陵庙越修越豪华越修越气派，吹捧牛神和禹王的匾额口气也越来越大：“玄功万古”、“砥定中流”……闭着眼睛一通胡吹。就这样，一边是跨进黄陵庙顶礼膜拜，一边是船毁人亡的惨剧层出不穷，一边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炸滩清淤疏浚航道，一边是过坝船只拥塞坝前……。古来今往，我们向往的“神”，都是如此“吹”出来的——“吹”和“造神”是溶入国人骨髓的特好。凡是其认定的“好人”，千方百计死后也要把他供上高台；凡是出现其难以释疑的自然或社会灾难，无论如何也要造出“天神”、“地神”、“山神”、“树神”之类。这些“神”，神通广大，主宰世界，为所欲为。“神”造得太多了，俗称“泛神”，民众精神也就变成无所适从的一盘散沙。一代复一代，什么

古怪的“神”都能造，都能找到信徒——“战无不胜”的，“光芒万丈”的，“包治百病”的，“神机妙算”的诸“神”应有尽有……。这些“神”又实在禁不起推敲：像大禹治水——如果历史上确曾有过其人的话——以那时的生产力水平，你能相信，就靠手执耒锸这般简陋原始的工具，能把滔滔洪水制服？大禹所能做的至多如孔子云“尽力乎沟洫”（开沟挖渠）而已。

今日之黄陵庙，曾改做了黄陵庙小学。1985 年学校迁出，现已基本恢复了昔日规模，但庙中的古碑大多残缺。其中一块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 年）的碑记上刻有“庙中？有妇女携带孩童往来嬉戏，亵渎神灵。今应禁止，不准妇女入庙，违者责归家主”——莫须有的罪名经常由可悲的女人承担。新塑的一尊寓意浅薄的黄牛雕像立在禹王殿的后身。但见它四足踏浪，使尽蛮劲弓身前冲——不知此牛是治水还是拉纤。

2

走出黄陵庙，往东五里，就到了新三斗坪镇（原园艺村）。老三斗坪原在距此再往东约五里的今三峡大坝坝址上。新镇只有一条街。医院、商场、供电局一水排在街面上。几家小饭馆比肩相邻，铺面和街道一样冷冷清清。黄陵庙文物管理所李自正先生特意请我和宜昌作家黄世堂在镇上的一个酒家吃了一席新捕到的江鲶鱼。服务员端着一盆腾腾冒着热气的鲶鱼向我们的餐桌走来的时候，充满诱惑的味道即已先期而至。鱼很肥硕，细白的嫩肉满口留香。老板说，本店就以经营风味鲶鱼名闻三斗坪。但依我看，江鱼渐稀，除了这些鲶鱼他也拿不出其它更多的品种了。

计划在三斗坪过一夜，明早出发，沿江边山路去石牌镇——这是此行三峡所走的最后一段路程了。

第二天清晨，背起背包，与向导小罗一起以黄陵庙为起点，向下游的石牌镇进发。天气阴沉，白色的云雾只在山头上飘来荡去；环视四围，江南江北景致清新可辨。沿着江边走过几个连续弧形江道，顺顺当当就走到了位在南沱村下的明月湾。明月湾，顾名思义，江水流经此处随峡势由西南向东南而成一个巨大的弯曲，宛如半轮弯月，极富想象力的文人就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落在这里。站在明月湾起始处，不由得想起当年乘一叶扁舟往来过此的诗仙李白的两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只是江已不是原来那条江了。小罗指着江北的一片水面告我，那里曾是下行船驶出三峡前经过的最

后一个险滩：莲沱。葛州坝蓄水前，这个莲沱名气很大。沱者，“水深萦回者”也。其在江中翻腾起伏，组成三个状似莲花的巨大旋涡。夜静更深，整个峡谷里回荡着莲沱发出的怪异的吼声。声音可以传到 10 里开外。过往船家戏称之为“笑水”——这“笑水”就像社会生活中常常遇到的“笑面虎”，隐藏着阴谋无数。

往者已矣，此时水流缓缓，像是经过数千里奔腾已经疲惫不堪——没有了往日江水的喧嚣，峡江仿佛也失去了生气。

飘起了星星点点的雨，空气愈发清新。过南沱，路渐难行。陡峭的山壁上拦腰凿出的凹陷的一条长长栈道，颇与巫峡的纤道相似——应当就是条亦走行人的纤道吧。踏上湿滑的此道，有了与走瞿塘峡中段栈道相同的感觉：一边身贴崖壁，一边是深不可测的峡江。路很窄，有的地段宽不盈尺，走起来要格外小心。

不知觉中，路好像到了尽头，茂密的荒草中依稀辨认出一条看来可行之路——踩着石缝往下可走到一个缓坡，由缓坡再向上前方就有一片农舍出现在眼前。此乃当阳头村，其名可能与赵云当阳桥上一声吼的当阳含义相同——以该村位置，四季里享用太阳当头的日子肯定不会少。此时已是下午 1 点。雨停了，湿润的风让你呼吸都舒畅。穿过一大片柑桔林，向导小罗带我进村去找一位叫张振民的农户。小罗介绍，张是接待南来北往客的专业户。近来，听说三峡要淹掉，徒步在三峡两岸观光旅游的人多了，吃住成了问题。精明的张振民瞅准这个商机，最先主动将几位北京客人迎到自己家里，包吃包住，热情接待。等这几个人回到北京，在“网”上宣传了这件事，他这个还没打出旗号的“家庭旅社”突然一夜成名。走三峡的客人，经过当阳头村都要打听着找到张家投宿或吃饭。无心插柳的张振民为此赚得一笔额外收入。

我们边吃着张家做的炒腊肉、清菜和西红柿蛋汤边和张振民聊起来。张说半年多前，几个背着大包的北京人走到村里想找个吃饭的地方，村民没见过这阵势，以为他们是坏人，都骇得躲起来。只有张挺身而出大胆接待了他们。

——“你就不怕他们是坏人了吗？”我问。

——“我有把握他们不是坏人，坏人不可能背着大包讨饭吃，那样目标不太大了吗？”张振民笑答。

从张的憨厚的脸庞上就看得出，他不是那种一肚子花花肠子的弯弯绕。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总是把别人想得太坏的人，他的内心肯定也肮脏得

可以。

张的一家种了 300 来棵柑桔，养了 10 几只猪，加上现在这个家庭旅社每年收入能有两、三万。这种收入，在当阳村已经是中等偏上。如老子所言“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得）善。”张的善待他人，已经得到了回报。

当阳村是个被柑桔树包围的绿色村庄。已过了摘采的季节，桔林里偶尔可见零星的红桔缀在枝头。翻过两座山坡，找到了一条通向石牌镇的山路——一条顺山势而下的勉强可称之为路的石阶小道。未行多久，路又断绝。翻过一座山坡，穿过几片桔林，再沿一条小路沿江而行。路，长满荒草。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眼睛不敢有瞬时疏漏，因为下面就是长江！此时天不再飘雨，但一个小时的艰难行程，汗水还是将上衣浸透了。到了龙进溪，眼前情景大变：路面突然变成平坦的水泥路，临江一侧还装了护栏。感觉像是从原始环境一步迈进了现代。很快走到了行程终点石牌镇。天色已晚，找了一家无名小食店坐下来。跋涉一整天，两条腿到这时感到沉重。要了三碗杂酱面——峡江两岸都把北方的“炸酱”读成“杂酱”——小罗两碗我一碗。吃罢饭没有歇，小罗带我到镇边上他的一个亲戚家住宿，明天我们将要参拜石牌天险，那里埋藏着一段感天动地的历史！

图 5.6 石碑保卫战烈士墓碑残碑

3

距离三峡出口仅 10 余里的石牌镇，以石牌而得名。石牌，则是立在明月湾东端江南岸山崖上部的一块高 40 米，宽 12、3 米，厚约 4 米的巨石。巨石略高出崖顶，其石身背靠山体，却不与山体相连。迎江的石面平洁光滑，浑然一个天然纪念碑。它在此孤独地挺立了千百万年，岁月轮回，星移斗转，似乎就是在等带着有朝一日，长江的儿女，能以生命之血亲手在这块碑上刻下永恒的碑文。

这一时刻终于来到——1943 年 5 至 6 月间，一场被西方媒体称之为“东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惊天动地的“石牌保卫战”在这里上演。

然而，才过去六十年，当年举国振奋的大战，即已随风烟远去，成为被几乎所有国人忘怀的历史。我来此地，不仅仅是追思那一段血火交织的岁月，也为的是祭奠在这场血战中献身的万余中华健儿。怀着崇敬、回忆、思索交织的复杂的情感，走到现今尚存于石牌小学的国民党“陆军第 31 师阵亡将士纪念塔”塔基前。说是纪念塔，塔身“文革”中已经被斩断为两截。近些年“尊重”历史风起，此塔却未“重生”。题为《天地正气》的塔志已有相当多文字难得辨认。

另一块由师长乜子彬亲撰“陆军第 31 师抗敌各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记录了该师的抗战经历（节录）：

> 溯自“七•七”事变，抗战军兴。本师驰驱南北，喋血疆场。首创敌于房山，继告捷于娘子关。廿七年春，台儿庄会战，以训练未满三月之兵当敌精锐强悍之师，我官兵犹能坚守半城于一壁一室间。火光熊熊中搏斗苦撑，开卷战未有之先河，遂造成辉煌之战绩。同年秋，敌犯武汉，师再布阵于大别山。孤军苦战，力却强敌。浴血搏斗达十八昼夜。士气之壮，牺牲之烈，可动天地而泣鬼神……三十二年夏，师于豫南受命援鄂。衔枚急趋，冒暑长征。殆达战地，适敌溃窜，而我近万健儿咸以未能参战为憾。旋奉令接防石牌，扼守要塞，肩荷重寄，以惧以荣。十一月十八日，为策应常德会战，九十一团二营五连攻击中保山，官兵神勇，力搏敌垒，前仆后继，争相先登，受伤不退，裹创杀敌者几十余人，尤属英烈。三十三年六月，湘省战起，攻势再兴，我九十二团第三营累取翠福山。九、十两日，先后猛攻克敌坚垒四座。官兵凯唱，士气鼓舞，方期一举扫荡，直捣宜、沙。乃以战略

所关，功亏一篑。而官兵殉国者又近百数余。躬亲战阵，靡役不从。袍泽杀敌立勇，牺牲之烈，历历在目。每当风暗晦冢，兀然斗室，缅怀忠良，忧戚无已。爰于石牌西侧，四方山之阳择地鸠工筑公墓于其上，策划经营两月告成。从此忠骸有寄，九原欢腾。上副中枢崇德报功之意，下酬烈士成功之举。仰树枕戈待旦之风，并作同仇敌忾之气，岂仅以武功彪炳寰宇也哉！

师长：乜子彬　谨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立

4

诚如上面碑文所述，陆军第31师所参与的是“石牌要塞保卫战”虽然惨烈，但已是保卫战的尾声。这场殊死之战，最悲壮的一幕，发生在31师接防前的1943年5月5日至同年6月18日间。

称之为保卫战，因此地乃三峡门户。其若有失，则意味着日寇便可逆江而上，长驱直入剑指抗战陪都重庆。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样的史实，抗战八年，中国西部国土未遭日寇凌侵；我们必须要记住，是15万英勇的中华健儿，在西陵峡口与日寇进行了一场殊死大决战，才守住了西部的安宁。

战事全部经过简述如下：

1940年6月，宜昌失守。拱卫陪都重庆的天然屏障三峡天险暴露在日军控制之下。情势危机，蒋介石于是决定重建第六战区，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蒋在军委统帅部高级幕僚会议上发言：“倭寇已紧逼陪都大门，我们已没有了任何退路。新建立之第六战区，负责拱卫重庆门户。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第六战区比其它战区责任更为重大，比其它战区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我们的任务和口号是，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石牌第一！”

此后三年中日双方各自完成了军事布防。

1943年5月，日军集结10万兵力，开始了向石牌的攻击。其预想的战略，是与中国军队决战宜昌。然后将石牌外围中国军队的防线层层突破，再集中兵力一举攻克石牌，最终打通入川通道。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部署王缵绪的第29集团军和王敬玖的第10

集团军，分别在安乡至公安县和公安至枝江一带布防；调集周岩第 26 集团军之一部和冯治安第 33 集团军固守宜昌至转斗湾阵地；吴奇伟长江上游江防军负责宜都至石牌防线；朱鼎卿 86 军负责守备聂家河、红花套、长岭岗一线作持久战；宋肯堂 32 军则布防在上游三斗坪等外围阵地；石牌东南的曹家畈由 18 军 18 师把守；而死守石牌的重任就落到 18 军 11 师的肩上。

5 月 5 日，经过长期策划和准备的日军第 11 军，由军长横山勇指挥，开始向洞庭湖北岸运动——“石牌保卫战”就此拉开序幕。几乎同时，日寇 11 军第 3、第 13、第 39 师团在津市、白洋、云池、古老背一带集结。兵力达 4 万余；并在汉口和当阳县日寇集结飞机 100 多架。日军最初欲“在宜昌地区进行决战”：于 5 月 12 日开始向大堰进攻，同日攻陷长江南岸公安县。得知日军进攻意图后，中国军队避其锋芒，决定以石牌为轴，开辟决战战场。

经过几天激战，中国军队撤退，日本军队西进。5 月 22 日蒋介石再次电示“……江防军最后应死守资丘、木桥溪、石牌要塞之线，拒止敌人。石牌要塞，应指定 1 个师死守”。

江防总部接电后及时调整部署，令 18 军 11 师死守石牌。战事吃紧，布防在下游的三斗坪的预备第五师也被上调至落步塘、高家堰、峡口待命。5 月 23 日，渔洋关失守；24 日，日寇向宜昌两岸江防阵地进攻；25 日，日寇在空军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部分日军冲入偏岩，陷入第五师、18 师、11 师的口袋；28 日，日寇后续部队约 3000 人进至石牌要塞外围曹家畈、闵家冲、高家堰，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击。但精明的胡琏在日寇攻击前，已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在石牌要塞附近的北斗冲、三官岩、一带的山沟里和岩洞中。

日寇攻击开始，先是飞机蜂拥而至，用重磅炸弹和燃烧弹将要塞四周的山野炸得山崩地裂，烧得满山通红。经过连续 4 个多小时的轰炸，日军以为中国守军已经溃散，便出动第 34 和第 39 师团的一部迂回到石牌要塞的侧后方发起冲锋。哪里料到，埋伏在北斗冲、三官岩、四方湾的 11 师主力有如神兵天降，瞬间将这 1000 多名日寇围困其中，杀声、炮声、喊声连成一片，很快将其全歼。

伤亡惨重的日寇继续向石牌外围增援。5 月 29 日，中国 18 军 18 师和 11 师部分兵力联合把守的八斗冲阵地，被敌人施放大量毒气而陷落。战况危急，第 5 师师长刘云瀚奉命将主力调至木桥溪继续阻击西

进之敌。30 日，日寇出动飞机数十架，掩护 4000 多日军抢战木桥溪高地。一天的反复争夺，黄昏时分，墨坪和木桥溪阵地失守。我军第 5 师 14 团、15 团及师直属营、连队退守至与 13 团阵地相联的太史桥与木桥溪北高地。

31 日，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孙连仲指挥之下，我军与日寇展开生死决战。此战惨烈空前，日寇借助飞机大炮先进于我方的武器，一度得手。但在誓死守卫石牌的中国军队将士的勇猛反击下，最终徒有招架之功。激战竟日，日寇担心退路被截，放弃了进攻准备后撤。我军则乘胜追击。中、美空军亦乘机用飞机追击扫射逃窜的日军。峡江沿岸，日寇横尸累累……日寇夺占石牌，图谋从三峡西进打到重庆的妄想就此彻底破灭。

石牌保卫战胜利了，消息传到重庆，举城欢腾。那些曾见石牌鏖战多日而不见捷音，整好行装准备继续西逃新疆的人士，终在胜利凯歌声中停止了脚步。

此役，中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分别为 15 万和 10 万人。中方共毙敌两万余，有万余将士壮烈捐躯。

名留青史，让我们记住这些为了胜利与敌激战在万里青山，并付出生命和鲜血的中华儿女:

第六战区：第 18 军辖第 11 师，第 18 师，暂编第 34 师；

第 86 军辖第 13 师，第 67 师；第 32 军辖第 139 师，第 5 师。

长江上游江防军；海军宜巴要塞；第 10 集团军；第 26 集团军；第 29 集团军；第 33 集团军；

石牌上刻下永恒的碑文：石牌峨峨，江水荡荡；英雄不灭，地久天长！

5

仍是细雨绵绵，荡着小小篷船，飘进水流澄澈的杨家溪。满峡谷的绿色，满峡谷的清风，在轻纱似的雾气里，如同一幅写意山水。江流悠悠，不大一会儿就把我们的小船带到了石牌码头。热闹的地方，雨中也没有改变。肩扛手提各色物什的百姓，集聚在码头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此情此景，是安谧与祥和，哪里可能联想到血火交织的战争。历史却是如此无情，世界上的灾难或战争，从来发生在你想不到会发生的地方——因为制造灾难

或战争的一方是头在任何角落出没的猛兽。战争已经远去，石牌之战遗址需要苦苦追寻。上得岸来，但见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从码头直通到山腰。山腰一座石桥横跨杨家溪。过桥到南岸向左转，一道继续向山上攀升的阶梯小路，就是今天来参拜的“石牌保卫战”核心阵地——我军主炮台（第一炮台）遗址。据史料记载，其时，此地设有 4 门 47 毫米加农炮，2 门 75 毫米野战炮；另配有一个烟幕队、一个鱼雷队、一个军鸽队，布置在峡江南北两岸。其中大炮火力可以封锁下游 10 多里以外的西陵峡出口南津关。

六十年光阴似箭，石牌高射炮阵地遗迹尚在。洋灰垒筑的环型炮台周围，到处是荒草和乱石。向导小罗说，旁边的类似拱型隧道似的加农炮炮洞，多年是农家放置红苕或蔬菜的菜窖。现在搞旅游开发，刚腾出不久。从炮洞后面顺路可直达江边。但葛州坝建成后，沿江两岸的很多抗日遗迹已被淹没于水下。杨家溪畔的山壁上凿刻的“敌人的坟墓”五个大字是我寻到的唯一的标语。所谓石牌“抗战遗迹”，让我寻得好不辛酸！

秋风秋雨中，从石牌山顶眺望雨雾中的远山远水，遥思当年的交战的炮声、枪声和厮杀声，我的思绪突然飞到了广西昆仑关。那个同样是与日寇殊死决战的地方：1940 年，杜聿明将军率国民党第 5 军，为守住我西南国际交通线，与号称“钢军”的日寇第 5 师团第 12 旅团，在昆仑关展开 18 天激战，终获全胜。此役，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统计，日方第 12 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 85%以上。日兵死亡 4000 余。被中方郑洞国荣誉第一师击毙的日寇旅团长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上写道：“帝国皇军第 5 师团第 12 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1996 年秋天，我从广西南宁驱车往桂平采访一桩走私毒品案途中，路过昆仑关，特意顺着高高石阶，登上昆仑关顶。本意想看到杜聿明题写碑文的“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感受一回杀寇报国的豪迈之气。但我极度失望，山顶上，雄碑未见，只有一个像是祭台的残缺的花岗岩长形石桌还在。一片荒寂的祭台旁，摆着几滩不知何人的便溺，丛丛枯草在秋风夕照下摇曳……

今日之石牌之所见，让我重复了登上昆仑关山顶的感觉：哪里去了，昔日昆仑关大捷的将士；哪里去了，石牌保卫战的英魂？我只知道，这两次抗战史上辉煌的战役，统成为不能被提及的“遗忘”；我只知道，自我启蒙时起，头脑里被存入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 8 年抗战”

——真实的抗战历史，因为党争，而被颠倒扭曲。

近些年，日本篡改侵华历史为“进入”，硬说“南京大屠杀”莫须有，惹得举国公愤。但我们对抗战历史的删改更先于日本，又当何解？每当我在电视中看到前苏联或今俄罗斯为纪念反法西斯作战胜利纪念日，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战士胸佩英雄勋章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间的时候，我都有几欲落泪的感觉——人家的抗战史只有全民认同的真实的一部，而我们呢，有的却是一部使整个民族伤怀的真假两个版本——真的被弃置藏匿，假的大行其道。是谁，制造了这起史学冤案？又是谁，对此噤若寒蝉？

我们多年已经习惯把遗忘当做历史，已经习惯在历史的虚无中生存。同是抗战死难英烈，一方是雄碑耸峙，松柏环拥；一方是断碑碎瓦，遍地狼藉。1982 年，我在南京紫金山下亲见，牺牲于抗战前线的国民党空军将士墓地被纷纷掘开，尸骨卖给废品收购站，6 分 1 斤。1996 年秋天，我曾发起新闻出版界同仁就日本侵占我国领土钓鱼岛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集体签名发表《保钓声明》，被跟踪和监控多时，并受到不公正待遇。后来我在北京医院遇到现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当时是副部长）——此时与以前的外交部的一位小干部相比地位已经是天壤之别——“一阔脸就变”（鲁迅诗句）——派头就是不一样——一个年纪与他相仿的估计是秘书的人为他拿着呢大衣左右相随。因在 80 年代初，他曾是我主持的一块报纸版面专栏极热心的特约撰稿人之一，彼此有过近 10 年的交往。我自做多情把他当作老朋友，向其倾诉了因“保钓”而生的苦闷。哪想到李先生竟然回答我说，搞钓鱼岛做什么，你要台湾去！那语气，不是对日本人，而是要把台湾生吞活剥！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我惊愕又愤怒。我当即反驳说，钓鱼岛是日本人侵占，台湾住的是中国人，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这以后，每当看到李部长侃侃大谈所谓“国家利益”，“中日友好”，“爱国主义”，我都为其深感羞耻。

将“爱国主义”等同“爱党教育”的庸俗说教；与日本之间只有一厢情愿的“友好”，而任其胡作非为。这难道就是我们的“国策”？

中日之间之结怨，肇因源于日本。只要日本不发自真心向中国人民认罪赔偿，这个怨，这个仇是永远要结下去——3500 万死难的中国人的血不能白流！

今日石牌荒草山坳间的残碑荒冢一样让你心生悲凉。

请记住写在仅存的墓碑上这些英魂的名字吧：

福建黄新瑞
权国卿　追赠陆军工兵中校
余志忠　陆军第四预备师步兵第十一团第一营第三连少尉排长
钟友幌　故上尉排长
傅聚才
……

逝者如斯，呜呼哀哉！

偏狭、残酷没有宽容的党争，使我们的历史失掉了份量和尊严。

抗日战争，归根结底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争来争去究竟哪个党领导，哪个党抗日，只能给历史徒留笑柄。

三峡二期工程蓄水后在杨家溪与长江交汇处新立起的“石牌抗战纪念碑”基座上的这样一段文字更令人悲从中来：

石牌抗战主力第十八军简史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成立于1930年8月，是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中建军最早、军史最长、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大的一支老牌劲旅，被称为“王中之王”。该军诞生、崛起于军阀混战的硝烟中，并在残酷“围剿”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十年内战中成长壮大。在抗日烽火中，该军血战淞沪、坚守鄂西、保卫石牌、纵横湘西，屡建战功，辉煌一时。而后在反共反人民内战中一度猖獗中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死敌，最终兵败淮海，全军覆没。该军装备先进，战斗力极强，尤擅长于防御作战。

日寇没有战胜的中国军队，最终被另一支中国军队全歼了——这碑文，究竟是对抗日英灵的褒扬还是对神圣的抗日战争的亵渎？

此刻，遥望大雾笼罩的西陵峡口，置身当年十数万中华健儿杀敌吼声威镇山河的地方，“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真真令我“布奠倾觞，哭望天涯”！

但我深信：西陵峡，你的峡风里，你的浪涛中，你的青山上，永远有万千抗日健儿的英魂飘荡，有一首不息的民族壮歌传扬。

6

再次回到石牌码头，雇了一条小船，逆水从明月湾返回黄陵庙。一路风光：灯影石，蛤蟆碚，龙进溪……如同各地旅游景点一样，路程仅仅十里的明月湾，到处是不着边际的“神话”：一会儿这块石头像猪八戒，一会儿那块石头像孙悟空，一会儿这山像龙，一会儿那山像蛤蟆……无聊至极的像形图解，没有一处能唤起人们对厚重的历史的记忆。

雨未停，小船回到黄牛岩的时候，西望大坝，竟有一缕令人振奋的夕阳晖光，从厚厚的云层中喷薄而出。黄牛岩来去，仿佛走过一个万年历史的轮回。山未变，水未变，黄牛岩上的黄牛图像也未变。实在却是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变了模样。

黄牛助禹治水是一个神话，黄牛如故也是个神话。

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听不到真话却总能听到神话的国度里。神话很美，美的让你忘了你面对的真实残酷的世界。

第六部 大坝梦

或乘飞艇或徒步前往，多次亲近施建中的大坝。那越来越成形的拦江大坝，不可不称之为“宏伟”——因为整个世界见不到第二个！但每当我来到它的近前，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这样一句话“从环境与社会角度来看，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兴建的最具灾难性的水坝。”此言出自加拿大《世界日报》1986 年 5 月的一篇文章。

坝体后面被拦截的江水沉默无语，没人知道高深莫测的水下隐藏着多少沉默的忧患：自古至今，没有人敢与之对抗的江水，真的就这样就范了吗？人类真的能胜“天”吗？

我们不能预测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必须记下来今天曾发生过的一切。

让我们对眼前大坝的由来做一次粗略的回顾 ：

历史性的一刻：1992 年 4 月 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高高举起的 1767 只手臂，向全世界宣告：长江，这条中国河，这条母亲河，其千百万年勇往直前的奔腾，终于将要继葛洲坝之后，被这 1767 只手臂构成的又一道亘古未曾有过大坝拦截，而失去往日威壮的神采。

它那宽阔浩大的江面，它那一泻万里的气势，是它命运走向转折的缘由。而将这个转折付诸实施，则是由一个“伟人”的梦想开始的：这个人叫孙中山。他在其1919年的《建国方略》和1924年的《民生主义》两本书中，分别提出在长江三峡筑坝之说——“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利。”

之后，1932年10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编写了《扬子江上游水利发电勘测报告》，推荐在宜昌上游葛洲坝建一水利枢纽，总装机容量30千瓦，枢纽设有通航船闸。

再其后，1944年，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潘绥提出了修建三峡的《潘绥报告》。此报告引起另一个美国人——世界著名的大坝权威萨凡奇博士极大兴趣。于是其在抗日的枪炮声将息时，便不远千万里来到中国。荡着扁舟一叶，亲来三峡实地考察。在中国同行的帮助下，完成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

1944年，国民党政府将此计划托人转交美国总统罗斯福。不久白宫把这个准备兴建的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向新闻界披露，一时轰动世界。

在萨凡奇的推动下，1946年6月，由徐怀远领队的国民党政府先后派出54名工程技术人员，赴美国丹佛进行三峡大坝的初步设计工作。但由于内战开始，丧失了一个巨形工程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环境，“初步设计”被迫中断。

共产党建国后的1953年，毛泽东在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长江防洪问题的汇报时指出：“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

国内三峡上与不上的争论就此开始。

1956年，《中国水利》5、6期合刊本刊登了林一山的《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 》两万字长文。文章称修建三峡大坝主旨是防洪和发电。

针对林文，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提出质疑。李以同样的两万字回敬，认为林文将三峡防洪问题绝对化，脱离了长江和国家的实情。李锐观点是：治理和利用长江，应当从长江支流入手。

1958年，是有关“三峡问题”争议最为激烈的一年：

1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提出对三峡工程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并委托周恩来总理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建设问题。

2 月底至 3 月初，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与中央各部委及有关省市负责同志、中苏专家共100多人，召开了三峡工程现场会议，讨论如何积极准备修建三峡枢纽问题。

3 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著名的《三峡决议》。该决议肯定了三峡“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3 月 30 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自重庆启程往武汉，一路视察了魂牵梦绕的三峡。于是有了后来的“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被视为其赞同三峡工程上马的诗句。但实际上，毛泽东从没有说过赞成三峡工程上马的话，七十年代，三峡派闹得正热的时候，毛甚至说，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反对报告。

1959 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对《三峡决议》进行了补充和修改。提出正常蓄水位 200 米方案。

1960 年，完成了《初步设计报告》（草稿），推荐三斗坪为三峡工程坝址。

1970 年，先于三峡工程的葛洲坝仓促上马。

1980 年 7 月 12 日，邓小平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地视察，并向工程技术人员了解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情况。三峡工程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1982 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研究了三峡工程 150 米蓄水位方案的可行性。

1983 年 3 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报了《150 米蓄水位方案的可行性》。

1984 年，国务院决定开始施工准备，力争主体工程 1986 年正式开工。

1984 年，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提出质疑。全国政协经济组进而要求吸收具有不同意见的单位和个人参加讨论以集思广益。与此同时，重庆市向国务院写了报告，认为 150 米方案既不能改善川江航道，又可能造成库底泥沙淤积，恶化重庆环境——这是关于三峡工程的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大交锋。而此前，“上与不上”的争论主要是在“党内”，待到 1984 这一年，反对“三峡”的声音突然以强势迸发出来，是“主上”派始料未及的。

由之开始的与其说是学术，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力量的较量。

直到 1992 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三峡决议》正式通过。

李锐先生告诉我，至今追忆起来，数十年论争过程，最关键的细节只有一个：即为八十年代三峡“上”与“不上”掀起又一波高潮时，一次中央会议后，邓小平将刚刚当选了副总理的李鹏留下，请他汇报“三峡工程”问题。听罢李鹏汇报之后，邓小平当即表态“万吨巨轮能开到重庆，为什么不修三峡？”

一言九鼎——就是邓小平的这么一句话最终决定了后来三峡上马！

随后，领得圣旨，快马加鞭，三峡省宣告成立——有人清楚，这可是安排 200 多等待提拔为司局干部的大好时机！

三峡工程决定着长江和中国的命运。它不仅仅是一个“防洪发电通航”的工程，它浓缩着一个民族的灵魂。

第二十四章 悲情黄顺兴

1

谈及三峡，谁也不能忘记黄顺兴。他是台湾彰化人，祖籍河南。曾任台湾台东县长、立法委员。1985 年，怀着一腔报国热望，辗转投奔祖国大陆。其后被委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黄顺兴颇有儒侠风范，经纶满腹，疾恶如仇。后半生致力于环保事业。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 8 年间，他考察了包括三峡在内的长江南北几乎所有省市。对大陆环境和生态现状感到深深忧虑。

在人大表决《三峡决议》时，他毅然挺身而出，成为投下 177 张反对票的第一人。黄老先生认为，三峡大坝决不是什么世界第一的伟大工程。正因为其“大”，才不可轻举妄动。大川大河是地球的动脉，一条河川从形成到稳定，要经历几亿年。中国人口密集，核电站也好，河上建大坝工程也好，一旦为害，非同小可。他主张要从三个层面考虑三峡工程的可行性：一、是不是非要那么多的电能？二、有没有替代方案？三、就算无可替代，也必须把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通过《三峡决议》的那个场面吧！

1992 年 4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

表决即将开始，台湾团代表黄顺兴和刘彩品从座位上起立，走到会场之中的一个麦克风前。

按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第 54 条规定：准备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必须先向大会秘书处登记。临时动念者，经大会主席允许亦可当场发言。并且特别强调，只要代表事先登记，大会主席必须安排，不得拒绝。黄顺兴提前在 3 月 31 日已在大会秘书处登记发言，他的发言应是顺理成章。

但麦克风的电源被关掉，其发言被拒绝。

图 6.1 黄顺兴在人大会议上

虽然如此，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决不是一次普通的发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黄顺兴之所为，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所仅见的良知、勇气和胆识；他是万里云盖下露出的一缕阳光；他是万顷惊涛中的一只不沉的小船；他是一棵屹立在山巅宁折不弯的大树；他是独立于风云中的一尊雕像，是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忠诚地守卫三峡的卫士。

2

黄顺兴的发言被拒绝后不几天，我在京城复外大街 24 号楼他的寓所见到他。先生与我之交堪称“忘年”。他回到大陆的第一部著作《黄顺兴看大陆》的下册曾经收录了我的一篇两万余字的报告文学。

我们的话题即是从那天《三峡决议》在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开始。我想切实了解，究竟为什么他对“三峡”投入如此的关注。

前面我说过，黄顺兴是个儒侠。其儒风之表现，饱览群书，提笔成文；其侠气之表现，即是与朋友谈，敞开胸怀，坦坦荡荡。说到动情处，他的声音会陡然升高，再也难降下来。与我交谈前，胸腔里装着起搏器的他，

甚至向口里喷了以防心脏病发作的药水。

——“那天我要求发言时，大会执行主席万里不但不予理睬，整个会场的音响系统电源统统也突然关掉。我实在有些想不通，代表一届政府最高权力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和全世界瞩目之下，为封锁一个代表的发言，竟然不顾廉耻到了公然违宪的程度。这种粗暴的做法是我始料未及的。他们这样做，是心里不纯，是怕我的发言对《三峡决议》通过产生影响。但你想一想，如果内心无愧，从国家人民利益考虑，听一听不同的意见，有什么不好呢？特别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来的方方面面的建坝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有十足把握说明自己的理由，有什么怕人家说的呢？据我所知，《三峡决议》的通过在幕后采取了压制手段，这是很不正常的。我想，那些头脑发热的不通过《三峡决议》不死心的人，心里很清楚，关于三峡工程，他们在许多技术上也没有把握。没有把握还要强行通过，目的很明白，说穿了就是给自己留后路，万一出现问题由你全国人大来承担。但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是谁的责任谁承担，历史是白纸黑字谁也赖不掉！”

七届五次全国人大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组织了常委委员进行了一次三峡考察。但考察团把黄顺兴和其他几位反对三峡上马的常委排斥在外。当黄顺兴从媒体上得知人大常委会委员考察三峡，并发表言论支持三峡工程早上快上的消息后，打电话向人大秘书处询问。对方答，我们担心你身体不好，所以没通知你。黄反问他，你怎么知道？对方无言以对。其实，三峡之争自始至终都容不得反对意见，黄补充道：

> 这次人大会上，为每位代表发送了力促三峡上马的数册“正面材料”。但“反面材料”却见不到，我问秘书处，为什么没有“反面材料”？对方答，“反面材料”台湾代表团有一份，只能借用，不发给个人。我很气，对他们说，你们做“正面宣传”，给每位代表发的材料有几公斤。而不同意见，即使材料少的可怜，也应当和“正面宣传”处于同等地位：每人一套。代表只有了解了“上与不上”的双方意见，才有可能决定自己的态度。现在这样的做法不公平不公正。事实上反对三峡仓促上马的意见，许多是很有见地的。如南京天文台的刘彩品提出的科学论证不充分，不公开以及工程预算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还有我多次在小组发言中提到的，既然流沙淤积估算不清楚，有没有替代方案？其它如水库寿命，诱发地震，山体滑坡，未来战争及对生态的影响，稀有物种危机，历史文物淹没等一系列问题，有没有相应的对策。但

我的这些提问，没有一个人给我解答。国内媒体千家一声，说三峡工程是民主决策的结果。你看看，哪里有一点民主决策的影子呀！

3

在七届五次人大会议上，坚决地投出反对《三峡决议》的一票。决定了其命运的又一次转折。他毅然公开宣布，退出人大常委会，开始另一种更民间化的生活。但我知道，道出此语，实出于无奈——他内心深处隐藏着深深的苦闷。面对万古长江，他除了几声愤怒的呐喊再无别策。不管他人怎么说，无力拯救这条人类的圣河，他自觉难以名状的内疚和惭愧。越来越严重的心脏病，加之那位心计颇多的结发夫人里应外合“闹”离婚，搞得他简直痛不欲生。

在阜外医院心血管病房，他提笔打点自己的一生。自传《走不完的路》就这样诞生了。此书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小时候，他读关于拿破仑的书，最让其感动的是少年拿破仑追逐太阳的壮举。为了追到太阳，拿破仑从早上太阳刚自地平线上露脸时就开始奔跑，从田园追到山头，再追到海边，不停地奔跑……虽然美妙的理想终于落空，但拿破仑的奇想和意志力，感动和鼓舞了少年黄顺兴。他说他自己一生都像少年拿破仑，一生追求理想和光明。但结局总是难称圆满甚至悲惨。他唯一可以说得出口的是无怨无悔！

在其病榻旁，在我专注地读着他的《走不完的路》的文稿时，他侧着身体安然睡去了。早春的阳光从大窗外照射进来，病室里暖意融融。床台上的那盆友人特意从漳州带给他的兰花散发着淡淡幽香。想当初他慷慨激昂述说三峡时的神采，酷似一名冲锋的战士。他说过，诚然，三峡是中国人的梦想，但梦想就一定要变为现实吗？过去的人认识不到大坝将会给生态带来的一系列灾难，也没有认识到三峡的文化价值以及百万移民的后果，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并且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一定还要急着上马？他说过，为了三峡，他随时准备“中弹”倒下。但他或许想不到，和他一起冲锋的战士竟然是这样地少，少到他被包围的时候，四野里听不到一声回应。他悲，他愤，他仰天长啸。古往今来，像黄顺兴一样的孤独者难计其数。屈原、司马迁、苏轼、储安平……他们或死或伤，即使活下来，许多都遭受了放逐的结局。

黄顺兴之命运，是对三峡工程“民主决策”最完整的诠释：表面上是称

之为“科学论证”，实则是背后的权力机制的运作。是权力主导科学，科学沦丧为权力的附庸。在这个意义上说，长江被拦腰一断（葛洲坝）再断，与其说是“断”在科学上，不如说“断”在政治上更准确。

黄顺兴睡去了，他是一个选择了战场却被阻挡在战场之外的战士，这个在家乡洪水的惊恐中长大的孩子，这个走遍万里天涯的侠客，这个身体已经万分疲惫的斗士，这个以心忧天下的情怀支撑着自己的老人，终于步先人之后尘，精神先于肉体无奈地被放逐于天涯。惆怅，失落，忧伤的足印刻满了他放逐的荒途。

两个月后，我收到他寄自日本名古屋的来信。信中结尾有这样一段话“虽然在亲人（女儿）家待我很孝，但心里依然很空虚，寂寞。你知道，物质是填不了流浪者寂寞的心的。

我这生已经注定流浪到死了……”

又过了 10 年——2001 年秋天，我与黄顺兴在北京“青年湖公园”不期而遇。他告诉我，现住在新街口外统战部宿舍。喜欢这个公园的清静，故常来散步消磨时光。我告诉他，我刚刚从三峡采访回来。本以为他会就此转向“三峡”话题，但他没有，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将话锋回避——“哀莫大于心死”，莫大于心死呀！

清爽的秋风里，望着黄顺兴满头荒草一样摇动的白发，和那刻满沧桑的面容，真令我百感交集：一个民族将那些真正为他爱他的儿女，一个接一个毫不足惜地抛弃在万里荒郊的时候，对这个民族我们还有什么期待可言呢？

第二十五章 大坝之争

1

大坝之争，初始曾是浪漫和激情的产物——“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上个世纪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敢想敢干的五十年代，主上三峡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一样诗情满怀。在波涛滚滚的长江上，他把革命的浪漫主义发挥到随心所欲的极至：林最先提出三峡的蓄水 235 米，库容 1000 亿立方米，以及万吨海轮（后来发现南京与武汉长江大桥桥下空间高度不够，改为万吨船队）直航重庆的惊世方案，并因之获“长江王”之美誉。林一山乃山东文登人氏，出身军旅。曾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任辽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在此任上紧握大权叱咤风云，打杀“阶级敌人”不在少数，亦曾获威风凛凛的“林钢炮”之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门口那座供众人瞻仰的林一山铜像，即足可说明其一贯的工作风格。

与其相对的“冤家”李锐，湖南平江人氏。早年就读武汉大学机械系，并同时从事“学运”。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 年被任命为国家水电总局局长。1958 年起任毛泽东秘书兼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因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三峡”的主将，终因此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与一批三峡反对派一起获罪。罪名之一就是“反对毛主席‘上三峡’”。身为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是当然的“罪首”。“文革”中又被关进秦城监狱 8 年。1979 年平反，再任电力工业部部副部长。

林、李之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半个世纪的所谓“三峡论证”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说得动听一点——是政治激情（包括权力）与科学理性的对抗。

2

毋庸赘言，概述一下有关三峡近 50 年来的十大争议吧！

一、建与不建之争

正方（主建派）：三峡坝址坛子岭下中堡岛，属于黄陵板块，位于古老的前震旦纪结晶岩体上。此处河谷开阔，河床覆盖层厚度不大。而且基岩恰是三峡中仅有的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体，十分有利于坝址的稳定，这简直是上苍的刻意安排。有人看准了这一点，发誓说“看不到三峡上马，死不瞑目！”。至于三峡建坝之后，将要面对的移民、生态等一系列问题，“论证”之初并未加考虑。

反方（反对派）：三峡工程所需投资太大，工期太长，移民太多；建成后泥沙淤积碍航，增加上游洪灾、山体滑坡，生态环境破坏。这些问题尚未论证清楚前，不宜仓促上马。从现有的国力实际出发，应当采用先开发支流，即先支后干的方针。这种开发方式，周期短资金省，防洪发电双利。为什么非要投大资建一个世界“大坝”？况且如果考虑到未来可能的战争，大坝很容易遭到军事攻击，那时候将造成骇人听闻的浩劫，我们则悔之晚矣。

二、建坝防洪之争

正方：三峡大坝，对于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遇到大洪水时，大坝可为中游拦截 95–220 亿立方米的洪水。大大减轻中下游的洪灾损失。如果不快上三峡工程，万一遇到 1870 年那样的特大洪水，荆江大堤可能决口，要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了。鉴于此，“三峡”必须上马，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伟大工程。

反方：正方意见是耸人听闻，夸大其实。因为长江的洪水不仅仅来源于上游，还有中下游的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和汉江、赣江等多条支流。而三峡大坝对来自这些中下游的洪水控制是无能为力的。如像 1954 年那样的全流域大洪水，中下游共需分蓄洪 500 亿立方，而三峡只能承担洞庭湖与长江汇口出的城陵矶以上的分蓄洪 100–200 亿立方的任务，另有 300–400 亿立方的洪水仍无着落。这就意味着，对长江防汛重点城市武汉来说，大汛来临，三峡工程既不能降低洪水位，也不能减少其附近分蓄洪的压力。至于对更下游的江西、安徽等省的防洪，三峡工程也只有望洪而

兴叹了。所以说，所谓三峡工程“防大洪”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正方所提到的 1870 年那场洪水，据调查，当年洪水出三峡下泄之际，首先将南岸松滋口冲垮，直入洞庭湖。而当时，监利以上的很薄弱的荆江大堤并未决口。而现在松滋口已有现成的分洪道，北岸荆江大堤已经大大加固加高，抗洪防洪能力远非 1870 年时可比，怎么能说，突来洪水会造成几十万上百万的人的死亡呢？

且 1870 年洪水最高水位比四川省 1981 年那场水灾还要高出 4.74 米。根据曲线频率，1870 年的洪水，只是 2500 年一遇。如果大坝建成，泥沙淤积，势必会壅高重庆洪水水位，增大洪水对重庆的威胁。务实的做法是，长江防洪必须纳入流域总体综合治理，而非任一单项工程或措施所能奏效的。所谓“三峡工程是不可替代的唯一方案”的说法，显然缺乏科学性。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用这么一个抗洪能力有限的大坝截断长江，还要淹掉农田 42 万亩，移民 120 万，造成无穷后患，值得吗？

三、发电之争

正方：如果说五十年代，正方力主三峡工程上马最主要的动因只是“防洪”的话，到了七十、八十年代，则改为以“发电”为主了。前面提过的林一山在其 1956 年撰写的那篇两万字长文中，提到发电的只有 500 字。但在两年后的“南宁会议”上，还是他，笔下的水电投资已经占三峡工程总投资的 2/3，“防洪”已退居次席。最新的提法虽然是“防洪、发电、航运并重”，没有人再坚持“防洪第一”之说了。但实际上建坝之重要目的，已经暗度陈仓——由“防洪”移情至“发电”。

三峡建坝，预计向华中和华东每年输送 840 亿度电量，可替代火电厂燃煤 4000 万吨。既减轻了煤炭生产和运输的压力，又有利于改善环境。

反方：既然三峡对防洪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仅从筑坝发电这一功能来看，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把长江截断，造成很多未知的后果和隐患。而从综合开发长江资源这一思路来看，在长江上游还是长江支流上建设中、小电站，不但发电量的总和能够远超“三峡”，而且投资省见效快，对推动当地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用数字进行比较，三峡总装机容量 1820 万千瓦，而在其上游的乌江、澜沧江地区可开发的水电资源就有 3400 万千瓦，远超“三峡”。从整个经济战略来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紧盯住三峡，而放弃另一条多快好省发展水电的途径。像现在这样，因兴建三峡工程而挤掉一批见效快的支流水电站的建设投资，将会推迟电力工业近期发展速

度，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四、航运之争

正方：三峡水库回水可达重庆，将淹没一系列险滩，并减小坡降和流速，可使目前行驶的 3000 吨级船队发展为万吨级。从而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同时，经三峡水库调节增加枯水季节流量，宜昌以下的航运也可得到改善。

反方：三峡大坝建成后，在万县下游的永久回水区段，航运可以得到改善。但在水库尾部的变动回水区，当水库水位下降时将露出天然河道，正是大量泥沙淤积的地方，航行却增加了难度。这不是耸人听闻，以黄河刘家峡水库为例，其设计库容为 57 亿立方米。17 年内，就已经淤掉了 10 亿立方米。原水电部决定采取“蓄清排沙”（每年汛期水库水位降至防洪限制水位进行畅泄排浑水，汛后才蓄清水，满足航运发电要求）办法清沙，只能调动坝后两公里内的泥沙，再远处的就调不动了。而三门峡水库就更严重了，仅 7 年就被泥沙淤掉了库容的 44%。再回过头来看三峡工程，即使按 150 米蓄水位（实为 175 米）方案计算，其泥沙淤积处，离坝址也有 300 公里之遥，要靠水库调动泥沙，无异于痴人说梦。加上蓄水后加剧的山体滑坡，所谓“改善航运”，随着三峡工程的运行，将会一年比一年艰难。况且，还有葛洲坝、三峡大坝两道大坝阻拦，光过这两道关少说也要花费 7、8 个小时，航运畅通从何谈起？

五、泥沙之争

正方：泥沙并不能成为反对三峡筑坝的理由。与黄河相比，长江的泥沙要少得多。近些年来，虽然上游滥伐森林，陡坡开荒，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但长江的泥沙还看不出明显变化。三峡水库若采取“蓄清排沙”的方式，大部分泥沙可以排出。100 年后，水库淤积到一定程度，可达到冲、淤基本平衡。防洪库容和调节库容还可保留 86–92%。库尾变动回水区的模型实验，虽然证明重庆港区将面临严重淤积，嘉陵江口会出现拦门沙，重庆洪水位将显着抬高，但完全可以采取优化水库调度，港口改造，整治和疏浚等措施将这些泥沙问题解决。

反方：泥沙是三峡工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一些专家将泥沙问题比做三峡工程的癌症。长江年输沙量固然在黄河之下，但也排在了世界第四位。在一条输沙量如此大的河流上，拦腰建坝，国际没有先例。如何解决水库

泥沙淤积迄今为止仍是个世界难题。特别是近数十年长江上游以及三峡两岸的滥砍滥伐林木毁林开荒，造成相当严重的水土流失。据统计，现在西部森林覆盖率已由50年代的40–50%下降到10%，有的地方甚至只有1%。长江年输沙量70年代为年5.1亿吨，80年代上升为年6.8亿吨。而且因上游水土流失没有得到妥善治理，长江的年输沙量呈恶化趋势。如果三峡大坝建成，再加上整个库区内20亿立方米的滑坡体潜在的威胁，势必加剧泥沙淤积。因之正方所说的“天然走沙水”和“蓄清排浑”的条件，基本已不具备。主张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专家热衷于模型上的实验，声称水库清淤的国际难题有望解决。实际情况是，模型与实际情况误差甚大，不足为凭。而能够证明在泥沙河筑坝发生淤沙碍航并导致翻船事故的例子却很多。像丹江口、西津、黄龙滩水库……

三峡库区的泥沙就目前的能力而言，尚无有效对策。越积越多的泥沙，后患无穷。

六、生态之争

正方：生态问题应该从利弊两个方面考虑。有利方面，三峡水库库容（正常蓄水位总库容为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虽然相当大，但与长江的水量（宜昌年经流量4530亿立方米）相比不算大。且水库为峡谷型，对生态环境如气候、水质、水温等影响不大。水库运行后，可减轻中游分蓄洪区的淹没损失，因开发水电这种清洁能源，可减少火电燃煤污染。再者，截流后的三峡风光更美好，被淹文物古迹可迁移重建。不利方面，如受水库淹没影响，百万移民的安置难度较大。但总体来看利大于弊。

反方：三峡工程对未来生态的影响深远，是一个万万不能忽视的问题。从保护生态角度出发，三峡大坝不是早建或缓建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应该建。

具体地说，如土地资源被淹没而不能恢复。三峡工程要淹没35万亩的耕地，7万亩柑桔地，都是地质第四纪最肥沃的冲积土地带。库区涉及到的19个县，丘陵和山地占96%，平原只占4%。相对平缓的耕地和城镇被淹后，仍要在海拔更高处的丘陵和山地开垦，水土流失会加剧。还有两岸大、小滑坡崩塌体214处，随着建坝后因水的浸泡作用，其稳定性减弱，会引起老的滑坡体复活。并且，水库蓄水还有可能诱发地震。如诱发地震和崩塌互相触发，对整个坝体将构成威胁。此外，如遇战争，大坝很容易成为

敌方攻击目标。其一旦遭到核轰炸，垮坝水流量将比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还要大得多，对下游的葛洲坝、宜昌市、荆江两岸广阔平原和武汉市，会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

七、移民之争

正方：考虑到未来人口的自然增长，三峡工程预计移民 120 万。再考虑到将来因泥沙淤积壅高水位后，移民人数还要增加，总移人口将达 130 万以上。如此庞大的移民大军，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众多的移民人口，可以用“开发性移民”的思路加以安排。这种方法“投资少，见效快”。具体地说，比如让他们垦荒种柑桔——移民试点很欢迎这种做法，他们说“不要亲儿子，也要‘柑’儿子！”；比如涪陵，那儿有天然气，搞个 30 万吨合成氨厂。另外，万县出盐，搞一个碱厂……总之，放开思路，移民安置不成问题。

反方：130 万以上的移民，是破天荒的。国外水库移民最多不过 10 万。有的水库建设因移民过多，还被迫放弃。移民加 42 万亩淹没耕地，加 10 几个城镇工农业生产能力的消灭，这是对生产力的破坏。三峡等待开工的这几十年，有人行政干预不让这一地区发展经济，以便减少赔偿数额，实际已经给三峡人民造成了很大经济损失。

“开发性移民”是美好的假设。先说种柑桔问题，不是你想种就种，这里面还有一个高程问题。专家告诫说，柑桔种植最高只能到海拔 400 米，再往高结果就不行了。另一个说法是搞工厂。像前面正方说到的建合成氨厂和碱厂，投资最起码也要 10 个亿，可安置人员最多 6000 人。按这个比例计算，所谓“开发性移民”要投资上千亿，国家投得起吗？

三峡库区两岸都是山坡地，现有人口已经超负荷，开垦已经过度，粮食不能自给。这种情况，已大大超过环境允许的承受能力。而且这方面我们已有过惨痛教训，像三门峡、新安江、丹江口三大水库，移民各 30 万之多，至今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从百万移民的利益多考虑一些，舍弃这个让百万移民付出巨大牺牲的大坝呢？眼下移民大军上访已经开始——移民的安置问题已切切实实摆在面前，逐渐开始向社会问题转化了。

八、技术之争；9，规模之争；10，投资之争（从略）。

如此争来争去，其实并不能决定三峡“上”与“不上”。1988 年，胡耀邦总书记，在权衡三峡工程上马利弊之后，曾就李锐先生的《论三峡工程》一书戏题打油诗一首：“妾本禹王女，含怨侍楚王。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乞君莫作断流想，断流永使妾哀伤！”诗写得诙谐风趣，但我们却不难从中看出，耀邦对三峡工程慎之又慎的态度。

李鹏则不然，他一直为三峡工程上马不遗余力。刚出版的李鹏先生的《三峡日记》，其 1996 年 12 月 30 日的日记尤其耐人寻味：

“话又说回来，是因为遇到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我在总理岗位上，才有机会全力促成此事。俗话讲这是‘缘分’，我们讲这是‘机遇’”——一切尽在不言中。

图 6.2 修建中的三峡大坝

第二十六章 万里黄河万里愁

1

2003 年 9 月，我沿着洪灾过后的陕西渭河而行，但见阴沉的天底下，大水茫茫。水面上各种漂浮物游荡其上。眼看即将收获的庄稼被淹在水下，一片连一片，令人不由得扼腕叹息。据统计，此年的渭河水患，受灾人口有 200 多万，直接经济损失达 40.3 亿元。

出乎人们想象，渭河这般严重的水患，水利专家却别有一番评断：小水大灾——这本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究其根源，千夫所指都对准了有前苏联专家主建的黄河三门峡水库大坝。此坝建于 1960 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错误地以为，通过建坝拦沙，加上水土保持就可以让黄河水变清。根本没有去考虑三门峡大坝建成后，会给大坝上游不远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这条同样多泥沙的河流带来的影响。

天不遂人愿，三门峡水库运转的第二年，渭河发水，库区的泥沙淤积即过了潼关。如今 43 年过去，被三门峡大坝阻断的黄河，其大坝以上的黄河及支流，因冲淤平衡失调，眼瞧着泥沙淤积年甚一年：仅渭河潼关段河床就淤高了 5 米多。而据史载，未见大坝前的 377 年间，此段河床淤高不过几厘米。河床淤高，使渭河成为“悬河”，致使行洪不畅。过去，渭河主槽过洪能力可达 5000 立方米/秒，现在只有 1500 立方米/秒，不足过去的 1/3；过去，即使 5000 立方米/秒的大水，通过渭南全境只需 7、8 个小时，而 2003 年这次仅 1500 立方米/秒的小水，过境竟达 50 多个小时。河槽变浅，流量锐减，严重的滞洪导致河水漫滩，造成百年不遇的大灾。据测算，现今的渭河，一吨洪水中，含沙量达 486 公斤！渭河已是名副其实的泥河。

谁也不忍见的灾害已成事实，人们开始讨论，建设这样一座给子孙后代造成无尽灾难的大坝，为什么当时就没人提出相反的意见阻止？2003 年

10 月 31 日的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追忆三门峡兴建过程的报道。证明在苏联老大哥权威不容触犯的五十年代，还是有中国专家提出了三门峡水库工程淤沙后患问题。此人就是当代因坚决主上三峡工程而著名的“水利专家”张光斗。电视里与画面结合的解说词这样说，张先生一生致力于我国多个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在他居室的墙上，挂满了上述工程的照片，惟独没有三门峡。张光斗说，我反对三门峡建设，认为泥沙淤积解决不了，将来很难办。张并且说，当时苏联专家不应独断独行，应当多听一听反对一方的意见。

历史似乎给了张教授一个机会，让他荣幸地“验证”了一次“正确”。但偏有人与他过不去，揭发张教授厚颜无耻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他不但不是反对建三门峡的人——和现在主建三峡工程一样——恰恰是三门峡水利工程的主上派，现在看三门峡出事了，为自己推卸责任。

2

七届人大、政协五次会议其间，我与张光斗教授曾经有过接触。那是在政协委员驻地北京京丰宾馆。也是巧合，连续几天早、中饭的餐桌上，我作为采访大会的记者，与张教授还有京剧名家袁世海先生同坐一桌。就餐之中，袁老先生时不时就景生情，爱讲一些笑话引得大家笑声一片。我爱听，张教授也爱听——他似乎也食人间烟火。这次会议上，三峡为重要话题，大会要对三峡提案进行表决。一次早餐后，我告诉张光斗教授，有的政协委员提出三峡应当缓上的建议，我本意想当面听听他对“缓上”意见的看法。

“放屁！什么缓上？缓上就是不上！”平常看上去和蔼慈善的张教授情绪突然暴躁，甚至有些气急败坏“什么人说的？”他向我追问。意想不到的场面，如此没有气度的言辞， 搞得我尴尬万状，我只得苦笑不再出声。

这回突然在电视上重见张光斗谈三门峡，其并说当初建大坝应当多听一听和充分考虑反对者意见，可能三门峡大坝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泥沙越积越厚的结局。我因之就想，他原来也知道对大工程的论证反对者的意见不容忽视，为什么轮到三峡工程，张教授就消失了“容纳”反对派的雅量？岂止没有了“雅量”，恐怕思维逻辑也弄不清了。既然你张教授当初反对三门峡坝的理由是泥沙淤积后果难以预料；那么现在，三峡工程与之面临的是同一难题，而且仍然是国际学界公认的难题，你为什么就高举双手赞成

了呢？我相信，你心里清楚，三门峡大坝拦的是真正的泥沙，而三峡大坝后面将要淤积的是泥石沙。两相比较，泥石沙淤积更易，处置更难！

3

回顾三门峡水利枢纽兴建的真实过程，就不能不追述同是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与张光斗先生的论争。

1957 年 4 月 13 日，三门峡水库正式开工。

同年 6 月 10 日至 24 日，水利部在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与会专家、教授 70 人。

会上，一直坚持认为三门峡工程上马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的黄万里先生，面对开工现实，在预见水库未来灾害的同时，仍然提出了权宜之策：

>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不淤。（指三门峡大坝拦沙）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 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两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些，洪流也可能小些，但总要逐渐将泥沙淤积在水库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段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但闹灾是终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暂时），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把泥沙）留在水库里面。（排沙方法是）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它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而一贯坚持“圣人出黄河清”之论的张光斗针对黄先生主张泥沙下泄的意见，则坚持主张拦沙库内清水下排，并反诘黄“看不出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

50 年过后，三门峡大坝之灾如黄万里教授预言，年甚一年的时候，张光斗竟敢在电视上置真相于不顾，当众扯谎，而且是那样地自我感觉良好：他明明知道大坝淤沙是个世界难题，却随着政治风向偏来倒去——恕我直言，我想引用这样一段话为其作注“我们生活在一个亲手制造了或大或小的罪恶，却无罪感意识；制造了一个个悲剧，却把悲剧当做全民喜剧来唱的时代”。

4

1957 年，西安农展馆举办三门峡工程宣传活动。展馆门口“圣人出黄河清”六个大字引人注目。其时刚开始推行简化字，许多人不认识由“聖”简化的“圣”字，将此句读为“怪人出，黄河清”——自有弦外之音。

1958 年，11 月 25 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 年 9 月关闸蓄水拦沙。同年大坝上游潼关以上渭河段大淤，淹没良田 80 万亩。库区百姓被迫纷纷逃离原本富庶的八百里秦川，踏上西迁宁夏之路。自此渭河水患不绝，两岸百姓忍无可忍，陕西的人大代表终于在惯于大唱颂歌的 1962 年 4 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唱出了真实的反调。他们在提交大会的 148 号提案上写道：“三门峡大坝自 1958 年 12 月至 1961 年 11 月拦洪以来，水库（泥沙）淤积量共约 20 亿吨（包括塌岸边 8 亿吨），潼关以上约占 6 亿吨。其中 1960 年 9 月蓄水以后至 1961 年 11 月，来沙 16.3 亿吨，淤积在库区内的泥沙占来沙量的百分之九十四。库区周围 340 高程上下，地下水位普遍上升。根据调查观察，在 335 米以上农田浸没面积已达 47 万亩。而这 47 万亩，本是一片沃土。农作物产量下降，部分地区果树已开始发生死亡……”

提案而外，陕西的代表还直接把意见提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中国官场向来有豢养不学无术长袖善舞佞臣的传统。此等人妖代代批量生产，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们极擅钻营和阿谀，向以欺上瞒下文过饰非见风驶舵制造灾难坑害贤良为己任。如此卑劣人种历朝急需不厌，还往往高官厚禄被冠以“对政府衷心耿耿”之名，呜呼！

想当初，正是因为“对政府衷心耿耿”“不学无术”之士的“活动”，1955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以急风暴雨般的掌声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报告》中以诗一样浪漫的语言描述说“只要 6 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当其时，又有多少代表意会这掌声之后，竟然是渭河两岸数百万父老乡亲绵绵几十年惊天动地的哭声。

5

1959 年，毛泽东在庐山上大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怒指彭道：“你和黄万里一样有反骨！”——是有人向毛告发了黄万里反对建三门峡。毛习惯从旧书中引经据典，不可能不知《三国演义》中的“反骨”将军魏延，但他不讲魏延却单将黄万里来比彭大将军，足见毛对黄恨之切。

当其时，黄早在两年前即已被毛钦定为清华大学头号右派。校长蒋南翔亲手交到毛手中的黄的小说《花丛小语》，可能引起了毛极大的愤恨。黄万里在小说结尾对三门峡水库的反科学“论证”有这样一番感慨：

> 于是田方生也激动了，就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他竟肯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欢的人才。

以毛泽东的专横，他不可能对黄万里“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欢的人才”的议论无动于衷——厄运很快再次降临在黄万里头上。他被贬到北京密云劳动改造。如此，黄的处境仍不解某些人心头之恨，1962 年又将其放逐至三门峡水库挖厕所。而此时，三门峡水库内的泥沙淤积加速，潼关河床在一年半时间内暴长 4.5 米，已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悬河”。独住黄河边，听黄河的呜咽之声——身处逆境心系百姓的黄万里心如刀绞！

1963 年，听窗外豪雨大作，念苍生之艰辛，他写道“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之意见，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悲愤、无奈与凄怆交织的《哀黄河》：

>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截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叫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涘。
可怜血汗付东流，改持开洞排沙止。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沚。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人处逆境多想的是茫茫中前程中的“自己”。但黄万里不同，他以科学家的良知和责任仍然时时关注着黄河。

1964 年春，黄万里再次上书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说明三门峡不能兴建的理由以及当前三门峡泥沙淤积的严重性。他说，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陕西和山西的黄土高原。正是黄河在这一地域挟带的泥沙冲积而成了仅次于亚马逊平原的世界第二的黄河三角洲平原。所以只以挟带泥沙将黄河断为“害河”，前提便错。现在我们必须注意到，郑州以下的黄河为淤积段，泥沙沉降本不可避免，怎么能指望三门峡水库解决下游河道的淤积呢？

信很快转给了水利部，水利部还召见了黄万里——这是当了“右派”之后，他的意见头一次有了回音。部里要黄拟出三门峡大坝改建计划。黄用了整整 60 个日夜，写出《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他主张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坝底河水流速，期以此救秦川于陆沉。然而，将“意见”上交后，再无下文。

1969 年，潼关河段再次告急，在三门峡召开的四省治黄会议上确定了防淤对策：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打开 1–12 号导流底孔。而打开这 12 个导流底孔恰恰是黄万里当初为暂缓大坝淤沙请求留下的。然而淤沙太多，且坝已不是原来那个坝，河也不是原来那条河，即使 12 个导流打开已经起不了缓淤的作用。多年后黄老先生回忆这段往事时仍不无感慨“大坝上马已成定局时，我说，大坝底下的几个施

工洞即导流底孔不要堵死，留着好排泥沙。这点大家同意了，但还是照苏联专家的意见用混凝土堵死了。大坝建成后，水库内泥沙大淤，才把这几个洞重新开通。12 个洞花掉 1.2 个亿!”国家的钱这么花，他心痛!

而另一些人，花国家钱如同扔废纸，只有花自己的钱时才心痛无比。法新社一则新闻报道：北京清华大学某某某教授（即那位当时坚持鼓吹上三门峡后来力主上三峡，并说“圣人出黄河清”的“泰斗”），在国外某机场登机时被阻。原因是他未清理旅馆账目。结果，在机场将欠账结清后，改乘下一班飞机。

据悉此教授如此行为，已经是第二次了。

6

渭河水患年甚一年的时候，“右派”黄万里正置身于清华大学的劳改大军中，奋战在江西庐山之下，鄱阳湖畔。每日可望庐山——那个传出“圣旨”的山头，决定了今日黄之命运；每日遥思黄河——那条他誓以科学家的良心捍卫的大河，牵系着他的灵魂。

1971 年，鄱阳湖的血吸虫肆虐于清华大学农场，致死人命，农场停办，教员家属全部撤回北京。独有黄万里，尽管在劳动中曾因体力不支晕倒，仍不在照顾之列，再次被遣送至三门峡基地继续接受“改造”。在这里，重听到他日夜牵挂的黄河的涛声，他百感交集曾写下“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岛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的诗句。他回忆“我那时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治理当前人造的黄河水患，已构成他生命之魂。

1973，在黄万里再三要求下，他终于获得批准沿河考察——一次承受屈辱的考察。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73 年春，承领导照顾，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这对于一个热情治河者是大好的机会，对思路起了强烈的反应，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黄方略。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

黄万里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报国至上——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只是尊重科学，他只在真理面前折腰。1973 年，他已经 62 岁，“右派”加上无尽无休的改造，使他对自己有否机会以学问报国愈感忧虑。他

甚至以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自比，希冀能如嵇康临刑前留下名曲《广陵散》那样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黄河论》。因此，他倍加珍惜好不容易争来的这次受人监视下的考察。黄天，黄沙和黄水，沿途所见，验证了他曾一再泣血呼号而无人回应的预言，黄万里心境凄凉无比。他在《倾听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宇冬梅报告三门峡坝造成后的灾害》一诗中写道：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我们完全可以想见，黄万里洒在黄河两岸的泪水有多重多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块土地爱的深沉!”

7

1911 年，黄万里生于上海。其父黄炎培为清末举人，亦是一位颇具声望的刚直的教育家和爱国者。1932 年黄万里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更名唐山铁道学院。今改称西南交大）。其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共三篇。那时，他深受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筑路修桥曾是他人生最大的愿望。但 1931 年的长江大洪水，一夜之间吞没了湖北云梦城，淹死 7 万人的惨剧和 1933 年黄河 10 余处大决口，刺激了他，他开始有了治水兴利之想。1934 年，其父黄炎培先生介绍黄万里认识了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许先生对黄万里说“每当江河大水过后，参与灾害调查的人才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言外之意许对学过桥梁建筑设计的黄万里日后涉足水文学寄予厚望。

1934 年黄万里赴美深造，先后就读于三所大学。其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提出了自暴雨推算洪流的理论，曾被当时水利学术界认为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方法。该方法比后来的欧洲水利专家纳什公布的相似方法早了 19 年。在美国的 4 年时间里，黄万里走遍了美国几乎所有大型水利工程。1936 年，美国最长的密西西比河发大水，他还乘船沿途进行了一次收获颇丰的考察。他从中悟出：“诚如先前许心武

先生所说，如果仅从他学过的土木结构专业讨论治水，远远不够。水文学非常重要，因为任何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要改变水沙流动的状态，促使河床改变。”

美国的 4 年学习，为他投身未来的水利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心已经飞向了急待进行科学治理的黄河和长江。

1937 年初，抗战爆发前他回到祖国。婉谢各种高薪任职邀请，来到四川省水利局任工程师、先后出任测量队长和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其间，年仅 26 岁的他与多名年轻人一起用了整整 10 年的时间，沿长江上游及各主要支流进行了全面踏勘。10 年考察既让他了解了长江水，也付出了人员伤亡的代价。他回忆说：“长江与黄河不同，那么浅的水就能把我们的人员冲走、淹死。河床尽是滚动的砾石。水浅，水力却很凶。当时我们不熟悉情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长江的淤积，不是黄河的泥沙、悬沙，而是河床上移动的床沙、砾石。”

1947 年至 1949 年 4 月，黄万里又被调至甘肃任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他有机会继熟悉长江之后，再走近黄河。春夏秋冬，沿着黄河叩访了一处处穷乡僻壤：有时是在洪水到来之前，有时是在洪水泛滥之后。大西北宁静而沉寂的晨昏，苍茫的天底下成群结队流离失所的灾民，引发了他对黄河一次次深入的思考。他观察到，黄河河床周边与水流的关系，动态中的水泥沙的相互间的作用，非人力技术所能完全控制。

10 多年的长江和黄河考察和工作的实践，他拥有了关于这两条民族之河的发言权。

8

黄万里想不到，解放后近 50 年的清华执教生涯，他的报国之想竟如一场空梦。

前 30 年，他因黄河获罪。其生命的最后 20 年，为了长江，为了三峡，他继续延续着地狱般的煎熬——50 年，50 年！竟没有一年心情舒畅的好时光！

1985 年，三峡上与不上开始新一轮激烈争论的时候，黄万里直接上书国务院，提出“勿建三峡水库，代以云贵川鄂赣多省水电站”的建议，无回应。

更让黄万里憋闷的是，主持“三峡论证”的钱正英的夫君与黄家是近

亲，而且每年春节钱都与夫君一起来给黄万里拜年，却偏偏在主持“三峡论证”时将黄视为陌路人——家事国事有别——钱正英不愧是政治家！

但黄万里不甘做局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92 年，他以一系列统计数字和计算为基础，写出《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的长论。他在文中告诫“长江三峡大坝之修建，从自然地理观点，从经济观点，从国防观点，皆不可行”并强调说“修长江三峡大坝无异自动制造一个弱点资敌。若使电站被炸掉，则华中工业瘫痪；若使电站被炸毁，则两湖三江人民沦为鱼鳖。”然而，仍是不见回应。并且，为了封锁黄万里的声音，水利部与各相关单位打招呼，要他们在“论证三峡”问题时，决不能邀请黄万里参加。

1994 年 12 月，三峡大坝在坝址三斗坪举行正式开工庆典的时候，远在北京清华校园的黄万里教授仰天长啸，老泪纵横！

悲愤中写下长诗《哭长江三峡开工》：“……孰料此江床满石，火成鹅卵逐流中。巫山着意催云雨，江水忘情沙石冲。库尾落沉渝港塞，延伸溢岸泛涛洪……但闻猛虎千家哭，怅望轮台悔诏空。”他心坠如铅，他忧心如焚，他做出了一生最痛苦的预言：三峡大坝建成之后，顶多 10 年，泥石沙的淤积将使库区重庆变为死港，大坝将被迫炸掉；他横眉怒对那一彪主上三峡的人马，称将来三峡工程为害百姓，后人切莫忘记在三峡白帝城的山尖上——如西子湖畔立着秦桧夫妇等人跪像那样——立起新 3 人跪像面对长江——中跪者钱正英，左跪者张光斗，右跪者李鹏。

他病了，昏迷中仍在喃喃自语：“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

现在，让我们再回顾一下，黄万里教授，此次重病前 6 次上书全国人大的第 3 封信中部分内容，以昭其赤子之心：

> 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像大渡河龚咀（电站）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利发电的。尽管 16 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淤积难泄）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但今准备施工了，领头的“专家”应负刑事责任。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兹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但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

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其意为生米成饭，中央决策难改，笔者注），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拯救此人为的灾难于万一。

一方面黄万里为反对三峡上马上谏不止，一方面三峡大坝一米一米往上增高。

然岁月无情，黄万里终于渐渐走向了生命的尽头。2001年8月20日，饱受癌症折磨的黄万里，在病床上度过了他90岁的生日。他的女儿黄且园向前来祝贺生日的朋友和学生表达谢意的时候曾有如下一段感人至深的发言："父亲留给我们最深的影响有哪些？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首先是他的诚实。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对学术观点是如此，在政治观点上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是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是如此。"

黄万里的一生是一代学人的悲剧：空怀报国壮志，无从施展。岂止无从施展，从身体到精神无端承受了几乎贯穿大半生地狱般的磨难。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诚实，更源于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这忠诚，不是拍马逢迎投当权者所好，而是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

我在此不得不写出如下的文字：无私无畏忠诚如黄万里先生者，十有八、九必得抱憾而终。如马寅初，如梁思成，如黄顺兴……问题是我们不是以无知而是以权力"干"掉这些优秀的民族儿女的时候，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

我相信类似黄万里教授的悲剧还将要延续。而产生伪科学的闹剧也会不断登场——像三门峡水库的"论证"，像北京大学年轻的"教授"陈某人

莫须有的“恐龙胚胎”的“研究”；像清华大学某环保赵教授，逻辑思维已经混乱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仍然振振有辞地站在讲台上大谈特谈怒江工程的“伟大”与“不朽”——毁了长江还不够，还要再毁掉怒江；像清华教授群体的《长江与三峡工程》专著——在讲到核战争威胁时，竟然幼稚地说出“只要战争发生时有一定的预警时期，就可以通过放空水库或降低水位来免除突然袭击的危险”——比“9·11”劫匪还明白！

怪哉，无学术能力或打着学术招牌人品低劣的庸才，往往在官场上极擅钻营。优秀的人才往往就毁在他们手中。“汰优养劣”我们已经从体制上完善了一条庸才升迁之路。如果真正的民族精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希望！

也许诚如李锐先生所云“把民主、科学当作吃饭一样，为生活之必须，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恐怕要几代人不懈努力才能得到。”

9

2003 年 6 月 1 日，三峡大坝开始蓄水发电。同年渭河小水大灾，各界对三门峡的非议联系到眼下正“热”的三峡——两座大坝面临的诸如泥沙、环境、移民问题——三门峡如是，三峡难道就可以逃掉？但现在的主上三峡者，依然仍有说辞。

原主持三峡工程论证的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说“三峡论证虽然是结束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

我的天！钱正英套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老话意在给自己留下后路——其实 1999 年，钱在一本水利杂志上即已声称“三峡工程有问题”——如此 “远见”不知是来得太早还是来得太晚。

50 年代初，曾任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的钱正英曾在淮河上“实践”筑闸一座，哪料想临到淮河大水，“实践”证明水闸大门竟然不能开启。而三门峡的“实践”结果是灾难连绵，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但这灾难，早在黄万里先生预言之中——这科学的预言本身即是人类实践的结果。钱正英究竟还要什么样的“实践”和“检验”——难道三门峡悲剧重现三峡那一天，才是“唯一标准”吗？若此，403 名专家到底“科学论证”了什么？

还有“双院士”潘家铮，他在黄万里教授去世两年后，接受《中国三峡工程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评说黄教授：“黄先生是位水文专家，并不是河

流动力和泥沙运动规律研究方面的专家……在泥沙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应尊重真正的泥沙科学权威和专家的意见。”

真不知潘家铮此番话究竟何指。如果说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天文、气象、地理，并沿长江和黄河进行过长达 10 多年跨学科考察的黄万里不是泥沙运动和河流动力专家，只不过不是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和专家组组长潘家铮“需要”的“专家”罢了——这正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以其同理可反问一下潘先生自己，又算是哪门学科专家，既“领导”三峡工程论证又担当三峡移民工程验收“组长”？

多点儿容忍的雅量吧！潘先生——恕我直言——我们国家优秀的人才不应让你们“闲置”得太多！

2003 年 6 月，重庆市投资 15 亿在下面涪陵寸滩兴建的新港正式开工——已经在为将来某一天重庆被淤成“死港”提前做准备了。

2004 年 1 月，瑞雪纷飞，三峡蓄水后，我第一次乘船经过三峡大坝与葛州坝之间的灯影峡江段，江水碧蓝如缎。江边的船民说，从没有见过长江水有这么清。清湛的江水显然意味着水的流速变缓，泥沙在江底逐渐沉积…… 耳畔不由自主地响起黄万里教授的一段话“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然变成浊水。”

2004 年 6 月 14 日，《北京晚报》消息：“连日阴雨，重庆市民政局收到万州上报的灾情：因雨该区内出现多处滑坡，截至昨日，已转移灾民四万余人……因滑坡事故死亡 1 人，3 人受伤……数百间房屋倒塌或成为严重危房。”

万州滑坡，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

10

2001 年，清爽的秋天将来的时候，黄万里教授，想着长江，想着黄河，怀着无限的遗恨，无限的眷念，无限的忧虑，走了。

临终前唯一清醒的一刻，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留给后人的最后一段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

仍应以堤防“拦”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他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一辈子治水不成，却被人治，但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心里装的仍是祖国的江河。不用自我标榜——他才是一位合格的中国人民的儿子！

黄万里的追悼会格外清净，清净得不染一尘。污浊的人士不会来，来也无立足之地。先生长眠的世界，一样溢满精神的芳香。 李锐来了，他从一个水利会议上告假而来。同在会议上的张光斗还有潘家铮不闻不问，禅定如山——也许黄万里之死，对他们来说是个解脱。

漫步在今日清华园，轻轻地从绿树环合的九公寓那幢小楼走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多少崇敬，多少感慨，多少辛酸，多少无奈，一起涌上心头。

清华园，清华园！你的校园走出多少“政治家”决不是你的骄傲，成为为科学献身的斗士才是每一位清华学子的荣光。

捍卫科学真理本非难事，但在当代中国，却必须要具备经受百般屈辱和万般苦难的意志。

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
大堤蚁穴谁先见，叹息泥沙塞巨川。（金克木赠黄万里诗）

黄万里先生走了，他的科学精神还活着。他给后来者留下了金子般珍贵的科学的良心。

第二十七章 问坝能有几多忧

1

中国，再难找到一块平静的国土。

在我们生息的这近 1000 万平方公里辽阔地域，现在只有堪称两条“原始”的江还没有大坝专家惠临——怒江和雅鲁藏布江。不过，我在了解了江河的生态危机后，对这些大坝专家愈发感到惧怕。须知，我国已经建设水坝 8.6 万座以上，成为世界上拥有水坝最多的国家。

为什么要建那么多坝呢？以前我也曾误以其发电无污染而称之为“绿色能源”。但看到三峡建坝毁掉了那么多的林木和农田，我开始对“绿色能源”产生疑惑。一个电站从开发建设到运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非一个电站的运营所能弥补。而且这生态损失往往不可逆转，难以估量。

现在，有大坝专家又打起怒江的主意了。

怒江，别称潞江。发源于我国青、藏边境唐古拉山南麓。流经西藏自治区东部，入云南省境再折向南，经缅甸入印度洋。全长 3200 公里，在我国境内段为 1540 公里。怒江水生生物丰富，已知仅鱼类就有 48 种。其中特有属 4 个，特有种 16 个，土著种达 70%。如裂腹鱼、江鳗鲡、巨鲑等构成了怒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水生生物，储存着青藏高原降升、自然环境变迁的所有信息，具有重要的科学、生态、经济和文化价值。2003 年 7 月，怒江峡谷独特的“三江并流”（怒江、金沙江、澜沧江）奇观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怒江峡谷的价值还在于，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其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一旦大坝高耸，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将丧失什么。

正是人类对江河无休止的索取和干预，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江河的原生貌和自然流动循环的规律。放眼黄河南北，有多少断流的河皆因筑坝所致。连我们那条母亲黄河也裸露出干涸的河底。自 1972 年至 1999 年 28 年间，黄河就有 22 年断流；还有黑河，几百公里流程上竟然建坝 98 座。水被拦

在大坝后面，30 多条支流除季节性的排洪输水外，再无水流入干流；再有新疆艾比湖，因奎屯河等河流竞相筑坝，入湖水量骤减，湖面迅速干缩，景象一片凄凉……。

有专家疾呼“我们要不要给子孙留下一条自然河？！”

2

1981 年的那个难忘的日子：人们敲锣打鼓庆祝葛洲坝拦截长江成功之时，有谁知道，大坝之前，看似沉静的江水下，成群结队的中华鲟正在逆水而上，与阻其洄游金沙江产卵的钢筋混凝土大坝拼死相搏。鲜血染红了江水，尸体横在了江面。何其惨烈的一搏，何其壮烈的一幕！

想不到吧，一坝横江，我们为改变长江命运自豪之时，却把千千万万年曾是自由往来江上的中华鲟逼上绝路。中华鲟是大型海洋洄游性鱼类，号称长江活化石。距今已有一亿四千万年的历史。成年鲟体长 4 米以上，体重 500 公斤，为世界 27 种鲟鱼之冠。每年 5 月从海洋游进长江口，秋季到长江宜昌段，再上溯至金沙江产卵毕，顺流回归大海。葛洲坝阻止了其代代相传洄游产卵的通道，即是宣告了其种群生命的末途，中华鲟怎能不惜头破血流以死相拼！

春雨天，寒意料峭。我在宜昌市集强路 7 号葛洲坝集团中华鲟研究所见到研究所技术人员姜华。在一间相当窄小的办公室里，他简要介绍了“长江鱼”：

> 长江鱼类主要分布为上、中、下游三段，共有 1000 余种。上游为山溪、山涧鱼类。鱼的体形小，因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种群保存相对完好；中、下游因水流渐缓鱼的物种较为丰富。尤其是宜昌江段，分布了较多的珍稀鱼类。其中最被关注的是中华鲟、长江鲟、白鲟、胭脂鱼四种。现在中华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而其它三种鱼类则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口。像白鲟，少说亦有 1 亿年的生存历史。虽然属于凶猛的鱼类，但与中华鲟比较又娇贵得多。如果同是用滚钩将两种鱼捕到，中华鲟会拼命挣脱，而性情凶猛的白鲟则一动不动，直到死去。1988 年，我们曾捕到过一条 200 多斤，长两米多的白鲟，并在研究所养过半年多，最后还是死了。后来我们尝试再捕几条，也告知渔民捕到白鲟善加保护并及时通知我们。有过几次捕到白鲟，用船拉过来，

> 但它一出水面极容易呛水而死。我们又想出用嘴套将白鲟套住的捕捞方式，但还是不成功。进入九十年代，白鲟已经见不到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对白鲟的包括生殖在内的等生活习性知之甚少，而白鲟有 5 年了，已基本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还有纯淡水鱼长江鲟，有记载以来它的个体最重是 80 斤。它也是到长江上游产卵，但它不入海，而是多集中在金沙江一带江段游弋。其处境也是岌岌可危。现在人工养殖共有 5 尾。两尾在宜昌，另 3 尾在宜宾，由一个叫周世武的个人养殖。无论白鲟还是长江鲟，理论上说其繁殖过程很简单。但由于我们对其生活习性了解很少，人工养殖难度也很大。即使人工养殖成功，还有一个近亲繁殖和基因退化的问题。

姜华说话很讲分寸，但我能感觉到其骨子里充满对所从事的中华鲟养殖事业的热爱。天色将晚，在瓢泼大雨中，他带着我，到离研究所有一段距离的一座大棚里看中华鲟养殖场。简陋的场房，一个个大缸，按鱼的形体大小分别放置。最大有尺把长，最小还是鱼苗。每年放入长江的中华鲟就是出自这里。至于鱼苗的来源，说出来你或许不信——杀鱼取卵是也。原以为如此珍贵的中华鲟，其人工繁殖场所该是如何现代化，但见到这简陋的工棚似的设施，令人不寒而栗的取卵方式，真让我大失所望。

据说，从保存生物物种多样性、遗传基因多样性的观点出发，美国和俄罗斯等国，都非常注意建坝对鱼类危害的问题。为了使洄游性鱼类正常繁殖产卵，他们在建坝的同时也修建鱼道、鱼梯等保护鱼类的设施。曾有过这样一个故事：美国过去曾要在一条河流建坝，但此坝建成将影响一种小鱼的洄游，最后仅为了保存这样一个物种，此坝停止修建。还有法国的卢瓦尔河，这条河拥有欧洲唯一能洄游 600 英里以上的大西洋鲑鱼群。卢瓦尔河的支流阿列河是这个地区最主要的鲑鱼产卵地。但卢瓦尔河的大坝却阻断了鲑鱼洄游产卵通道，导致鲑鱼产量急剧下降。1994 年，法国政府为挽救大西洋鲑鱼将卢瓦尔河上的大坝拆除——这就是“小鱼胜大坝”的世界传奇。

想一想我们吧，除了大熊猫享有贵族之礼遇，我们又有哪种珍惜生物得到了如此精心的呵护?

保护大熊猫固然不错，但就濒临消亡的珍惜物种的全部而言，这种保护有失公允。

3

很少有人知道，三峡蓄水，另有一个珍稀物种——桃花鱼亦遭灭顶之灾。

桃花鱼，其实不是鱼。准确地说，应称之为“桃花水母”。这是一种直径约 1–2 厘米的圆形透明的腔肠生物。其生存时间距今已有 9 亿年。据载，世界上发现过的桃花鱼共有 5 种，其中在中国的 3 种分别分布在四川灌县、泸州和秭归。令人惋惜的是，总共 5 种桃花鱼有三种已成陈迹，唯有泸州和秭归硕果仅存。而秭归的桃花水母即桃花鱼，生存状态最好。

关于桃花鱼秭归人编有一个充满诗意想象的传说：

话说西汉元帝刘奭（公元前 48 年–33 年）为结束与北方匈奴多年战争，特选原本是村姑的宫妃王昭君远嫁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临离宫前，她向汉元帝请求回香溪与父母兄弟和乡亲告别。当回乡的小舟在融融春光里驶入香溪时，两岸细柳依依，桃花灼灼。触景生情，想到自己将远嫁他乡，不知何年能归，就轻抱琵琶，弹奏一曲《桃花送》。泪水流淌，点点滴滴撒落在澄澈的香溪河。很快，串串泪珠就变成了玲珑剔透的桃花鱼。在五彩的春光里，在清碧的溪河中，如同一团团张开的玻璃小伞上下游动，像是对即将远行的昭君送上不尽的慰藉。

自此，每年春天，只要香溪河岸的桃花开了，河里的桃花鱼就像变戏法似的成群结队地涌出来——暂把昭君的故事撇在一边——每到这个时节，也就成为秭归城的孩子们心有所想的节日。确切地说，秭归盛产桃花鱼的地方在秭归城西面不远的咤溪河的鸭儿潭。春天的阳光下，常见快乐的孩子们三五成群走过了咤溪上那座铁索桥，再过了江边“九龙奔江”的沙滩，一手提着脱下的鞋子，一手提着小瓶小罐，涉过溪流来到鸭儿潭边，打闹着，嘻笑着捞起在水中漂浮的桃花鱼。

桃花鱼是以超强的生存意志，顽强地历经 9 亿年的风雨活到了今天。在人类已经认识了基因的这个时代，我们当然要重新判断包括桃花鱼在内的任何微小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桃花鱼的生命基因里，或许存在着三峡变迁的奥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其生的权利。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深刻的哲学命题——任何一种生物物种如果是自然的毁灭，如恐龙之类——那是遵循自然法则的结果。反之，如果物种毁于人类之手，那就是灾难！

聪明的人类学会了“移植”和“搬迁”，2002 年已经把 2000 多只桃花

水母“搬”到北京水产科学研究所繁殖和研究。三峡蓄水，与桃花水母同命运的还有被学术界称之为“三峡第一花”的疏花水柏枝。这种水柏枝之所以珍奇，是因它的身世之谜：与其同属的其它 10 余种植物都分布在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心的西部地区。忍受着干旱、盐碱和风沙的煎熬。独有疏花水柏枝，却在气候湿润和温暖的峡江边扎根。专家分析，可能是在青藏高原逐步抬升和长江形成的过程中，疏花水柏枝的祖先的种子顺江传播，再经过千万年的适应生存，终于在峡江边安了家。但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言，因为如果此说成立，就另有疑惑产生——为什么只顺江漂下疏花水柏枝一种？如果飘下多种科属水柏枝，为什么单单疏花水柏枝活下来？

经过课题组长期观察，疏花水柏枝尤其在汛期，被江水浸泡的时间最长可达 9 个月。这时间，其在水中几乎处于窒息状态，凭借类似于休眠的特性，坚持度过漫长的汛期，熬到其成长的冬季。千百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在被淹没的水中休眠已经成为它生长中所必经的生理调节过程。疏花水柏枝在冬季开花结果，落地的种子发芽后，抗不住来年的洪水，很少能长成高大的植株。只有那些漂浮在水面顺流而下的种子，才有机会在石缝间找到安身之地，最终长成高大植株。

由于疏花水柏枝分布高度在海拔 80 至 130 米之间，恰在三峡二期工程 135 米蓄水水位以下，成为三峡库区 37 种特有植物中唯一被全部淹没的物种。

当我在力图为疏花水柏枝的命运悲鸣之时，大水已经无情地吞没了其成长的家园。与桃花水母的命运一样，疏花水柏枝也被冠之以“保护”的名义，移栽到距其原生长地最近的宜昌植物园。出乎专家预料的是，移栽后的疏花水柏枝在宜昌度过的第一年就出了问题：本来其应当迅速成长、开花、结果的冬季，却完全失去了朝气——连开花都成了问题。课题组连忙出动，为其重新选址安家。新家定在毗邻武昌东湖的武汉植物园。此地地势低，夏天湖水上涨时可将疏花水柏枝全部淹没达数月之多，较符合其在三峡中生长的条件，看来再次移植很可能获得成功。

桃花水母和疏花水柏枝的移植，似乎到此应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实际上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暂时保存了它们的性命，却彻底毁灭了它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而没有了与之共生共存的家园，它们本来完整的生命就没有了根基。如果我们以如此方式——只为了人类的利益，恣意一一将物种迁移并将其家园毁灭后再加以“克隆”，并声称这是对物种的“保护”——问问上帝吧，最后的人类世界还能剩得下什么？

4

2004 年的夏天，三峡工程蓄水已经整整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说，三峡库区水质良好，比预计的要好。

事实却没有那么乐观——重庆 1/4 河流已经严重污染：

据重庆市水利局和环保局的统计数字：三峡库区二期蓄水后，个别支流水质呈异常迹象。库区 15 条次级河流已变成 5 类水质。大宁河（小三峡）等次级河流出现了富营养化现象。

重庆辖区内 500 万人口缺水喝。集雨面积大于 100 平方公里的 207 条次级河流中，1/4 被严重污染，基本丧失了水资源的使用功能。

2004 年 1 月和 2 月，国家环保总局抽查重庆饮用水源地的水质，发现水质全部超标。超标的主要项目是大肠菌。清水溪、御临河、桃花河、花溪河、临江河、璧南河、澎溪河等污染严重。

大坝截流蓄水成库，库区成为当世最大的人造湖。江面变宽，水位增高，江流变缓，江水自净能力大大减弱。某些河段还出现江水回流现象。种种原因，导致污染物滞留库区。

三峡蓄水前，重庆城区入江的可降解污染物，流到下游百多公里的长寿区即可降解一半，现在污染物到长寿只能降解 10%。待到 400 公里外的奉节方能全部降解。

重庆渝中区大溪沟嘉陵江边，是重庆著名的美食地。5 艘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豆花鱼船”在江边一字排开。这些有废旧的客轮改装的“吃”船都起了很动听的名字：“新欣鱼港”、“江城鱼都”……入夜，这里灯火通明，乐声飘扬。每只船上人声鼎沸，每只船上觥筹交错。大量的油污和辣水加上食客的粪便，汩汩倾入嘉陵江汇入长江。重庆市 8 万多家餐饮店，每年仅入江餐饮垃圾就有 25 万吨！

重庆市环保部门公布过这样一组令人不安的数字：

目前，全市向长江的污水年排放量为 10 亿吨。

年入江垃圾总量为 130 万吨。

到 2010 年，污水年排放量将达到 23 亿吨。

年入江垃圾增至 269.6 万吨。

另有重庆籍各类船舶年产生垃圾 4.2 万吨，粪便 700 多万吨，生活污水 1500 多万吨，油污水 100 多万吨。

三峡库区是个大大垃圾桶，是个随意倾泻的大粪缸！

库区水质的污染扩散，将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居民饮用水的安全。加之废弃物中有毒重金属沉积，对水中鱼类和以江水灌溉的作物也都会产生越来越重的影响。通过食物链，这些受过污染的食品进入人体，后果很难预料。有的环保人士担心“三峡库区就像一个生态炸弹，说不定在哪一天突然爆炸！”

如此严峻的污染形势，极其有限的生存空间，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秭归、奉节、仍在图谋扩展。而万州市更是痴人说梦般提出“要建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口号。

5

不管怎么说，三峡库区的污染必须要治理。但是无奈之中，我们又在重复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沱江是这样，云南滇池也是这样。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治污的投资大大超过我们在破坏自然生态过程中获得的经济收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北京的环境和能源专家玛利亚•莎克批评说：“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利益，完全放弃了对环境的考虑。”

过去，三峡开工前的“科学论证”，对蓄水后库区污染和治理“论证”得过于乐观——只知道筑坝需要花多少亿，移民资金需要多少亿，至于污染的损失之大，治污的投资之高，可能是始料未及。“论证”原文写道：三峡大坝“对水污染的影响”为“影响较小”。

2004 年，重庆市政府宣布，为保障三峡水质，即年起将陆续投资 200 亿元，上马 190 个环境治理项目。这些项目包括重庆市主城区及影响区的 17 座污水处理厂，15 座垃圾处理厂，以及库区 18 个沿江小城镇污水、垃圾处理项目。

《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预测：到 2005 年，三峡库区及上游主要控制断面水质要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人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基本得到遏制。到 2010 年，库区及其上游主要控制断面水质整体上基本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二类标准。库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防治库区水质的规划毕竟是写在纸上。落到实处却绝不那么简单。200 亿投资不是小数字，投资的到位和管理，治污工程的兴建，工程质量的保

证……岂止一个“规划”了得。

巫山县有关部门要在大昌镇官庄百姓世代饮用水源上建垃圾处理厂，百姓群起反对。他们向报社写信反映此事。记者拿着相关材料找到国家环保局。国家环保局回信给巫山县委，请他们出示关于在官庄建垃圾处理厂的环境评估报告。结果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却胆大包天愣敢欲将工程上马。县里的某位不敢透露姓名的人（有录音为证）2004 年 1 月，打电话给记者说记者多管闲事没事瞎捣乱。试想想，记者如果当时不出面干预，巫山这些“环保人士”，还不反了天！

还是 2004 年 1 月，我乘船从尚未完全淹掉的巫山大昌南门返回巫山城的时候，一路虽仍是青山碧水，但在我曾多次往返的大宁河水面上，第一次见到了漂浮的垃圾堆和粪便。而以前大宁河与长江交汇处清浊分明的景象，也已被泛着白沫的浑浊和浮动的垃圾所代替。有消息报道，2003 年，三峡二期工程蓄水后，江面漂浮物正在成为威胁三峡库区水环境的又一个“杀手”。因为越来越多的漂浮物的出现，直接影响了过往船只和三峡大坝的安全。漂浮物所畅行无阻，是库区的管理在此环节上又出了问题。

当初，库区沿岸曾成立了专门打捞漂浮垃圾的队伍。具体分工是，三峡坝前 3 公里内的漂浮物。至于三峡库区的其余 8 县 600 多公里江段，则由分布沿江各县的打捞队负责。这些打捞队运用最原始的人工网捞方式，进行着繁重的劳作。但清除水上垃圾，需要资金投入，而这笔钱，国家又没有立项——没钱的活计，当然没人愿意做，即使上了船，也是出工不出力。如此，漂浮的垃圾焉能不与日剧增？

我从万州登船上岸往重庆。站在岸边，眺望雾气沼沼的几乎感觉不到流动的长江，心中充满了惆怅感慨苍凉之情——不仅是为峡江两岸如我一样百姓的未来，也为水中越来越难存活的鱼子鱼孙。

库区污染能够治理固然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似现在这般漏洞百出的库区管理，没有理由让我有足够的信心——库区水质向污染转化，是世界上所有大坝的绝症！

第二十八章 98洪水再回首

1

1998年7月，长江发生洪水。死亡1230人。

同年9月28日，江泽民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称，此次洪灾为“天灾”。

11月14日，北京人大会堂本要举行的庆祝抗洪胜利文艺庆典，朗诵上海一位桂“诗人”的歌颂江泽民领导军民抗洪抢险的长诗——大红封面的诗册已经发到记者手里——虽然文艺大会又突然“因故”取消，长诗也未公开发表，但江泽民领导的“抗洪业绩”永存。

江所强调的98年洪水为“天灾”，原因有四：厄尔尼诺气象造成长江汛期多雨；1997年中国西部高原积雪异常偏多；亚洲中纬度环流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

至于“人祸”：无。

2

文过饰非。

有人拍案而起：他就是因为对三峡工程持有不同意见，遭人冷落而沉默已久的水利专家陆钦侃。

陆钦侃，浙江人氏。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随美国水利工程师萨凡奇考察过三峡。1946年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遣到美国，学习研究三峡工程。1947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硕士学位。1949年以后，陆钦侃一直从事水利水电规划工作。曾任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处长、副总工程师。他亲历了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始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议。1986年，陆担任了三峡工程防洪专家组顾问，参与了三峡

工程上马前的最后一次“科学论证”。他认为，三峡的防洪效益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洪水灾害，成为少数几位拒绝在“三峡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之一。

陆钦侃向那些认为防洪只有“三峡是唯一不可替代工程”的人非常冷静地指出“一些人有重水库轻堤防，重新建轻维修的倾向。说得尖锐些，好像只有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建新水库、大水库、特大水库，才显示技术有成就。而对默默无闻，年复一年的堤防检查、维修加高加固，就认为没有技术，没有成就。这种思想倘若不扭转，则今后长江再遇大洪水，难免还要临时抱佛脚。”

此言一出，在有关三峡的“科学”论证会上，立即遭到主上三峡的人士齐起而攻之。于是就有了关于“三峡论证报告”的这样一段耸人听闻的文字：

> 加高长江堤防不切实际，因为长江堤防加高是有限度的。1980 年，提出的加高加固堤防的要求，是按现有实际可能而言，堤防高度已近极限，进一步加高已无可能。长江重点堤防一般高度为 12-16 米，堤防越高，风险越大，况且长江堤防是在千余年来修建的旧堤基础上加高培厚而来的。堤身质量很差，存在众多缺陷。如堤身隐患，堤基地质情况复杂，地基渗漏和局部段迎流顶冲。高水位行洪时，渗水、管涌、流土、塌陷、滑坡等险情大量发生。这些缺陷难以完全从根本上加以消除，也就是技术上是不可行的。要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只有尽早建设三峡水库。再者，加高加固堤防，经济上也是不合理的。长江堤防长达几万公里，需要巨大的财物投入。按照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社会是难以做到的。加高加固堤防的方案，最高水位将比历史最高水位高出 2-3 米。如按此水位加高加固堤防，仅土方量就需要 76 亿立方米，要挖压耕地 160 多万亩，迁移人口 100 多万。沿江各种涵闸、泵站、桥梁、码头、道路、通信和输电线路等设施都要改建或重建，这是全社会能力难以承受的。鉴于以上情况，工程论证并征求沿江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的意见，都认为加高堤防 2-3 米缺乏可行性。

主上三峡的人士中，有那么一部分人，眼睛里耳朵里除了“唯一不可替代的天下第一的”三峡工程，其它任何关于三峡的意见统统见不得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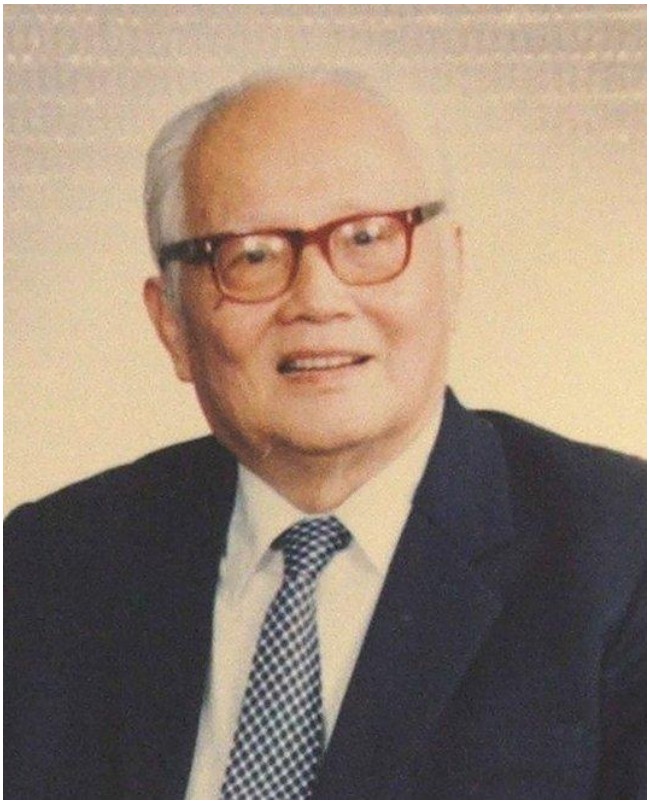


图 6.3 陆钦侃先生

进。并且为了达到工程上马的目的，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1985 年，全国政协经济组组长孙越崎老人，不顾 92 岁高龄，亲赴三峡考察。38 天的考察中，正赶上毁灭性的新滩大滑坡。老人为三峡心忧如焚，回京后与参与考察全国政协委员一起上书中央认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但没有回音。

1988 年，陆钦侃等 5 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上书中宣部，要求同意上三峡建坝者与反对建坝者的意见同等见报，遭到拒绝。中宣部的理由是：不宜公开辩论。

1980 年，国务院召开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制定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规定必须在 1990 年之前完成加固长江大堤，并附有详细措施。但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对此无动于衷。以至到 1997 年春季长江大堤江西段出现了溃堤之灾。即使如此，长江水利委员会仍然不闻不

问，随后 1998 年出现了更大的长江洪灾。

“1998 年的长江洪水是天灾，忽视长江堤防加固更是最大的人祸!”参加过国务院 1980 年的长江中下游座谈会的陆钦侃义正词严。

不妨再重复一遍 403 个“科学家”签字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说的吧，“加高加固堤防的方案经济上也是不合理的。长江堤防长达几万公里，需要巨大的财物投入，按照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社会是难以做到的”。

陆钦侃说，1980 年国家文件上明文规定，加高加固堤防，为什么过了 18 年直到发了大洪水还无人理睬？没钱吗？否！如果 1980 年动工加高加固堤防，只需 10 亿人民币。如果 1990 年动工，也才需 100 亿。而建一个葛州坝，花了 50 亿，建个三峡，则要投资至少 2500 亿！如果哪怕拿出一半精力像关注三峡那样关注一下大堤，何来 98 年湖北、江西几处大堤决口！

陆钦侃还说：“1998 年的洪水来量，比起 1954 年长江那场大水要小得多。1954 年超额洪水为 1023 亿立方，而 98 年超额洪水最多只有 300 亿立方。也就是说，98 年最大洪峰量，尚不足 10 年一遇。”

陆钦侃针对 98 年洪水，再一次阐明他一直坚持的“三峡工程防洪能力有限”的观点。他说：“1998 年 8 月 1 日之前的长江洪水，主要是由于三峡大坝以下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和汉江和赣江等众多支流的洪水组成，三峡工程没有能力控制这些洪水：尤其对头顶一盆水的武汉市，既不能降低洪水位，也不能减少附近蓄洪量。对更下游的江西、安徽更是无能为力。而在 8 月 1 日以后，主要是三峡大坝以上地区的洪水。三峡大坝虽然可以蓄洪拦沙，削减部分洪峰，减轻对下游荆江河段的压力，但这样一来回水曲线将壅高重庆市本来就已经很高的洪水位，对重庆防洪构成威胁。”

闻及此，再想想誓死主上三峡的“爱国志士”高唱的三峡工程将要实现的三大丰功伟绩：防洪、发电、和航运，不能不有更多的慨叹。

说它“改善航运”，看看现在大小船只拥塞葛州坝和三峡大坝两道大坝前后，非半天乃至一天以上时间决难过关，就知道航运“改善”的有多么彻底了。

说它发电，但发电有许多可以选择的其它方案。完全可以不似现在，破坏生态，令百万移民背井离乡。

说它“防洪”，1998 年的洪水，就足以看到水库大坝的“防洪作用”了。1954 年长江洪水，长江流域没有大中型水库。而 1998 年，长江流域已经有了大中小水库 45218 座，总库容达到 1486 亿立方米。严酷的事实

是，1998 年的洪水远比 1954 年小，损失却远远超过 1954 年。还用多说什么吗？

3

让我们再回首 1998 年长江洪水中惊心动魄的一幕幕：

1998 年 7 月 24 日，湖南安乡县洞庭湖安造垸溃决；

同年 8 月 1 日，湖北公安县孟溪大垸溃决；

同年同日，江西九江大堤决口……

这些堤防的溃决无一例外都是由于堤防质量不合格造成的。诚然，长江两岸尤其是中下游的森林过度砍伐造成的水土流失亦是不容忽视的小水大灾的另一个成因。

2000 年 6 月，世界银行批准向中国提供两亿一千万美元贷款，资助加固湖南、湖北两省内长江沿岸的防洪大堤。其批准根据是鉴于 1998 年的长江洪灾因防洪大堤质量差，致 4000 人死亡（实为 1230 人）。

1998 年的洪水，验证了长江水利专家陆钦侃的观点：三峡工程对于大坝以下的众多支流组成的洪水无能为力。对于长江中下游来说，加固堤防，建好分蓄洪区才是防洪抗洪的最好的手段；而一直为“三峡论证报告”上高唱赞歌，称“加高加固长江大堤不可行”的某些人，如三峡工程开发公司总经理陆佑楣来说，虽然依旧嘴硬“如果三峡建成，1998 年洪水就如何如何……”，但私下也不得不低头认同中国政府投资 100 亿，世界银行贷款两亿一千万美元、加高加固长江大堤不是不可行而是十分必要的现实。

1998 年的长江灾难，终于让一群头脑发热的人士回到了固堤防洪的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这个群体理性的回归，仅仅是验证了陆钦侃等少数水利专家的科学预言的正确。

4

1992 年 4 月 3 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三峡工程提案。第二天，即 4 月 4 日国务院就公布了三峡工程移民淹没区的范围。

1994 年 12 月 14 日是国家规定的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日期。

1992 年 11 月 15 日，也就是距国家规定的日期还差两年，施工队伍即开进工地。搞得地方的移民工作措手不及，留下了至今梳理不清的后遗症。

上述一切只能说明，三峡工程上马早有预谋，人大会通过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

对于三峡，陆钦侃做了他能做到的所有。

陆钦侃是无党派人士。八十至九十年代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为记者，我与陆先生有过接触。那是在无党派人士小组讨论会上。1990 年那次会议，为了能听到陆先生关于三峡工程的小组发言，我曾特意提前进了会议室等候。遗憾得很，小组会上留给我的回忆仅仅是，与其隔桌对坐的某位名士抱着黑皮包瞌睡，他则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又过了一年，我曾冒昧打过一个电话，我自三峡采访归来，请他就三峡问题谈谈个人意见。但遭到断然回绝。为此，我对他颇有微词。

再过了十余年，在我了解了关于三峡前前后后的争论全部过程后，对于陆钦侃先生，我心中只有敬意。

由陆钦侃先生我想到在中国的学界，从来缺乏的不是智者，而是面对强权敢讲真话的真人。陆钦侃就是这样一位讲真话的真人。他的身材矮小，他的灵魂却魁伟高大。虽然，在数百名三峡“专家”的包围中，他是落寞的孤独者，但他以学者的良知和责任，为子孙后代树立了一个足以垂范千古的榜样。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但愿 50 年前教训惨痛历史不再重演——错批了马寅初先生，我们多生了 10 亿人；错批了黄万里，古来富庶的 800 里秦川变成了灾区；错批了梁思成教授，我们毁掉了北京城!

50 年，多少人祸被说成是天灾—— 中国啊中国，人祸何时了！

第二十九章 大坝啊大坝

1

正当三峡大坝之“地球第一伟大”的赞誉，在中国“炒”得火热的时候，世界另一端却传来对于“坝”的责问之声——与中国相反，拆坝之举已成为把尊重还给自然的新趋势。

我们先追溯一下这样一段史实吧：1954 年，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在旁遮普邦的赫加尔运河上，面对运河及巴克拉大坝的建筑工地，以亢奋激动的声音赞叹：“这是多么壮观，多么宏伟的工程啊！只有那些具有信念和勇气的人民才能承担如此的工程！它已经成为国家意志的象征，象征着这个国家正在迈向力量、决断和勇气的时代！”

仅仅过了 4 年，尼赫鲁就对这座“印度第一”的大坝另有了想法“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正在遭受着‘畸形庞大之病’的折磨”，“我们想表明我们能建成大坝并且能够成就大事业。但是，为表明我们能够成就大事业而且拥有大事业和完成大任务的思想，根本就不是一种良好的世界观”。

2

尼赫鲁的忧虑，折射出这位伟人高尚的人文情怀。惭愧于心的是，这忧虑我们没有。我们有的是传统的“膨胀的虚荣心”和“好大之志”：因此才有了古代的长城，有了“世界第一”的人口，有了今日的三峡……。俯瞰蜿蜒于北方的长城，沉思其两千年的历史，这最长的墙，究竟意味着什么？说它阻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可它实在谁也没“挡”住。汉代靠与匈奴“和亲”得到数百年的“安定”。而到了宋代终被新兴的蒙古所灭，被人家在北京独坐了天下。再过几百年，又有清兵入关，游牧民族二统神州，直到民国。试问，长城，这道大而无用的愚蠢又耻辱的墙，值得我们那么

自豪吗?

尼赫鲁道出“忧虑”40 年后，大坝越来越成了困扰人类的现实问题。1994 年，最早建坝的美国最先发出了“水库时代已经结束了!”的呼声。拆坝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发生在 2001 年 10 月，威斯康星州的巴拉博河上的系列水坝被彻底拆除。全长115公里的河流重新获得了本来属于它的自由。

已过去的 10 年中，美国已拆坝 500 多座。而今后越来越多的大坝将被拆除。诚然，美国是个早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国家。但以学者的眼光来看，拆坝成为潮流，主因是因为人类对其实际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估。1998 年成立的“世界水坝委员会”耗资千万美元，经过历时两年的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公布了一个长达 400 页的报告:《水坝与发展——新的决策框架》。其中有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文字“水坝对人类发展贡献重大，效益显著。然而，很多情况下，为确保从水坝获得这些利益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而通常是不必要的代价，特别是社会和环境面的代价。以‘一个群体之所得，抵另一个群体之所失’的资产负债方式的方法进行评估：水坝的成本和收益是不能接受的。特别是在各界都已承诺保护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缘于此，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大坝是把双刃剑，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利益时，不得不承受它给我们带来的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大坝的兴建或拆迁，权衡利弊，首先是把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力放在首位。如果我们兴建的大坝极大地改变了自然径流模式和稳定的地质作用过程，极大破坏了沿河两岸的生态系统导致河流水质退化，极大干预了民众的生活状态……使自然和社会一起为大坝付出高额的综合代价，从长计议，这种大坝万万建不得。

在非洲，2001 年 10 月，加纳政府宣布搁置了伏尔塔河上的布尔水坝工程。因为该工程将会淹没部分国家公园土地，破坏河马栖息地，并影响数千人的生活；而乌干达则终止了多年争议不休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上修建大坝的工程，拯救了著名的布扎加里瀑布。

在亚洲，2000 年 10 月，日本新上任的长野县知事田中康夫，下令中止 8 处兴建中的水库，并于 2001 年 2 月发表《摆脱水库宣言》。同年 6 月 21 日，国土交通省发表了一份关于公共事业改革的文件，提出“冻结有关大型水库工程建设计划的新的勘测项目”。2002 年 8 月 1 日,《朝日新闻》报道，已面临计划停建的水库有 92 座。此外，政府称九州岛熊本县荒濑水库报废的决定，是对“河道水泥化政策”的一次突破。

在韩国，2000 年 6 月 5 日，时任总统的金大中宣布，为了保护东江河

域的生态系统和 20 种濒危的生物以及首次发现的 7 种动植物，政府正在取消江原道永越大坝工程计划，并将把东江河域设计成一个“对自然友善的文化与观光区”，为当地居民经济利益的提高开创新的途径。

在东南亚的泰国，其反水坝的运动表现为一种很特殊的方式。它不是立即将坝拆除，而是放弃水坝原有的蓄水发电功能，完全开放水闸。如 1994 年建设的帕满水坝，它位于泰国东部蒙河与湄公河的交汇地带，毗连老挝。此地风光秀美，盛产 4、50 种独特鱼类。大帕满水电站修建后，特种鱼类不见了，被迫搬迁的渔民没有得到赔偿，没有搬迁的居民生活条件恶化，村民经过 7 年努力，进行了多种活动要求拆去水坝，2001 年终于使政府同意开放了帕满电站的 8 道水闸，让大河从此畅流。还有拉斯沙来水库，其大坝建在天然盐矿之上，使得水库的水质变咸，不能为灌溉之用，又因水库还淹没了当地居民赖以为生的淡水沼泽森林，15000 人不仅失去耕地，他们中的多数还得不到补偿。居民经过数个月的不屈抗争，泰国政府于 2000 年 7 月，下令水坝闸门全天侯开启两年，政府同时对水闸开放后的生态和居民生活进行调查研究。

还用多说什么吗？这世界的拆坝潮流，难道不是人类对自然与河流的一种忏悔？细细回想从建坝潮席卷世界，到今天拆坝潮的兴起，看似是历史的倒退，其实正相反，它象征着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理性地回归自然。

决不是说大坝不能再建，准确地说法应该是人类对包括河流在内的大自然的干预，一定要把握一个“度”，适“度”为益，过“度”则为祸。似我们当今这般滥无节制地建坝，建得越多，生态系统将会变得更加脆弱！

须知：没有河流的健康，就没有环境的健康和人类社会的健康！

3

三峡工程的论证，不单是没有耐心听取吸纳反对者的意见，另还有两个重大的失误。一是对大坝寿命的论证；二是没有社会和人类学者对三峡民俗和文化价值进行总体评估。

也许是有意地回避，三峡工程的论证报告，给人一种完全的错觉：筑建在长江上的大坝，将会与万古长流的江水一样永远地运转。实则不然，人类修筑的任何一座水库大坝，都有被淤沙淤满、老化和报废的时限，尤其像目前这样水土严重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下，大坝寿命更要缩短很多。据“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报告，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水库，每年有 1%

因淤满泥沙而报废。

就三峡工程而论，几百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论证会”。但见诸位意见一致地作出工程上马的论证决策，却不见有谁对大坝建成可能出现的“后果”承负其责。譬如说，三峡大坝寿命多长，遇到恐怖袭击的对策，泥沙淤积速度超过预期处置办法……等等。因此说，三峡工程对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考虑得远远不够。

只在 1996 年，也就是三峡工程开工已经近 4 年后，才有人提起大坝寿命问题。三峡办的郭树言在上报国务院的“关于三峡大坝混凝土耐久寿命问题认识的报告”中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工学博士刘崇熙说“三峡大坝混凝土耐久寿命预计 50 年”。但这只是“估计”不是“研究”的结果。

再就是 120 万三峡移民。我们的三峡决策，考虑的只是移民人数，移民费用，移民安排，少有人设身处地多想移民工程将可能引发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我在巫山大昌镇采访时听到镇政府干部给我讲述 2001 年 8 月 20 日，大昌龙兴村和宁河村的青年，刚登上移民船只为相互无意碰撞了一下，就在船上抡起啤酒瓶大打出手显些闹出人命的事情时，十分惊诧：同是背井离乡的乡亲，本应心怀依依惜别之情，缘何竟是彼此怒目相向。

以行政手段强制让黎民百姓远离故土，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国是一个认同血缘、宗族、地域和文化传统的礼俗社会，而且越在农村，这种认同越强烈。峡民代代依峡傍水的生活形成的一个稳定的民俗系统，随着移民的四散分离，这个系统的被打破和重新组合，势必引发出难以估量的后续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峡百万以上的移民人口远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更是我们应当认真面对和思考的社会课题。

但我们的三峡论证“忽略”了对移民未来命运的认真关注。轻描淡写地认为“开发性移民”，移民就会有好日子过。想得过于简单了：当我的文字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移居至湖北当阳市烟集乡（现更名庙前乡）4 年的巫山大昌镇移民，还在冬天凄冷的北风里守候在该市移民局和烟集乡政府的门前请求当局按照 5 年前的合同，分给他们土地和发给尚未到手的移民款。

美国的一位社会学者麦克尔•撒尼尔曾对没有社会学家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感到惊奇。他说，在当代世界水利工程和大型农业工程的论证中，把有没有足够比例的社会学家参加可行性研究，作为一个工程是否合格的标

志。因为将大型工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当作重要课题讨论，体现了对人民的尊重。他呼吁，无论何时，首先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三峡未蓄水前，两岸的山体上随处可见鼓动移民搬迁的大字标语。其中“舍小家，为大家”这组词出现的频率最高，我们的移民搬迁政策出发点即含义在内里：只要“小家”服从“大家”，而“大家”为“小家”要做什么的标语，找遍三峡每一块石头，也看不到一个。另还有“齐心协力奋斗拼搏 圆满完成移民工程”的大字标语写在奉节至白帝城间的公路旁，让我心灵陡然一震——如果移民也要靠“奋力拼搏”，或者是一个“工程”，谁还把移民当人看呢？在奉节，在碚石，在大昌，在当阳，无论城镇和乡村，我所见到的移民愁苦的脸让我心忧，我所听到的借“移民”中饱私囊的赃官之事，让我愤怒。大昌镇那一位曾被捧为移民好干部的镇党委书记刘敬安，因贪污腐败太过，2003 年一审被判了徒刑 13 年；碚石镇的年过六旬的谭钢吾老人向我控诉该镇党委副书记卢光明和于乡长（当时已被捕）“把移民搞成害民”……用不着再多说什么了，我们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其底蕴是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的延续：负责只对上司，对“下”发号施令就是为了责任对“上”。这种体制的本质极其冷酷无情——其对生命的漠视和对百姓的敌意是与生俱来的。如此，“移民”自然很难得到尊重与公正；而那笔移民款，恰恰为大大小小的贪官提供了大捞一把的机会。

每每眼前浮现地方官怒目面对移民的情景，我总是奇怪地想到雄猫瞄着老鼠——我为移民的今后的生存深感忧虑。

第七部 峡江挽歌

三千多万年前，地球母亲在惊天动地的火光和怒吼声中（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分娩出群峰高耸的青藏高原。苍天作证，再经过千万年的天地风雨的磨砺，孕育于青藏高原的涓涓溪流，终于汇成一条贯穿七曜山(今奉节县境)、巫山、黄陵三个地质背斜的长河，呼啸着冲出西部峡谷奔向平原和大海。

这条河就是 6300 公里长的长江！这峡谷就是 193 公里长的三峡！

在人类尚未出现的远古时代，长江穿过三峡自由自在地万里奔腾；再后来，人类出现了，他们饮着三峡清澈的江水渔猎为生；再后来，在三峡两岸的坡地上开始垦殖耕耘，步入农业文明……。

三峡从此有了文化生命：群山碧野间，古寺荒村里，民俗俚语中，我们能解读到先人留给我们的所有远古的信息。

三峡作为地名，最早的记载见于 1600 年前晋代袁山松《宜都山川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里许，山水纡曲，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丈许。又其石形容，多所象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后有郦道元在其大著《水经注》所引南北朝时期盛宏之《荆州记》中句“自三峡七百里中……”，

“三峡”之名由此渐传开来。

风雨和血火交织的三峡，是中华民族历史链条中最为神秘璀璨的一环。

但她被我们遗忘得太久——以至我们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三峡史。

巫山人活动遗址，鱼复浦的陶片，小三峡的自巫溪县宁厂镇至龙门峡口共6880余古栈道石孔，巴人铜器上的象形文字，汉代无名阙，云阳述先桥，奉节锁江铁柱，大昌古城，新滩江渎庙，白鹤梁，石宝寨，张飞庙，古墓群，古民居……所有这些我们未曾解读明白的先人创造的灿烂文明真迹，都将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

走遍三峡,探访若干考古现场,我的愈发沉重的心里总有这样的问题闪现:以现在这般缺人少钱的窘况，实现对三峡文物保护谈何容易。万一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后人如果问道:“为什么，水淹三峡之前才发掘区区10%的文物遗迹？没钱吗？没钱保护文物为什么还要建三峡？以毁灭三峡文化和百万移民的代价换取大坝发电值得吗？”——孰是孰非，我们该怎么回答。

第三十章 苍凉之叹

1

2003 年全国春季书市上，买了本几乎无人问津的《李鹏三峡日记》。洋洋洒洒 30 万关于三峡的文字中，李鹏先生没有哪怕一个字关于三峡文物的记述。只在书中 217 页作为“附录”，节选了《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那是 1994 年三峡正式开工后，时任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开发局局长唐章锦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几句轻描淡写的发言：“受三峡工程直接淹没影响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1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 处。通过继续调查、勘察，制定新的规划 ，我们将尽可能把文物保护工作做好。”

事实是，文物保护和发掘在某些一心“上”三峡的人的眼睛里，并没有真正提上日程。

请看如下数字：（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文物研究所调查上报三建委的保护规划）

必须保护发掘的三峡文物总数 1282 处。

地下文物遗址 829 处。

地上文物遗址 453 处。

其中，国家级 1 处。

省级 10 处。

报批中国家级 8 处。

三峡开工 8 年后，2000 年 6 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三峡工程淹没区及移民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保护项目和保护方案）》姗姗迟来。

最终确定：文物保护单位 1087 处；其中地面为 364 处，地下为 723 处

按国际惯例，文物保护投资应占工程总投资的 3%–5%。三峡工程总投资当时预算 1200 亿（后来实际投资 2500 亿），用于文物保护投资至少应

当是 40–50 亿。

而我们又当如何？

1991 年，水利部长江规划委员会曾提出这样的几个数字：三峡工程共淹没文物古迹 60–70 处，估计 6000 万人民币足够了。

1994 年 11 月，国务院开会决定，用于三峡文物发掘保护的资金 3 亿元左右。这些钱从本来就不多的 400 亿移民款中扣除。

且不论“国际标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建设迁移费就花掉 10 亿，堂堂一个文化三峡文物保护才 3 个亿还左右，岂不是笑话？

2

你若以为这 3 亿元可以很快下拨到一线考古队伍的手中，那你就是又错了。

曾经担任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组组长的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为讨要这点儿钱，历尽千辛万苦。

记得 2002 年春天，中央电视台播出过一个俞伟超先生的专访。在这个节目里，俞先生谈了三峡考古的意义，谈了三峡考古发掘的困境。其时身患重疾的他，在迟缓的言谈中，眼睛上一直挂满了泪花。我理解并知道泪花里包含着老人对三峡文物面临的灾难的忧虑。

此前，为了能将考古资金早日到位，俞伟超曾在草签一份协议的前几天，关上房门，与三峡工程某部门负责人有过如下一番对话。

俞：“今天谈话就我们俩，没有别人。你跟我说句实话，400 亿移民资金到底够不够？”

负责人：不回答，只是笑。

俞：“我知道用 400 亿移民款给 120 万移民肯定不够！但我告诉你，从 400 亿里拨出 3 亿给我肯定也不够！”

负责人：“你应当理解我，国务院规定就是这么多钱，我没有权力再多讲话。现在由我们移民局出面和你们文保小组签字，3 亿是底限，我不能突破。”

俞：“当然，给多少钱是政府说了算。但我们学术工作者必须对文物保护工作负责。因此，不能看政府脸色说给我多少钱我就需要多少钱。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用 3 个亿搞三峡文物保护根本不够！你今天跟我签这个协议即使是草签，我也不能签！”

负责人："如果上级部门要求你必须签，你咋办？"

俞："那好办，我辞职就是，请另找别人。"

负责人："这样吧，咱们互退一步，达成相互谅解：文物保护尽量在 3 亿限额里。如果超出，可根据实际需要再提出申请。"

就这样俞伟超接受了这令人辛酸的 3 亿元，在其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痛：因为他知道，非洲修建阿斯旺水库为迁一处神庙就动用了 3.2 亿（4000 万美金）；因为他知道，仅保护三峡库区的涪陵白鹤梁水文题刻一处古迹，投资就需 3.7 亿元。

3

三峡工程腰大气粗紧锣密鼓快马加鞭，预示着二期蓄水日期毫无情面地日益迫近。

三峡考古却因资金紧缺难以为继陷于窘境，俞伟超欲与工程"虎口"争夺时间，尽量多地抢救国宝的盘算几近妄想。

为讨钱做考古规划，俞伟超以个人名义向故宫借款 200 万。

与此同时，三峡库区 600 公里长的沿江两岸，30 多个来自全国的学术单位 600 多位学者或历史考古专业的学生（不包括民工），考古发掘已经全面铺开。

文物发掘不是刨白薯，挖出来洗洗就可以吃。它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需要科学记录和清理。而做到这些都需要钱。

举例说吧，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到三峡进行野外考古的 40 多人，一共才拿到 30 万元的经费。他们要用这些钱食宿、雇船、雇人，在每个考古点儿上至少工作几个月，这钱怎么够？

俞伟超急了，他与三建委某部门某负责人就文物保护问题发生了争执。

俞说："你们要让我们对文物保护说意见，不建不动三峡，文物损失最小。建了动了，我们尽量抢救。你不要认为我这是向你争多少钱的问题。不要说让你们现在拿出点儿钱这么难，就是你们拿出足够的钱，我们至多也就能抢出百分之一、二十。绝大部分文物抢不下来。如果三峡工程要继续建下去，文物保护还要做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呼吁国际支持了。

负责人："打住，关于'海外支持'，这个问题要慎重，我们没开这个口，你们也不能开！"

就这样，一方面，修建三峡大坝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国外设备就

有国外的设备。

另一方面，抢救三峡文物，要钱没钱，要人力没人力，要国外支持，免谈！

那一个时期，俞伟超心情坏透了。他对朋友说，他有这样的感觉：三峡考古发掘，不是真的没有钱，而是有钱也不给你，给你一点儿也让你不痛快，直到最后水淹三军，不了了之。提出国际合作，也是出于在现有条件下，尽量多地抢救一些文物的考虑。他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又何尝愿意在文物发掘和保护问题上丢失国人脸面。但现在不同了，世界对人类或民族文化的理解已经大大超过了从前。甚至可以这么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有了这样的共识：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遗产，广义上说，皆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们在文物保护上争取一些国际合作，帮助我们完成一些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考古发掘，恰恰证明了中国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俞伟超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三建委为什么如此强硬拒绝与国际合作——宁可看着 90%的三峡文物毁掉也不要国际支持——到底怕的是什么呢？

4

我与俞伟超先生有过两面机缘：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在湖北荆州，我亲耳聆听了他做的关于楚文化的讲座。讲座之后，他还带领我们一帮记者参观了荆州博物馆，那次参观我们沾他的光，看到了临时从库房里拿出来的一把状似菜刀的汉扇，以及一把锋利的越王剑。我曾问过他，越国剑何以万里迢迢出现在荆州？俞答，可能是战利品或是国与国之间互赠的礼品；第二次是相隔不久在往上海的飞机上——天下之大又天下之小——恰巧坐位相邻，我再次向他请教了楚郢都和纪南城遗址命名的问题。两次接触，对俞先生可能不会有太深的印象，在我却影响深远——即从接触他起，我开始了对楚文化研究的关注。

按俞先生指点，我数度在江陵楚国纪南城遗址和长江之畔屈原登临过的古码头彳亍低徊。想象的翅膀曾一次次在长江的浪尖和风云上飞翔。他那时说过，楚文化比起中原文化要年轻得多，但它朝气蓬勃，充满了向上的力量。俞先生赞美屈原的辞章，说他于悲愤之中有大气。站在江陵码头，他曾向西遥指，告诉我们，那边白浪滔滔险滩密布的三峡里就是屈原的家乡。

想不到啊，想不到——十年后，他闯进了三峡，踏上了那里的浪尖和险滩。

一别二十年，似乎是2002年早春，一天打开电视机，无意间看到了记者对俞伟超的专访。我惊讶，印象中坦诚精干的他已经变得那么苍老。从他与记者的对话中，我能感觉出，他要说的话很多。但终于没有说的那么多。

朋友说，自三峡工程开工起，靠“借贷运行”的三峡文物发掘与保护，就一直成为他心中的最大的隐痛。

5

俞伟超终于没有坚持到等到“上面”将可怜的3亿文保经费落实到位。

2003年6月三峡二期蓄水。大部考古现场和遗址被淹。

2003年12月7日，69岁的俞伟超病逝于广州。

《北京晚报》这样报道了关于他逝世的消息：

修改中国通史陈列　指导整理三峡千处文物

本报讯（记者 丁肇文）著名考古学家、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俞伟超先生前天在广州因病逝世。

俞伟超先生1933年1月4日出生于上海，1950年9月至1954年7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考古专业毕业生。俞伟超先生先后参加了黄河三门峡古栈道和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群的发掘工作。主持了北京昌平雪山遗址、山东临淄齐故城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湖北江陵楚都纪南城遗址、陕西歧山和扶风周原遗址、青海大通上孙家汉晋墓葬群、湖北当阳季家湖遗址、青海循化苏志卡约文化墓群、湖北沙市周梁玉桥等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俞伟超主持修改了自1959年以后长期未变的中国通史陈列。这一陈列展出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博物馆”。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创了水下考古和航空考古，填补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重要空白。1994年，三峡工程上马之后，尽管他行政工作十分繁重，为了做好三峡库区文物的保护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组长的重任。在3年多的时间里，他以60多岁的高龄，跑遍了三峡库区

的山山水水，指导整理出数千处古代遗迹、遗址档案，完成了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方案，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盖棺论定，但这并不是俞伟超光灿生命的全部——自古至今名人的悼词总要留下难言之隐——当说不当说有着极强的政治选择。

对于俞伟超除了对三峡文物保护的贡献，还有必要提及的是，他因在三峡文物保护及坚持中国历史博物馆门票降价而不提价诸问题上坚持己见，早就被人称为“北京老顽固”。

可悲的是“老顽固”最后坚持到一无所有。堪可告慰的只有那颗永不变质的知识分子的良心。

也许我们仍处在“启蒙时代”，正直的文化人每一次真理的坚守，都要迎击四面八方的炮火，都是孤独者的绝唱！

6

提笔写到此处，刚好韩国艺人李成延拍摄的“慰安妇写真”的事件，正在韩国闹得沸沸扬扬。韩国人因其歪曲历史不依不饶。李成延则又是削发，又是跪地忏悔。韩国人对其回答是，请其自杀以表谢罪之真诚。自杀当然没有，但以韩国人怀有的民族情结可以预言，李成延的艺术生涯算是走到了尽头。

无独有偶，中国也有一个叫赵薇的艺人，她也有过不知廉耻身着日本军旗裙招摇过市的经历。舆论一时也曾批评如潮。赵薇本人则在刊登了其穿日本军旗照片的《时装》杂志上，发表了几句不痛不痒的“道歉”的话，加上有媒体为其开脱，说赵薇的爷爷是新四军，所以她有“爱国”的家传，穿了日本军旗装是“不经意”的事——荒诞的逻辑——将来，赵薇之子，是否也要“遗传”，像个汉奸一样争穿日本军旗装？然赵薇竟然很快得到国人的谅解。不仅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还摇身一变，变成了“全国希望书库爱心之旅形象大使”——她也配——真让人说不出这些专以制造文化垃圾为己任的歌星、影星、包括某些导演、作家（简称“文垃星”）究竟算什么东西！

可见，在韩国人过不去的事情，到咱们这里全都可以“宽容大度”，很容易就过去。

韩国不让李成延过关，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心胸狭隘”。其实从中

折射出来的正是韩国国民整体对历史的清醒，和为民族崛起而生的强烈的自信和自尊。相比之下，我们的所谓“宽容”，难道不是对历史遗忘、冷漠、甚至是自轻自贱？

再回到山穷水复的三峡吧！我们有责任去考证它，其实是在找寻历史的过程，印证先人创造的辉煌，链接民族文化的血脉。

但似现在这般，如此“大度”地将 90%的三峡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抛弃而不足惜，也许证明了我们民族理性精神的缺失（这种缺失由来已久）。有外国作家更是将此概括为中国人的“算盘心理”，说是中国人喜欢用算盘，算盘的妙处在于算错了可以把算盘一抹，即刻可以重新再算一遍。至于上一次乃至上几次是怎样算错的，究竟错在哪里全都可以忽略不记。西方人则不然，都是用笔算，算错了，抹不掉，错误在哪里记得清清楚楚。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人总是健忘的，屡屡重犯历史的错误。

我观中国人的“健忘”，还可以从另有一层面剖析：即人们的心里总是把个人或家庭的享乐、平安装得满满当当，而对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则在心中少有空间。因为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代价甚至生命，这恰恰又是颇多信奉“识时务者”的中国“俊杰”所不愿为者。于是以“健忘”当作法宝，回避历史，也就回避了社会责任。

今日三峡，大水漫坡，古迹沉江，却再也见不到最亲近它的俞伟超的身影——他已经含泪匆匆而去。

重温一次俞伟超先生留给我们的遗言吧！

“三峡工程的建设如果从 1994 年 12 月 4 日正式动工算起，已经 6 年多了。6 年多来，一批关注这个工程的人始终为如何处理（文物保护和三峡工程）这对矛盾而争论不休。三峡工程如按设计方案，2009 年将全部完工。这就是说，争论顶多再有 10 年，到时必自动停止。因为水漫三峡以后，库区的‘文物清单’将只是筵席上的一道菜单，可望而不能品尝。”

“在我们国家，地下到处有古文化遗存。如果全要保护，势必无法进行工程建设。但也不能一味破坏，一个忘掉或者轻视自己历史的民族，一定会性格软弱，精神空虚，没有理想，只知追求物质享受。”

“不要以为得到的物质享受丰富就一定强大、愉快。人所需要的物质享受，如果得到基本满足却被人讥笑为没有文化自尊心，恐怕只会羞耻难忍。”

肺腑之言，谁解其中味？

第三十一章 古峡悲离去

1

巫山大昌镇外的荒芜的田野上，兀立着一幢幢废弃的民居。盛夏的急雨过后，缠绕在残垣断壁上的青藤显得愈加碧翠。听不到蝉声，无言的绿树上间或可见一两只飞鸟驻足歇息。天云与飞鸟都不知这里将要发生什么。只有比他们明白的乡亲们走了，留下了这里山林、老树、水田、磨盘和祖屋，移到远远的山那边，水那边，走了。但他们共有的一丝牵挂却永远走不了，这牵挂就在古镇东北的滚石槽。

石滚槽是片连绵的山包。山包上是大昌先人长眠的地方。站在山包顶上，大昌城的大半尽收眼底。

每一批移民远走它乡前，都成群结队来到这蔓草和青藤缠绕的坟场哭别祖先。

2001 年 8 月 17 日清晨，大昌五组移民张志和一家老小来了。全家 11 口人，将要分迁到安徽、广东各奔前程。他们买了鞭炮、香火、元宝、冥币，齐跪在前后共七座祖坟前。七支花花绿绿的坟吊子，正在坟顶上不停地飘动。张家先祖是大清康熙王朝由湖北黄石一带迁徙而来。来时双手空空，先是靠几亩薄地为生。咸丰年间传到张修贤这一辈，弟兄仨靠贩运巫盐，家境渐渐有了起色。

张修贤兄弟就是那时，随船主押送盐包从小三峡乘船到巫山，从巫山再顺江而下到现在三峡坝址三斗坪。到那里将盐包卸下，他们三兄弟与其它脚夫结伙，各自手持一根打杵，一个细颈子背笼，一包一、两百斤的巫盐，再加一条缠在头上的长长的汗帕，即踏上了通往湘北重镇津市的漫漫 500 里盐道。风雨里，骄阳下，沿着飘动在雾河边上的山路，过土城，跨清江，再穿密林小径，走渔洋关渡过渔洋河，经梦溪越澧水，最后到达目的地。每一次如此穿越，都是一场生命和生存的较量。有的人倒下去，再

也不能站起来；有的人倒下去，却又挣扎着站起来。张修贤弟兄来来往往，多少年一次次走着这条说不清起点和终点的盐道。终于有一年，老二和老三先后病死累死在白云山下；终于有一年，孤身一人的张修贤讨了媳妇——再以后有了家族的繁衍和兴旺——而所有这一切的源头，都摇动着生命和血泪铺就的盐道影子：盐道，一部用双足刻印的沾满了苍凉的历史；盐道，是一只响彻鄂西南与湘西北交界万山丛中的悲歌！

哎——一根烟袋五寸长，
装袋丝烟敬小郎。
郎吃三口递给姐，
姐吃三口递给郎，
巴点口水像红糖……

盐道，连同道上的高亢的山歌和曾经繁华的小镇，渐渐隐没在时光的潮水中。山色依然，水流依然，但它负载过的苦难却永远地融入在曾行进在这条古道的后人的生命中。当这一刻，行将远行的张家后人哭别先祖的时候，千头万绪如激溅的江潮扑向心头。虽然一块工艺精致的高大的墓碑上刻满了后人的姓名，刻着散花天女、亭台楼阁、香草、门神和牛羊……但这都不足以表达他们对筚路蓝缕开创了家业的先祖难割难舍的情怀。这一去山高水也长，这一去难有重逢日——前辈创业和今人离别同样艰难。张志和八十多岁的老父哭着跪倒在墓碑前，双手不停地敲打着石碑。

大昌南门码头的移民船起航上路时，岸上的亲人，船上的家人再一次一起哭了。张志和双手紧紧抱住身前的担子。担子里有祖上传给他的盐盒子。油黑的柏木方盒里，不再装盐，而是珍藏着张家 11 代人的家谱。但从今而后，兄弟南北四散迁移，家谱也续不成了。张家以盐兴家，以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盐衰而四散——明天，他们将迁到做梦也梦不到的地方。

2

百万移民大潮中，张志和一家不过是潮水中一朵浪花。然而朵朵小小浪花构成的大潮的远去，却换来一个据说是几代人的宏伟的三峡梦想。梦里有水平如镜，有万家灯火，有江船如梭，有普天欢歌……

今天，当你乘船重新驶过大水淹过的三峡，已经见不到小田溪、路家

河、朝天嘴、老关庙、白庙、大溪、哨棚嘴、柳林溪、楠木园那些曾令考古学者怦然心动的古人类文化故址——面对已是汪洋一片的浩浩江流和那回荡在峡江上苍凉的汽笛声声，沉默也许是最无奈的回应。

万年千年，我们的先人世代传承，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打造了一个壮美的文化三峡。现在，我们仍是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将先人创造的文化三峡淹没。

我们自己评价说，中华民族是文化灿烂历史悠久的民族，是创造史诗的民族。但如果细剖历史——从秦始皇到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到改造北京城，到“反右”，再到“文革”，我们又何尝不是一个习惯于扼杀文化和史诗的民族？

今日文化三峡的消亡，是一场漫长的政治与科学较量的结果，不怨天不怨地，这也是我们民族整体自己的选择。是的，中国建起了一个世界最大的大坝，但同时也丢掉了一条辉煌的文化三峡，强行移走了堪称世界之最的百万工程移民。

凄凉的汽笛声中，仰望三峡的群峰和峰顶上的白云，我总是情不自禁想到横亘在北方的那道万里长城——那道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伟大的墙！但你沉下心来想一想，那真是一道值得骄傲的伟大的墙吗？如果长城会说话，它会告诉你多少孟姜女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

世界第一的万里长城，它只是向世人宣告：人类史上，只有中国皇帝，才敢于如此作践万万苍生性命开山修墙——修一道防御的长墙——一道比挖沟壑省些气力的到头来谁也挡不住的墙——挡不住匈奴，挡不住成吉思汗，也挡不住努尔哈赤，更没有挡住日寇侵略……

我决不是偏激地看待长城，因为综观中国史，只要对外开战，不战求和者总处于上风，而主战派没有几个会有好下场。其结果，将大片大片的国土割让敌方，当作“安定”“友好”的筹码，甚至以“和亲”为名，把漂亮的女孩子也送进了入侵者贪婪的大嘴。过去送，现在送。就连保卫被日人侵占的钓鱼岛这样一个中国固有领土，也要千方百计压制国民发出强烈的吼声。2004 年，大陆保钓人士以合法途径在安徽芜湖市印制了“钓鱼岛风光”明信片，也被强令收回（并未得逞）。更有中宣部于 2004 年 3 月，在 7 位保钓勇士，突破日寇重围，成功登上钓鱼岛后，命令大陆主流媒体一律不准发布消息表态。还有一个当代“伟人”的高论：想守住祖先留下的土地吗，我们活着的一代的“智慧”不够，留给下一代去“解决”吧。怪哉，土地，我的就是我的，与“智慧”何干？

中国文化的血脉里，中庸为上，犹如长城，实在太缺少一股肩负民族责任和道义而抗争的血性！

让我们再一次为背井离乡的移民祈祷吧！他们的不幸其实根源不在三峡，而在于生存在缺少仁慈与博爱的中国文化中。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那个“仁”字，只是道德的异化。它的真正含义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关系下的无条件服从。只有“下”对“上”的忠孝，决没有“上”对“下”的尊重与平等。看那“节烈坊”，看那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 “曹娥投江”……哪里有丝毫的对人的仁爱之心？难怪鲁迅先生将两千年的国史概括为“吃人”。

“舍小家，为大家”，每当看到这条立在三峡两岸山坡上的训导式的标语，总让我“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穷苦的百万移民“舍小家”，有钱的“大家”为什么就不应该为“小家”“舍一舍”？“大家”的含义是什么？建在滑坡体上的数座县城数度改迁，某些移民机构和移民干部趁机中饱私囊，区区 400 亿移民资金，真正到移民手中还有多少？可怜的移民把一切都“舍”给了“大家”，而他们中的多数却为未来的生计忧心忡忡。那个世界号称巨无霸的三峡大坝凝结了太多的移民的血泪！

长城、大运河、三峡，号称世界之最的工程，它国不是不能而是不为——面对移民，民俗，良田，古迹，文物，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棘手难题，人家不忍让国家和国民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由此，是否可以反证其对人对文化对自然的尊重？正如李锐先生所云“只有中国能做出这样的事。”

3

南北朝刘义庆在其著作《世说新语》中记述过这样一段故事：“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断。”——母爱至此，子又当如何？

峡江缓缓，冷月当空；悲猿长啸，山鸣谷应。

我听到了三峡远去的哭声。

2004 年 3 月 26 日夜一稿

2004 年 7 月 7 日抗战爆发 67 年纪念日之夜二稿

2004 年 12 月 1 日改毕

后记

为什么我要写三峡

1

这样的一个静寂的春夜，我写下了《三峡挽歌》的最后一个字。前后四年的采访和写作，终于有了结果，却仍然难以释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三峡工程被纳入会议议题时，会场内外代表和委员热烈讨论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作为一名采访两会的记者，亲眼所见千家驹、孙越崎、吴京、郭可铨等委员主张暂缓三峡工程上马而慷慨陈词。他们的主要观点一是国家经济刚刚有了起色，应当把钱花在更需要的地方；二是三峡工程有很多未知数，如泥沙问题，滑坡问题，生态问题，文物保护问题……，希望在将来有了较强的国力以及对上述问题有了相应的科学对策时再做考虑。为了验证自己看法，孙越崎老人不顾92岁高龄，1985年暑天亲率政协委员赴三峡考察。而正当其在三峡考察的同时，秭归新滩发生了特大滑坡，将新滩这座千年古镇整体滑进长江。老人忧心如焚，寝食难安。回京后即上书中央，务请暂缓上三峡。但没有回音。

1992年4月，七届五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三峡决议》通过。但决议通过前，大会向代表散发的三峡工程的材料（几本小册子）中，只有主上方的一面之辞，而反方的意见未见一字。并且为了保证决议通过，在某些省的代表团内，还特别告之共产党员必须投《三峡决议》的赞成票。

在各方的压力下，《三峡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票未表态的结果得以通过。也就是说共有886位代表占投票总人数三分之一的代表不赞成三峡工程。况且赞成票中还有相当的水分。掺水的选票尚且如此，大多代表真实想法可想而知。

人大七届五次会议结束后，我曾经动念将三峡工程从争议到通过的全部过程记录成书，但因种种原因搁置下来。1999年春天，一次与朋友聚会，大家不约而同议起三峡，言语中表露出对三峡未来深深的忧虑。之后，我

反复想了一段时间。此时恰逢我刚刚写作完成长篇纪实报告《尊严——从黑发告到白发》，瞑瞑中感觉好像是上苍在召唤我写一部三峡——我由是决心上路了。

2

巴金老人写了一本说真话的回忆录，得到赞扬一片——人说真话本应是天经地义，在我们这里却稀罕得成为倍受关注的新闻，如此现状，该是何等可悲可叹。

多少年了，我们已经习惯了说假话，听惯了讲假话，造假而不觉假，极端适应了在假话营造的社会氛围内生存。回忆我自己，假话讲得比谁都不少。就说“文革”吧，我的“三忠于”“四无限”，我的“刀山敢上，火海敢冲”，我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的“某某某万岁”“某某某身体永远健康”……，哪一句不是瞎话胡话假话？然在当时，这属于几乎人人见怪不怪的“正常”。像遇罗克、张志新、林昭那样敢于冒杀身之祸与之对抗者，鲜矣！

讲真话，从理论上说并不是难事，是黑是白，是丑是美，是痛是痒，这其实是连三岁孩子都明白的常识。但到了社会上，讲句实话在相当的场合下却变得难上加难。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多，几乎所有人都看得明白，那些“关键”的谎言都是彻头彻尾地为投“领导”所好。至于“道理”：这是所谓社会“安定”的需要，亦是某些政要生存的必须。如果你胆敢反其道而行之，重则会惹上杀身之祸，轻则往后的日子也会遇到麻烦。

最近读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文集，其中有一段话写道“如果只看日常生活表面，只从统计数字和官方报告来衡量，国家成功地获得了安定，但如果从社会道德与精神复兴，人性和自由的扩展，人的尊严的提高这种角度看，社会并不是安定的，而是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因为人民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团结，根源只是人们的恐惧。”

可见，如果讲那些言不由衷的假话成为一种时尚，它背后隐藏的则是政治高压下的国民精神的麻木和社会道德的堕落。

反之，敢于为民为国倾诉肺腑之言，则需要直面真实的勇气。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容易，如果我们以说胡话瞎话假话了此一生，是否愧对了每人仅拥有一次的生命？

3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有尊严地活着并且必须承担社会道义和责任——而讲真话做实事是实践生命价值的前提。

三峡工程争议过程中，像李锐、孙越崎（已故）、周培源（已故）、黄万里（已故）、胥光义、刘东升、茅于轼、彭德、乔培新、黄顺兴（已故）、徐洽时、钱伟长、王伊复以及在“三峡论证报告”上未签字的覃修典、陆钦侃、何格高、黄元镇、郭来喜、程学敏、伍宏中、侯学煜（已故）、 方宗岱（已故）……诸位先生和学者，以忧国忧民之心直抒胸臆，不能不令人感动。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我当然知道写一部说实话的书意味着什么。但我还知道唯如此，此书才称得上是书。

2000 年准备，2001 年夏天，正式踏上了赴三峡采访的征途。此后直到 2004 年 10 月，前后共 7 次穿行在三峡两岸群峰、乡镇、古迹和移民间。尤其是穿越 20 里险峻的瞿塘峡古栈道那一次，简直是拿性命做赌注。向导老李答应领我走瞿塘时，只是不确指说有一段路不大好走。及至将出东峡口见到约有 50 米的断路，我才发现此段“不大好走”的山路之绝险。老李手扒脚登山壁先将行囊背到断路另端，然后再过来，让我跟着他按他的手式和足印一步一步捱过那 50 米绝壁。我知道我们的脚下就是滚滚江流，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坠落江中。但我并不惧怕，我一直有这样的宿命感，以为既然命运安排我写三峡，我是决不会在事情未竟时而丢掉性命。

除了在三峡两岸乘车或徒步，再就是雇船在三峡里多次往返而行。雇船，当然是雇那些便宜的长度 6、7 米，宽也就 1、2 米的钢板打造的机动船。当小船在或宽阔或湍急的的峡江上轻盈地驶行时，你就会明白船身与大浪比例失调，摇动起来实在恐怖。在巫峡里采访，多次与硕大无比的如“三国”号游轮似的大家伙相遇，船主远远地就把小船靠在岸边避让。但仍然有时来不及避让迎面和后面尾追而至的游轮、客轮、运沙船和货轮，小船只得在掀起的大浪尖头摇来摇去，任浪峰一个接一个打进船舱。此时，心里默念的只有一句话——千万别翻船。

船当然没有翻，我于是才有机会走访了三峡两岸我想去的地方。想象中的三峡当是青山绿水粉墙黛瓦古寺飞檐，风光无限的宝地。及到三峡腹地，我感触最深的是峡民的淳朴和贫穷。如我在书中写到的“一发”移民，巫山农民从乡镇干部口中动不动就听到“‘依法’处理这个那个”却不解其

意，但他们感觉这个词一定了不得，像是宣读圣旨一样了不得，不然那些干部一提起“一发”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不可一世。实际呢，某些乡镇干部恰恰“依法”（“一发”）横行乡里。我两次采访的家将被淹却得不到补偿的曹孝国，他比我年轻却比我还要苍老，满头白发，身患癌症还要爬山赶船到巫山民政局告状，却无人理睬。我意外地在巫山街头碰到他的时候，背过身体禁不住流下了热泪——移民生存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后来深入小三峡深处的大昌古镇采访，对移民中的各种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大昌镇书记刘敬安曾主动到我下榻的招待所接受过我的采访。我理解他的本意：想让我在媒体上为他吹一吹。刘有一句名言在大昌乃至巫山流传甚广：“世界上最好的减肥药是移民！”

我与刘敬安面谈那回，他请我抽烟，只见他一次次把手伸到上衣里面将一支支烟掏出来。为验证香烟牌子，我将他递我的香烟故意留下半截，等他走后带上老花镜一看，可了不得，刘书记抽的是“大中华”！他总还算有些廉耻之心，没有公然把香烟盒摆到桌子上。

刘敬安走后，我就想：说移民工作是世界上最好的减肥药并不准确——事实正相反——移民工作是世界上最好的快速增肥药——肥就肥在当官的腰包里！

就是这么一位基层的“移民书记”，在大昌弄虚作假完成了上级的移民指标，并受到表彰，提升为副县长。但让大昌百姓震惊不已的是，2003 年“清廉”的刘书记东窗事发，贪污移民款被判徒刑 13 年。但谁都明白，刘不过是个替罪的羔羊。

巫山县和大昌镇是我采访的重点，采访中我与许多农民结为朋友。他们不时以信件和电话或者直接到北京与我联系。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大昌镇官庄村数百村民联名写信状告巫山县政府与大昌镇有关部门，说他们要在官庄世代水源上建立垃圾处理厂。我与国家环保局污控司联系，由国家环保局污控司出函要巫山方面寄来项目审批的环境评估报告，但巫山方面不见回音——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位副县长还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记者多管闲事，给县里添乱。可见，某些基层领导做起事来简直无法无天——天晓得他们背后搞什么鬼名堂。

近日读报，又见“三峡移民惠州来安家谁承想新房竟是‘豆腐渣’”：说是广东惠州市非法将 1100 万移民工程款耗掉，给 899 名“舍小家 为国家”千里迢迢来惠州安家落户的移民盖了一堆连地基都没有的烂房。

想想百万移民的处境，我决不能视而不见。整个移民大军中喜少悲多，

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如果我们在三峡工程论证中，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再多一些预见或考虑，三峡论证也许会是另一种结果。我想掏出心来告诉读者，那些面对哭别家乡在动荡中求生的百万三峡移民无动于衷的人，竟是何许人也？

“水利专家”潘家铮在电视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李白在诗歌中曰‘两岸猿声啼不住’，表明那时三峡猴子很多。现在三峡里猴子好像很少，几乎没有了。如果说那地方还有很多的猴子，我们能不能去修坝？一修坝就影响猴子。如果是西方学者，他看一定不能修坝。你怎么能影响猴子呢？但是我不修这个坝，保护了猴子，却让我们的人民永远过猴子一样的生活，你说这公平不公平？”

潘家铮说的未免太轻巧和荒唐。首先，以人为本的西方学者，第一注重的恰恰是人而不是猴——潘的言论只能说明他的无知和无耻；其次，移民 “为了国家利益，听从国家安排”搬迁后，许多移民面临的生活惨状甚至不如猴子，他视而不见。

老舍《茶馆》中常四爷讲的一句话，用在今日移民身上，可能更耐人回味：“我是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呢？”

4

近来又听说大昌镇政府已于 3 月 26 日和 3 月 27 日迁到新址邓家岭。迁居那天，先是头天夜间祭神烧纸共 300 斤，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镇党委和镇政府分别搬迁——警车开道，威风八面——比以前县太爷出行高举“回避”和“肃静”的两块牌子要气派得多。新镇办公大楼装了 25 瓦彩灯 6000 多个。镇领导说，年底移民住进新镇时还要放炮——那时如果有钱就放 20 万的鞭炮，无钱就放 10 万的——反正得热闹一番——老百姓的移民款就是这样被糟蹋挥霍。

钱花的如此大方，眼下二期和三期移民经费缺口还差 1.5 个亿。上任才 4 个月的大昌镇书记唐兴建在巫山某大酒店抱着副县长兼县移民局长的刘道生的大腿哭讨移民款。因为唐来到大昌这么久县移民局没给他一分钱。唐兴建回到大昌后大会上公开此事说，我 50 岁的人给 40 岁的县长下跪，心里也很难受。县委书记王爱祖事后对我说，你以后再不要这样做了，你是共产党员，应当挺起腰杆过难关。但我没有钱移民迁不走，挺起腰杆有什么用？

就是像王爱祖这样的讲大话空话的干部，把移民坑苦了。我敢说，三峡里好干部也有，但昧着良心挥霍和吞噬移民款的干部却远比好干部多！他们有了钱就讲“安定”，移民要应得的移民款就是闹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老百姓连一块哭的地方都找不到！

5

三峡的文化价值，我在书中已经写了很多。但仍然觉得言犹未尽。这几天又听说北京仍在大面积拆除胡同，拆得让我心痛。过去，我们对文化或文明的漫不经心，曾经毁了北京厚重的明城墙。现在却仍然在重复着第二次、第三次“毁灭”，这真是一种让你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心态。

三峡的淹没不是我这个小人物能够挽回的事实。我能够做到的事情是，用笔记录下某些握有实权和财权的人物，却眼见峡中和库区文物的淹没而不愿多作为：他们没有力所能及地实施最大限度的抢救，而是敷衍塞责，基本上不把文物抢救当作一回事。有钱不给，国际合作发掘不行，90%的地下文物得不到抢救还不说明问题吗？

三峡工程“论证”最重大的失误，就是目光死死盯住“经济大局”而忽视了对百万移民长远的生存和三峡的“文化”价值的关注。就文化而言，有相当的人物认为，三峡文物，不就是一堆坟墓一堆破庙一堆烂砖头，淹掉就淹掉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实用的眼睛里只看见“实用”的三峡大坝，其它概可忽略不计。他们根本意识不到或根本就不想意识到，三峡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保护三峡文明文化是我们不容忽视的责任。如果仍然继续坚持以毁灭文明文化为代价换取所谓的“经济效益”，那么等这种缺失文化的“经济效益”来临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什么？

打个比方说，现在有人说，为了北京城建设的需要，故宫北海要拆掉盖楼房，一定会遭到举国反对。但毁掉三峡，这个整体文化价值甚至在故宫之上的文化地域，却少有反对声音。何则？因为三峡至上的宣传盖过了一切，除了部分学者，相当的民众没有意识到三峡地域潜在的文化价值！50 年来，正是因看不到“潜文化”价值的短视，文明和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毁掉了太多。

现在，除开大水淹过三峡，中国早期猿人的研究，巴人历史的研究，巴楚、巴蜀文化交融的研究，诸多历史课题成为了永久的悬案之外，三峡

地域民风民俗随着移民的迁移而消失，注定将是中国文化史上永远的心痛。

继北京古城的被破坏 50 年之后，又有了今天三峡文化的毁灭：当初把北京城墙扒掉，理由充足得感天动地，今天后悔了；现在把三峡淹了，将来是不是又来一次悔不当初？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太缺乏自省精神，也是导致了文化毁灭悲剧不断地发生的另一个主因。对文物遗迹破坏的随意性意味着对历史的冷漠和忘却——我们已经十二分习惯在缺乏民族尊严的忘却中生存了。

6

近些年，我数度在三峡中往返。每次与高耸的大坝擦肩而过，或者住在大坝宾馆，天天与大坝对望，从没有在心中生出自豪的感觉，甚至还有丝丝悲凉之情。一次晚饭后去大坝专家公寓采访地质专家薛果夫，恰在公寓门口遇见几个老专家。老专家刚刚吃罢晚饭，围在一起谈笑风生，个个怡然自得。见到这群人，我竟然顿时心生愤慨，因为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些用技术实施淹没三峡的老知识分子，为后生究竟在树立什么榜样？坦率地说，甚至他们的微笑我都感到虚假和可怖。

如果问起我，采访三峡这些年，有没有令人高兴的事。我的回答是，只有一件：那就是 2003 年初，在赴大昌采访的船上，听到朋友的电话，告诉我温家宝总理批文否定了有人要在怒江再建大坝的消息。

真正意义上的三峡现在没有了。虽然，我笔下的三峡多少记录了一些消失的记忆，但挂一漏万，也仅仅如此而已。当初决定写这部书，主旨是力所能及求真求实。现在，我心怀忐忑，把这本说了些真话的书献给读者，也同时献上了我对三峡淹没的忧伤。直到今天，我仍希望三峡工程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梦。

此刻，夜正深，从窗外飘进来阵阵梧桐花的清香——我再一次想起离别我们远去的三峡——在这略带寒意的春夜，不知伤痕累累的她已经走到了哪里？

祈告上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想舍掉我的身体，为她寻一个温暖的家。

2004 年 5 月 6 日至 12 月 5 日

致友人

关于三峡的书终于写完了。回首四年的辛苦，我最想说的话就是“感谢我的亲友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我所感谢的亲友有：王立刚、刘延庆、岳建一、杜学平、吴琰、马平、李胜楠、张晨、杨兴贵、王雄、童永强、杨传真、韩三洲、陈京生、石玉林、冯金声、罗昌平、时金凯、王孺牛、徐麟……是他们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了我精神或物质的支持。四年来往来于三峡腹地，我的头脑里常常浮现这些朋友的身影。仿佛风里雨里他们时时站在峡江两岸，关注着我的行踪与安危。

我赞成孔子所倡 “友直、友谅、友多闻”的交友三益之说。我的这些朋友当然都在达标之列。

人生朋友多，喜怒哀乐共享的机遇就越多，品味的人生滋味才会更足。

人活到我这个年纪，已经能深通稼轩词所云，从“少年不识愁滋味”到“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人生体验。但稼轩的词意里却含着情绪上的消极和凄凉。谁都希望过一个永远快乐的人生，事实上这种生命过程根本不存在。人生，原则上说，是苦难与欢乐交织更替。

三十多年前，大学刚刚毕业，即被放逐于燕赵山野间。那时常与我慷慨悲歌的天津好友王宏光，虽已多年不通音信，但他一直是我十分怀念的朋友——我们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忧郁、最困惑而又快乐的一段时光。那段经历告诉我，不管你做什么事，生命中一定不能缺少与你共享快乐和对付苦难的朋友：一个人好比是风筝，朋友好比是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朋友越多，风筝才能飞得越高。

我拥有朋友，所以我幸福。但我知道，生命短暂，岁月如流，这幸福的时光也不会长久。我倍加珍惜与朋友一起生活的每一天。

2004 年 12 月 5 日